

总策划 罗强烈

呐喊
第

主编 卢跃刚 罗强烈

本报今日出击

基于正义与良知的呐喊
首次披露所有新闻幕后
如果你关注这个时代
关爱你自己
本书会告诉你
这近百个中国社会问题故事
离你究竟有多远

追寻正义

南方日报出版社

中国青年报
CHINA YOUTH D

呐喊丛书

本报 今日出击

主编 卢跃刚 罗强烈

中国青年报

1998年7月
16
星期日
今日八版
第9197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62
(代号 1-9)

YOUTH DAILY

南方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报今日出击：中国青年报调查性报道选 / 卢跃刚，
罗强烈主编. —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1

ISBN 7-80652-019-8

I. 本... II. ①卢...②罗... III. 新闻报道—作品集—
中国—1979—1999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7007 号

本报今日出击：追寻正义

卢跃刚 罗强烈 主编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020) 87374631、87373998-8509、8503

经 销：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南海市彩印制本厂

开 本：850mm×1168mm 大 32 开 印张 15.125

字 数：301 千字

印 数：1-10000 册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52-019-8/I·10

定 价：全套(三册)75.00 元 每册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 序

罗强烈

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时常告诉我，我们中国人太需要基于正义和良知的呐喊了。

非常惭愧，我在新闻界工作了 16 年，直到去年底才“呐喊”了两声，一是《只有本报记者一人旁听的庭审》，一是《党报记者隐性采访历险记》，而且这两声呐喊很快都被深厚无边的旷野吞噬殆尽了；但是，这两声呐喊唤醒了我心底的良知，激活了我胸中的激情，于是，我决定编辑一套《呐喊丛书》，以荟萃国人弥足珍贵的基于正义和良知的呐喊。

鲁迅先生说过，他的“呐喊”“须听将令”。那是一种基于一个时代的信念和理想的将令。五四时期，人类无数思想的明灯从西方传照过来，照亮了我们沉沉数千年的封建生存状态。主将们悚然惊起，引进民主与科学，以期从制度上为中国人建立一种崭新的生存空间。——重要之处在于，创建一种民主和文明的生存制度，不仅仅是“五四”一个时期的社会总主题，更是我们民族

一个世纪、两个世纪，甚至将会是更多世纪的社会总主题。

正义与邪恶、文明与愚昧、民主与专制，无时无刻不在我们民族的所有生存领域残酷地搏斗着。以一种对人民的良知与爱心，以一种对自己的生存空间负责任的态度，去为一种社会信念和理想而呐喊，是一件绝对庄严而荣耀的事情。

在布达拉宫那间悬于半空的大堂里，数千盏酥油灯层层叠叠地燃烧着。我当时只惊异于那种灯海的壮观。但是，当朋友告诉我，自从布达拉宫建成以来，这里的酥油灯就没有熄灭过，灯里的酥油全是由成千上万人来这里朝佛的信徒依次往里添加，一种信念使每盏酥油灯里的酥油从不间断，数千盏酥油灯燃烧着穿越时空，创造了一千多年没有黑暗的岁月……我从心灵深处受到震撼，我看到了一种力量的汇聚方式与理想的实现途径。

就《呐喊丛书》而言，无论是每一位写作者，还是每一位读者，实际上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信徒般地参与着一种基于正义和良知的呐喊。

2011/10/30

风云际会

（代序）

卢跃刚

一开始，我便与强烈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应该编一本书，来记录中国青年报人自 1978 年复刊以来推进新闻改革、推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历程，来检索新闻在中国社会 20 年历史进程中的光荣与梦想，遗憾与悲哀。基于这种想法，这本书所收集的作品不仅是编年史印象中的名篇，更是洋溢着新闻记者职业精神的记录；不仅是 20 年新闻篇章的冷峻检索，更是中国青年报人掏出滚烫的心与新闻界同行，与立志新闻事业的后来者，与昨天、今天和未来的读者说话；不仅是中国新闻界一个群体人格与才华的体现，更是这个群体为了维护应有的职业尊严所经历的痛苦和欢乐。

于是，中国青年报三代人踏着清晨的露水，沐浴着灿烂的晚霞，匆匆赶赴中国青年报人本世纪最后的约会。走进我们这部书的记者，年龄最大的 70 岁，是抗战时期的老同志；年龄最小的

22岁，到报社只有一年多时间；男女老少，或白发苍苍，或英姿勃发，或才高气盛，或老成持重，或一身清贫满腹惆怅，或百转千回几多遗憾，或名满天下文章舍我其谁，或沧桑世故凡几奈我者何，或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或低吟“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他们前赴后继，同道而来。他们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家”是什么？是归宿，青春的归宿；是中国青年报东围墙根那三棵扎在土地里踏踏实实生长了数百年的老槐树，——春天来了叶繁花开，冬天来了枝杈刚劲直指苍穹。便是那般温暖和苍凉，时时令人感动，时时托付着中国青年报人青春的灵魂。老青年报人爱说这么一句话：我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青年报。这句话，如果细细品味，心态极其复杂。以我之观察，有怀念，有希冀，有憧憬，但是，绝没有轻浮；有哀怨，有沮丧，有愤懑，但是，绝没有后悔。于是有了我们这本书。

我经常想这样一个问题：20年来，中国青年报到底有什么东西感染并吸引着青年才俊加盟旗下，以心相托？前不久，我遇见一位50年代初参与创刊的老青年报人，他说，中国青年报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种东西深深地影响着中国青年报人，形成了中国青年报独特的魅力。以我十几年之体验，这种东西实实在在，能说清楚，否则无法解释20年来的薪火传递人才辈出，无法解释如此众多的好报道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鲜明印记。一言以蔽之，就是理想主义加业务民主空气。仅仅提供一个生存的场所，如果仅仅是福利的现状和福利的承诺，或者是名份的虚荣，那也许能托住人，却托不住心。这不是唱高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存的大环境，因为我们知道“福利”的中国青年报实在是捉襟见肘，因为我们知道对于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来说什么东西最重要最有价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珍视什么放弃什

么。这恰恰是最现实的个人选择的基础，虽然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如此之大，虽然现实问题常常让我们糟心不已烦恼不已。“现实”怎么说？“现实”对我们说：你什么都想得到，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理想”或“理想主义”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也是一个曾经被利用被亵渎并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话题。可是，我不得不说，“理想”或“理想主义”构成了中国青年报的凝聚力，至少构成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青年报狂飙突进领中国新闻界之风骚时期的凝聚力。一天，采访中心副主任叶研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对我说：“跃刚，你的序一定要写当今这一代记者职业意识的觉醒。”“觉醒”指的是什么？我理解，就是记者要有起码的职业尊严，不能重蹈荒诞年代里假大空、人云亦云、指鹿为马、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覆辙，不能再让我们的后代指着我们的后脊梁骨骂娘，然后施舍给我们一点理解和一点令人悲哀的怜悯；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无论面临怎样的压力，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并作出写什么不写什么的选择。不管我们努力的程度怎样，只要我们能挺着腰板说“我们努力过”，足矣。得出这样的结论很简单，只要翻翻报纸的合订本就明白了。有人说，新闻是用脚跑出来的。我说，这只是皮毛。我要说，新闻是用“思想”跑出来的，用自己的“思想”跑出来的。新闻记者本来就是功利性极强的职业，加之特定的政治文化约束，如果“思想”是一张白纸，即使健步如飞，也永远是不知所终，事倍功半；如果满脑门子“功利”选择，左顾右盼，过于权衡利害得失，投机取巧，梦想播的是“跳蚤”而收获“龙种”，将来翻剪报册的时候，只能是永远的内疚和遗憾。我这里所说的“思想”，主要指的是记者的价值和立场。在我们生长的这块土地上当一名正直和有良知的

记者，是件太不容易的事情，既有历史的阴影，又有现实的困境，既有压抑，又有诱惑，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归宿感很难存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屡败屡战，生生不已；才会有许许多多值得骄傲的报道被历史记录在案。

当记者时间长了，都有稿子被“枪毙”的痛苦经历，读者能看到的报道，仅仅是冰山之一角。为了一篇稿子被“枪毙”而哭泣过，沮丧过，绝望过，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枪毙”不是撂挑子放弃的理由。决定一篇稿子上与不上，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不去争取、不去努力却没有理由。新闻编辑中心副主任李大同说：“真正的新闻理性知道什么是限制，最后超越限制。”本书收集的为《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平反、陈爱武事件、“第五代”中国留学生现象、大兴安岭火灾、1998年洪水等等等等报道的成功就是明证。张建伟经常用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来鼓励自己，我则愿意举中国治水的例子。比如黄河。黄河是抚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几千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和痛苦的害河，甚至有“黄河清，圣人出”的诅咒与期待。面对黄河，我们爱恨交加。明明知道黄河水永远不能清澈，明明知道黄河绝难尽行舟楫和灌溉之利，明明知道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修筑的堤坝可能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明明知道治河“不能改变，只能改善”，却丝毫不能贬损我们的祖先和他们的子孙满目希望，满目绝望中的希望，在黄河岸边种上一棵树，为黄河大堤培上一抔土，为黄河决口背上一捆薪草的永恒意义和价值。种一棵树，培一抔土，背一捆薪草，年年累积，循环往复，绵延不绝，何等壮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感受到不懈努力的“理想”的高峰体验，才能登临怀风，在历史的伟岸上感受风云际会，波澜壮阔。

复刊以后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第二阶段是90年代。两个意象

似可概括：其一，“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其二，悬崖边沿的舞步。大江弄潮，欲取肥美之鲈鱼；悬崖舞蹈，即揽奇峻之风景。——惊险而富于挑战。

80年代，中国青年报人构成年轻，思想活跃，支持改革者，鼓吹改革开放。中国青年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忌讳“老”，忌讳“旧”，有很强的年龄危机感。报道强调深度（于是有“深度报道”之说），强调干预社会（于是“批评报道”滥觞），对新思想新观念异乎敏感，传播新思想新观念不遗余力，许多报道一经推出，便有争相传诵争相模仿之盛况。这一时期的报道与“理论新潮”相呼应，具有浓重的启蒙色彩；文章推重“气势”，亦不免浓重的思辨色彩。记者风格迥异，各行其是，各领风骚；报社内部浓郁的业务民主空气，等级淡化（当然不是不讲必要的程序），资历淡化，认稿不认人，鼓励争辩，鼓励记者坚持个性，甚至极大限度地理解记者的某些怪异和过激行为。评价记者，老面孔新面孔不重要，能力是第一指标。于是，中国青年报报道不拘形式，花样翻新，与报道内容相匹配，不断给中国新闻界带来强烈的冲击波。中国青年报充满了机会，是培养名编辑名记者的摇篮，成了公认的事实。

90年代，中国青年报进入了漫长的困惑和调整期。困惑和调整，严格地说，至今没有完结。原来一重挤压，现在是双重挤压。一重挤压，自上而下，则可“放开大路，占领两厢”。于是90年代初期，“经济蓝讯”、“社会周刊”、“生活周刊”、“冰点”等“特刊”勃兴。媒体市场化冲击，由一重挤压到双重挤压。“卖点”在哪儿？出现了以市场取向的“找卖点”的争论。围绕着报道主体，出现了“观念”与“关节”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是在《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崛起，电视报道改观，社会生活世俗化、市民化趋势，“机关报”性质不能动摇，怎样才能“有

所为，有所不为”的背景下展开的。当我们以调查性报道为主线编辑此书时，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90年代的报道单篇单组比较，社会影响远不及80年代的报道，80年代一些报道今天读起来，亦堪称美文。但是，90年代的调查性报道竟在本书中蔚为大观，占了绝对多数，而且总体分量不弱，原因何在？大的方面说，与社会形态、社会发育程度有关，与媒体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功能有关，当然也与记者的社会经历和生活态度有关。如果说80年代的报道更从宏观上关注社会变革，那么90年代更在微观上关注民生关注普通人的生活；80年代更是“政治”的，90年代更是“社会”的；80年代更提供“认识”，90年代更提供“认识的基础”。这种变化，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的社会功能。——新闻由“典型”回到了“常态”，记者由“主体”回到了“客体”，文体从注重“通讯”写作到更注重“调查性报道”的写作，版面从“大篇幅覆盖”到编辑多重信息组合。我们意识到，中国青年报的嬗变，实质是“职业回归”，还新闻以本来面目。叶研在他的“新闻幕后”中说：职业记者的报道“第一是事实，第二是事实，第三还是事实；第一是叙述，第二是叙述，第三还是叙述”。我以为，这是一种渴望“回归”的极致说法。我同意这个说法。

20年里，我们也曾文过饰非，我们也曾逃避现实，我们也曾说过大话空话套话违心话；我们顽强地坚持过，我们无奈地放弃过，我们痛苦地反思过。然而，我们将不懈地坚持新闻在文明社会里所应有的尊严和价值。惟有此，才有可能使“新闻记者”无愧于艰难的人民与前进着的历史。

我们仅以本书作证。

1999年11月25日于北京木樨地

目 录

不敢当王海 (1)

他并不想像王海那样，发现假货，动辄斥资万元买他个轰轰烈烈，然后再去索赔。他只想亲身试试，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买到纯属自己消费的假货以后，在依法索赔的过程中，究竟有什么遭遇。

记者手记：其实文中的主人公根本不是什么王瑞，而是我本人。

一篇正面报道的背景追踪 (25)

三姐妹自筹资金义务办学，怎么成了沽名钓誉？又何迹可发？学校为何被强令停办？盖着宣传部大印的稿件为什么要颠倒黑白？此中一定大有文章。

记者手记：为了公正，我有一个铁的原则：不能领受当事人一顿饭、一杯水、一根烟。

晋江“9·21”火灾：千里寻访生死两界..... (38)

因为劳资纠纷，老板拖欠工人工资，打工仔一把火烧了外

商老板的工厂。32个打工同伴随之葬身火海。除了本文以外，人们好像听到似曾相识的故事。

记者手记：这组报道，旨在告知读者，唤醒同胞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对活着的打工仔、打工妹的关注。

莆田：向“公关小姐”征税引发争议…………… (61)

税务局长说，如果把当地所有的公关小姐都纳入征税的范围，每年能给当地财政增加上千万元的收入。向“三陪小姐”征税，是否意味着“三陪”的合法化？既然“三陪小姐”要征税，那么那些找“三陪”的先生们是不是也该征税呢？

记者手记：讨论引起了罗干同志的重视。为此，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李永贵率队到福建进行调查。李得出的结论是，“福建莆田地税部门对‘两高人员’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做法是对的”。

面对贫困…………… (70)

大学校园里的毕业生除了物质贫乏之外，是否还存在着精神贫困？

一位穷得不能再穷的大学生，家里为他借了数千元债务，记者问他：“现在有一份扫地的工作，你干不干？”

他睁大眼睛说：“我不能因此忽略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呀！”

记者手记：我们得知，凡是勤工助学设立清扫岗位的学校，几乎百分之百宣告失败。

“上访村”纪事…………… (86)

这个牵挂了县、省、中央不少领导心的小村庄，并没有传言中凶悍的“刁民”，老百姓一句句朴实的话语震撼人心：“俺不就图过个好日子么，谁愿上访穷折腾呀？”

记者手记：让我理解了为什么当年群众不怕坐牢也要上访。

雷州“7·11”海难追踪 (102)

从早晨8点左右，渔船被风浪打翻，到下午3点半最后一位幸存者爬上岸边，在这中间的七八个小时里，出事渔民所在的企水、纪家两镇的所有领导，竟然没有一个出现在出事的海难现场，满海滩的尽是那些在声嘶力竭地呼喊自己的亲人赶快回来的父母、妻子和孩子。是海难还是人难？

记者手记：每每看到某某国家的头脑中止正在进行的国事访问，赶回处理国内突发自然灾害的新闻，就对这些国家的百姓羡慕不已。在采访雷州“7·11”海难的日子里，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蹊跷的特大毁容案 (121)

罪犯作案的时候，肆无忌惮，门大敞着，门外有村干部；房内哭天抢地，门外置若罔闻……于是有了报告文学《大国寡民》。

记者手记：当我在黄河岸边面对武芳的时候，我便知道，我必须拔剑了。我无可选择。

泰山作证 (136)

在共和国历史上，他是自刘青山之后受刑最重的一位地委书记。他敢吹，他能把5亿财政收入吹成12个亿。当地的老百姓说“泰安的每一头牛都认识胡建学”。当农民去找他告状，说他们乡的党委书记是个贪官时，他这样回答农民兄弟们：“你们回吧，感谢你们推荐了一个好干部。”他写了一部书，称作“胡选”，在当地当作“邓选”来学习。这就是胡建学其人。

记者手记：关于《泰山作证》，我实在是不想再说什么了。

宝鸡“3·12”事件追访 (150)

车匪路霸人们也见多了，见死不救人们也见到了。而靠抢、窃步入小康、成了暴发户的人则不一定见得很多。

记者手记：表扬表出了麻烦：“刘斌和媳妇离婚了，你写他媳妇好，把刘斌气得不行。”“你写完拍屁股走了，把我们弄在这难受。”我写过那么多的批评报道，从未出过纰漏，惟有这一次。

民以水为天 (164)

就在最不应该缺水的淮河水利委员会，也赫然贴着这样的通知：每个职工家庭每天供水 10 公斤。就在前两年还是靠养鱼致富的“于老万”，转眼之间变成了“于光蛋”。因为水质差，鱼都死了。

记者手记：一位熟人见到我说：“让我最难忘的是那个细节——记者采访‘淮委’副主任时，见他手拄双拐，原来，他是骑自行车去取井水时不慎摔成骨折。想一想堂堂的国家‘淮委’副主任，因为被迫取井水摔伤，说明了淮河污染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沈阳不相信眼泪 (177)

有人说，沈阳是一只恐龙。架子虽在，但气脉已虚。这个以“辽老大”著称的全国重要的重工业城市，进入 90 年代以后，经历着经济结构调整，下岗工人剧增等等的阵痛，并且还痛得不轻。正如记者朋友所讲的，在没有出路的地方往往孕育着新生。

记者手记：沈阳是苏联体制最大的受惠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那里的跌宕一定很强烈。解剖好了转型期的沈阳，就解

剖好了转型期的中国。

假种子事件调查 (214)

在湖南，有一个由几个农民创办的名为“三江口特区郊区种子公可”，把他们的假种子卖到了安徽，卖到了广西……农民哭成一片，万亩农田绝收。它们的假种子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记者手记：碰到了几乎所有记者都碰到过的问题：上级有关新闻单位记者到我县各有关单位进行采访报道的，须经县委宣传部同意后方可采访报道，若未经批准，擅自进行采访报道，产生不良后果的，由提供报道线索的单位（或个人）负责。

申冤无泪 (235)

在西安一歌舞厅内，一公安人员当众把前来劝架的刚从部队回来不到10天的陈巍打死。由于凶手的特殊身份，被害人的母亲开始了艰难的上访之路。

记者手记：在《申冤无泪》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心肠慢慢地变硬，血慢慢地变冷，我发现自己几乎很容易接受不公平的现实。新闻媒体不应该成为上访中心，不应该承担不属于自己责任，但是这部分职责该让谁承担呢？这是我在写过《申冤无泪》之后想不清的一个问题。

中国不是国际垃圾场 (253)

要致富，进废物。进入90年代，在中国东南沿海，悄悄矗立了上百座由洋垃圾堆成的山。它们来自风光美丽的美国。有人把你们家阳台当作垃圾场，你作何感想？

记者手记：“如果‘垃圾场’一文不能获得一等奖，我们《中国青年报》将拒绝所有的奖项。”几天后，我终于站在主席台上领取了这一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好新闻一等奖的证书。

谁对新生儿生命负责..... (272)

在沈阳市某医院，18个哭声嘹亮的新生儿相继感染死亡，在死亡诊断书上年龄一栏里以天计算，最小的8天，无一人超过20天。他们的父亲不敢回家。谁对新生儿的生命负责？

记者手记：这是这一年《中国青年报》反应最迅速、最敏锐，时间跨度最长、篇幅最多、信息最密集、最充分的一组报道，同时也是一组调动人力最多、采访最艰苦的调查性报道。

中国第一村揭秘 (288)

一位在职的官员问禹作敏：“中央各部的部长都不坐这么豪华的奔驰，你是什么级别，你敢坐！”

禹作敏回答：“我们农民没有级，别拿有级的比。”

大邱庄的人说：“老头的车有多好，大邱庄就有多好，老头的车开得有多快，大邱庄就有多快。”

记者手记：有人说，写出了那么好的大邱庄报道，是否接受了大邱庄的什么好处？对此，在采访时也在大邱庄访问的报社党委书记和新闻研究所所长说：“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这算什么博交会 (324)

代表们带着满腹的希望来到海口，他们发现展厅里都是卖方，没有买方。钱收了允诺的条件一个没有兑现。博览会开幕之日即是闭幕之时。

记者手记：要么半途撒手，要么奋然前行，与之相伴的，往往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

蒜苔突围记 (338)

市场法则不听这一套。供销社向菜农收购蒜苔，每公斤

1.80元，个体户每公斤收购2.20元。个体户与供销社之间玩起了“擂台战”。

在各交通要道，“大盖帽”们警惕地盯着每一个过往车辆。政府进行“蒜苔阻击战”，个体户则玩起了“游击战”。

一个小小的通海县城被蒜苔搞得昼夜不宁。

记者手记：当时我想，农民还不会游泳，会不会被淹死？

半个世纪的论证 (346)

在三峡工程问题上，李锐和林一山可以说不是冤家不聚头，说他们是针锋相对，一点不错。在“南宁会议”上，三峡问题正式提出到政治局讨论。

毛主席说，把林一山接过来。

当即有人反对说，林一山赞成三峡，也有反对搞三峡的哟！

毛主席问：“谁？”

“李锐。”

“那就把李锐也接过来！”

三峡工程，与这两个老人的命运直接联系在一起。

记者手记：此文发表后的第二天，三峡工程“反对派”李锐先生即打电话来要见我，李锐看完报纸后，非常激动地说：“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得了，真不得了呵！”

含泪再炸邱家湖 (370)

“要炸，自己炸去，我不当坏蛋！”区长说。

“不能再炸了，你们走了可知俺们修堤取土要遭多大罪！”老百姓说。

然而，为了下游人民的安全，堤还是炸了。

这就是真实。这就是1991年安徽水灾的一幕。

记者手记：把“现场”拿出来交给读者，并不需要更多的

东西，同样可以惊世。

十万吨查私聚丙烯假合同案追踪 (377)

“有聚丙烯吗？”

“要说有也有，要说没有也没有，看是谁买。”

记者从此开始，卧底报道揪出了犯罪嫌疑人，并与警方合作，捣毁了一个涉嫌一亿多元人民币的经济诈骗案。

记者手记：商量来商量去，干脆，扮成情人，跃刚要横，显出江湖上熟门熟路的交道；我则显得越没心眼儿越好，整个什么也不懂，就知道跟着。

私营企业家联名推举市长候选人 (398)

一位老板对记者说：“我们农民企业家说到底还是‘带头王’，我们要推举能代表我们利益的政界人物参加竞选。”

记者手记：一起去采访的记者看到那么多的人参加竞选，自荐自己作为市长候选人。

重铸一代海魂 (404)

季风在交替劲吹，无边的海浪带着永世不竭的冲动在沸腾。中国人把脸转向了海洋。

记者手记：我仅仅想写一个主题：海权忧患。

三十万临时工在深圳 (431)

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聚集一地的最庞大的临时工大军。

30万临时工，当时超过了深圳固定工人总数近4倍，比深圳常住人口多5万人，相当于非洲吉布提这种小国的总人口。

记者手记：《30万临时工在深圳》系列报道发表后，我欲罢不能，接着写了6万字的报告文学《痛苦的年代》发表在《中国

作家》上。它成为披露中国临时工问题的开山之作，尔后转载率之高出乎我的意料。

中国铁路悲歌..... (453)

翻车。撞车。客车着火。

买票难。乘车难。运货难。

中国铁路何以应付全方位开放的局面？

记者手记：新闻还得用脚去写，脚底板下出新闻。

时间：1997 年 11 月 26 日

作者：刘元

不敢当王海

刘元：文中的主人公就是我

不敢当王海

北京的王瑞决心当一回王海。

这念头是他参加了一次消费者权益的社会调查后产生的。

他没想到，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家庭那 5000 万合法权益受到分割的城镇居民中，敢于奋起维权的仅占二成；更没想到，消费者高达 68 亿元的损失中，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得到的赔偿只有 11 亿元。

王瑞对此大惑不解。照理说，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把尚方宝剑，受到侵权的消费者，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找商家依法讨回公道。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却窝里窝囊地放弃自己的权益呢？

正是为了寻找这个答案，王瑞才铤而走险的。

他并不想像王海那样，发现假货，动辄斥资万元买它个轰轰

烈烈，然后再去索赔。他只想亲身试试，一个普通消费者买到纯属自己消费的假货后，在依法索赔的过程中，究竟会有什么遭遇？

假货贩子捣鬼有术

他听说市场上假货不少，但买什么却很茫然。因此，当他在北京西单一家大商场里，逛了几圈儿也没发现报上登过的、王海买的那些无邮电部进网许可证的进口无绳电话、“卡西欧”计算器和“日立”充电电池时，感到十分沮丧。

但在那家商场的地下室，他却意外地发现了“猎物”——柜台内那些包装得五彩缤纷的游戏卡。

去年春节，他曾买过两盒这种被称为“任天堂”的游戏卡送给侄子。11岁的小家伙只瞟了一眼，就一口咬定这是假的，还从自己的游戏卡盒里抽出张卡片，上面印着：所有“任天堂”原装产品，均附有防伪冒银色立体镭射标记、产品质量保证印章、一年免费保用印章，说明书底还有一年免费保用证。而他买的游戏卡，里里外外也没见这些标记。

两盒卡花去700多块钱，他一个月的工资。为这，他年都没过痛快。如今一见这假卡还在卖，气就不打一处来。

他装作不经意地问售货员：“有‘任天堂’游戏卡吗？”

“有。”售货员边说边拿出几盒。

他选了3盒，开好小票去收款台排队交款。眼看要轮到他了，忽然，一个没穿工作服的年轻女人匆匆走来对他说：“您过两天再买吧，这是新上的货，编号还没输入收款机呢。”

“你们的货根本没号儿。”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收款员已冲那年轻女人喊了一嗓子，并顺手把他的钱收了。

取游戏卡时，他发现那年轻女人正蹲在柜台底下往每个游戏卡盒上贴合格证，合格证上的经销商为广东惠州赣亚实业有限公司，还有地址和电话。出于好奇，提完货后，他用手机拨通了那家经销公司的电话，没想到对方竟是私人住宅。

他到商场总服务台投诉，值班的人说负责人全在外面参加活动，让他到外面找。他走出商场。那天是3月15日，商场门外热闹非常，正在举办庆祝“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几十张桌排成一条长龙，围着密密匝匝咨询投诉的人群。

他挤进北京技术监督局设的咨询台，想鉴定此卡的真伪。但懂行的人当时不在，几个执法大队的人一看外包装，就断定此卡起码属“三无”商品。听说此卡是刚在这家商场买的，一个自称商场服务科的小伙子热情地把他带到办公室，并递上一杯热茶，始终微笑地听完他的投诉，立即前去调查。

10分钟后，小伙子回来说，那柜台刚搬了地方，还没来得及查他们的货，但去带来了退货款和按《消法》规定赔偿一倍的钱，还再三表示歉意。弄得他反倒怪不好意思的，也就没再追究假合格证的事儿。

等过了“3·15”，就没有这么顺的事儿了。

十几天后，在北京王府井一家卖儿童用品的商店，他一进门就看见两边各有一个卖游戏卡的大柜台。听说他要买“任天堂”游戏卡，售货员立即拿出几盒8合一、9合一、43合一的让他挑，还介绍此卡产地北京。而卡上明明注明“MADE IN JAPAN”。

他拿着买的卡找到值班经理投诉，那经理说不了解情况，让先退货再解决。他不同意，经理留下他的手机号，说明天业务负责人会和他联系。回家后，他发现发票上的财务章根本不是这家的，而是崇文区某百货商行的。

第二天一早，有人呼他，但不是商店的业务负责人，而是游

戏卡的供货商。那人提出别去商店，找个地方“私了”。他拒绝了。他认为在商店买的应该找商店解决，而且商店也不该把他的电话告诉供货商。

上午，当他来到那家商店时，业务负责人不在，可供货商在门口等他。那人指着马路对面一家著名国营大店开设的玩具店忿忿地说：“那儿也有卖的，我就是看它卖才进的货，你怎么不去买它的？”

在商店等了好久，才等来了业务负责人，而他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供货商。供货商则说辞不少，但最终也没拿出此卡为真品的任何证明。于是，商店的业务负责人让供货商撤货并付赔偿款。供货商老大不乐意地付了钱。

临走时，商店的那位业务负责人朝王瑞甩了句：“有人借打假获利。”好像商店卖假反倒有理。

出了店门，他径直走进马路对面那家被供货商指控为“罪魁祸首”的玩具店。一进门正对着就是卖游戏卡的柜台，果不其然，假卡至少有 20 多种。他问售货员：“有‘任天堂’游戏卡吗？”

售货员指了指柜台说：“有，每种只有一盒。”

但当他说要买 6 盒时，售货员小姐神色骤变，磨蹭着不肯开付款单，接着又说机器坏了，小票出不来，边说边离开柜台。

一会儿，她和一位胸卡上标明是副经理的先生一起过来。那副经理先拿起游戏卡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阵，又用狐疑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着王瑞，柜台内的几个售货员也盯着他窃窃私语。

他想，许是买得太多了才引起怀疑，于是说买 4 盒。售货员从那被说成是坏了的机器里开出付款小票。他去交款时，收款的人只在发票上写“游戏卡”，无论如何也不肯写“任天堂”3 个字。他去问售货员：“既然你卖的是‘任天堂’卡，为什么不在

发票上注明？”小姐居然改口说：“这不是‘任天堂’卡，是兼容卡。”而这些游戏卡上分明印着“任天堂”的注册商标“Nintendo”，虽然他敢断定这些游戏卡绝对是假“任天堂”，但担心发票上不注明品牌，索赔时可能惹麻烦，因此退了货。但当他再一次光临此店时，那些假游戏卡已荡然无存。

商家和二道贩子什么关系？

走了几家商店，他发现了商家的诸多“通例”：如果消费者不提醒，售货员决不肯把商品的牌子写在发票上（尤其是知假卖假时）；当消费者买到假货找商家投诉时，他们确认后，往往会说“给你退货吧”，而决不会主动按《消法》第49条进行加倍赔偿；即使碰上既懂法又认死理的消费者，商家大多会把供货商找来让其掏钱，而不愿按内贸部的规定对消费者先行赔偿。

王瑞还发现，所有商店销售的假冒“任天堂”游戏卡，都来自“二道贩子”中间商。因此，当他找商店时，没有一家商店能坦荡荡地拿出游戏卡的进货发票和证明自己无过错的证据，因此，只有在消费者面前对自己的过失百般抵赖或把供货商叫来三头对案。

他在东三环路一家档次很高的大商场买了假“任天堂”游戏卡后，为真伪问题竟和玩具部的经理争论了近两个小时，也没见经过拿出任何能证明此卡是真货的证据。为维护大商场不卖假货的形象，经理只肯退货，不肯赔偿。而他却坚持依法索赔。僵持不下。最后经理极不情愿地表示，可打电话叫供货商带着有关证明来向顾客解释。

又等了半个小时，供货商自己没来，只派来个小伙子，一进门，经理问：“东西带来了吗？”

“没有。”小伙子笑着。

“顾客说这‘任天堂’游戏卡是假的，你们老板怎么说？”

“赔呗！”回答得挺干脆。

经理十分尴尬，一面叫手下人去退货，一面带几分恼怒冲小伙子说：“掏钱吧。”小伙子没带钱。经理冷冷地说：“回去通知你们老板，撤柜台！”

几天后，当他在西长安街上的一家商场，买了两盒同样的假“任天堂”游戏卡，开付款单时，无意间一瞥，发现身旁站着的那个正在盘点游戏卡的人，竟是在那家大商场见过的供货商派去的小伙子。此刻，那人也发现了他，但双方都装出素不相识的样儿。他去交款时，小伙子跟了过去，不让收款员在发票上开“任天堂”的品牌，还对收款员说：“给他退票，不卖了！”

他们的争吵引来了值班经理。“你是哪儿的？顾客买东西碍你什么事儿？”值班经理显然不认识那小伙子，三言两语就把那小伙子打发走了。

像这样和假货贩子第二次“握手”的事儿，无独有偶。

他曾在安定门附近一家新开业的商场里，看见了假“任天堂”游戏卡，他想：商家也许不知此货是假。他想像报上登的一位雷锋式的消费者那样，发现了假货不买，而向商家举报。于是，他诚恳地向售货员指出这卡是冒牌货，并把识别真假“任天堂”游戏卡的方法——道来。售货员似乎大为感动，谢了一番。

过了一段时间，当他再次去此店时，发现货架上的假游戏卡已经消失，但他还是漫不经心问了句：“有‘任天堂’游戏卡吗？”没想到售货员竟说有，而且忙不迭地掏出钥匙打开货架下的柜子。他看到，柜子里的假“任天堂”游戏卡不下20盒。显然，商家不仅知假卖假，而且卖假手段更加隐蔽。这当头一棒击碎了他对商家存在的善良幻想，他索性买了3盒假卡去索赔。

到商场的文化部说明情况后，店方笑容可掬地表示可以退货。但当他要求索赔时，店方感到意外，称此店开张以来从没有人投诉，也不知道还有《消法》规定的加倍赔偿一说，并言明售假柜台是出租的，可以立即打电话叫供货商来解决。

供货商一进门，他们几乎同时愣住了。原来，不久前他在北三环路的一家大商场索赔时，见过这位同样被商家叫来的某公司的张经理。

此刻，张涨红着脸，挺不自在地打着招呼：“没想到又见着您了。”王瑞说：“没想到你还在卖假货。”张急忙辩解道：“S商场现在不卖了。”店方的人一脸惊讶地听着他们像老熟人似的对话，或许听出点儿名堂，仍旧笑容可掬地问他想怎么办。“依法索赔。”王的口气不容置否。张则乞求：“您上回已经罚过我了，商场的柜台也撤了，您这回就给我一个机会，饶了我吧。以后您再碰上我卖假货，假一罚十……”他最终没有原谅张。

离开那家商场，王忽然觉得那些笑容可掬的商家面目可憎。作为堂堂的国有大中型商业企业，为什么放着光明正大地向厂家向“源头”公司直接进货的渠道不走，而宁肯让中间商的假货败坏商誉，背上“欺诈行为”的黑锅呢？显然，这里面的秘密妙不可言：试想，把柜台租给“二道贩子”，经营没有风险，资金、货源、库存问题毋需考虑，有的还可以从中间商那儿得到好处……何乐不为，可“上帝”呢？

甩掉跟踪的“尾巴”

他看到王府井一家不怎么起眼但资历颇老的专营店，也打出了经销游戏机的招牌，虽然此店的经营项目和游戏机八杆子打不着。走进店里，他一眼就看见了一个柜台里陈列着10多种假

“任天堂”游戏卡。

“有‘任天堂’游戏卡吗？”他还是问了句。柜台内一手上戴着大金戒指，操着外地口音的男人说：“都是。”他买了两盒，发票上只写了“小卡”二字，他要求把品牌和名称写清楚，那男人扫了他一眼，或许为做成生意，极不情愿地重开了一张。

当他第二天去索赔时，接待他的一位女副经理说柜台是出租的，不了解进货情况，所以商店无法解决此事，只能呼租柜台的李。

李来了，就是卖假货的那个外地男人。李一进门就吵吵嚷嚷，不承认卖的是假货，不过倒挺坦白地承认，游戏卡是从红桥集贸市场进的，什么手续也没有。但李不肯赔，连退货也不同意。女经理借口开会走了。这时，又来了一位男经理，了解情况后，经理一面规劝李退货赔款，一面向他解释，李的租赁合同马上到期，到时就让李走，能不能少赔点儿。王瑞要去上班，不想再与李耗下去，就同意了。

几个月后，他到卖过假“任天堂”游戏卡的几家大商场转了一遭儿，看到这些假卡全部消失，他挺得意，觉得王海没白当。

可他走进王府井这家小店时，却发现柜台仍在出租，假货仍在卖。商店管理人员的失信，假货贩子的嚣张，使他很气愤，他又买了一盒25合一的假“任天堂”游戏卡，为的是让商家及假货贩子接受知假卖假的教训。

没想到，买这盒假“任天堂”游戏卡，差点儿给他招来杀身之祸。

当他去那家小店索赔时，那位男经理承认游戏卡确有问题，还说他早就不想把柜台租给李了，但李上头有人，撕破脸不好。另外，公司要求商店每年上交140万元利润，可现在这种经营状况能完成90万元就不错。完不成任务，职工发工资都成问题，

他每月工资才 300 多块，不得不把柜台租出去……诉了一番苦后，经理无奈地表示，索赔只能打电话叫李来协商。

李又来了，同时进来的还有一男一女。奇怪的是，李并没像上次那样吵闹，而是拿起游戏卡对那女人说：“去柜台对对货号。”女人把游戏卡拿走了。片刻，进来一个瘦男人，把一盒游戏卡放在桌上，王瑞惊讶地发现，此卡是一盒标记齐全的真“任天堂”游戏卡。

采用“掉包”手段骗走了假游戏卡后，李立刻指着王瑞说：“上次被你骗去了钱，正找不着你呢，这次你又来诈骗，走，上派出所去！”

李这一手儿是他始料不及的。但他觉得挺可笑，假货贩子怎么比买了假货的人还理直气壮，竟敢叫警察来。

警察没有来。他对坐在一旁一言不发的经理说：“我在你店里买了假游戏卡，来找商店解决问题，和李没关系。现在游戏卡被换了，你要负责。”经理对李说：“我都看见了，这游戏卡不是人家的，你把人家的卡拿回来。”李却一口咬定就是这盒卡，没换。

王瑞明白，证据没了，如果经理不肯做证，就是打官司自己也赢不了。此刻，经理又劝他退货算了。为了不使经理难堪，他决定退货了事。

他走出商店，忽见李和 4 个壮汉堵在门口，其中一个裸露着长着黑毛的胸。李迎上来，满脸带笑，与刚才判若两人：“我们‘打的’送你回家，也好认认门儿。”

“不必了。”他边说边过了马路。

走出几十米，他越想越不对劲儿，李召来那么多人，到底要干什么？他警觉地回头一看，嗨，那 5 个人正在后面紧紧跟着他。瞬间，他想起了警匪片中的杀手，他恍然觉得自己变成了

007、地下党、福尔摩斯……

危急之中，他飞快地走到眼前一家豪华的大饭店门口，上气不接下气地对门卫说：“我请求保护。”

“为什么？”门卫惊诧地问。

“有人跟踪我。”

“那您还是找警察吧，我们只管饭店的事。”

正说着，李已跟上来，冲门卫大声嚷着：“他是诈骗犯……”此刻，王瑞来不及多想，走进饭店大堂，瞥见楼道拐角处站着两个服务员，他急忙上前：“请问饭店有后门吗？”“有，从这儿往左再往右，下了楼梯就是。”他迅速走出饭店后门，跳上了一辆出租车。

直到这时才明白，王海可不是好当的。

投诉“怪圈”

不过，王瑞并不死心。虽然他已经领教了找商家依法索赔有多难，但按《消法》规定，解决消费纠纷有5种途径，与商家协商只是其中一种，还可以找消费者协会、工商局、法院，他们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后盾。因此，他还想尝试一下，倘若买了假货，不直接找商家，而去有关部门投诉，是不是既安全又能尽快解决问题？

在王府井的另一家商店，他花225元买了一盒假冒“任天堂”卡。这一次，他没有找商家，而是直接到消协去投诉。

消协办公室的两位老女同志，听说他买了假货，显得非常吃惊。他们拿着那盒游戏卡翻来倒去看了半天，议论着：“还是三无商品呢。”随后拿出一个大本子，让他登记姓名、电话、投诉对象、投诉内容……在投诉要求一栏中，他写道：希望工商管理

部门对售假商家进行处罚，并责其对消费者依法进行加倍赔偿。

消协的人并未提出解决办法，只是出去带进一位穿工商制服的小伙子，对他说：“你直接跟工商所的人说吧。”他这才知道，消协的隔壁就是工商所。可他有点纳闷：自己是到消协投诉，没有想找工商所，消协这到底算受理呢，还是已受理完毕？不过，他还是原原本本向工商管理人员述说了一遍购假经过。

那人不得他说完，就截断话头反问：“你怎么知道是假货？按我们的规定，谁投诉谁举证。”

毕竟是有备而来，王瑞立即出示了侄子的那张“任天堂”真品提示卡。工商人员接过去看了一眼，说：“这不能算数！”

“为什么？”

“我不能以消费者的材料为证据。你这不过是张印刷品，说白了，这东西你可以印，我也可以印，谁都能印，这种举证是无效的。”

“那么，什么样的举证才算有效呢？”

“你去技术监督局吧，我们只认他们的鉴定。”

“如果技术监督局证明是假的，你们会去检查商家存在的问题吗？”王顺便问了一句。

他把游戏卡递过去，说：“这卡假不假可以请技监局鉴定，但从外包装看，至少能断定它属于无厂名、厂址、生产合格证的“三无”商品，对这种违反《质量法》的商品，工商部门应该去查处。”

那人看了看游戏卡，说：“是有问题，所以我建议你去鉴定，只要确定为假，我们会处理。我们是管理部门，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程序，该如何处理是我们的事，与你无关。至于这件商品的问题，因为你投诉的是假货，而不是“三无”商品，所以我们只谈真假。假如你对商品不满意，我们可以让消协帮你退货。”说

完那人就走了。

王瑞当即抄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北京市技术监督局。有关人士告之，目前国家没有游戏卡的行业标准，因此无法鉴定。他问那张“任天堂”真品提示卡能否作为辨别真假的证明。对方回答，应该可以，但技监局不能凭此开具书面鉴定，应由厂家举证。事实上，有关商品真伪，技监局也是通过生产厂家来鉴定的。

他又与任天堂公司广州办事处联系。听了他介绍所买的 25 合 1 的游戏卡特征后，办事处的人当即断定此卡为假货，因“任天堂”游戏卡从未生产过 4 合 1 以上的。但公司不对个人出具鉴定证明，须由工商、技监或法院等有关部门发公函后，方可出具证明。

挂上电话，他立即对工商所的人说明情况：国家对游戏卡没有检测标准，但厂家已断定该商品为假货，希望工商局发公函，让厂家出具鉴定证明。

没想到，工商所的人竟说：“我们从来没有为个人的商品鉴定发过公函，也不可能给你发公函。”

王瑞懵了。查假治劣不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责吗？举报制假贩假不是党和政府所积极倡导的吗？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吗？可是，为什么事到临头，商家坑消费者，消协的人推消费者，工商的人难为消费者，厂家不认消费者……

舆论总是浩叹消费者屈服于权益被侵害而不去投诉，经过一番艰难的投诉历程后，王瑞终于对消费者买了假货，为什么宁肯认倒霉也不去投诉恍然大悟：投诉原来是个走不出去的“怪圈”。

最终，为解决那盒假“任天堂”游戏卡的问题，他还是找到了商家。面对投诉，商店经理一脸正气：“我们国营进货渠道都

是正规的，我们从来没卖过假货。”

王瑞说：“《消法》规定消费者有知情权，我想看看有关这盒游戏卡的产地、商标和说明。”

“这是商业秘密，我可以不让你看。”经理显得很傲慢。接着话锋一转：“你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嘛，我们不谈商品质量，我们只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给你退货并再给你破例赔偿。”这口气，好像消费者买了假货，依法得到赔偿是占了多大便宜似的。

购假索赔——好一番甜酸苦辣！

王瑞从此再不敢当王海。

记者手记

文中的主人公就是我

本报“冰点”1997年11月25日刊登了我写的《不敢当王海》。其实，文中的主人公根本不是什么王瑞，而是我本人。

我之所以没用第一人称并回避了所涉店名写此文，一则由于购假索赔这事儿可不是好玩儿的，闹不好会招灾惹祸；二则由于我所涉足的大都是国有大中型商场，有些经营者是我的老朋友，不愿因此伤了和气。

在提笔写这篇新闻内幕时，我仍犹豫再三，但为了新闻的真实性，我决定实话实说。

为什么要当王海

为什么要当王海？因为我对王海的购假索赔可谓知根知底。我在1995年11月2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召开的“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上，认识了在中国首开购假索赔先河被不

法商家贬为“刁民”的王海。同时也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两年后，第一次知道了《消法》的第49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并从有关立法人士那里了解到，制订这一条款的目的，旨在惩罚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鼓励受害的消费者积极参与打假。

随着“王海现象”被国内外传媒炒得沸沸扬扬，《消法》第49条唤醒了众多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我一直在跟踪采访王海。我曾陪他到北京的“仟村”、“华联”、西安的“民生”、“唐城”、“开元”等大商场去购假索赔；也曾在成都的法庭目睹他和“协和”打官司；还曾参与过他和多个被假货侵权的厂家签定打假协议；我写过多篇有关王海的报道，而且我们合著过两本书……因此，我当王海无疑具有很大优势。

但我产生当王海念头的真正原因在于：1997年初，我看到一份《中国城市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1996年全国有1/4的家庭，近5000万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造成约68亿元的经济损失。而奋起维权的人只占22.3%。”有人为此感叹：中国的消费者是一群“沉默的羔羊”。我对此大惑不解，有《消法》这把尚方宝剑，消费者受到侵害，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找商家依法讨还公道。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却忍气吞声地甘于吃哑巴亏？

我因此想当回王海。但我不会像他那样发现假货斥资数万元买个轰轰烈烈，然后再去索赔，这种方式易被不法商家指责为“知假买假，不是消费者”。虽然商家所言毫无道理，参加过起草《消法》的全国人大法工委巡视员何山曾明确表示：“主动买假的人也是消费者！而且这种人原本是《消法》立法宗旨所提倡的

人。第49条的立法，就是要培养像王海这样的扫除假冒伪劣商品的‘清洁工’。”我只想以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身份，亲历一下买到少量的某种假货后，找商家依法索赔会有什么结果？然后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不论成功与否，都可以给读者一个借鉴。

当我把这计划告诉王海后，他很热心地为我提供了一长串假货名单和各种假货的特征，并说这些假货在市场都有售。我从中选择了“任天堂”游戏卡，因为它的真伪从外包装上就可以昭然若揭，且不用管它的防伪标志、质量保证印章、说明书是否存在，只记住“任天堂”从未出过4合1以上的游戏卡足矣，无需作质量鉴定。然后我开始选择商店，我把主要目标定在北京的国有大中型商场，因为它们是社会商业的主渠道，在消费者心目中具有良好的信誉。这些商场如卖假货，欺骗性远远大于个体摊贩。

1997年“3·15”前夕，我开始亲历当王海。我先后出入于京城的10多家大商场：百货大楼、西单商场、西单购物中心、新中国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蓝岛”、“双安”、“燕莎”、“城乡”、“仟村”、“复兴”、“三利”，也光顾过王府井外文图书大楼、宏声乐器行等国营老店。令我震惊的是，所到之处，无一不在售假。

我断断续续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亲历购假索赔，所见所闻大都写在《不敢当王海》一文中。在此，我只想披露一些购假索赔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新中国第一店碰钉子

原本在我购假的计划中没有百货大楼，因为我从来就不相信它会卖假货。我对百货大楼的信任不仅是因为它那“新中国第一店”的光荣称号，也不仅是因为张秉贵的“一团火精神”给它带

来的美誉，而是因为我和它的缘分实在不浅。作为多年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我曾为百货大楼写过多篇歌功颂德的报道。

那天我去王府井，先在百货大楼对面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里发现并买了假“任天堂”游戏卡，该店的业务负责人把供货商赵先生找来，经过一番对证，赵同意退赔，但却很委屈地指着一路之隔的百货大楼娱乐城说：“百货大楼还卖呢，你怎么不去那儿买？”

于是，我过马路走进娱乐城，这儿是百货大楼的玩具部，进门迎面就是卖游戏卡的柜台。我看到柜台里陈列着20多种游戏卡，就问售货员：“有‘任天堂’游戏卡吗？”她说：“这些全是。”我让她拿出1盒，看到上面清晰地印着“任天堂”的注册商标“Nintendo”。我打量着那些8合1、32合1、120合1的游戏卡，断定都是冒牌货，因为“任天堂”游戏卡没有4合1以上的。

再一次发现“猎物”，我很激动，不加思索地对售货员说：“买5盒。”售货员拿出了5盒，但迟迟不给我开付款小票，而是和旁边柜台的售货员嘀嘀咕咕，几个人的目光都射向我，好像我做贼似的。我催她开票，她说机器坏了开不出来，眼神惶惶的。直觉告诉我，售货员知道游戏卡有问题。一会儿，她带来个中年男人，我从他的胸卡上知道此人姓赵，是副总经理。赵拿起一盒游戏卡看了半天，又用审视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我。我挺坦然地对售货员说：“开票呀。”她和赵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从那台“坏”了的机器里开出了小票。收款的男人无论如何不肯在发票上注明“任天堂”的品牌，我问售货员，游戏卡到底是不是“任天堂”的？她涨红着脸支吾道：“是……是兼容卡。”我考虑到如发票上不注明品牌，索赔时商家不认账怎么办，就决定不买了。

事后我告诉王海，他说只要游戏卡上有“任天堂”商标，即

使发票上不写品牌也是假冒。在百货大楼娱乐城购假失败后，我总结教训：一是经验不足，对假货缺乏准确的判断；二是急功近利，一次买那么多盒，能不引起人家警惕吗？

几天后，为了不让售货员认出来，我乔装打扮一番，拆散了扎起的头发，戴上眼镜，换了衣服又去该店，发现柜台里那些假“任天堂”游戏卡已荡然无存。显然，我的出现起到了“打草惊蛇”的作用。离开店时我想，这样也好，百货大楼不卖假货了，也算我帮了老朋友一把。

索赔走了回后门儿

如果不是在忍无可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决不会为购假索赔走后门儿。

我之所以想看看复兴商业城是否在卖假“任天堂”游戏卡，是因为我在“燕莎”买假卡索赔时，听那个被找来的假货贩子说的。他当时因提供不出进货手续，被“燕莎”玩具部的罗经理罚了款并被撤了租的柜台。他老大不乐意地说，“复兴”也有我们的柜台。于是我来到了这里，果然，发现了假货。当我正请售货员拿了两盒假游戏卡时，无意中发现在柜台外盘点的那个外地小伙子，正是我在“燕莎”索赔时遇见的假货贩子。显然他也认出了我，但却装作没看见。当我去交款时，他迅速地跟上来，对收款员说：“给她退票不卖了。”我说：“你有什么权力限制我买东西。”吵嚷声吸引来值班经理，我说明了情况，经理问他：“你是哪的？顾客买东西碍你什么事？”他做贼心虚，无言以对，只好仓皇走开。

我拿着假卡到商城的服务科投诉，接待我的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开始他的态度还不错，挺认真地看了我买的游戏卡，并耐

心听我讲述了辨别真伪“任天堂”的方法，让我登记了投诉内容，然后就去找有关部门调查。但回来后他态度就变了，一口咬定卡是“任天堂”正品，还说看见包装箱的标志了。我请他出示进货证明，他傲慢地说：“不用证明，我认为是真的就是真的。”我把“任天堂”广州办事处的咨询电话号码（020）83501136告诉他，请他核实一下。他极不耐烦地说：“没功夫。我早该下班了，为了接待你耽误了我两小时。”我说，我又不知道你的作息时间，你下班了可以请别人为我解决，我指指服务科内的四五个人。没想到这一指惹出了麻烦，那几个人七嘴八舌地指责我，让我拿出能证明此游戏卡是假货的证据。我说：“国家工商局 1995 年 3 月 15 日颁布的惩罚欺诈行为办法相关条文规定，经营者售卖假冒商品且不能证明自身无过错的，承担加倍赔偿责任，也就是规定举证责任倒置。”“既然是工商局规定的，你就找工商局去呗。”那小伙子满脸不屑一顾，说完掉头就走了。我问服务科的人接待我的小伙子姓什么，她们装没听见。

我可咽不下这口气，卖假货的人凭什么比买假货投诉的人还横？我当即决定去找商城的总经理。说起来，我和“复兴”的交情可追溯到它开张那天，当时我是作为嘉宾被请进该店的。该店总经理刘琦是个正直、出色的经营者，当“王海现象”推出后，一些商家指责王海是“刁民”，“钻法律空子”时，刘琦说：“如果说人家‘钻空子’，根本问题应该从自身找，谁叫自己有这些‘空子’可以给人家依法去‘钻’呢？在这个问题上复兴商业城坚决不护短，有一赔一，有百赔百。这是涉及商德、信誉的大问题，我们坚决不含糊。”正是冲着刘琦的人品我才决定去找他。

刘琦不在，但我却见到了副总经理周伟丽，该商城开张时她负责公关，大胆、泼辣、能干是她留给我的印象。果然，我把事情的原委一说，她表示要立即追查此事，把租柜台的清除出商

城，并派人立即解决了我的索赔问题。

事情虽然得到圆满解决，但离开商城时我心里挺堵得慌，没想到索赔还得走后门。试想，如果我真的被打发到工商局投诉，不定猴年马月才能得到解决呢。因为我曾掉进过投诉的怪圈。

我在王府井外文图书大楼买了盒 25 合 1 的假“任天堂”游戏卡后，到王府井地区消协投诉，消协的两位老女同志虽承认此卡是“三无产品”，让我登了记，但却没提任何解决办法，而是把我被打发到隔壁的工商所。工商所的人说，谁投诉谁举证。我拿出真“任天堂”游戏卡包装盒内的真品提示卡，他说这不算数，他们只认技术监督局的鉴定。马上给市技监局打电话咨询，称目前国家没有游戏卡行业标准，只能由厂家举证。又给“任天堂”广州办事处打电话，对方说 25 合 1 的游戏卡肯定是假货，但他们不对个人出具证明，须由工商、法院等部门发公函后方可出证明。而工商所的人对我说，他们从未因个人商品鉴定发过公函，也不可能为我发公函。

找执法部门投诉未果，我只好去找商家外文图书大楼投诉。万万没想到，1 小时前满柜台的假“任天堂”游戏卡，竟变魔术似地消失了。我不能不怀疑是工商所的人给商家通风报信。我觉得这件事很可悲，如果执法者和不法商家串通一气，消费者上哪说理去？

虽然外文图书大楼的那个一脸正气的孙经理，最终在我投诉 4 天后解决了索赔问题，但他决不承认卖假货，并义正词严地声称：“我们国营商店进货渠道是正规的，我们不谈质量问题，这是站在消费者立场上破例给你的赔偿。”而我则在想，还嘴硬呢，4 天都拿不出证明自己无过错的证据，如果没卖假货，根本不可能给我加倍赔偿。

逃出假货贩子的魔掌

王府井大街上有家国营老店宏声乐器行，许是经营乐器不景气，也卖开了游戏卡。我第一次在那儿买过两盒假“任天堂”游戏卡后，找该店的一位姓张的女副经理投诉，她说卖假货的柜台是出租的，自己水平低，处理不了这件事，采取回避态度。该店的经理露了一面，听完我的陈述后称开会也匆匆离去。一位姓李的副经理倒是挺负责的，打电话叫来租柜台的浙江人王某，让他出具进货发票。王一进门听说有人投诉游戏卡是冒牌货，就跳着脚地叫嚷，说他的货是从红桥批发市场进的，什么进货手续也没有。还说马路对面的王府井外文图书大楼也在卖同样的游戏卡，而且售价比他贵，七八十块钱一盒进的货，他卖190元一盒的图书大楼卖225元。王振振有词地诡辩着，不但不肯赔偿，连货也不肯退。

我去过10多家大商场，也接触过几个租柜台卖假货的人，他们对店方都很巴结，惟恐被清除出店。而王却不把店方经理放在眼里，即使被抓住售假的把柄也毫不畏惧，这是为什么呢？听店里的人无奈地说，他们早想让王撤柜台，但王在店的上级公司里有人。后来在李的调解下，王极不情愿地赔偿了部分货款。

几个月后，我到这些卖过假货的商场转了一圈儿，只有“宏声”仍在卖。我又买了一盒，请店方解释为什么知错不改。李副经理很尴尬，希望我体谅店里的困境，如不靠出租柜台挣钱，完不成上缴任务，店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至于解决索赔问题还得找王。王被呼来后，没像上次那样吵闹，镇静地派来一个女人借查货号为由，把我买的假卡掉包了。还当着我的面给辖区派出所他认识的警察打电话，说店里来了诈骗犯，让警察来抓人。我当

时觉得这事简直不可思议，一个外地的假货贩子，竟敢在北京如此嚣张，店方怕他，还有警察做后盾，也太无法无天了。我倒真盼着警察来抓我，好看看王到底有多大能耐。目睹了这一切的李无奈地劝我退货算了，说他们拿王没办法。既然证据被骗走，李副经理又这么为难，我同意退货。

退完货走出店门，迎面看到王和4个汉子虎视眈眈盯着我。我在前面走，他们在20米开外紧紧跟着。生平第一次被跟踪，虽然是在京城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但我还是非常紧张。万一他们冲上来打我，街上不明真相的人是不会拔刀相助的。此刻只有想办法尽快甩掉他们。我想过报警，也想过“打的”，但眼看他们越跟越近，我慌不择路地朝台湾饭店走去。我对饭店门卫说，有人跟踪我，请求保护。没想到他竟和颜悦色地打发我去找警察，说他只管饭店的事。这时王已跑过来冲着门卫大喊：“她是诈骗犯！”我来不及解释，飞快地走进大堂，向管理洗手间的人打听到去饭店后门的通道（此前我从不知道该饭店有后门，或许是急中生智吧。），然后从后门出去“打的”回家。

第二天，我特地去台湾饭店找当时值班的门卫，询问王在我进饭店后的举动。他说王只在门口吵嚷了一阵，根本没敢进饭店。

这是我在购假索赔中遇到的最惊心动魄的一件事，它使我从此打消了当王海的念头。

为什么不敢当王海

在京城10多家商店亲历了一番购假索赔后，我列了一张向商家投诉到解决问题所用时间的统计表。

西单商场：20分钟

仟村百货：30 分钟

蓝岛大厦：1 小时

燕莎友谊商城：2 小时

西单购物中心：2 小时

三利百货：2 小时 15 分钟

双安商场：2.5 小时

城乡贸易中心：3 小时

新中国妇女儿童用品商店：3.5 小时

复兴商业城：4 小时

宏声乐器行：4.5 小时

王府井外文图书大楼：4 天

王海看了我的购假索赔时间表，认为我的成功率比他高。因为他至今还有若干假货窝在手里，且被多个官司缠身。但我丝毫也没有成功的喜悦，只感到中国的消费者实在太可怜了，买了假货，依法索赔，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却要遭受一些不法商家的敌视、嘲讽、恐吓甚至追杀。这次亲历使我深深领略到王海索赔时遭遇到的：

冷脸难看冷凳难坐冷言冷语难耐

投诉难投索赔难索商家厂家难斗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中国的消费者买了假货后，宁愿当“沉默的羔羊”。消费者倒想当老虎呢，敢吗？

《不敢当王海》见报后，北京电视台的一位编导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她请王瑞到电视台去做节目，谈谈购假索赔的过程。当我坦言根本没王瑞这个人，事情是我干的后，她大为惊讶，再三邀请我去电视台当嘉宾谈亲历。我向她解释了此行的动机，此举的危险性及不宜公开身份的原因。她仍不死心，三天两头地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考虑考虑，我婉言谢绝了。我想她可能出于一种猎

奇心理，但却没替当事人想想，连王海每次上镜都要浓妆艳抹，还要戴上墨镜伪装，谁敢轻易抛头露面？购假索赔的风险实在太大了，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想到个中滋味苦不堪言的。坦率地说，虽时过境迁，但每忆及此事，我仍感到心有余悸。

时间：1995 年 4 月

作者：陈志文 李公军

一篇正面报道的背景追踪

陈志文：追踪的故事

一篇正面报道的背影追踪

引 子

3月8日，本刊（六版）发表了一篇题为《春霞红似火》的通讯，报道了中国矿大劳模班学生李春霞寒假期间帮助她的三个妹妹李春梅、李春芬、李春红（下称三姐妹）办希望小学的事。

报道刊出后，本刊接连接到来自江苏响水县（三姐妹办学所在地）的长途电话和来信，反映三姐妹所办学校被有关部门“强行停办”，要求记者前去调查此事。正当我们考虑是否专程跑一趟时，又接到《春霞红似火》一文作者的电话，说他写的那篇报道“因采访不深入，事实全部失实，一切责任由他本人来负”，

并称“希望小学的学生现已转到乡中心小学就读，全部安置妥当，希望你们（记者）不要来采访了”。同时，记者还了解到一种说法，认为三姐妹办学目的不纯，是沽名钓誉，想走其大姐李春霞（全国劳模，曾获巾帼扫盲奖）的“发迹”之路……

三姐妹自筹资金义务办学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怎么成了沽名钓誉？又有何“迹”可发？学校为什么被“强行停办”？盖着县委宣传部大印的稿件居然“事实全部失实”，到底是怎么回事？职业敏感告诉记者：此中一定有文章。为了弄清这些疑问，我们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4月8日，我们从连云港中转，一路上倒了3次车，当汽车进入响水县境内后，路两边的茅草土坯房明显多了起来。一辆三轮“蹦蹦车”在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颠簸了20多公钟，才把我们送到该县的海安集乡。据了解，响水是江苏的9个扶贫县之一，年人均收入约900元，而海安集乡又是响水县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在乡里唯一的一条大街上，我们打听三姐妹的家。几个老乡停下手里的活，敏感地盯着我们。一位妇女反问：“你们是用来采访的吧？”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此之前，已有3家新闻单位来过，在大街北头的一座两屋“小楼”里，我们找到了三姐妹中的李春梅，希望小学的主办人。她对我们说：“你们来晚了，学校已经没了，3月31日就全交给乡中心小学了。”

这座小楼不是三姐妹的家，是当医生的父亲为开诊所向人租借的，父亲在楼下为人治病，三姐妹在房东无偿提供的楼上办学。记者看到，这座房子非常简陋，楼梯的扶手还是三姐妹为防

孩子们摔下去，用竹竿扎上的。教室已人去屋空，只留下裸露的水泥墙上贴着的课程表、学生守则、办学宗旨以及孩子们以前的作业和试卷……

我们还注意到，墙上一张已经泛白的红纸上写着《三姐妹誓言》：“顶住风风雨雨，克服重重困难，不求功名利禄财气大，但求肝胆心魄火样红。热血满腔，满腔希望，壮志未酬，教本不放。”问她们的“壮志”是什么，李春梅说，是为本村及邻村失学儿童能够入学，为扫除下世纪的新文盲作义务奉献，争取在本世纪末，把这些失学儿童教到小学毕业。

正交谈中，十几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子背着书包跑了进来。李春梅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她教过的孩子，虽然已经送到了乡中心小学，但每天放了学，他们总要到她这里呆一会儿。在孩子们的簇拥下，李春梅对我们讲起了办学的经过——

二

李春梅早在几年前，就与大姐李春霞一起搞过成人扫盲，由于成绩突出，李春霞 1990 年获得了国家教委、全国妇联颁发的“巾帼扫盲奖”和江苏省优秀青年等称号。1992 年春霞考入中国矿大，春梅也靠自学取得了农业函授大学的毕业证书。两个妹妹都是县职业中学的应届毕业生。

去年秋天，春梅看到邻居家的两个孩子失学在家，便主动教她们认些字，后来又有一些人把孩子送到她这儿来，春梅就借了一间房子集中为她们上课。时间一长，春梅便萌生了办一个免费学校的想法。

据李春梅介绍，办学前大姐曾向县教育局和县妇联汇报过。

2 月 10 日，学校正式开学，第一天就有 32 个孩子来报名，

几天后就达到 44 个。学生来自海安、立礼、大湾三个村，其中女童 42 名，年龄最大的 15 岁，10 岁以下的 10 人。由于绝大多数孩子的家庭都比较贫困，学校每学期只收每人 10 元书本费。三姐妹把孩子们分成两个年级，开设了语文、数学、音乐、美术、德育等课程，全天上课。大姐春霞也利用寒假，帮助妹妹们办学。

此事不久就被县里搞宣传的几个人知道了，2 月 20 日，《人民日报》和《新华日报》同时刊登了三姐妹创办希望小学的报道。

据李春梅说，报道登出后的 2 月 23 日，海安集乡主管教育的一班人来到了学校，在查点完没有乡中心小学的学生后，便以不符合有关办学条件为由，让三姐妹停止办学。三姐妹据理力争，最后不欢而散。此后，村、乡、县不断来人，要求她们停办这所学校，并强行搬走了教室里的 6 张课桌。村干部还要求有孩子在希望小学就读的家长，把孩子领回去，否则罚款五百至两千元，并没收承包的土地。

3 月初，根据乡教育办的要求，李春梅初交了办学的申请报告，但没有回音。李春梅说，她曾到县里找了三次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最后一次等了整整三个小时，才终于见到了。但副县长告诉她，条件不够，不能办学。

“做件好事怎么这么难！”李春梅说着，眼泪便扑簌扑簌直流，坐在她身边的一个个小女孩不住地为她擦眼泪，不一会儿，周围的孩子已哭成一片。

3 月 28 日，《新华日报》所属的《服务导报》以《不能让希望变成无望》为题报道了三姐妹办学受阻的情况。

3 月底，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亲临海安集乡，召集专门会议，他检讨了工作中的不足之后，提出将希望小学的孩子全部交给乡

中心小学。李春梅在孩子上学有保证的前提下，答应了。

3月31日一大早，李春芬领着剩下的20多名孩子，边哭边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走进了乡中心小学的大门。在家长们的要求下，乡中心小学答应这些学生每人每学期只收10元，直到小学毕业（其它学生每学期须交一二百元）。同一天，一些孩子的家长给三姐妹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人心所向，爱心永恒！”

三

在离开海安集乡的那天晚上，邻村的两位农民找到了我们，他们说自己没有孩子在希望小学，但有一个问题弄不明白：“为什么群众欢迎的事，有些干部就反对，希望小学还没有没希望办下去？”

我们回答不了他们的问题，我们也想弄明白，除了“办学条件”以外，希望小学停办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4月10日，一位分管教育的乡领导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乡政府上报的适龄儿童入学率是98%（而记者在乡教育办查到的人学率则是100%），同时承认这个数字“可能有点水分”。当记者问，三姐妹办学是不是无意中暴露出了这种“水分”时，他不置可否。

同一天，在县政府，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接受我们采访时，对这一问题却毫不回避：“不承认这点是不行的，这也是矛盾（让不让三姐妹办学）的焦点所在。”据这位副县长介绍，各乡和县里都签定了有关责任书，适龄儿童入学率必须达到98%以上。他说，这件事说明乡政府的上报数字中“是存在一定水分的”，对虚报统计数字的有关责任人已“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表示欢

迎新闻媒介的监督。

尾 声

据了解，来自希望小学的大部分没有上过学的孩子已分别被插进了乡中心小学的一二三年级，由于本学年已进入第二学期，这些没学过第一册课本的孩子，很多人学不了第二册，使得学习的兴趣大受影响，有一些孩子又重新处于失学状态。在那个二层小楼里，孩子们告诉记者，他们还想回希望小学。在乡中心小学，他们没有课本，也没人管他们能不能听懂，有的孩子没有凳子，每天要站着上课。有个别老师甚至对他们说，不交钱就想上学?!

临走前，我们特意赶到乡中心小学，发现从希望小学移交过来的海安村 26 名学生中，有 12 个没有来上课。来了的 14 个学生中，有 5 个是站着上课的。校长否认了重新失学的说法，分析说，“可能是病了。”

记者手记

蹊跷的来信引发了这篇报道

1995年3月8日，本报刊发了《春霞红似火》一文，介绍了中国矿业大学劳模班学生李春霞寒假帮助她的三个妹妹办希望小学的事迹。不料很快，我就在来稿中陆续收到了江苏响水县的部分群众来信，反映三姐妹所办小学已被关部门“强行停办”。正当我们考虑是否专程跑一趟时，又接到了《春霞红似火》一文作者的来信，称由于其采访不深入，事实失实，一切责任由他本人负责。在来信中，这位作者特别强调说：希望小学已自行解散，学生目前已全部转到了乡中心小学就读，希望你们不要前来采访。信中特别指出，三姐妹办学的目的不纯，是沽名钓誉，想走其大姐发迹之路……（大姐李春霞因从事扫盲活动获得了中华扫盲奖，并因此上了中国矿业大学劳模班）。

三姐妹自筹资金义务办学本是一件好事，学校为什么会被停办？盖着县委宣传部大印的稿件居然“事实全部失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征得当时的部门领导刘学红及副总编辑陈泉涌的

同意后，我带着实习生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这是我到中国青年报以来，第一次走这么远搞批评报道。大约是考虑到安全的原故，部门主任刘学红坚持让比我年龄还大的实习生李公军同行，以避免我这个“容易激动”的年轻人吃亏。李公军当时是武汉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他毕业后先留校当老师，多年后又再次考研究生，因此在处事上，比我这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要老成沉稳得多。

对于一个学新闻的年轻人，可能没有比搞真正的新闻——批评报道更能让人兴奋的了。我没有征求新婚爱人的意见，只是兴奋地准备着自己的行程：地图册、一把小刀、应急的介绍信（那时我的记者证还没有下来）、简单的衣服、钱……

事发地在苏北响水县海安集乡，从北京到那里没有直达的火车，我们只好按着地图上的线路走：坐火车从北京到徐州，再从徐州到连云港，然后从连云港坐汽车到响水，再想办法到海安集。由于三姐妹的大姐李春霞在中国矿业大学读书，我们想先到她那里了解一些情况。因此我们把第一站定在了徐州中国矿业大学。见了面，李春霞只是不停地哭着说：“你们来晚了，回去吧，学校可能已经被解散了。”

晚了！解散了！这些出乎我的意料。但既然出来了，至少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与李公军按着既定路线奔向第二目的地——连云港。由于到连云港后天很晚了，矿大的人怕我们不熟悉，替我们联系了连云港一所学校的老师接我们。有意思的是，连云港市由好几个镇组成，连云港市实际上是在新浦镇，而不在连云港。由于不了解情况，我们一口气坐到了头——连云港。下车后我们才发现，根本没有人接，才知道坐过头了。

第二天，也就是4月8日，我们坐上了开往响水的长途汽车。

响水属于盐城地区，是江苏最穷的9个县之一。一般人都知道苏南富足，苏北比较穷，但差距之大是我没想到的。还未到响水，一路上就可以看到许多茅草土坯房。车到县城，我们马上寻找到海安集的小公共，结果让我们很失望：因为海安集不通公路，没有到那里的车。我们只好先坐一辆小公共，让他把我们放到了去海安集的路口上。

为了在了解到实际情况前少受干扰，路上我就一再告诫实习生李公军：尽量不要暴露身份，在后边的路上很可能碰上相关各方面的人，少说话。

下了汽车后，我们与一位村干部模样的人合租了一辆小机动三轮，在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颠簸了20多分钟，终于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海安集乡。

背着简单的行李，我们直接去找三姐妹及他们的希望小学。一打听三姐妹，街上的人马上就问：“你们是来采访的吧？”原来，在我们之前，当地的报社和电视台已采访过了。

不拿当事人“一针一钱”

海安集乡应该说是我见到的最落后的乡之一。在这个乡所在地，只有一条很窄的街道，街上除了小摊外，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商店，没有一家旅店，没有一家餐馆。

没地方吃饭，没地方住店，三姐妹和他的父亲——一位“赤脚医生”真诚地邀请我们住在他家里，被我坚决回绝了。我的回绝也很诚恳：“你们是当事人，我们是记者，如果我们吃在你们家，住在你们家，我们还怎么保持公正？即使别人不说我们，我们在下笔时可能也得考虑在你们家吃的每一顿饭，喝的每一口水。”

在批评报道上，我特别强调保持公正。为了这公正，我有一个铁的原则：不能领受当事人一顿饭、一杯水、一根烟。实习生李公军烟瘾极大，好抽好烟。我为此特别强调：咱们这趟江苏行，无论到哪，绝不能抽人家一根烟。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在街上找了一家有余房子的人家，吃饭和这家人搭伙。惟一的特权是我们可以在他可能买到的菜中，选择吃哪些菜。4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记得我们吃得最多的菜是鸡蛋炒韭菜及蒜苗，喝得最多的是玉米渣粥。

我们住在小楼的二层。这种小楼的房顶不是预制板，与普通的大瓦房没什么区别。也许是为了省钱，房子没有吊顶，房间之间的隔断只是一堵不太高的墙，不要说说话，就是隔壁地上掉了一件东西，我们都听得一清二楚。床上的被褥看起来并不脏，但却散发着一股汗臭。邻街的墙上有一扇窗，但没有玻璃，只有一个木框。

临睡觉，主人过来特别叮咛：乡上经常有小偷，一定把门插上。主人走后我们发现，门上的插销很容易被拔掉。也许是因为太年轻，把事情想得过于严重。我们为这很容易拔掉的插销紧张了半天。最后商定：为了保证安全，各睡半夜，轮流值班。

已经记不得是谁先睡觉，谁先值班，由于太疲惫，我们都很快睡着了。海安集离海边很近，那晚正碰上刮大风，一阵大风将窗刮得“彭”的一声，我马上被惊醒了。我赶快叫醒实习生，但他还是很快又睡着了。我却怎么也无法入睡。风呼呼地刮着，甚至还带着“哨”，窗外的路灯也随风晃来晃去，忽明忽暗。房间里，老鼠不停地咬着什么。这一切就像恐怖电影里的场景似的，我害怕极了，不敢大声地呼气，手里攥着从家里带来的水果刀，瞪大了眼睛，仔细看着一切……

如何面对“糖衣炮弹”

经过初步采访，我们了解到事件的原委：三姐妹办的免费学校，收留了很多失学的孩子。但乡上上报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则是100%，三姐妹学校的开办无疑漏了底。媒体没报道时，谁也不知道，但一报道，这种底就等于露出来了，于是学校很快就遭到了当地政府的查封。

我们去时，孩子们都被解散了，于是我们连夜到孩子们的家里去找。由于已有记者采访过此事，有关部门给孩子及家长都打了招呼，不得随便接受记者采访。为了避免给被采访人带来麻烦，我们到任何一家都是迅速地“闪身”进屋。被采访的每一家，几乎都是低矮的茅草土坯房。这些孩子之所以到三姐妹办的希望小学上学，都是因为交不起乡中心小学的学费。每走一家，我都被孩子们想上学的强烈欲望所感染。临走，我在一个小铺子里买了一沓作业本，请三姐妹转送给这些令人同情的孩子们。

由于是周末赶到海安集的，因此地方虽小，却没有一个官知道我们来了。星期一，到乡政府采访，乡长还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显然他已经很熟悉接待记者了，你问什么回答什么（当然有许多不符合事实），完了坚持要请我们吃一顿便饭，并对自己的“官僚行为”进行了检讨：“你们来了这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下次来，先打个招呼，我给你们安排一下，工作要干，但也不能太辛苦嘛！”

我牢牢记着乡政府边上开照相馆的小老板讲的事：上次来了电视台的，采访完在乡政府吃了一顿，还让我给拍了合影，最后就没有声息了。任他如何客气，我就是不吃这顿饭，声称和县上已经联系好了，还得赶过去。没有办法，乡长只好派乡上有关部

门的负责人去送我们。

这位负责人刚要和我握手，我马上就乐了：这不正是来时和我们一起合租小机动三轮的那个人嘛。这位负责人非要付出租车的钱，我们坚持不要，在车启动的一瞬，我把那五元钱从车里扔了出去。

到县教育局，已是下午4点钟了，局长、副局长几个人都在。他们显然比乡长更有经验。对我的提问，他们回答得很坦诚，同时“诚恳”地说：“该批评批评，咱们现在先去吃饭，再登记个房间。”

在一些批评报道中，这种人可能最难对付。他很配合，诚恳得让你无法拒绝他提出的诸如吃饭等等建议。如果断然拒绝，一是采访可能无法进行，二是显得你不尽人情。我含混地答应了一声，没说去，也没说不去。如果和他们吃了饭，就可能走不了了，而且当我拿起笔时，可能会顾忌那一顿饭、一次热情的接待。这顿饭无论如何也不能吃，我暗自下定决心。利用上厕所的一小会功夫，我对实习生说：“呆会我先下楼，等我走一段，你再跟着下来。”

采访结束，利用局长上楼换衣服，副局长陪同的功夫，我借口上厕所，走出了局长办公室，同时向实习生使了一个眼色。不料我还没走到楼梯口，实习生已沉不住气，也跟着跑出来了。副局长一句“你干嘛去？”，我先自发虚，头也不回地摔下一句：“我们今天得赶回去。”“蹬蹬”和实习生前后脚向楼下跑去。只听那副局长一边向局长大声喊：“他们要走！”一边追了过来。听了他那一声喊，我跑得更快了，感觉自己有点像小偷。

局长、副局长年龄还是大了点，等他们从四楼下来，我们已跳上一辆人力三轮车走远了。

天已渐渐黑了，我们怕住在县城总会被他们找到，于是决定

连夜赶回连云港。怕他们后边追来，我们先远远地躲了一会，才出来拦了一辆开往连云港的车。据司机讲，这是最后一班了。

记得此后不久我去沈阳采访另外一件事，需采访市教委一位主任。教委办公室主任问我住哪儿，我说还没住下，他显得为难时说：“那我们主任就不好找你了，这样吧，你就住我们招待所，等主任晚上回来了，也好找你。”本来怕他们使“糖衣炮弹”，把我安排进宾馆，一听说是招待所，我挺高兴，满口答应了下来。不料到了一看，哪里是什么招待所，明明是家刚开张的大宾馆，看了一下房价：280元！我心里连呼上当。但我已经无法拒绝了，否则主任就访采访不上了。我打定了主意，炮弹你发出来了，我可以不享用嘛。于是和和气气地在宾馆采访完这位副主任。副主任临走叮咛办公室主任：“明天安排小陈玩一玩。”

办公室主任问我第二天几点钟来接我，我玩了一个小花招：9点。第二天早晨7点，我便起床了。到前台结帐，小姐说市教委已签单了，不用付帐。我坚持要自己结帐，小姐说“头”交代了，这个帐不让结。我于是对小姐软硬兼施：“住店结帐是我的权利，谁也不可剥夺。”同时我耐心地向小姐解释我结帐的理由：“两家打‘官司’，我来采访，让一家给我掏钱住店，我还能主持公道吗？”

我的真诚打动了小姐，她边给我开票，边感慨地说：“我还没见过这样的记者，你们报社的记者都是这样吗？”我骄傲地回答：“个个都这样！”

这样做似乎神经了点，太不尽人情，但每次回来，我总能用一种最大的平和心态去写东西，而不会在下笔时考虑到别人热情的款待、那一杯水、一根烟、一顿饭……

时间：1997年9月25日至11月15日

作者：陈强 马少华 陈彤 李方 周艳秋 紫继军

林森泉

晋江“9·21”火灾：千里寻访生死两界

陈强：在行动中思索

晋江“9·21”火灾： 千里寻访生死两界

一

1997年9月21日凌晨，福建晋江市港资企业裕华制鞋厂突然着火，睡在厂里的19名女工、13名男工因被铁窗围困而在烈焰中丧生。

第一个从三楼逃出火场的湖北籍18岁女工李洁，在医院里向记者描述了死里逃生的经过：“星期六那天，跟往常一样，我们连续工作了十几个钟头直到半夜1点多钟才下班回到三楼宿舍

休息。凌晨5点多钟，我们宿舍8个人几乎同时被楼下‘起火了’的惊叫声吵醒，打开房门，滚滚浓烟扑面而来，由于底楼起火，沿楼梯下去显然已经不可能，而窗户又被铁栅栏封死。在这节骨眼上，同屋的四川人唐小燕想到了钉鞋子用的小锤子，我的湖北老乡刘华赶紧抓起锤子狠命砸窗户下方的铁条，我个子小就第一个试着钻出刚撕开的小口，跳到相隔1米多远的另一家鞋厂的屋顶平台上，扭伤了脚脖子。接着同屋的其他姐妹们也挨个逃了出来，其中蔡德芬没跳准，吊在半空中，造成膀胱破裂……”后来，救援人员用木板在裕华鞋厂的三楼窗户和西侧楼房的平台之间搭起一个约2米长的“天桥”，据统计，通过这条“生命通道”获救的有40多人。

官方公布，这起火灾造成32人死亡，4人受伤，是近年来发生在福建外资企业的又一起特大事故。1993年12月13日，福州马尾台资企业高福纺织公司火灾，烧死61人；今年3月25日，莆田港资企业新光电子厂员工宿舍楼发生坍塌，32人丧生。值得一提的是，时过半年，莆田楼塌事件至今尚无处理结果。

据悉，在晋江“九二一”火灾中遇难的打工者分别来自4个省份——江西23人、安徽3人、湖北1人、福建5人，其中至少有4对姐妹和1对兄弟。

二

淮北平原上的安徽省怀远县，10月3日，收割后的平旷田野里，相距三里远，同日添了两座新坟。陈圩村的陈立和周庄村的乔峰，在9月21日凌晨晋江那场大火烧到三楼宿舍之前，他们睡在同一张床上。

记者于10月2日夜来到陈家时，未见灯光就已闻一片哭声。

从福建抱回来的骨灰盛殓在棺材里，空场上支起了大棚，看得见数十张饭桌，六口大锅。远乡近县来了三四百位亲朋故旧，有人已经来了七八天了。出殡是在3日的中午，随着响器和纸车马、棺木，周围三四个村的数百人逶迤在混合着鞭炮烟火味和薄荷清凉味的空旷田野里，问一问，许多都是出外打过工的。在送葬人群里，相邻解放村的农民崔北亮告诉记者：昨天村里回来好几个外出打工的人，听说这事，都不敢回去干了。也有这事故发生后被家人打电话叫回来的。周庄村一位叫周启方的24岁青年，也在晋江打工，那事发生之后自己跑回来了，一分钱也没拿到，身份证还扣在老板手里。在送葬的队伍里，记者分明听见一位老妇人嘴里嘟哝着：“饿死死个（在）家！”

陈圩、周庄两村人，出门打工的历史也有10年了，福建、浙江是走熟的道。周庄村320多口人，出去打过工的就有100多人。而28岁的陈立和26岁的乔峰，却可能是最晚出去的。陈立去年秋天忙完农活出去，因老实能干，前些时候被裕华鞋厂的老板看中，不到两个月就出了事。而乔峰，他差不多是“赶”着这场灾难去的：第一次出门打工，到出事算下来也才十几天。他在福建转悠了些日子，9月18日晚才找到陈立，住进厂来。有人确证老板已经答应他留下干活，但他实际上还未上一天班。

57岁的陈宝传是从身架和骨骼的大小上确认儿子的尸体的。厂里的人说，除了陈立，这厂里打工仔没这么魁梧的。一米七五的大个子，手大，脚也大，陈宝传比一比，正与自己的手大小相仿，他点头了。陈立不久前寄回过300元，说让5岁的儿子在淮南的姥姥家上学前班，但后来同村打工的人说，是借的。陈立在家信中说，“我要在这里干一大笔钱才回去”，“如果收入好，我就不回家了，如果收入不好，可能还要回家”。

不知道乔峰怎么想的，他种完了两亩花生就提前出去了，离

开家的时候，妻子就快分娩了，而在他的骨灰归乡入土的时候，临盆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周庄穷，停电有七八年了；家穷，除了结婚证上的以外，竟找不到乔峰的一张生活照片。结婚证上的乔峰，清瘦，一双眼睛不知为何在那个喜庆的日子里也透出一丝莫名的惊惶。在乔家的一间矮房里，起伏不平的黄土裂着条条大口子，我看见他母亲坐在地上嚎哭，父亲也坐在地上，一张木然的脸，深深地勾着腰。陈和乔都不是独子，但结婚分开家，就是唯一的男劳力。人们说，出外打工的，都是田少兄弟多的人家，主劳力是不该出去的。陈立28岁就已结婚9年，有7岁一女、5岁一儿，上面一位84岁的爷爷、一位57岁的父亲，还有患精神病的母亲；乔峰结婚不到一年，分了家，分了4亩地，也分摊了家里8000元债务中的2000元。他们有不得不出去的理由。

三

妹妹陈凤兰从打工地晋江给江西瑞昌金鸡村的家里写信，反映姐姐秋兰由于谈恋爱而影响工作，语气倒更像一个小姐姐。信写得文通字顺，不愧是一个初中在班里拿第一的好学生。

秋兰的家书是为了向父母澄清这件事，她没有只顾交男朋友不做工。她希望父母不要看了妹妹的“告状信”一怒之下不认自己做女儿。

秋兰的信是9月18日到家的，两天以后晋江大火。在这两天里，秋兰的父母商量好“骗”秋兰姐妹回家，因为他们不愿女儿远嫁。他们打了两次长途，一次没有通，一次被老板娘挂断了。

秋兰父母写了一封信，但是秋兰永远看不到了。信中说：

“你们回家吧。”

我们原文照登这两封信，也是为了在沉重之中，再现那两颗年轻的心灵，她们的烦恼，她们的情感，都已随风而逝，但又恍如昨日。

爸爸妈妈哥嫂：

及全家人好！

你们来信我已经收到，接到你们的来信我十分高兴，因为就在这几天夜里的思考，我终于想通了，还是要写信告诉家中，心中不要有选择。

这个厂生意实在是太好，根本抽不出空来写信，每天晚上加班到2、3点钟，这几天我不怎么舒服，病了，所以没上班，利用这个时间跟家里写信，请见谅。姐姐这段时间根本就没有做什么事，白天睡觉，晚上谈恋爱，7月份一个月才车了300双鞋面，别人都有700至800双，我也整天说她，可能她心里也过意不去，这几天才好一点。爸妈哥嫂，实话对你们说一句，我觉得姐姐变了，变了很多，根本就不像从前的她，现在她很狡猾，从前的她是那么温顺那么听话，现在这股劲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说她的时候，看她的样子是多么凶的样子，对我大叫大嚷的，还说我变了。真的有时候气得我好难受，气得我胃（胃）疼得很厉害（厉害），我还只能一个人躲在一边偷偷地哭。哥，你说我姐姐在外边谈恋爱为什么不告诉家里，不是我不想告，而是有时候看见她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又软了心，写了好几封信又撕掉了，我不告诉家里又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真是左右为难，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听爸爸说妈妈的身体不好是吗？请妈妈一定要保重身体，不要为这件事难过，照姐姐这样的形势是不会回头的，你们就当少生了这个女儿。那个男孩子，长的还可以，就是喜欢惹

事，在这里整天跟别人打架，不是个好东西。好了，就写到这里，下次再叙。

祝：全家快乐，万事如意。

女儿：凤兰 97. 8. 20晚

爸爸妈妈：

及全家好！

你们的来信我已收到，内容我都看了。

妹妹告诉你们说我在这里天天不做事，和男朋友玩。我那（哪）里天天不做事，他只晚上下班来我这里座（坐），帮（帮）我做点事。白天他网鞋，我车鞋面，有时候晚上玩一下。妹妹说我我都没说什么，还说我骂她，我那（哪）里骂她。姐妹在一起总有一点吵吵闹闹，为别的事，说她两告（句），说我骂她。难道你的小女儿不要人碰，还要我对她么样好。你们不姓（信）就打电话问春花。对于这件事，你们信中说等于没有我这个女儿。我只是在外面谈，我反（正）没有做过别的事。

定儿在这里谈了一个，她发生什么事（定儿的事你们不要乱猜）好啦，我就不多说了，下次下（再）说。

如果你们打电话，到12点打过来，可以直接找我。老板娘都吃饭我就可以接。1点也可以打过来。

祝节日快乐，万事如意

秋兰字

9月11日

四

梁德桃是凭着一对金耳环把自己的未婚妻认出来的。

他今年 19 岁，出来打工三年。原定年底订婚的未婚妻死于晋江大火。未婚妻叫余春花，长他一岁。火灾发生前的几个小时，余春花刚刚离开梁德桃，她给梁送了一床毯子。几个小时以后，梁被老乡推醒：裕华厂着火了。

裕华厂门前，哭声震天。

梁的堂嫂浑身发抖，只穿着内衣，在人群中边哭边喊弟弟的名字。梁德桃也忍不住大哭起来。他 6 点半赶到浓烟滚滚的裕华厂，当时火势还没有窜到三楼。他知道未婚妻睡在三层上，就拼命喊。可是喉咙喊哑了，也没有人回答。在他眼里，消防队的动作好慢，水车到一半就没有水了。

梁眼睁睁地看着大火持续了近 3 个小时，当消防队扑灭二楼的火时，梁感到绝望，因为那个时候三楼已经起火。他知道他的未婚妻一定烧死了，但是他没有想到会死得连他都认不出来。

梁去认尸多次，很多人面目全非，亲属也无法辨认。梁的堂兄开始连自己的弟弟都没认对。但是当梁第一次见到那具烧焦变形的尸体就停下了。这是他的未婚妻，他亲手挑的金耳环，亲手带上的金耳环，那对花了他 420 元钱的金耳环在停尸房里熠熠闪光。

梁德桃在停尸间里只抽泣了一下，可是在回程的车上，他却忍不住放声痛哭。在大火中丧生的 32 名打工仔打工妹中，梁德桃的亲人占了 6 位。他的一对亲表妹陈秋兰陈凤兰、他的未婚妻余春花以及未婚妻的亲妹妹余冬菊，还有这对姐妹的表姐周莲花，另外刘火忠可以算是他的远亲——堂嫂的亲弟弟。其中他的

小表妹陈凤兰今年只有15岁，是第一次出来打工。当时陈凤兰的家人全不同意她出来打工，正月16那天，凤兰和姐姐商量好，连早饭都没吃借口串门到舅舅家，双双跟大表哥梁德桃见世面去了。

梁德桃说自己心里好难受，家里人以后可能也会反对他出来打工，不过“腿长在自己身上”，梁说他还是会再出来的，不过要等明年正月十五以后。

五

人的生命按理说是不能按钱来“称”的。但人既然死了，也只有用钱来弥补，晋江“9·21火灾”的死难者每人得到7.5万元的赔偿。但这些死难者原籍的所在地对这个赔偿则态度大不一致。

安徽怀远方面：

陈宝传是21日晚就接到儿子的死亡消息，当夜赶赴福建的，他对晋江地方政府的处理和“赔偿”都是满意的。“给多少钱算够呢？你就是给我一百万，能换回我的儿子吗？”陈宝传从晋江拿回来7.5万元，丧事花去了一万多元。曾当过村干部的陈宝传表示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把陈立的两个孩子抚养好，教育好。但是，当别人说到陈立曾寄钱回家让5岁的儿子上学前班时，他皱皱眉头把这话头止住了，似乎不准备实现儿子这个遗愿而是明年先让陈立7岁的女儿上学。他们没打算把陈立的两个孩子留给陈立的妻子，据说陈立夫妻长期感情不和，陈立出外打工就是忍受不了这种关系负气而出的。而陈家在这次丧事中，就有请公众把家事说个公道的意思。如此看来，陈立的妻子是沾不到这七万五了，尽管（据陈家人讲）她听了陈立去世的消息后说

“这回我有钱了”。

江西瑞昌方面：

乡亲们到齐了，大家推举梁德桃做代言人。因为这个 19 岁的男孩在晋江已经打工 3 年，会说普通话。代言人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条人命多少钱？

梁德桃自以为开出了天价：5 万！

没有想到各方面进行得很顺利，很快签字画押按手印。

更想不到的是，代言人突然被叫去，当地由于捐款踊跃，每条人命已经可以多赔 2 万五千元。乡亲们对于理赔感到满意，尤其是后来这 2 万 5 千元，因为这是在准备离开的时间突然得到的消息。为了这 2 万 5 千元，大家重新签字重新画押。他们对于赔偿是满意的。

福建方面：

与江西方面给晋江“9·21”事故善后处理组送锦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福建的死者家属对于 7.5 万元的赔偿普遍不太满意。因为福建省人大通过的《福建省劳动安全卫生条例》规定，工伤事故中的死亡者应按不低于 25 年的社会平均工资一次性予以赔偿。1995 年泉州地区年平均工资是 6638 元，照此应赔偿 16 万多元。尤清云的大哥尤金色说，这次善后处理没个准，起初讲赔两万，后来又加到 3 万、5 万、6 万，最后说 7.5 万，不要就拉倒。善后处理组的干部向死难者家属解释说，这家发生火灾的鞋厂已经破产，赔偿的钱是政府从社会各界募集来的（据记者了解，裕华鞋厂的老板曾从香港汇进 20 万元赔偿金），所以难以按法规赔偿。

黄琼莲的丈夫潘良法听说同镇一个 15 岁的女工在这场大火

中丧生也赔了 7.5 万元，心里不太平衡。他认为，赔偿不能搞“一刀切”，要有地区区别、家庭差别。发达地区生活水平高，消费也高，应该多赔一些；像他家庭负担这么重的，也应该多赔一些。

据知情者透露，由于死者来自 4 个省的不同地区，家属对于赔偿的要求差距很大，有的人要求赔十几万，有的只要求赔 7 千元就行了。他给记者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位江西籍家属问可以赔多少钱，善后处理组的干部张开手掌伸出 5 个手指（意思是 5 万），可这位家属以为是 5 千，连忙说：“那起码也要加两千！”搞得当地干部哭笑不得。

这笔在乡下人看来非常巨大的赔款如何花呢？

在闽南，办个丧事起码得花上万元，穷人家也不例外。

10 月 4 日上午，记者来到永春县汤城村，尤淑明家尽管家徒四壁，还是按当地风俗为被大火烧死的女儿摆道场做“超度”——二楼厅堂摆满了肃穆的灵牌，穿“法衣”的道士手捧香炉嘴里念念有词，尤家人跪在一旁痛哭；一楼大门外的空地上排着 3 座用纸粘起来的小“房屋”，穿着白色制服的鼓号队员正使劲地吹吹打打，旁边的两口大锅里盛满了中午宴请用的猪肉。与正常死亡不同，按当地风俗，在异乡惨死的尤淑明死后连家门也不能进，其骨灰盒只能暂时放在路旁临时用塑料薄膜搭起的帐篷里，等待下午上山埋葬。

当记者在镇村干部的带路下不邀而至时，尤家人显得格外感动，特地用红纸包好 50 元钱塞给我们几位，说“这是当地礼仪，一定要收下”，我们按当地风俗收下了包在外头的红纸，把 50 元放在桌上退回。

尤淑明的父亲尤垂太告诉记者，做“超度”和做墓要花掉一万多元。记者问尤父剩下的 6 万多元准备用在哪些方面，他说小

儿子结婚可能要用一两万，其他还没想好。

同一天，记者来到同村的尤清云家时，这一家已基本趋于平静，因为死者已于前一天安葬。墓地就在尤家的后山上，记者沿山路步行 20 分钟才到尤清云的墓前，墓碑已立，十多个人正忙着抬石头垒墓基。见记者举起相机拍墓，这些人（包括尤兄）全都躲开，据说在当地“活人和墓合影会倒霉”。

尤清云的两个哥哥也经常出外打工或做点小生意，记者问她大哥尤金色是否准备把 7.5 万元的赔偿金用在生意上，他笑了笑说：“这一点点钱怎么够做生意？光办丧事就花了上万。”他认为，“人既然死了，也应该搞得隆重一些，以表达我们生者的怀念之情。”

南安市炉中村的潘良法原来不准备为死去的妻子黄琼莲大操大办丧事，因为他家前年花 4.5 万元盖起的新房还没有装修，此外还欠别人一两万元。潘说：“她娘家人过来大吵大闹，非得做‘超度’不行。”结果还是按传统程序做了一遍，花了上万元。

瑞昌上湖村。刘火忠死了，23 岁。

7 万 5 千元中的零头用做丧葬开销。剩下的 7 万元钱怎么花，为此家里专门立了一个按满手印的规矩。规矩中规定其中的 5 万元全部存在刘火忠留下的小儿子刘硕名下，另外 2 万元一年一存，如果家里需要用钱，只能从这两万元中取，并且每次取用必须是两个人共同前往。一个是刘火忠的遗孀朱烈春，一个是刘火忠的亲姐姐刘晴英。刘晴英的姐夫梁德文并不隐瞒立此协议的用意：那个弟媳妇那么年轻，如果 7 万元钱全是她的，她改嫁带走怎么办？

刘家的事解决得算是顺利，但是离此不远的金凤村的余家就不一样了。

余家死的是一对满 20 岁的姐妹，一共赔了 15 万。村里人

说：15万，一年利息也有1万元。但是余妈妈还来不及伤心两个女儿的惨死，家里的亲戚就上门来要求确立这15万的归属。两个女儿的叔叔认为这笔钱该用在家里唯一的男丁身上，即余妈妈的小儿子，今年16岁。但是两个女儿的姨父却悄悄地把15万的现金支票拿走了，姨父的理由是：“如果余家的这个儿子将来不养自己的母亲怎么办？”但村里人有知道余妈妈的都说钱不该给她，因为，她的丈夫早亡，她和一个老头子相好，两个人没有正式结婚。大家都说：钱给了她，等于给了那个老头子。

余家的钱究竟怎样划分，直到记者发稿仍然还在争论中。记者前去采访时，村民也很关心有什么办法限制余妈妈对这笔钱的使用。他们似乎也知道余妈妈是法定第一继承人，但是他们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在金鸡村的大墙上到处着标语：“生女相隔”。村书记说：这是计划生育的标语，意思是如果生了女儿，必须隔5年才可以再生一胎。他说这是农村的特殊政策，因为农村没有男孩就没有劳动力，以后可能就无人养老。农村人的重男轻女和农村的特殊条件有关。

六

10月17日上午8时30分，徐廷建被押进福建泉州市（注：晋江市隶属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时，没人能从他的神情里看出他的想法。徐当庭承认自己是“9·21”晋江大火的纵火者。

据法庭调查，9月17日，在福建晋江市陈埭镇横坂村裕华鞋厂做杂工的徐廷建向老板娘许燕燕借100元，许只给了他50元。徐廷建的律师洪志铭在法庭中说，徐借钱是为了还在食店赚

的账。据老板娘许燕燕当庭作证称，按鞋厂的规矩，厂方平时不发放工资，工人可向厂方预借，剩下的钱款按干活多少年底一起结算。9月19日，“徐产生了要教训老板娘的念头”。

9月20日（即火灾前一天）晚上，徐廷建在鞋厂附近的小食店吃了晚饭，看完电视，并和鞋厂另一工人向食店赊了两元钱的蚕豆带回厂里吃。这名工人后来在大火中丧生，被烧黑的蚕豆壳被公诉人当庭举证。

据悉，从8月底在裕华鞋厂务工到“9·21”大火前，徐廷建共向厂方借款4次共170元（其中最少的一次为10元），并欠鞋厂附近的食店饭钱30元。洪律师认为，按该厂最低的工资标准，徐廷建应获报酬200元。而来自四川贫穷农村的徐在初来乍到的20余天里，他未曾从厂方领到过一分钱工资。

徐当晚是在一楼车间里过的夜。在徐廷建到鞋厂务工后，徐一直没有宿舍，只有厂里给的一床席子和被子，四处流动睡觉。9月21日凌晨5时许，徐被蚊子咬醒，再无法入睡，偶然发现工友遗忘在冲床上的打火灯与香烟。抽烟时，徐廷建取车间里的一海绵条浸油后用打火机点燃，并扔至一楼堆放的成品鞋及原材料上。火势渐大，徐害怕了，赶紧去叫工厂管理人员，并参与了搬运海绵及救火，但大火已经失控。洪志铭律师在辩护中曾提到过一个细节：徐廷建曾用厂里的泡沫灭火器灭火，但灭火器喷不出泡沫来。但就此事，法庭未作进一步深究。

事后，徐廷建作为火灾的第一个目击者被调查，这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打工仔在盘问中露了马脚，并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拘。

当泉州市检察院作为公诉人问徐廷建对“32人死，6人伤残”的感想时，徐说：“很后悔。”

根据徐廷建的纵火事实公诉人认为：徐的行为已构成纵火

罪，后果特别严重，建议从严惩处。公诉人举出三条佐证：1、大火使工厂完全瘫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0多万元，老板娘许燕燕受伤住院。2、32人死，6人伤残，其中最小的（打工者）仅15岁，涉及3省8县。3、花费了300多万元抚恤金。

此案中途休庭合议时，记者听见听众席中有人对此佐证排列顺序表示气愤，说：“岂有将人命置于经济损失之后的道理？”

由法庭指定为徐提供法律援助的洪志铭律师为徐廷建作了“要求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辩护。洪认为，徐廷建的犯罪行为在法律上有可恕性。洪志铭给法庭出示的理由包括：徐廷建在公安机关尚未掌握其犯罪事实前主动坦白，应视为自首；徐刚满18岁，无前科；徐来自贫穷农村，经济困窘，是在无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产生怨恨情绪，合乎情理；等等。

至此，公诉人与辩护人双方出现在法庭上的第一次交锋。公诉人对“怨恨产生合情合理”的说法予以激烈反对。公诉人认为：裕华鞋厂的招工以及工资报酬是徐自愿接受的，现在工厂的情况完全符合改革开放的形势，而厂方年底结账是为了帮工人存钱回家过年。“厂方在对待工人方面有不尽公正的地方，但不应成为导致这一惨案的原因。”

洪志铭律师则反驳说：“公诉人没必要为厂方作出这种解释。工人付出劳动就应得到报酬。”洪说：“公诉机关指控徐的罪名（纵火罪）是成立的，他也应该承担责任，但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洪还强调，厂方防火设施不力，没有必要的疏散通道。而且海绵、柴油等易燃危险物放在“三合一”（即宿舍、车间、仓库合一）的地方，使徐廷建无预谋的纵火最终难以控制。

审判持续了3个多小时，当法官宣读审判结果时，很多在法庭调查阶段离开的听众又重新坐满了能容纳100多人的审判庭。听见自己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时，徐廷建仍然没

做任何反应。法官问：“你上不上诉？”听众席上听不清回答，但审判席上的人听见徐嚅动嘴唇说的是“上”。

徐廷建的律师洪志铭承认对徐自始至终的镇静出乎意料。此前，洪律师在看守所见过徐廷建一次，对徐的印象是“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但智力和精神上没有任何问题”。洪志铭说，徐曾与看守聊天，说自己可能会被判几年刑。“后来我们把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了他，他也没有激动的表现。”

庭审后，当地有人士认为，如果此案不牵涉劳资关系，问题自然就简单多了。

另据悉，徐廷建在进厂时未与厂方签定任何合同，这家在晋江有80余名工人的鞋厂没有工会。火灾前，当地劳动部门也从未收到过有关该鞋厂的投诉。

11月15日，徐廷建在晋江被处以死刑。

记者手记

在行动中思索

我当了回“特工”

1997年9月21日，星期天。

中午时分，我家电话铃骤响，声音急促：“今天凌晨，晋江发生火灾，30多人死亡。”电话是福建有线电视台的颜梅小姐打来的。她是我1994年在人大新闻系进修时认识的“师姐”，该线索是她上午到福建省政府开会时从“急报件”上看到的。

在福建新闻圈，像颜梅这样够意思的哥们、姐们还不少，他们经常主动把“高精尖”的新闻线索提供给我，着实帮了我不少忙。在他们眼里，《中国青年报》几乎没有什么不敢登的新闻，同行们的信任加剧了我超负荷运作。

我立马打长途电话到事件发生地晋江市核实情况，市委值班的同志只是说“有这么一回事”，但具体情况不愿透露。无论如

何，得尽快赶往离省城福州 200 多公里外的现场，用自己的眼睛作出判断。由于我们记者站没有配车，我惯常的做法是拿重要的新闻线索与其他有车的新闻单位作“交换”，以实现“新闻与交通”资源共享。况且搞事件性报道，介入的媒体越多越有利于形成合力，便于与地方当局周旋。我首先想到了有福建“焦点访谈”之称的东南电视台《记者行动》组，那里有一批相当敬业的年轻人，我们曾经在前一年的漳浦“翻船事件”中合作过。不出所料，当我刚报上线索，电话那头就拍板说“干”。

就这样，我背上便携式电脑搭上了电视台的车子。途中，我与先期到达现场的《海峡都市报》驻泉州记者保持手机联系，他们告知采访受阻拦。当晚，我们风尘仆仆赶到事故地点——晋江市陈埭镇，尽管大火已经扑灭，但周围依然戒备森严，警察以“保护现场”为由不让任何人靠近那座被烧的“三合一”厂房。我们通过与现场群众的交谈，总算把这一事件的新闻“五要素”搞清楚。当我急匆匆赶到宾馆准备给报社发快讯时，总编室说“没版面，明天全文刊登十五大报告，后天还发别的文件”，这意味着这两天新闻版根本不可能上此类“负面报道”，值班副总编陈小川指示“干脆弄大点，发星期四的《社会周刊》”。

对于此类灾难性事件，官方想方设法遮蔽是意料之中的，这时候就看记者的应变、突破能力了。当天晚上 10 点多钟，我和电视台记者一同赶往医院采访伤员。据护士说，我们是第一批来此采访的记者。地方当局只顾严密封锁火灾现场，却忽略了对那些劫后余生者严加“监护”，结果让我们钻了空子。在一个多小时里，4 个受伤程度不同的伤员在病榻上向我们讲述了他们死里逃生的经历。

第二天上午，我们再次来到火灾现场附近，试图碰碰运气。我瞅准警察全力阻拦电视台记者拍摄的瞬间，怀揣照相机乘机随

省里来的消防人员溜进了被烧的厂房。我感觉自己像个“特工人员”，从一楼跑到三楼，对着散发出恶气的废墟不停地摁动快门，将劫后惨景一一摄入镜头，不到5分钟两卷胶卷全拍光了。出来之前，我特地将胶卷取出，放在内衣里，以防万一被“逮”住时胶片被强行曝光。还好，出现场时同样神不知鬼不觉。我为自己拍到了独家照片而暗自得意，这种反遮蔽成功之后的快感是职业记者才可能拥有的高峰体验。

现场采访结束，我直奔泉州，省里的调查组驻扎在那里。官方渠道的消息得找他们去。

关注普通人命运

午夜，我站在泉州街头用手机向《社会周刊》主编张岳庚报告事件概况。他听了就来劲，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历数了近年来发生在外资企业导致数十人丧生的多起大火，痛斥了那些不把中国员工当人却被某些地方官员捧上天的境外不法资本家。我们越谈越兴奋，报道思路在热线传递中渐渐明晰：这不是一起孤立、偶然的事件，要解剖事件的本质；关注普通人不普通的命运，不仅要让人们记得这起火灾烧死了多少人，还要设法让读者了解这些死难者也曾经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像剥笋似的，层层推进，搞成连续报道。

为了把尽可能多的时间留给前方记者，《社会周刊》将截稿时间从通常的星期二往后延了一天。星期三，我赶回福州，将近2000字的文字稿一气呵成，接着又借助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的图片传输系统，将照片传回报社。9月25日的第六版上，编辑陈彤特地在最醒目位置上用黑体字标明“本报九月二十四日福建图片传真”，以突显这次超常规运作。为了感谢中新社福建分社

在技术上提供的便利，我只好忍痛割爱将那几张难得的底片“卖”给他们，图片以“中新社”的名义发出后，被多家海外媒体采用。

常规的事件性报道模式，是与事件进展保持同步。事故原因尚在调查阶段，早期介入报道的多家媒体都保持低调，而我们却另辟蹊径，转而展开做关于死难者的相关报道。我通过关系从事故调查组那儿弄来了死者的名单和身份证地址，据此，国庆节期间我们兵分三路——《社会周刊》编辑李方、陈彤飞江西，评论部编辑马少华上安徽，我再下闽南与海峡都市报驻泉州记者刘良辉会合同往永春、南安农村，寻访死者故里，试图去感受和了解他们的生前死后，记录并诠释促使他们踏上动荡人生的那些复杂而简单的动因。

这是一次高投入高产出的职业化操作。三路人马长途跋涉采集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在“大火竟成青春祭坛千里寻访生死两界”的通栏标题统领下，占据了10月9日中国青年报《社会周刊》的两个版面。主编张岳庚“写在前头”的那段发自肺腑的话语，震聋发聩：

“福建晋江的这把大火又一次令国人震惊。还是那个恐怖的‘三合一’，没有起码的消防通道，致使32条年轻的生命早就悬于一发；又是那个狰狞的铁栅栏，在火势将员工驱赶到窗口的时候，使他们求生的一线希望最后落空。当本报驻福建记者陈强将新闻火急传到编辑部的时候，我们感到了心灵的震颤：外资企业正不断地要求在中国享受‘国民待遇’，而我们的兄弟姐妹却在自己的本土，在个别外资企业内沦为‘二等公民’！”

“32个青春就这样永远地逝去了。作为打工仔和打工妹，作为中国最贫困人群的一部分，他们对财富和幸福有着更为执拗的渴求。从‘葵涌大火’、‘马尾大火’……到这场‘晋江大火’，

他们几乎命定地成为了歧视和渎职的殉葬品。他们惨死在人生的花季。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更多地向世间诉说他们的人生之梦……

“我们想告知读者的是，生命的价值，青春的价值，亲情的价值，希望的价值，高于一切；我们想告慰死者的是，他们以灵肉作价的这场灾变，定将更多地唤醒同胞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

这组图文并茂的组合式报道，不仅在报社内部引起了轰动，也得了社会上的好评。《新闻出版报》就此发表题为《可贵的快速反应》的述评文章，称此举“再一次表达了中国青年报人服务读者、贴近读者的初衷与夙愿”。该文分析说，中青报“4位记者对死者‘故乡生存环境的调查’文章，反映死者故乡存在的‘活税多’、罚款多等问题与农民外出打工的关系；还刊登江西省瑞昌县金鸡村两姐妹生前给父母的信，在沉重之中再现了她们的感情及烦恼；《平旷秋野里的两座新坟》以及记者马少华拍摄的‘陈圩村周围三四个村庄的数百人为陈立送葬’的图片使读者感到青春生命被大火吞噬令人悲痛的沉重；‘死者及家庭档案’一栏里，死者生前青春意气、妩媚动人的照片和生者悲痛欲绝的照片形成鲜明的对照，更衬托出编者对死者生命逝去的可惜与遗憾。”文章认为，“中国青年报人刊出的这组报道，旨在告知读者，唤醒同胞对普通人命运的关心，对活着的打工仔、打工妹的关心。笔者敬佩中国青年报人这种可贵的快速反应，可贵的平民意识，也盼望越来越多的媒介像这样来关注普通人的命运。”

聚焦劳资矛盾

事故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是：晋江火灾系打工仔纵火所为，导火索乃老板拖欠工人工资。

又是纵火案，与4年前导致61人丧生的马尾火灾如出一辙！

工人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极端手段疯狂报复？为什么此类惨剧屡屡发生在外资企业？……我们把焦点对准了“劳资矛盾”和外资企业的管理问题。

于是，报社二度派记者南下探源。10月中旬，《社会周刊》编辑周艳秋、摄影记者柴继军和我一同从北京飞赴福州，我陪他们俩在省城采访了福建省工会、劳动厅及江西省劳动厅驻闽劳务办事处。由于当时发行工作正忙，我无法脱身，初次来闽的小周和小柴随后便结伴继续南下。沿途肯定受了不少苦，但运气不错，成绩大大的——既采访了打工仔打工妹，也采访到了晋江市市长，还赶上了“晋江纵火案”的开庭。10月17日那天，18岁的四川打工仔徐廷建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10月23日，又逢星期四，《社会周刊》再度推出整版专题（由周艳秋执笔），这里有典型案例的剖析，也有理性的思考。特别是来自劳动部门及工会权威人士的说法，有助于人们多侧面了解“劳资矛盾”的症结所在：

——“一些外企老板无视中国有关法律，采取了加大劳动强度、压缩成本的野蛮管理方式，而造成了劳资矛盾的激化……迫于就业压力，打工仔们能够在短期内忍受资方较为苛刻的工作条件。由于务工手续不全，打工者就很容易受到老板的欺负。打工者因为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当权益受到侵犯时，不会寻找法律保护，有的可能采取极端形式。”

——“在有些地方，外资企业是宝贝，实施劳动监察有难度。有的县甚至高挂‘免检牌’。通常，企业发生比较大的集体上访、罢工等事件时，才会想到需要劳动部门。”

——“福建马尾大火、莆田塌楼、晋江大火的3家企业都没有建工会。没有工会的企业，工人有气没地方出，有的就破坏机器、诬陷老板，甚至绑架老板家人……大多数企业老板，尤其是

台商，对建工会会有‘花钱买对手’的观念。而工人也多数持‘做工拿钱’的简单思维，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张岳庚为这个版配发的“编者按”可谓刀刀见血：“正是在晋江，在福建，在东南沿海的个别地区，伴随一轮轮经济奇迹的，是对中国有关劳动制度的无视，是对打工者权利的剥夺，是对人性的践踏。由此直接导致的，就是劳资矛盾的逐渐紧张……如果一天不改变落后的劳动关系，一天不确立中国法制的尊严，劳资双方一天没有学会依法行事，那么这场晋江大火，就决不会是悲剧的结束。”

关于晋江火灾的连续报道到此基本告一段落，但我们的思考还在继续——化解劳资矛盾不仅仅是劳资双方的事，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此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避免悲剧的重演？有人指出，某些地方官应多多“补钙”，克服“软骨病”，理直气壮地依法管理外资企业，规范劳资双方的行为，才是避免此类悲剧一再发生的根本途径。

有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令我百思难得其解，不妨提出来与读者一同探究——

是什么使得在华投资的某些外商竟敢无视中国的有关法律？难道他们来中国投资办厂看重的就是某些地方可以为所欲为的“软环境”？为什么在对待外资企业的管理上，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不时会与他们管辖下的劳动、环保等部门站在对立面上？当这些部门依法对外企实施监督管理时，为什么一些政府官员总喜欢扮演“保护神”的角色，有时甚至一个电话就把法律赋予给这些部门的执法权给剥夺了？在劳资矛盾发生时，为什么某些地方官更多地站在外企老板一边，使原本处于弱势的工人更加无助？

有人解释说这是“地方政府承担发展经济的重任使然”，有人坦承这是“地方官显耀政绩的内在需要”。那么，又是什么使

得“发展经济”与“维护法律尊严”、“地方官的政绩”与“打工者的合法权益”之间扭曲成了一对貌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福建莆田，就有这么一件颇令老百姓费解的事：1997年发生在港资企业莆田新光电子有限公司、导致32人丧生的塌楼事件，其结果是“豆腐渣”工程的包工头被判了6年徒刑，业主港商在当地仍然厂照开、老板照当，而对此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个别地方官在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之后不久却升了官。人们不免猜测，要是重庆虹桥倒塌事件中被判重刑的官员知道南方沿海竟有如此宽松的“环境”，是不是该叹息自己“生不逢地”了？！

正当我写这篇“新闻幕后”之时，从深圳特区传来噩耗——1999年6月12日，当地港资企业智茂电子厂“二合一”厂房发生特大火灾，导致16人葬身火海，53人受伤。

这会是此类悲剧的终结吗？

时间：1997年8月21日

作者：陈强 原仁开

莆田：向“公关小姐”征税引发争议

陈强：一场不可避免的大争议

莆田：向“公关小姐” 征税引发争议

林小姐从安徽来福建莆田市后，每天都在一家歌舞厅陪客人跳舞、唱歌。舞厅老板不收她门票，也不给她工资。她的收入主要就是客人给的小费，每次少则50元，多则一两百。

林小姐随身的证件很多。除了老家带来的身份证，还有在当地有关部门办的暂住证、从业证、健康证，以及税务部门刚发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完税卡”。

林小姐的从业证上职业一栏填的是“坐台”。她自称每月收入在两三千元之间，其中要拿出100元交税。

在莆田，人们习惯于把林小姐这样的歌厅、舞厅、卡拉OK厅、酒楼、美容院、桑拿城等娱乐休闲场所从事演出、坐台、陪

舞、陪酒、推摩的服务人员统称为“公关小姐”。据保守估计，从外地涌入莆田的“公关小姐”有近万人。

“公关小姐”往往是高收入者。据莆田邮局统计，她们每天汇回老家的款项总额达 50 万元。

今年初，当地有老干部给市里写信，建议对这些人征税。5 月 1 日，莆田市地方税务局发出《关于加强高消费行业服务人员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的通知》。

通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凡在莆田市的高消费行业中从事唱歌、坐台、推摩以及其他高收入服务人员，均应缴纳个人所得税。每人每月定额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低于 100 元。纳税人应在月后 7 日内到服务单位主管地税机关报缴税款或向受托代征的服务单位缴纳税款。未按时申报缴纳税款者将处以 2000 元以下罚款；偷抗税的，除补税外，处偷抗税款 5 倍以下的罚款。

“公关小姐”上税，在社会上引发了一些议论。有人担心，“公关小姐”有一部分实际上就是“三陪”小姐，有个别人甚至还从事色情活动。对这部分人进行征税，是否意味着政府部门对她们行为的认可？也有人提出“公关小姐”的收入隐蔽，账上难以体现，纳税依据不足。

面对种种非议，莆田市地税局局长陈清宝表示，“公关小姐”们都有公安部门发给的暂住证、从业证等，只要没有涉及色情，她们为社会提供所需的正当服务应该视为合法，而她们的高收入状况也是客观存在。根据国家和福建省的有关规定，个人每月收入超过 950 元，就得向税务机关申报个人所得税，如不申报，也可以采取核定的方式征收。如果对这部分事实上存在的高收入者视而不见，不敢管理起来，必然造成税收的流失。

陈局长强调，即使“公关小姐”交了税，也不等于她们的一切行为都合法，如果发现她们有色情服务或卖淫之嫌，当然要依法坚决取缔。

陈局长介绍说，从5月1日至今，已有3335名“公关小姐”缴纳了34万元的税款。如果能将所有的“公关小姐”纳入纳税范围，每年就能给当地财政增加上千万元的收入。

福建省警方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莆田市税务部门的说法不予评论。但他们认为，“三陪”是不合法的，“这点我们从来没有松口过，因为它是导致卖淫嫖娼的温床，最近进行的夏季治安整顿还在抓这个问题。至于某些地方还存在‘三陪’现象，与当地打击不力有关。”

据透露，对“公关小姐”上税的做法并非莆田首创。由于时下对此还看法不一，有的地方是“只做不说”。莆田地税局的负责人并不回避记者采访，他们坚信这一“务实的做法”开辟了新的“生财之道”，值得推广。

记者手记

一场不可避免的大争议

没有遮掩的采访

按说，采访向“公关小姐”征税这样的敏感话题，一般是很难进行的。早在几年前，福州等地就已经开征这方面的税种，但人家“只做不说”，记者想采访也无从下手。然而，在莆田，关于这方面的采访几乎得来全不费功夫，因为税务部门本身就想把它宣传出去，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一拍即合，自然就顺当多了。

那是1997年8月中旬，我到莆田市就半年前发生在这里、导致32人丧生的“3·25”楼塌事件进行回访。听《福建日报》驻莆田记者原仁开说，莆田市地方税务局正在推广向“公关小姐”收税的做法，他已经写了肯定这种做法的内参，因为担心会产生“误导”，最终报社没让发。我告诉小原，中青报公开见报不成问题，让他赶紧联系地税局采访。

顺便交代一下，我原先在《福建日报》社干过，与省报驻各地记者都认识，每到一地都习惯与这些老同事通通气，问问他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闻线索。由于地方党报受限制较多，要在报面上找到有用的新闻线索不太容易。但省报驻地记者手头上往往掌握有许多当地的新闻资源，有些在他们的报纸上出不来，但在《中国青年报》很可能是好新闻。尽管办报的大环境都一样，但不同媒体享有的自由度显然有所不同，中青报是公认最敢说话的报纸，这也是我在省报干了9个年头之后，都成“老记”了还往青年报奔的主要原因。

小原领着我上了莆田地税局，局长陈清宝很乐意接受我们两家的联合采访。陈局长向我们出示了该局出台的《关于加强高消费行业服务人员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的通知》，并就我们提出的几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作了解释。

采访税务部门之后，还得听听纳税人——“公关小姐”的看法。当天晚上，我刚走出宾馆大门，就有骑摩托车的人迎上来：“要不要找公关小姐？我们莆田小姐很多，全国各地来的都有，而且很便宜，几十块就可以。”坐上摩托车来到一家歌舞厅，花了20元开了间KTV包厢，前来坐台的是位安徽小姐。聊了不到一会儿，给了50元小费，从这位林姓小姐那儿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便成了文章的开头。

莆田、仙游一带的人特精明，所以在福建有“神仙难赚莆仙钱”之说。但近几年，莆田人着实让外来小姐赚走了不少钱，据邮局统计，小姐们每天从莆田汇出的款项总额多达50万元，一年可就是一个多亿。找“三陪”、包“小姐”在当地几成时尚，有些干部甚至习惯于带“小姐”出入社交场合。就在那次采访之后，某镇政府连夜派面包车送我回福州，司机行前特地拐到一小酒楼，把“相好”的外地小姐带上车，说是返程时有个伴。

“公关小姐”在莆田持有有关部门发给的“坐台”之类的从业证，所以用不着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担心随时可能被驱逐。她们只要不卖淫，便可长久服务下去。应该说，当地对“公关小姐”的认可和纳入规范的管理，是税务部门得以顺利向她们开征个人所得税的社会基础。试想，如果“公关小姐”从业不稳定，公安、文化等部门三天两头去查，令她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税务部门上哪儿找她们收税去？

报道引发更大争议

稿子以《莆田：向“公关小姐”征税引发争议》为题，很快在中青报《社会周刊》上刊出。被广泛转载是意料之中的了，没想到的是由此引发的更大范围的争议给莆田地税局添了不少“麻烦”。

我的这篇独家新闻应该算是中性报道，考虑到莆田的这种做法当时在全国还算罕见，到底行还是不行，记者也没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不带倾向性的态度进行客观报道是合适的。那阵子，据此作相关报道的报刊估计有上百家，多数还是中性报道（如《南方周末》、《报刊文摘》、《海峡都市报》）；也有的就此发表评论，或反对（如《中国妇女报》、《杂文报》），或叫好（如《沿海时报》）；还有少数报刊在转发时作了倾向性明显的改写，这从香港《东方日报》的标题——《莆田向三陪小姐开刀》，便可见一斑。

一时间密集的报道使莆田市倍感压力，加上那段日子境外媒体对莆田的负面报道（如买官卖官、外商被绑架、人事局长奸污女大学生，等等）相对集中，官方认为这有损于当地的形象，要求有关部门作出解释。市地税局陈局长急忙给市委书记、市政府

写了汇报材料，把责任归咎为报道的“误导”。陈认为，“误导”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文件上所说的征税对象是“两高人员”——即在高消费场所从事唱歌、坐台、推摩以及其他高收入的服务人员，从来没有提到“公关小姐”；二是这方面的征税在当地根本不存在争议，所谓“争议”是记者为了便于发稿而杜撰的。陈的上述观点后来通过内部途径被层层转报到了省里，要不是朋友告知，我可能至今还蒙在鼓里，一直把“误导”的黑锅背到底。尽管现在已时过境迁，还是有必要借此机会澄清一下事实：其一，“公关小姐”是莆田人对在歌厅、舞厅、卡拉OK厅、酒楼、美容院、桑拿城等娱乐休闲场所从事演出、坐台、陪舞、陪酒、推拿、按摩的服务人员的习惯称呼，这是民间约定俗成的叫法，自然上不了官方文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公关小姐”的概念与税务部门所说的“两高人员”不完全等同，但它的外延肯定比“两高人员”来得小，也就是说，向“两高人员”征税必然包括了“公关小姐”，而“公关小姐”中相当一部分是“三陪小姐”，因此报道称向“公关小姐”或“三陪小姐”征税并无不妥。其二，作为一张全国性大报，我们所说的争议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事件发生地莆田。且不说此举在当地事实上存有争议（比如“公关小姐”对征税就有看法），即便我们默认陈局长关于“在当地没有争议”的说法，在全国范围内存在争议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报道之后何来如此多的评论？因此，“不存在争议”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除了忙于写汇报、作解释，陈局长还得接待众多的不速之客。有些地方很看重莆田的“经验”，来人、来函、来电要求“取经”的不少，河南某地区甚至派出由副专员带队的代表团千里迢迢前来学习考察，搞得陈局长应接不暇。

陈局长事后告诉我，为这事，整整忙乎了半年才平静下来。

争议惊动了高层

围绕莆田做法的争议涉及诸多方面，比如有人提出，既然“三陪小姐”要征税，那么那些找“三陪”的先生们是不是也该征税呢？但争论最多的还是——向“三陪小姐”征税，是否意味着“三陪”的合法化？《中国妇女报》等一些报纸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据莆田地税局陈局长说，讨论引起了罗干同志的重视。为此，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李永贵率队到福建进行调查。李得出的结论是，“福建莆田地税部门对‘两高人员’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做法是对的。不能以此作为违法操业合法性的理由。违法操业应取缔，不是税收所能解决或认可的问题。”随后，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项怀诚批示：“请永贵同志主持起草一封给罗干同志的信，起草一篇声明送《中国妇女报》刊登。”

有关这方面的争议最终以国家税务总局有关人士出面释疑而休止。国家税务总局个人所得税处负责人在接受有关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凡取得应税所得并达到纳税标准的个人，均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特种消费行业服务人员取得的收入无疑属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第二，特种消费行业服务人员中确实有一些人从事色情活动，从理论和税收实践两方面看，都不能认为对其依法征税就意味着他们行为的全部合法化。如果他们从事了非法活动，即使缴纳了税款，也不影响有关部门对其依法打击和取缔。就像有些商家在经营活动中出售一些伪劣假冒产品，税务机关并不能因此而不收税，更不能将征税视作对其一切经营行为合法性的承认。第三，税务机关是执行国家税法的职能部门，依法纳税、应收尽

收是税务机关的职责，不能要求税务机关同时行使其他部门的职能。

我的这篇不足千字的报道，之所以引发了如此大规模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触及了社会的敏感神经。而这场争论看来是社会进程中迟早要发生的，通过争论廓清了观念，推进了相关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向娱乐服务业临时从业人员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地区已由原先的福建、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扩展至北京、山西、辽宁、广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吉林、黑龙江、陕西、新疆等地，而且大有覆盖全国的趋势。

时间：1997年1月9日

作者：吴苾雯 王伟群 高峻

面对贫困

吴苾雯：寻找痛点

面对贫困

——高校勤工助学采访记

四号楼的尴尬

爬完最后一级楼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只见楼道里面条、桔子皮、废纸屑、易拉罐扔得到处都是，几个学生正大声嚷嚷着在楼道里玩足球。

一个多月前，武汉某高校四号楼作为该校勤工助学的第一个试点曾引起大家的关注。

“你是来采访4号楼的？搞不下去，没搞了。”学生公寓科科长神情沮丧地说。

听说五楼有个姓李的贫困生参加了这次勤工助学，干了几天就不干了，便想找他聊聊。

小李不在宿舍，他的一位同学正在复习功课，我们便和他聊起来。

“小李为啥不干了？”

“不好说呀……”他挠了挠头。

“他是贫困生吗？”

“是，不但是贫困生还是特困生。”他说。

据这位同学说，小李来自广西农村，进校三年多来，因为没钱，仅回去过一次。家里平时很少给他寄钱，没钱吃饭，常常一天只吃两顿，有时只吃一顿。班主任知道了，借钱给他，他已经在班主任那里借了四五百元了。这次学校在四号楼搞勤工助学试点，将每层楼的卫生包给特困生干，班主任向学校推荐了他。

这位同学说：“开始那个星期他干得还挺好的，每天早上5点多钟就起床开始扫地，可是第二个星期就不想干了，早上睡得快上课了才起床。”

“他饿着肚子，为什么轻易放弃这个挣钱的机会？”记者问。

“是呀，我们也不理解。”他说。

科长告诉我们，四号楼的试点只进行了两个星期，就有两名学生提出不干，剩下的4名特困生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楼道里脏乱不堪，学生反映强烈，学校只好将他们全辞退了。

“他们不干，是不是待遇低了？”

科长摇了摇头说：“原来请临时工，一人扫两层楼面，月工资180元，现在学生一人只扫一层楼面，一个月160元。我们将工资标准定高些，一是对学生带有补助性质，二是怕标准定低了学生不干。”

谈起试点失败的原因，科长说，客观上是清扫时间与上课时

间有点冲突，但那是可以调整的，个人主观原因是主要的。一是觉得在同学面前太丢面子，二是觉得付出的多了，得到的少了，不划算。科长心情沉重地说：“当初我们搞这个试点时，曾设想，如果成功了，便将所有的学生宿舍、教室和校园卫生都包给贫困生，没想到干成这样……”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推动勤工助学的阻力竟来自于被援助的贫困生。

这样的尴尬，在上海一所高校也发生过。1996年该校有本科生6307人，每月生活费低于上海地区最低基本生活费185元标准的贫困生，占24.2%。为了给贫困生广辟勤工助学渠道，该校专门成立了勤工助学服务中心，义务为贫困生寻找勤工助学的机会。一次，机会来了，上海一家百货公司要举行开业典礼，主动与该服务中心联系，想请几位大学生去帮他们做宣传，一天给每人发40元劳务费。

“中心”将招聘海报贴出去后，几天竟无一人来报名，就连那些贫困生的学生也一个没来。“中心”的老师很纳闷儿，便去问他们，回答说：“让我们穿卡通服在门口蹦蹦跳跳太没面子，而且出这点钱，谁愿去？”

这样的尴尬，记者在校园里也碰到过。记者采访一位贫困生时，听说他家很困难，父母都有病，为了他和弟弟上学，家里已借了4000多元债，便问他：“如果现在有份扫地的工作，你愿不愿去干？”

他睁大眼睛说：“扫地？我不能因为穷，就忽略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呀！”

在武汉一所高校采访时，我们听说了这样一件事。一位来自湘西的女生，由于家庭贫困，每月的生活费不到70元，学校为了帮助她，给她安排了一个勤工助学岗位，负责清扫学生宿舍楼

周围的卫生。按规定，她的清扫时间应该是早上6点半到7点，下午4点半到5点。可是，只有到晚上，当夜色笼罩、校园里少有行人时，她才开始清扫……

两张工资单

在某高校，我们看到了两张工资单，一张是临时工的，一张是勤工助学学生的。

翻阅这两张工资单我们发现，同样的岗位，学生的工资比临时工要高出一倍，同样的岗位，学生工时少于临时工，工资却比临时工拿的多得多。

该校负责勤工助学的同志告诉我们，造两张工资单是怕临时工闹意见。

该校女生宿舍楼有一名临时工值班，为了照顾贫困生勤工助学，暑假期间又在每栋楼安排一名贫困生协助值班。临时工值一个昼夜班，工资5至6元，学生只协助值白班，工资却拿8元。

这样的不公平，我们在大学校园采访时并不少见。

某高校原有校园清扫工10余人，为了帮助贫困生，他们又设立了100多个“协扫”岗位，清扫工每天工作8个小时，承担着主要的清扫任务，月工资不到200元，而学生每天只在早、中、晚各协助扫半小时，每月就能拿到80至100元，仅这100多个“协扫”岗位，学校一年就要支付10多万元劳务费。

我们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有设立清扫助学岗的学校，无一例外地将厕所排除在外，扫厕所的，都是从外面请来的临时工。

那天一大早，记者来到某高校学生楼，正碰上早起的几位学生在扫地，一问，是搞勤工助学的。

“你们扫厕所吗？”

“不扫，我们只承包楼道，不管厕所。”

“厕所谁扫？”

“临时工。”

后来我们问该校一位负责人：“厕所为什么不包给学生干？”

“我们担心将厕所划到卫生区里学生嫌脏不愿干，所以承包时先明确规定厕所不在承包范围，另外请临时工干。”

在各大职业院校采访，我们处处能感觉到学校对贫困生的这种特殊的爱：一高校在学生食堂安排十几名贫困生做伙食管理员，每人月工资 120 元，中午还享受一顿免费午餐。一高校实在无岗位可设，便成立了一个国旗班，安排了 19 名贫困生当升旗手，每周升旗一次，每人每月发勤工助学费 50 元。一高校有 10 个阅报栏，便安排 10 名贫困生当报栏管理员……

劳动的象征意义，在这里已远远高于劳动的价值。而特殊的照顾和优惠未必能使他们顺利地走向社会。

前不久，在武汉市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南方一家公司在武昌开辟了一个儿童乐园，公司主动与一所高校联系，招聘 10 名贫困生到乐园搞安全护理。没想到工作了几天后，大部分学生放弃了这份工作，只有一名学生暂时留下来。为此，公司、校方、学生各有说词，争论的焦点是：贫困大学生是不是一个特殊的打工族。

学生认为该公司提供的工作耗时较多，而且风吹日晒，比较辛苦，报酬却偏低，把他们当成廉价劳动力。公司方面则认为，公司提供的工作只是耗费了学生的体力劳动，而并非脑力劳动，而且因为劳动强度不大，耗时多一些也是合理的。至于说到辛苦，他们说，很多贫困生都是从农村来的，这种工作难道比种地还辛苦吗？

学校认为，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勤工是为了助学，用工单位应考虑这些因素，给这些大学生以特殊照顾。公司方面则认为，学生既然受聘于公司，就是公司的员工，在管理和工资待遇上应同其他员工一视同仁，如果允许一个特殊群体的存在，公司的许多管理条例在执行时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他们认为，优先为高校贫困生提供工作机会已经是对他们的照顾了，一旦上岗，大学生就应该放弃自己身份的优越感，同企业其他员工一样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接受企业的管理。

特殊风险金

96级新生进校不久，校团委将“关于进一步拓宽勤工助学渠道、增设勤工助学岗位”的报告送到校党委书记的案头。

要在校内增设勤工助学岗位，必然会挤掉一些临时工的饭碗，学校后勤管理一直搞得比较好，如果在各个岗位换上学生会不会使后勤工作受到影响？这种种考虑，使书记不敢轻易拍板。

书记将这个问题带到全校中层干部会上。他说：“学校今年实行并轨招生，学生贫困面大了，贫困生已占学生总数17%，冬天来了，有的学生连棉衣棉被都没有，有的学生一日三餐只能吃馒头咸菜。最近，团委打了个报告，要在校内增设勤工助学岗位，大家看怎么样，同意的请鼓掌。”会场一下安静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响起了一阵掌声。

书记笑了，说：“既然大家同意了，就这么办，以后校内凡是能让学生干的活就不要请临时工了，优先贫困生。”

虽然学校领导和各部门都支持勤工助学，但是学生愿不愿干？能不能干好？起草这份报告的团委书记心里没底，与本校一墙之隔的某大学也曾将学校的卫生包给贫困生干，结果失败了，

如果这次也搞失败了，怎么向学校和后勤部门交待？人家后勤部门本来搞得好好的，是硬从人家那里挖一块地盘出来给学生。为了稳妥起见，他决定在某系学生宿舍五号楼先搞试点。

接受试点任务的系党总支压力很大，如果试点失败了，责任非同小可，会直接影响学校勤工助学的发展。分管试点工作的系党总支副书记，主动向学校交了1000元个人风险抵押金，将学生干得好不好的风险扛在自己身上。也就是说，如果学生干得好，学生拿钱，如果干得不好，他来承担风险。

贫困生正式上岗的那天，他亲自带着系党总支干部、辅导员、学生干部、党校学员共60多人，拿着扫帚陪同贫困生一起上岗，按规定，以后每隔10天，党员干部必须轮流到这里陪同勤工助学的贫困生搞一次大扫除。

虽然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大家出力，学生拿钱”，但是每到规定时间大家仍自觉地前来“陪扫”。系党总支副书记对记者说，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从道义上支持他们，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让他们的心理得到平衡。

为了从道义上支持他们，系里发现有学生站在窗口向楼下吐瓜子壳，罚他陪扫一周，发现寝室有人将茶叶水泼在楼道里，罚这个寝室的学生轮流陪扫一周。

为了试点成功，他们确实使出了浑身的劲。可是仍有人不好好干，承包三楼楼道卫生的两名贫困生，常常不清扫，各个寝室扫出的垃圾堆积在门口。几次警告无效后，他们只好辞退了兩名贫困生。

我们走访了不少大学，将校内卫生包给贫困生干的几乎没有一个不失败的，只有这所学校取得了成功，然而，这成功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

“我为他们脸红”

去年9月，香港一家公司到上海某高校兑现自己的承诺。

从1995年开始，公司每年拿出20万元在该校资助25名贫困新生，每人每月补助生活费150元。他们之所以选择新生为资助对象，是因为新生刚到大上海，环境不熟，找打工机会困难。

这天，他们将已享受了95年度资助的学生和已确定为96年度资助对象的新生请到一起，举行助学金交接仪式。公司代表将助学金一一发给新生后，对台下的95级学生说：“尽管这笔助学金是给新生的，但是你们老生中，如果个别人确实有困难，我们也会根据情况予以考虑。”谁知，话刚说到这里，台下95级学生一个个向台上鱼贯而来，公司代表见状惊得目瞪口呆，站在一旁的老师面红耳赤地冲上去拦住自己的学生。

事后，有人问那些95级学生为什么还要伸手，他们说，有人给，为什么不要，不要白不要，他们的老师说：“我为他们脸红。”

记者在某学院采访时，翻阅一份该校减免学费的学生名单，发现一位来自广西的96级女生，“因何原因减免学费”一栏里写着：父母双农，冬无寒衣。在此栏后面，学校审批意见却是这样写的：曾安排该生去校图书馆勤工助学，该生不去，故只减免学费500元（注：该生一学年学费800元）。

记者找到这位女生，她告诉我们，是60多岁的母亲上山打柴供养她上学，来学校时带了2500元钱，其中有1000元是母亲在村里挨家挨户借的。这个学期，交了学费，购置了生活、学习用品后，还剩下1000元，家里没再寄钱来，因为母亲要还债。

记者问：“家里那么困难，为什么学校安排去图书馆助学你

不去呢？”

她说：“我刚来，对那里的情况不了解。”

“打扫卫生、整理图书这活不复杂，为什么不去试一试？”

她笑了笑，没回答。

问她生活费如何解决，她说一是向学校申请困难补助，二是找同学和老乡借，这个学期已经借了 550 元，其中有 50 元是找一位比她还贫困的女同学借的，那钱是那位同学帮学校洗刷墙壁刚拿到手的工钱。

“你不参加勤工助学，怎么好申请困难补助呢？”

“我在申请书上写明理由呀。”

“什么理由？”

“有了困难补助我就可以安心学习呀。”

记者给她算了一笔账，9 月份到 12 月份她生活开销共花去了 1550 元（其中有 550 元是借的），平均每个月 387.5 元，而该校学生每月生活费平均在 160 元左右。

问她今后几年怎么办，她说：“借呗，毕业了再还。”

对于这些“伸手要”、“坐着等”的贫困生，“济困”显得多么尴尬！

上海某高校一位大学生就令自己的学校尴尬了一回。这位“贫困生”多次得到学校的困难补助，可是在毕业时为了不去教师岗位，脱离师范生身份，竟拿出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来。

与这所高校毗邻的另一所高校更为尴尬。为了援助贫困生，该校从 1994 年以来，每年都给贫困生提供无息贷款，可是不少人宁愿不要毕业证也不还贷款，至今，学校已经扣压了 1000 多个毕业证。

借钱不还，使各高校为贫困大学生提供贷款的救助方式陷入两难境地。

有人说，中国的贫困生是幸运的，有那么多关注的目光，有那么多热情搀扶的手——

中央财政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连续3年拨出4.5亿元专款用于资助贫困大学生。

国家对贫困大学生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并制定了一系列免还政策，这些政策，使有些学校贫困生免还额占贷款总数五分之一。

学校和社会设立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每校设立各种名目的奖学金近百种，获奖学生占学生总数45%以上。

到1995年，全国已初步形成以奖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基金、特殊困难补助以及学杂费减免为主体的多元化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中国贫困大学生，也许是中国各贫困阶层里得到援助方式最多的阶层。

还有来自于四面八方的爱流——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成立一分钱爱心基金会，每人每天捐一分钱，帮助贫困生；郑州大学对贫困生实行营养配餐制度，每生每周可免费吃上一顿营养配餐；江西省委、省政府规定，高校大米，必须优质平价供给，并在粮袋上打上专供高校字样。……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关注的目光，这么多热情搀扶的手，贫困生们才不致因贫困而辍学。

在天津，有位84岁叫白方礼的老人，靠蹬板车救助了180名青年大学生。一位叫杨璐的中专生看了报道后，给编辑部来信：

“为什么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能靠一架板车养活自己还救助了180名青年大学生，而那些二十多岁、有知识、有强健体魄的大学生，却连自己都养不活呢？”

记者手记

寻找痛点

1998年冬天，中南民族学院一位名叫朱继东的大学生给《中国青年报》寄来了一份对武汉地区贫困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这份调查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在勤工助学的各种方式中，贫困大学生最不愿选择的是体力劳动，占总调查人数57%。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这样一件事。某大学为了给贫困大学生谋求勤工助学岗位，与一家麦当劳达成协议，每个周末安排10名贫困大学生去这家麦当劳当服务员。学校将用人信息公布后，陆陆续续来了七八位贫困生，可是只干了一天就纷纷不愿干了，说干这种服侍人的活太丢人。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正在为衣食和学费而忧。

我还认识这样一位大学生。他来自鄂西一个偏僻的山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考上大学的那年，母亲在村里挨家挨户磕头求借，为他凑足了学费。为了供他上学，40多岁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跟着村里一帮年轻人一起外出打工，因为年龄大，活不好找，她只能干一些别人不愿干的粗活重活。为了多挣点钱

寄给她在上大学的儿子，她没日没夜拼命地干，自己却舍不得吃一顿饱饭。

在大一和大二，儿子每个月都能收到母亲寄来的浸着汗水的钱。可是大三上学期，母亲一连两个月没给他寄钱了，他写信回家询问才知道，母亲累得口吐鲜血被人送回了家。他的老师知道了他的困境，想帮帮他，托人给他找了份家教，每周去一位中学生家里辅导两次，每次的报酬是20元。他干了一个月便不想去了，嫌路远。后来，老师又给他找了一个路近的地方做家教，他没干多久又不干了，说太浪费时间，影响学习。

那天，我在校园里见到了他，穿着蓝白相间夹克衫的他面容很清瘦很苍白。他似乎并不掩饰自己的贫困，他说身上的夹克衫是同学送的，又指了指脚上的旅游鞋说也是同学送的。他还有一年才大学毕业，我问他今后的学费和生活怎么办，他说家里已经指望不上了，母亲的病没好，一场洪水又使家里的房屋和庄稼遭了灾，他从这个学期就开始借债，已经向同学借了六七百元钱。

“你为什么不去找点事做呢？”我问。

他嗫嚅着说：“找不到适合我做的事啊……”

“你适合做什么呢？”我又问。

“我是学计算机的，我想找跟我的专业有关的事……”

我的心沉甸甸的。在那以后，我的头脑里一直纠缠着一个疑问：对于这些贫困大学生来说，贫困也许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他们的心理，他们的精神和人格是不是也存在一种更为可怕的贫困呢？

也就在这时，报社收到了一位中专生的来信。她是看了《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后来这封信的。那是登在一版上的一篇通讯，讲的是天津有位叫白方礼的84岁老人，靠风里来雨里去蹬板车，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先后救助了180多位贫困大学

生。这位中专生在来信中说，为什么一位 84 岁的老人，能靠一架板车养活自己还救助了 180 多名大学生，而那些 20 多岁，有知识、有强健体魄的大学生，却连自己都养不活呢？

这个质问再次引起了大家的思考：一个已经上了大学的成年人要不要靠别人来养活呢？心安理得地接受别人的援助正常吗？

贫困大学生，这个近年来出现的特殊群体，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关注。

几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实行免费上大学、国家包分配的体制。学生吃的是“大锅饭”，坐的是“铁靠椅”，几乎没有学费、衣食之忧，没有找不到工作之虑。这种大包大揽的体制，使教育完全成为国家行为，个人不但不承担教育经费的投入，也不承担任何风险。这种大包大揽的体制，使学习不是学习者的责任，而单纯地变成了国家的责任；使学习不是学习者的需要，而仅仅变成了国家的需求。而且，它还带来了分享现有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性。一方面，由于教育经费和教育资源短缺，仍有许多人徘徊在学校门外，有的人甚至连基础教育都难以完成。另一方面，一部分幸运者却自始至终享受着这一资源。要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公平合理的配置，就必须重新分配这一资源。将高等教育从国家义务教育中剥离出来，使受教育者承担起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这成为中国教育的一次重大改革。

1995 年，全国部分高校实行并轨。

1996 年，全国 50% 高校实行并轨。

1997 年，全国所有高校实行并轨。

从此，上大学得自己掏钱了。虽然这钱只占学生完成大学教育总投资的 20%，但是它仍牵动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心，牵动了千千万万个学子的心。

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个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使校园

里的学子迅速分化。于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出现了，这就是贫困大学生。据国家有关部门 1996 年的调查分析，在校大学生中，有学费、衣食之忧的贫困大学生有近百万人，其中特困生占 30%。

这个特殊群体的出现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不能让一个大学生因贫困而失学”，这既是充满爱心的号召，也成为检验各高校工作的标准。在短短的几年中，各高校便建起了包括“减、补、勤、奖、贷”的救助体系，社会各方面更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纷纷向贫困大学生伸出了援助的手。在中国社会各阶层贫困群体中，贫困大学生也许是救助措施最多，得到援助最多的群体。在武汉大学，就有 40 多种由企业、个人设立的救助贫困大学生的基金，仅这项基金就能使该校大部分贫困生得到援助。

当高校贫困生已渐成社会热点，人们纷纷将关爱的目光投向他们时，我们却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贫困生的心理、人格和精神，我们看到了一些贫困大学生心灵的扭曲、人格的羸弱、精神的萎缩。

可是，我们需要验证我们的判断，这个判断是否正确，是否存在偏颇，需要更深入的调查研究。

我和另外两位记者在北京、上海、武汉、江西、河北等地展开了广泛的调查。我们访问高校领导和教师，走访勤工助学指导中心，采访贫困生和他们的家长，我们获得了足以支持这个判断的大量信息。

我们得知，凡是勤工助学设立清扫岗位的学校，几乎百分之百宣告失败，不是没人愿干这又脏又累的活，就是缺少责任心不好好干活。有侥幸坚持下来的，其优惠政策好得惊人，不但学校领导陪扫，团委书记陪扫，教师陪扫，工资待遇也高得没门。

有一所高校，在清扫楼道的贫困生上岗的那天，各系党支部正副书记，学校各科室的头头脑脑，各班级的党团员，写了入党

申请书的优秀分子，都拿着扫帚拖把前来义务陪扫。而这些贫困生3个人负责扫一层楼道，每人每天打扫的面积不足30平方米，学校每月却发给他们勤工助学金300元。就是这么优惠的条件，有的贫困生仍是不愿干，勉强留下来干的贫困生也向学校提出要求，不扫楼道里的厕所。学校只好另外请临时工专门扫厕所。

我们还得知，一些贫困生放弃能养活自己的勤工助学岗位，却伸手向学校要生活补助，坐等社会救助，有的贫困生宁愿饿肚子，也不愿“低就”。

采访正在进行中时，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湖南岳阳的信。写信的是一位从某大学退学的女孩。她说她和弟弟先后考上了大学，由于父母双双下岗，家庭生活困难，父母强令她退学保弟弟读书。为了继续学业，她被迫接受某商人求“爱”，不久怀孕在身。商人不准她堕胎，迫使她仍然难圆大学梦。她说“像我这样以身许人换学费的女大学生并非个别，我的同学中就有8位，她们都是边远山区的穷家女子……”

这封信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我不敢相信，在90年代竟还会有以身许人换学费的事。难道她们除了以身许人就没有别的办法？我为她们悲哀！

虽然我们带回的大量信息，足以支持我们的判断，但是，在社会正热气腾腾地开展援助贫困大学生活动的时候，我们发出这种不同的声音是否合时宜，会不会给热心的人们泼凉水，会不会影响社会对贫困大学生的关注和救助？

然而记者的良心和责任告诉我们，计划经济下养成的依赖性，对人心灵的腐蚀是可怕的，它使一些被“抱大”的大学生正在失去自立自强的精神，经济的援助可以解决他们的衣食温饱，却扶不起一部分人萎缩的精神。只有找到痛处，一针扎下去，才能激人警醒，同时也提醒社会：在给贫困大学生以经济援助时，

不要忘了在精神上扶他们一把。

而且，在这个正急剧变革的时代，自立自强的精神，又何止贫困大学生需要，那些没有衣食之忧的大学生更需要，工人需要，农民需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因为，救世主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在中南民族学院采访时，常挂在大学生嘴边的一句口号让我振奋不已，这就是“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这个口号应是新时期中国青年的共同口号，它应该响彻中国大地，成为时代的声音！

1996年的最后一天，是在激烈的讨论中过去的。当傍晚我们步出报社大楼时，发现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雪，飘飘扬扬的雪花已将大地变成了一片银白。

1997年元月9日，《中国青年报》在一版突出位置推出我与另外两位记者写的长篇通讯《面对贫困》。当天，中央电视台《早间新闻》摘播了这篇通讯，有多家报纸予以转载，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领导看了文章后立即打电话到报社邀请记者去电台做专题节目。一些大学生纷纷打电话或投书报社，认为文章戳到了痛处，不但令他们汗颜也令他们警醒。

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又在一版头条位置推出了《面对贫困》的姊妹篇——《父老乡亲》。

《面对贫困》和《父老乡亲》见报后，《中国青年报》因势利导，开辟专栏进行“面对贫困”的专题讨论。讨论稿从四面八方飞来，有大学生、教师、家长和大专院校领导，也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正在国外的留学生。

这年的3月25日，一篇《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终于徐徐关上了这组报道的帷幕。但是，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和思考至今仍在继续着。

时间：1996年12月17日

作者：张坤

“上访村”纪事

张坤：要身入，更要心入

“上访村”纪事

1400多口人的王营村，东西狭长，形同一片小小的落叶，挂在安徽省的西北角。

就是这不起眼的小庄，前几年，却牵动了从县、省到中央各级领导的心：仅1994—1995年，全村共进京上访8次，其中4次是50人以上的集体上访。不断上访，直接造成了农田荒芜，缺水断水，多年没上交公粮。

还是这个小村庄，1996年7月2日，从村里“突突突”开出14辆装满粮的机动车，上写“‘上访村’送粮车”。震耳的鞭炮声，吸引了方圆几十里的乡亲赶来看热闹：“上访村”破天荒第一遭领头在全县超额交售爱国粮！

官多下访，民少上访。在泪水浸泡的事实面前，人们往往才

认识到这样一句朴素的真理。

**“俺不就图过个好日子么，
谁愿上访穷折腾呀！”**

去王营村时，正逢连日大雨。到了临泉县白庙镇，通向王营唯一一条田间小路，变得泥泞不堪。65岁的老宋坚持要为我当向导。老宋退休前是县信访办主任。

老宋开玩笑说：“现在进村不用带‘家伙’了，以前有记者想进村，听说还要联防队员保护，就拉倒了。”

不到5里的路，深一脚、浅一脚，竟然走了一个半小时。好不容易捱到村口。

我们先去的是村长王向东家。今年30出头的村长，过去是全村上访代表的头。村长不在家，闻讯围过来的村里人纷纷说：“村长进城里联系麦芽项目好几天了，不知咋还没回来。”陆续来的几位村干部，过去几乎都是上访代表。

村长媳妇于莉敏端过板凳后，便进了里屋。看来的人多了，就出来靠着门听我们聊天。当我问当初王向东上访她支持不支持时，于莉敏愣了半晌，眼圈有些发红：“俺开始咋知道上访是个啥？那年向东在外打工，给俺捎信说，要接俺一起到廊坊去。俺在家把猪都卖了。可向东回来那几天，和村里人在一起捣鼓，也不提啥时动身，几天后才从村东王婶那听说，向东带头到县里上访去了。”

“俺那晚和向东干了一架，丢人现眼上啥子访？向东和俺讲村里事，俺不大明白。俺自家事倒有说头，干部催命似的要这费那费，给不齐，就搬走电视机什么的。那次俺差20元，说去借，不管，还是把俺家猪牵走了。听向东上访为这，俺也不吱声了。”

于莉敏“不大明白”的事，村文书王洪岭一一向我叙说。那是1993年秋，村民王登礼家穷得揭不开锅，催不到款的村干部便把房子扒了，弄得他无家可归。早有怨气的村民们被激怒了！这几年来，村里干部大吃大喝，财务从不公开，名目繁多的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牵猪扒房子，更伤透村民的心。村民王永德找出两张当年的缴款条，一张是上报县里的，写着应交的195.97元；一张写着王家实际被收的254.93元。两张条一假一真，这还只是夏季的提留款，秋季还要交一次。而当年县人均年收入不过274元。

乡亲们找到中学毕业的王向东，商量着由他领头，上县信访办论论理。那天是10月28日。就在这之前，个别县主要领导还在说：“要啥信访办。俺们有政法，有公安，还怕几个刁民闹事！”现在真有“刁民”找上来了，刚刚缩编的县信访办无人接待，县里最后只好派纪委领导出面接待上访群众。

村民们终于盼来了县工作组。一清账，果然发现镇、村都有严重的加重农民负担问题。工作组回去后，村民们左等右盼，却迟迟不见下文，一切照旧。几个上访代表还不时莫名其妙遭人毒打。村干部笑话他们：“你们告到联合国也白搭。”

村民们不服这口气，开始不断到县里上访。1994年1月26日，镇里通知上访代表到镇政府参加协商核账退款。王向东进了大门后，就被这一伙人揪住猛打，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这时，一旁的镇党委书记才说“别打了，都快走”。这伙人当着县、镇干部的面扬长而去。几个代表背起王向东不敢走大路，抄小路回家；回家后不敢住院，在家打吊针，半个月后神志才清醒。

60多岁的王洪军说起这一段，蹲下哭起来。正是他随后带头找上县委书记，将帽子摔在地上，拍着头大喊：“俺不就图过个好日子么，谁愿上访穷折腾呀？谁要报复，就把俺这老骨头拿

去吧！”

县里再次派出工作组进王营。村支部书记、村长等被停职检查，村两委被解散。镇里不久也写出检查。1993年1.8万元乱收提留款被退给农民。

但是，村民们并不满意：自1992年以来，村里账目有80%是白条，尚未查清；镇里向县里汇报已退的8000元钱并未到村民手中；对上访代表打击报复的事，不断发生；有重大贪污嫌疑的干部无人追究……

书记用棍子将钱从门缝 塞进去，群众却不领情

没有退到王营人手中的8000元钱，在当时是笔糊涂账。一位县农委干部曾就此提醒当时那位县主要领导：“有的乡镇报上来的材料水份多，一些人在糊弄你呢！”

这位领导对提醒付之一笑，向上级保证：“钱都退了。”

王营人却笑不起来。他们担心遭打击报复，日夜紧张。1994年4月2日深夜，几名干警和联防队员租车进村，村民们误以为是来抓人的，与他们发生冲突，车被砸，干警被打伤，两支手枪丢失（次日由村民上交）。

4月3日，县委主要领导坐镇白庙，指挥大批人员进了村。

老党员王天基当年是小学校长。他回忆当时情景时说：“老百姓哪见过这阵势？有的被打骂，有的家里银元什么的被拿走，一些人甚至吓出了毛病，有个村民被打后，过了不久就病死了。”

6名上访代表先后被处理，王向东被逮捕（后来都受到从宽从轻处理）。

王营村一下子变得冷清、萧条。村民自发组织起来，白天站

岗，夜晚放哨，县、镇干部难以进村，生产、生活没心思过问。村民人均收入从 200 多元又跌了一半多。进省、进京上访成了一些村民的头等大事。

县里想尽办法对上访代表堵截，但不奏效。县委书记亲自带着钱粮到村里来慰问。当大批人马进村后，村里空荡荡的，有的跑掉了，留下的也紧闭家门。书记叫不开门，只好用棍子将钱从门缝里塞进去，但群众不领情。

镇里班子 2 年换了 4 届，不仅王营，其它村子上访的也不断，本来在全县经济走在前面的白庙镇，一下甩在老后面。镇里是“车轮子不转，电话不通，干部不上班”。每届班子上台，都想把王营班子建起来，但对群众不信任。一位镇领导说：“让村民自己选班子，岂不要出乱子。”镇里把能打擅斗、在天津打工的王某紧急召回，想“以毒攻毒”治王营，村里群众说：“俺们身边就挑不出个管理人么？”王某当晚就卷铺盖走了。1995 年 7 月，镇党委书记带 70 多人突然来到王营，宣布村委会班子，被 300 多群众围攻，新支书兼村长被打到沟里，这个班子 10 分钟又黄了。

“全县看白庙，白庙看王营”，省、地、县派出 8 个工作组或专案组调查、疏导，但每个组都没坚持下十天半月就被轰走。

**“喜鹊被毁了窝，还要围着
‘喳喳’叫，舍不得走呀。”**

“我们的干部要是都这样脱离了群众，怎么得了！”现任县委书记陆有朝在上任后第一次干部大会上，不捂不盖摆问题，语重心长谈心里话：“我们农村有句俗语，‘话是开心的钥匙’，‘话不说不明，木不钻不透’。群众是朴素、可爱的，哪怕暂时觉悟

不高，我们可以谈心、交朋友，坐下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要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们受点气，比起群众受的委屈，算啥！”

“我最反感现在一些干部把讲真话、争权益的群众唤作‘刁民’，动不动就动武，特别是扒房子这一招。你们想想，就是喜鹊被毁了窝，还要围着‘喳喳’叫，舍不得走呀！何况我们对待的是被称为衣食父母的老百姓。”

1995年底，原县委主要领导因坐超标奔驰车被免职，不久就调走了。陆有朝于1996年1月3日走马上任县委书记，县长是从异地调来的李新才，两人有个共同认识：王营问题绝不是孤立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转变干部工作作风入手，才能“敲得明，震得响”。临泉是有173万人口的贫困县（人口安徽第一，全国第三），“扶贫先扶人，扶人先扶志”。

县委再次派出工作组，赴镇、村解决农民负担，吸取过去教训，县里要求：清账对农民公开，啥时解决问题，啥时撤回工作组，县领导下农民家督促落实。几个月时间，就将田桥乡1995年9月计划生育突击中乱收、乱罚款的268万元全部退清，处理了有关领导。1996年全县人均负担占去年人均年收入3.89%，低于国家规定的5%。

王营工作组组长的担子落在了副县长李玉玺肩上。这个工作组成员与以往不同：一是人少，只有五六个；二是几名老干部主动请缨，比如早就退休的老信访办主任宋立德（“宋老头”）、55岁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城建局长程证九等。

初进王营时，有许多干部劝李玉玺：“过去都是带联防队员去的，你们这次人少，更要多带些，万一挨了打，县长面子过不去啊！”

李玉玺痛心地说：“以前工作组进庄，就有群众质问：你们

带那么多人，是来抓人，还是来打架的？我不知道听了这话，别人咋看，反正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难道为了自己的面子，我们非要让群众见了就躲不可吗？”

李玉玺带工作组进村时，果然被数百群众围起来。

“你就是李县长？庄外戴鳖盖盖（警盾）的咋不进村？”

“俺们是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的，就你们看到的这几人。”

“这次咋弄？你们反正咋说咋有理。”

“瞧你们村子现在这样，俺们心里急啊！过去有些干部确实想一下子让你们安心下来，你们还有问题没解决，当然有怨呦！俺们这次一项项兑现，一项项解决，你们啥时满意，俺们啥时走。”

几句话入耳贴心，尽管大家半信半疑，但都想看看咋个“一项项兑现”。

李玉玺不顾被挤得站立不稳，诚恳地向越围越多的群众介绍全县经济情况，介绍富裕乡村，为王营描绘了一个安定富裕的美景，群众久久不愿离去，觉得新鲜，听得心动。

工作组分三个组，对该村 20 名党员、22 名上访代表、400 多户群众，逐人逐户走访，不抽一颗烟，不吃一口饭，夜以继日。

参加上访的老党员王天德，听说李县长对他说田桥乡退款的实例，听着县里坚决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心，掏了心窝：“俺是个党员，政策给俺们落实了，俺决不给村里拖后腿。”

工作组还带着数千元救济款和棉衣等，挨个上门看望了 19 名五保户和困难户。当看到 80 多岁的五保户王贺氏盖的被子还是结婚时的嫁妆时，工作组同志哭了，只是不断说着“对不起，对不起”，王氏拉着老宋的手说：“你们没忘了俺这把老骨头，俺死也心安了。”

**1996年5月21日，王营人第一次
自己选举村委会。没有一个领导在场，
工作组也悄悄离开村子**

工作组在村里对立情绪逐渐缓和后，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当场请群众推荐代表参加清理财务混乱、增加农民负担问题。村级财务账，有关部门清过4次，但群众认为是走过场。这次采取清账人员、群众代表、原干部“对照核查”。在查出几万元白条款、吃喝款事实后，移交司法部门依法处理；在县检察院支持下，将8000元去向不明款、滞留于村里的500多元负担款追退给群众；“4·2”事件中不该收查的价值数百元的银元等财产退给群众；突击计划生育时多收的1000多元钱、900斤小麦、三轮车、电视机等退回给群众……

群众的心定了，就盼着有个值得信任的“主心骨”（领头人）。工作组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县委派人考察，组建了由镇纪委书记刘青红当支书、村里几名德高望重的党员当支委的党支部。又培养了王向东、王洪岭等14名入党积极分子，这是多年来第一次。

1995年5月21日，是王营人难忘的一个节日。就在当年“10分钟村长”被打落到沟的地方，王营人第一次行使自己的权利，选举自己的村委会，没有一个上级领导在场，连几个人的工作组也悄悄离开庄子。

这天下着大雨，但上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娃娃，都顶着大雨，互相搀扶着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近千名群众在村党支部主持下，投下了庄严的一票。由王向东当村长，王永良、王运威当副村长，王洪岭当文书的村委会产生了！

1996年1月28日，在工作组动员组织下，18名党员、群众、上访代表到几个经济发展快的乡镇参观考察。

在单桥乡种田能手韦建华家，韦介绍说：“只要富了，村里调款我最先交，村干部到我家，一搬凳子二拿烟，最后能把票子点。”一位上访代表鼻子里哼了一句“吹牛”。工作组同志请求韦建华能不能实地“传传经”，他爽快地答应了。看着长势喜人的西瓜、棉花地，王营人心里一算，好呀，俺们一亩地最多弄个500元，他这一亩能干5000到1万元呢！王向东钻进塑料大棚，捧着结实的黄瓜流了泪：“人家在科学种田、发家致富，俺们把钱和精神气全砸在上访上。真是穷捣，穷捣，越穷越捣啊。”老党员王永良看过曹庄村的苹果林后，自打着耳光：“人家是人，咱也是人，咱还算个打头的党员吗？”

工作组给每个代表补助了10元钱，早上每人用了2元钱，到中午时大家悄悄将剩下的144元钱凑齐交给了王向东：“你有文化，你就买些科技致富的书吧。”工作组同志了解到他们省下中、晚饭的钱买科技书后，十分感动，也饿着肚子，掏出钱，引他们绕道县城，抱回十几本科技书。

这件事引起工作组同志思考：有一些机关，许多科技书堆积落灰，而农民却穷得买不上几本。工作组同志从县农经委等单位找出一堆科技资料带到王营。

当县里组织第二第三次参观时，报名人数远远大于预定人数。在看了河南有名的南街村后，王向东感慨地说：“人家不是光想着自己富。咱们也得自力更生，带着大家伙一起富。”

再后来，王营人已不满足于看别人致富了，他们主动找到科技副县长蒋秀兰，让她带着去河南辉县等地联系购进优良稻种。村里人串门或遇到邻乡人，也不再是交流上访“经验”，而是焦急地打听“你那儿有啥新品种”。

**“不带着乡亲们扑腾过好日子，
俺不是孬种吗？”**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几年班子瘫痪的王营，如今有了干部，群众是咋看的呢？

走村串户，村民们争着向我叙说现在干部与以前的不同。新的村支部、村委会上任后，干部们就几乎跑遍每户，多次召开村民大会，让村民们有啥说啥，特别是经村党支部研究，聘请了18名村民组成“督察组”，对村财务、干部廉政、工作作风公开监督，村民们切身感受到腰杆挺直了。

在许多村民家，我看到刚刚装上的电灯泡。“不是没电吗？”一位村民说：“这几年晚上都点煤油灯，谁管俺们这事呢。如今有了向东他们，盼电快盼到头了。”

新班子成立后，把“通电”列为几大实事之一。在工作组帮助下，多方筹资，县供电局也大力支持，7天时间就装好了高、低压线和配电器。我到王营采访时，通电已指日可待，乡亲们急不可待地纷纷装上了电灯。

见到副村长王永良和王运威是在下午，两人早上出去办事，刚刚才回来的。问起他们出去补贴多少，两人相视一笑：俺庄还穷，工资俺们现在不拿一分，到外地办事，每天每人5元补助，实际根本舍不得花。王运威掏出磨得发白的几元钞票：“瞧，今天中午饭钱又省下了。”“督察组”一位村民说：“过去干部出去，谁不千儿八百地花！现在村干部不是饿肚子不吃，就是只吃两元一碗的面条，饭店嫌不赚钱，不愿卖，买了面，还被老板轰到一边，‘来了桌吃酒的，一旁蹲着吃吧’。”

天快黑时，终于等到王向东回村了。乡亲们围上去问长问

短，几位村干部将村里事向村长汇报。等他缓口气，我问他晚上愿不愿和我说话，他一口答应。

晚上躺在床上，王向东和我谈着他到东北找工和几次上访中的故事。他说现在不想再上访，但对有些事还是想不通：为啥有些干部犯了错，只挪了个窝，那位县主要领导还提了级？为啥有些干部贪污问题愣查不下去？

“干部吃香，俺这不拿钱的干部却没人愿当，”王向东说，他刚提前释放出来，福建一个老板就来请他：只要你带30个人去打工，当个工头，包吃包住，稳给你一万元。“咋不想去啊！老板来那天，先是几十人，后是几百人聚到俺家门口，就那么眼巴巴瞅着俺。你说，不留下带着乡亲扑腾过好日子，俺不是孬种吗！”

谈到王营的变化，王向东显得很激动，他说：“党和政府保护了俺们的权利，俺们也要尽自己的义务。”他向我自豪地描述着那令人兴奋的一幕幕——

1996年7月2日这天，14辆满载小麦的四轮车、三轮车组成的送粮车队，插着彩旗，打着横幅，一路敲锣打鼓驶向白庙粮站，王营率先在全县交售3.8万斤公粮，超额101%。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王向东，剃掉了上访时留起的络腮胡子。村党支部委员王洪德回忆当年随刘邓大军经过此时，老百姓沿途也是这样为部队送粮送馍的。王营此举，带动了周围乡村，全县掀起踊跃交售爱国粮热。

8月份，天气大旱，王营抗旱工作突出，县里专门在这里召开了抗旱工作现场会。

10月6日，正值种麦最好的季节，搁往年，赶着播麦种的人家少，零星单门独户地用耢子犁犁，现在统一施肥、播种、打畦田、搞灌溉，全村这天第一次机械试播1200亩小麦，男女老

少都像赶集似地跑来看新鲜。科技副县长蒋秀兰亲自操作机器，手把手教授给村民。忙了整整一天，老宋累得蹲在了地上，62岁的王印礼老汉不声不响地回家，拿来一件衣服给老宋披上，说：“老同志，跟俺回家吃碗热面吧。”老宋披上衣服：“这就谢了，麦子还没播完呢！”

王向东谈到王营未来，眼里熠熠闪光：“俺村300亩育种基地已落实了，2000亩农业综合开发区的蓝图已规划好，村里有了钱，俺首先是让村里失学娃都能上学。再修条像样的公路，用5年时间，把王营这个穷村变成文明村、小康村。俺这几天在等着李玉玺副县长回来，谈办卫生纸厂、麦芽加工厂的事情……”

我实在不忍再打扰他，劝他早点休息，话还没说完，就听到了鼾声，他太累了！

我回到阜阳市正好遇到刚下火车、风尘仆仆从北京往回赶的副县长李玉玺，他这次一是到三森公司为王营联系种啤酒大麦的技术材料，再是应中央信访办要求汇报王营这个“上访村”近况。

李副县长说，全县今年以来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农民法制观念增强，经济发展意识强烈。对于王营的发展，他说：“新班子面临的阻力还很大，少数人还在背后捣鬼，新班子工作方法和自身素质也亟待提高。记得王向东刚上任时，我问他，要是碰到有人捣乱咋办？他举着两个拳头说，用这个。我批评了他，你这不又要犯过去那些干部的错误了吗？长此下去，拥护你的会越来越少。这几个月的锻炼，他成熟多了。”

对于自己带领的这次工作组的业绩，他轻轻一言带过后，深有体会地说：“做好农村工作，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要身入，更要心入，不是有这句话吗，‘民心是杆秤，能秤出一位领导分量，民心是把尺，能量出一个干部的良心’。”

记者手记

要身人，更要心人

1999年2月，我随安徽省民政局的同志一起，去参加一个直选村民委员会的活动，几位熟悉的同志谈着谈着，不约而同谈起我3年前写的那篇《上访村纪事》，电台一位同志还立即背出第一段：“1400多口人的王营村东西狭长，形同一片小小的落叶，挂在安徽省的西北角”，他说当时专门围绕此文做了一期节目，所以“印象深刻。让我感动的不仅是题材的重大，更是其间许多真实细腻、饱蘸深情的故事”。

这件事也令我感动，当时这篇报道在全国媒体中较早地触及了上访、民选等敏感问题，由于新闻事实本身就很有感染力、说服力，文章一发表，社会影响很大，《文摘周刊》等全国主要文摘报纸纷纷全文转载，广东卫视等对我做了专题采访，后该文还被收入《冰点》一书。安徽省不仅在当时将其列为基层政权建设的典型材料，还向国务院有关部门作了专门上报，受到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的重视和肯定。

回忆3年前的那次采访，许多情景还历历在目。真的，为了这次采访我付出了一定的心血和劳动，然而比起劳动果实来说，这种心血和劳动实在太值了，因为我不仅采写了一篇有份量的新闻，更通过这次采访，使自己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和灵魂的洗礼。因为有了自己的一次次感动，才使我能在最短时间一气呵成，完成此文，让读者尽快地与我一起分享这份感动。

记得当时偶然听到一个线索，说安徽省临泉县有个出了名的上访村，第一次实行直选，群众自己选的村长是个从牢里放出来的年轻人，一段时间下来，年轻人干得不错，这个上访村也逐渐改变成了交公粮的先进村。由于题材敏感，不少记者都不愿去碰，更谈不上去实地深挖，但我意识到这是一条题材重大的活鱼，里面肯定有不少新闻可挖。我决定去挖一挖。去采访前，我对中央关于农村方面的有关政策作了研究，心里有了底，对采访将可能遇到的困难、问题提前作了一个预案，满怀信心地出发了。

临泉是安徽省境内最偏远的的一个县，而王营又是县里最偏远的的一个村之一，我赶到那里采访时，正逢连日大雨，县里的同志向我简单地介绍了王营的情况后，问我是否一定要去村里，我态度坚决。让我感动的是，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同志主动要求陪我一起去，其中就有65岁的老宋，他退休前是县信访办主任。

赶到白庙镇，通向王营惟一条田间小路泥泞不堪，我背着采访包和摄影器材，信访办一位同志扛着从县里买的一箱方便面（我们事先商量好不吃村民一口饭）。几个人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进了村，一路上老宋都在开玩笑说：过去进村都要带联防队员，这次看看我们到村里“待遇”怎样。

在村里一天的采访中，让我感动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不管是田间地头，还是在农家小院，只要我和一位农民交谈，旁边总

会围上一群人，一面仔细地听着我的询问，一面七嘴八舌地谈着各自看法。这个村子从来没有来过记者，而外界对于这个村子的传言一直神乎其神，我到来后，发现了一个真实的王营。

这个牵挂了县、省、中央不少领导心的小村庄，并没有传言中凶悍的“刁民”，老百姓一句句朴实的话语震撼人心：“俺不就图过个好日子么，谁愿上访穷折腾呀？”“一些干部把讲真话、争权益的群众唤作‘刁民’，动不动就动武，特别是扒房子这一招。你们想想，就是喜鹊被毁了窝，还要围着‘喳喳叫’，舍不得走呀！”……

中午我们谢绝了村民们的热情邀请，吃了带来的方便面。我感到难过的是，虽然王营现在已经人心稳定，新的村委会带领全村走上了正轨，但由于几年来不断上访，造成的创伤还没愈合，不少村民还过着一种艰苦的生活。在80多岁的五保户王贺氏家，我们了解到几年来她盖的被子还是结婚时的嫁妆，在另一个五保老人低矮潮湿的房子里，老人瑟缩地伸出手拉住我就下跪，原来，多少年来村里没有干部来看他，五保费也得不到正常发放，老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直到刚刚通过民选选出的新村委会班子上任后，才有干部定期带着钱粮来看望他。看着老人家徒四壁，我实在抑制不住眼泪，将100元塞到老人手里，匆匆离开。

正是因为一个活生生的事实，让我理解了为什么当年群众会不怕坐牢也要上访，让我感受到农村基层干部作风的粗暴简单会酿出多少悲剧，让我痛切地感到只有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真正让老百姓当家做主，才能实现农村的稳定，才能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天黑的时候才等到那位曾坐过牢的新任村委会主任王向东，为了使采访更深入，在我的请求下，当晚我们在一起捣腿、促膝谈心，直到深夜，我的所有疑惑、好奇，终于在我走近这位年轻

人灵魂深处时释然。

我接着又在县里采访了方方面面的人士，后来赶到阜阳市，耐心等到另一位关键人物——副县长李玉玺，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李是从北京为王营村联系啤酒的技术材料赶回来的，对工作组的业绩他轻轻一言带过，谈了许多帮助王营人尽快致富的办法，谈了自己对农村问题的一些看法和体会，特别是有一段话让我十分难忘，也使我找到了写作此文灵魂所在，我将它提炼出来作为全文的结束语：“做好农村工作，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要身入，更要心入，不是有这句话吗，‘民心是杆秤，能秤出一位领导的份量，民心是把尺，能量出一个干部良心’。”

当有人问我：采访对象那么多生动、形象、贴切的语言，你是怎么挖出来时，我也想借用李玉玺的那句话来回答：“做好新闻工作，我们这些当记者的，要身入，更要心入。”

时间：1996年8月10日至23日

作者：林炜

雷州“7·11”海难追踪

林炜：还有多少漠视百姓生命的官

雷州“7·11”海难追踪

海难还是人难？

钱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也许人们已记不清引发舆论对这个问题不厌其烦地展开讨论的事件，在我们这个社会究竟发生了多少回，但这一回，对广东人来说，可谓是刻骨铭心了——该省雷州市水产局副局长钟进等一些领导干部在雷州“7·11”海难中，以求救渔民凑不足钱为由，拒绝开出当时唯一能进行海上救援的船只，眼睁睁地看着12条渔民同胞的生命被骇浪吞没！

7月11日清晨，天气晴朗。与往常一样，靠海吃海的雷州渔民早早就在海上忙了起来，期望今晨有个好的收获。谁知天有

不测风云，8时左右，一场不期而至的风暴突然袭击企水镇、纪家镇一带海面，风暴掀起的10数米高的巨浪将正在这一带水域作业的10多只捕蟹小艇打得舟覆人翻，10多位落水渔民与狂风巨浪展开了搏斗。

“大风打翻船了，快救人啊！”离出事水域最近的西坡村村民得知风暴的消息，大声喊了起来。一时间，400多村民和出事渔民家属一道赶到了出事海面的岸边救人，但终因风大浪高，村里的小船数度欲出海救援均以失败而告终，10多位身健力壮的男子冒死手拉手排成纵队冲进海里，也只救起一位离岸边仅数十米的渔民。9点，10点，时间一分分地过去，但风暴却没有丝毫减弱，村民们只能看着三四百米开外的渔民兄弟在大浪中挣扎。

突然间，不知是谁想起了停泊在企水港的一艘渔政海监船。“对，只有它能救人！”落水渔民的家属似乎看到了亲人得救的希望，家属周月银等人顾不得许多，拔腿就往20公里开外的企水港跑。11时许，周月银等人终于找到了吨位为108吨的属于雷州市水产局管辖的G905渔政海监船，谁知船长冼永康的回答却打碎了周月银等人心存的半丝希望。不管家属们如何苦苦哀求，冼船长能回答他们的就只有一句话：“我没有开船的权力，要调动这艘船必须得到我们主管副局长的批准！”这时，风力已经减弱，与狂风巨浪搏斗了3个小时的渔民们正借此机会喘息，无力地等待着前来救援的亲人。

然而，不管家属们如何哭求，冼船长就是不肯开船。看着哭得泪干腿软的家属，冼船长最后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同意让船工黄永三上岸给“主管副局长”打电话请示。黄永三冲到岸上，又是呼局长大人的BP机，又是打他的“大哥大”，待他好不容易与上司通上电话时，已是中午1点多钟了。虽然迟了点，但这个电话还是给希望一再破灭的家属们重新点燃了让亲人们生还的希

望，他们希望从这位此时决定着亲人生杀大权的雷州市水产局副局长兼渔政海监大队队长的钟进大人口里得到一道开船的圣旨。然而，家属们刚刚燃起的一线希望又一次被这位副局长大人的金口彻底吹灭了。电话那边的钟进听完黄永三的汇报，竟然严肃地告诫代家属们求情的黄永三：“你们救人可以，但一定要先收足钱（指燃料费和船员们救人的“工本费”——作者注）才能开船！”“能不能先救人再说？他们一时凑不足钱。”黄永三与家属们低语一阵，再次提起胆来战战兢兢地低声向上司求情。“说不行就不行，你糊涂什么！”副局长不由分说就挂上了电话。

无奈，黄永三又领着几位家属找到企水镇副镇长冯亚生救助，冯立即通知在外开会的镇委副书记陈玉与钟进联系。陈一再向钟副局长说明，现在筹钱已来不及，请他尽快下令开船救人。但我们的钟副局长却顾不得这么多，答复依然：“救人可以，但要有钱才能开船！”与家属们一道急得团团转的陈玉随后又打电话给企水渔监站站长黄其林，得到的答复几乎同出一辙：“没钱，船不能开，这是规矩。”

情急间，陈玉想起了钟副局长的头上还有上司——雷州市水产局的正局长。“副局长不让开船，正局长总能下这个命令吧？”陈玉一阵兴奋，似乎为他的子民们找到了救星，当即很顺利就找到了局长的电话，谁知这个“救星”尚未出现，就给了陈玉当头一棒——局长在电话里告诉他，该船由钟副局长分管，要动用得征得他的同意。“请局长以救人为重，通知钟进开船救——人——吧。”听着陈玉从请求变为哀求的声音，这位局长还是“不敢越过”分管副局长下令开船，只是在电话里支支吾吾地说了一句：“我打电话给钟进吧——”

这时已是下午2时多，在镇里焦急地等待着陈玉的冯亚生听到令人绝望的消息，才赶紧跑到企水码头，请求私人的木船开船

救人，然而，这些私人船主看到风急浪大，没有一个人愿意开船。停泊在港口的 G905 渔政海监船，在平静的避风港里等待着来自局长的金牌圣旨。这里，水路距出事现场仅 2000 多米。有经验的渔民说，以 G905 的吨位和马力，冲过风浪到达海难地点只需十几分钟。

下午 3 时多，海难现场。凭着一身好水性和惊人的毅力，与风浪搏斗了近 6 个小时的落难渔民黄妃赤拖着血肉模糊的双腿徐徐地爬上了岸边。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眼那几乎吞噬了自己生命的大海。就在这一瞬间，他看到了不远的海面上，一个黑点在若沉若浮。凭着渔民的直觉，他知道这是一个快支撑不下去的落难兄弟，他来不及喘息，又一头扎进了那刚刚还令他魂飞魄散的大海。渔民邓否因此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此时，陈玉还在无奈地等待着来自水产局正局长的“拐弯”消息。虽然，他最终还是无法知道这位正局长有没有给钟副局长打电话，但知情的家属们最后却看到了一个让他们感到肝裂肠断的事实——当天下午 3 时 20 分，洗船长的中文 BP 机上显示出钟副局长的最后命令：“关于救难的事，一定要收费才能开船，而且死尸不能放进船里。”虽然远在湛江市出差，虽然要通过 BP 机才能发号施令，但是我们的钟副局长仍然担心部下是否会忘了自己的指示，只救人而忘了收钱。

时间相当吻合。刚刚收到钟副局长的 BP 机指令的洗船长长长地舒了口气：“今天再不用起锚了。”正准备抬头舒展一下的洗船长，与岸上的人们一道，发现了漂进企水港的第一具渔民的尸体。几乎是在同时，黄妃赤搀着奄奄一息的邓否爬上了岸边。

在后来的时间里，落难渔民的家属找到了另外 11 具遇难渔民兄弟的尸首。

最是渔民兄弟亲

雷州“7·11”海难发生后，心有余悸的雷州市渔民在痛斥钟进、关祥和冼亿康等人的“冷血”和对事故发生地的乡镇党委、政府感到失望之余，对海难发生时和发生后出现的令人难忘的人间真情，也深藏心间。

44岁的黄妃赤，是纪家镇恬神管理区的一位普通渔民。7月11日凌晨5时多，他和其他小户渔民一样，划着一条小艇到离岸3000多米的北部湾海面撒网捕蟹。7时多，天空突然乌云翻滚，海天漆黑一片。顷刻间，刮起了9级以上狂风，翻滚的海浪把他的小艇掀了个底朝天，转眼间就再也见不着了。这时，怒吼的大海有如发狂的巨兽，一会儿将他抛向七八米高的浪尖，一会儿将他摔到数米深的浪谷。黄妃赤就这样在狂风中被巨浪抛摔了半个多小时，精疲力尽，方向不辨。待风浪稍有减弱，黄妃赤经过一番努力辨别出方向后，就顶着巨浪向岸边一寸寸地游动。经过数小时的挣扎搏斗，他终于拖着血肉模糊的身体游回了岸边。当早已守候在岸边盼望丈夫出现的妻子带着4个儿女迎向黄妃赤时，黄已经无力地瘫倒在浅滩上。

见到站都站不起来的黄妃赤，村里人找来担架，准备将他抬回家。这时，他下意识地看了看依然翻腾的大海，突然看到远处的海面上，有个人在随浪沉浮。不知突然间哪来的力量，黄妃赤一下子从浅滩上站了起来，就要向海里冲下去。亲人和乡亲们惊呆了。妻子拉住他，哀求道：“不要下去了，风浪这么大，你会没命的！”黄妃赤睁大眼睛，大吼一声：“放手！”就挣脱众人，扑向那十几分钟前他逃都来不及的大海。他以惊人的毅力，在仍刮着四五级大风的海面上与风浪搏斗了40多分钟，终于靠近了

素不相识的企水镇渔民邓否。他用左手架着邓的胳膊，用剩下的微弱力气顺着海浪慢慢向岸边移动，这期间他们10多次被巨浪卷入海底。约1小时20分钟后，两个奄奄一息的汉子终于神奇般出现在浅滩上。

“7·11”事件被传媒披露后，黄妃赤的事迹也迅速在雷州渔民中间传开。雷州市委也顺应民意，于8月10日作出决定，号召全市人民向黄妃赤学习。雷州市和黄所在的纪家镇还分别向他颁发了2万和5000元的奖金。采访中，黄妃赤对恭喜他得到大笔奖金的记者说，救了个人，能得到钱，他连想也没有想过。他说，他一年打鱼下来，最多也只能挣个三两千元，“得到这么一大笔钱，太意外了”。记者问他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怎么还敢下海救人，有些腼腆的黄低声回答说：“见死不救我做不到！”

“7·11”海难发生后，虽然雷州市有关部门和海难发生地企水镇一个领导干部也没有出现在现场，但渔民的自发救助行动却相当感人。采访中，不少渔民对记者说，没有渔民兄弟的互相救助，死人肯定不止12个。

海难发生后，离事故地点最近的企水镇西坡村的数百名群众就自发赶到发生海难的岸边，搜救遇难的渔民兄弟。他们数次欲驾村里的小船出海救人，都因风浪过大而不得不中途放弃。当发现一些落海渔民正抱着木板在近岸处随风浪漂浮时，人们纷纷自觉地手挽手组成纵队，冲进齐腰深的海水，向遇难渔民伸出援助之手，使数名渔民幸免于难，其情景悲壮感人。

当企水镇数名在家的书记、镇长们面对海难，抱怨没有大船（实际上当时港口停泊着许多大渔船），表现得束手无策时，远离出事地点的纪家镇海联管理区的邓立勋和黄伍，却各自驾一条小船出海，不顾个人安危，穿行在浪峰波谷之间，竭力搜寻遇难者。

“7·11”事件发生后，由于有关镇一级政府部门没有及时将灾情向市里汇报，致使这一严重事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在事发数天后，有关政府部门都尚未有一个比较完整地反映事件全面情况的调查。而雷州市水产局的4位离退休干部，在听到由于自己单位的某些领导渎职，使海难中遇难渔民失去生还机会的群众议论后，自发组织起来，深入渔村进行调查，于7月17日首次将事件情况汇报给雷州市政府，并同时向党报作了反映，使这一严重事件得以公之于众。

此次海难，雷州共有渔民12人遇难，其中有两个家庭为夫妻双亡和父子双亡。他们全都是这些小户渔民家庭的最主要劳动力。

事件发生后，由于雷州市各级有关部门对死难渔民家属的善后安置工作没有及时、系统地展开，致使遭难家庭对未来的生活忧心忡忡。而出差在沈阳的雷州市个体户刘秋海8月10日看到《南方日报》刊登的家乡海难报道后，当即坐飞机返回雷州，联络了10名个体户向全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出捐助遇难者家属的倡议。第二天上午，他们就将募集到的首笔3.1万元捐款逐个送到死难者亲属手中。

以上这些发生在民间的人道主义救助行动，与有关政府部门迟缓的反应和软弱无力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记者连日来的采访中，不止一个渔民当着一些当地干部的面耐人寻味地对记者说：“最亲、最可靠的还是我们渔民兄弟！”

心里没百姓 别想再做官

原雷州市水产局副局长兼市渔政海监大队大队长钟进和该市G905渔政海监船代理船长冼亿康事后被雷州市检察院依法逮捕。

检察院的侦查结果表明，在“7·11”海难事故中，身为渔政海监负责人兼市防风指挥部副总指挥的钟进，在接到群众要求救助遇难渔民请求后，竟然以渔民家属筹不够油料费为理由，拒绝派出船只前往救援；而身为渔政海监船代理船长的冼亿康，在得知渔民遇难需要紧急救助的情况下，以船只调动需经主管领导批准为由，拒绝开船前往出事海域救援。

继雷州市水产局副局长兼市渔政海监大队大队长钟进和该市G905渔政海监船代理船长冼亿康分别被雷州市委、市政府开除党籍、撤消行政职务和开除公职、依法逮捕后，又有7名雷州“7·11”事件的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由湛江市和雷州市两级有关部门组成的“7·11”事件联合调查组查明，原雷州市水产局局长、市防风指挥部总指挥关祥、市渔政海监大队副大队长陈光星和该市企水镇渔监站站长黄其林，在得知出海渔民遭风暴袭击，并接到遇难渔民家属请求派船出海救助要求的情况下，除了通过电话协助遇难渔民家属与市渔政海监大队联系出船救人事宜外，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或法律赋予的权力，组织和调动停泊在出事海面附近企水港的船只进行救助，延误了救难时机，甚至没有再过问灾情，事后也没有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企水镇主管渔业生产的副镇长冯亚生，在得知灾情和遇难渔民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也只是协助报案人向渔政大队电话联系请求派船救人，当请求失败后，没有采取其他任何措施，也没有及时赶到现场组织群众进行海上救助；当时在企水镇主持全面工作的镇人大主任梁发明以及副镇长陈沛、邓碧华，在早就得知海难发生的情况下，既不过问灾情，也不组织研究如何进行救助，事后还不过问风暴造成的灾害情况，梁发明甚至授意镇办公室向雷州市政府办公室虚报灾情“只沉一船、死亡一人”。

雷州市委、市政府认为，以上干部或是身负组织和进行海上

救难的重责而严重渎职，或是为官一方却对渔民的生命安全不关心，丧失了作为党员干部应有的品德和责任感。市委市政府于 8 月 16 日作出处理决定：撤消关祥雷州市水产局局长职务，留党察看一年；撤消黄其林企水镇渔监站站长职务，留党察看一年；撤消陈兆星雷州市渔政海监大队副大队长职务；撤消冯亚生企水镇副镇长职务，开除党籍；给予梁发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陈沛和邓碧华行政记过处分。

记者手记

还有多少漠视百姓生命的官

每每看到某某国家的首脑中止正在进行的国事访问，赶回处理国内突发自然灾害的新闻，就对这些国家的百姓羡慕不已。在采访雷州“(96)7·11”海难的时间里，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当天的风暴，起于早上7时多，8时左右，在海上生产的渔船纷纷被风浪打翻，堕海的渔民开始在风浪中挣扎，但直到下午3点半最后一位幸存者爬上岸边时止，在这中间的七八个小时里，出事渔民所在的企水、纪家两镇的所有领导，竟然没有一个出现在出事的海难现场，满海滩的，尽是那些在声嘶力竭地呼喊自己的亲人赶快回来的父母、妻子和孩子！

本来可以生还的生命得不到拯救，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的家属也得不到及时的安抚。遇难的11位渔民，几乎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有些还是父子同时随浪而去，家里留下的，都是一群群嗷嗷待哺的孩童，以及年迈无力的老人和没了主意的女人。在他们亟需政府的及时救济和安抚的时候，他们盼不到心目中“领

导”的身影。水产局是主管一个地方的渔业生产的，但直到8月9日，从报纸上得知渔民遭遇的时任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到渔村慰问遇难渔民家属时，雷州市水产局的局长关祥才派出一位副局长陪同陈同庆前往。这是雷州市里的官第一次出现在遇难渔民的家里！

实际上，当我完成第一阶段的采访，得知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时间表时，我的心情已不仅仅是对别国百姓的羡慕，同时更是对自己的同胞感到悲哀！他们的遭遇，无异于我们原始社会部落中自生自灭的祖先！

于是，当我完成第一阶段的事件报道时，就开始了颇为艰难的第二阶段的采访。我要弄清楚，事件发生时和发生后，除了早成众矢之的的钟进、冼亿康外，其他那些管着当地渔民百姓的官都在干些什么。

— 市里的官

我首先找到了当时在任的雷州市委书记陈永平。

我想，市委书记是当地的第一父母官，对自己臣民的遭遇应该感同身受，在他这里或许能找到点我理想中的共鸣。

但谈话刚开始，我就清楚地感觉到，这一愿望要破灭了。他用一些“令人痛心”、“令人气愤”的字词痛斥一番钟进、冼亿康后，就开始与我大谈特谈企水、纪家两镇和市委、市政府是如何如何积极做好受难者家属的善后工作的，但最后竟然让我得知，在7月11日灾难发生到8月15日他接受记者采访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竟然从未踏足哪一户受难渔民的家！实际上，此前我已经知道，所谓的“积极做好善后工作”，指的是市、镇两级政府发动百姓给遇难者家属募捐了3万多元，就是这一举动也还

是在雷州市“个体协会”的几个个体户自发募捐的带动下才出现的。初时，雷州市个体户的这一行动甚至还遭到市里、镇里一些领导的阻挠，指他们“把事情张扬大了”。

他没有意识到我的诧异，只是一个劲地说他很忙，忙得不可开交，而且知道这件事也太迟了，“直到7月25日我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我说，你高为一个市的书记，方方面面的事都有，应该是够忙的。“是呀，7月11日（事件发生当日——作者注）我到湛江市委汇报工作”，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趁着我的“恭维”把话茬给接上了，“14日，省里要开省委扩大会议，于是我12日就去了广州，提前点顺便办点别的什么事。从广州回来就已经是7月25日，中间忙得一塌糊涂，一直没有跟家里联系，所以也就不知道家里曾发生这么一件闹心的事。”

你永远闹不清楚，作为一市之首，自己管下的12个臣民遭难死去，自己的下属因为一时拿不到钱而见死不救，他竟然就可以十天半月的不知道！

但毕竟是贵为书记，临近终了，陈永平总结出事件中反映出来的三个严重问题：

- 1、一些干部忘记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心里没有群众。
- 2、干部队伍中，金钱至上、拜金主义思想严重，把几千元看得比群众的生命还重要。
- 3、一部分干部没有正确的人生观，缺乏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

作为“事后诸葛”，陈书记虽然不算太迟钝地总结出雷州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金钱至上和拜金主义思想严重”和“心里没有群众”等问题，但他却没有勇气承认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问题在自己身上的反映。

二 局里的官

“（96）7·11”事件被新闻媒体披露后，雷州市委、市政府为了平息众怒，除了将事件中的焦点人物水产局副局长兼渔政海监大队大队长钟进和 G905 渔政海监船船长冼亿康交由司法机关严惩外，还历史上第一次大面积地处理了一批与事件有关的干部。在被党政处分的 10 余名干部当中，有雷州市水产局局长关祥和该局驻企水港渔监站站长黄其林，他们均被处以撤销职务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记者第二次采访时，关祥已经被撤职，于是有了充分的理由躲避记者的追寻，而据说是在乡下某处专门侍候自己在任时就通过自己的权力承包的 100 多亩甘蔗园去了。于是老实巴交的黄其林作为当时水产局与事件有关人物的代表，成了记者的采访对象。

应该说，有着 30 多年党龄的渔监站站长黄其林就像经验老到的老艄公一样，熟知大海的喜怒哀乐。他说，当天一大早起床，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海要变了”。果不其然，将近 8 时，海上就刮起了七八级的大风。

但黄其林徒有了这个经验，因为他看到海要变了，也就仅仅是想到海上要起大风，而没有想到海上起风对他的工作职责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他既没有采取措施通知在海上生产的渔船赶快回港，也没有向水产局和当地政府报告风暴可能造成的后果，而是照常自己的日常工作。

上午 11 时多，风力开始减弱，企水镇主管渔业的副镇长冯亚生带着一渔民家属前来向他求援，说早上在海上生产的 10 多只小船全给风浪打翻了，船上的渔民全都掉进了离岸好几公里的

大海里，让他尽快联系停泊在附近的 G905 渔政船出海救人。听说要救人，黄其林倒没怎么糊涂，拿起电话就往管着这条船的钟进家里打。但钟的家人告诉他，钟外出吃饭去了。他又打钟的手机，但联系不上。就这样一直磨蹭到下午 2 点，企水镇党委临时负责全面工作的副书记陈跃又打电话来求助，他只说了句“我这里没有办法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就以为自己已经仁至义尽了。

记者问他：“市里把你撤职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他们说我不尽职，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那你的职责是什么？”

“实在地说，现在体制变了，平时只是忙于向渔船收费，尽力完成局里下达的收费指标。至于渔监站的其它职责，我自己都给搞懵了，不知道是变了，还是不用管了。反正局里考核的惟一硬指标就是收费，完不成就要挨罚，扣发奖金。”

“其实，当初冯副镇长带着人来向你求援时，你要作的第一件事应该是向局里汇报，而且，你们关局长还是市里三防指挥部指挥长。”

“在我们这里，渔民遇险的事儿太多了，所以对这种平常事也就没有想得太多。况且，堂堂一个镇长，要比我这小站长的办法应该更多才是。”

“按规定，你不但要管收费，还要管港口的秩序，还要管渔民的安全生产和组织抢险，经常提醒渔民出海要带救生器具（遇难的渔民没有一个带救生器具——作者注）。这些你都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只是这类事情发生得少，而且现在有什么事都有镇政府，也不太需要我们。”

“在调动不了渔政船出海救人时，就没有再想过其它办法？比如你还有一个很大的权力，渔民遇到危险时，你可调动港口的

一切船只投入抢险，对不听调度的船只你还有权力建议吊销执照。据说，当时在港里的，就有不少大马力的机动渔船。”

“说实在的，我一直不知道我还有这么大的权力，只是受了处分后，翻开一本1989年发下来的工作手册，才知道的。况且现在的情况也不一样了，渔船都是私人的财产，他们最忌讳救人，因为很可能捞上来的是具尸体。因此，就算我当时想到这个办法，也不可能调动得了。”

看来，对这种麻木之人，要让他明白自己是在漠视百姓的生命，恐怕要比让听琴的牛懂得音乐还难。

三 镇里的官

这次海难发生在雷州市企水镇西坡管理区离岸三几公里的近海海域。据记者调查，当时镇委书记位缺，市里临时指定主管政法的副书记陈跃负责镇委全面工作。镇政府方面，镇长外出学习，镇人大主席梁发明被指定临时负责政府的全面工作。事发当天，除了梁发明当晚住在雷州市区不在镇里外，其余一大群副书记、副镇长均在镇里，而且都是在早上得知海上发生风暴的情况下才出门工作的，但海难发生后，镇里不但没有组织任何的抢险措施，而且除了陈跃一人在下午4时多到过出事海滩一次外，其余领导均在“各忙各的事”。他们几乎都说，“我不主管这方面的事，况且也不知道”。

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呢？

冯亚生是镇里主管渔业的副镇长，后来被市里撤消职务，开除党籍。事情发生后，渔民家属在管理区领导的指引下，第一个找的就是他。但是，他不但没有以政府的名义组织任何哪怕是无效的抢险措施，也没有立即向市里汇报情况，而是以“帮渔民办

事”的角色，随着手足无措的报案渔民家属东奔西走，在得知钟进发话筹不到钱坚决不开船时，也没有亲自拿过电话与钟进交涉，更没有当机立断承诺由镇政府负担费用，以换取 G905 船出海救人，致使错过了救难的良机。

陈跃是受处分最轻的一个官，只受了个通报批评。虽然承认当天上午出门公干前的确知道海上发生了风暴，但他说起理由来，依然振振有辞：“知道有什么用，我们这里的海上风暴有时一天三次，难道我们能每次都在不知道灾情的情况下组织一次抢险？就在 7 月 10 日的小风暴中还死了一个人呢。假如你在这个位置上，根本就不会去想有什么灾难！”

于是，他也就按他的逻辑，照常前一天已经安排的事情：镇里欠着纪家镇糖厂的几十万元债款，糖厂有困难，天天催债，而镇里又一时拿不出这笔钱，镇长说他与糖厂关系好，他就与另一副镇长周英同去周旋去了。“对镇里来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对镇长交代的事情，我不能不去办。”

中午回来后，他也接到了渔民家属的求助，但他也只是打打电话张张嘴，最后什么事也没办成。更加让当地渔民气愤的是，他在下午 4 点多去出事现场时，已清楚地知道灾情和死难情况，但当天晚上镇政府报给市里的情况通报里，依然睁眼说瞎话：沉一船，死亡、失踪各一人！

邓碧华，镇里的副镇长。她对记者说，因为自己太老实，说了自己当天外出买早餐时雨伞给狂风刮走的细节，而被市里认为“明知发生了风暴却没有一点当领导的责任感”，才惹了行政记过处分的结果。

她始终认为，整个事件应该由镇党委负责，她自己没有任何责任，因为她当天一直都在做着本分的事：上午到分管的管理区催缴公粮，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带孩子看病，之后还去了粮所了

解夏粮入库情况。“知不知道发生了风暴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管渔业的镇长。”

陈沛，副镇长，事件中受行政记过处分。雷州市纪委的通报说，他知道情况后，不过问救灾、救人情况，特别是当冯亚生等领导要他一起到他自己分管的管理区了解灾情时，还以自己还有“其它工作”为由拒绝同去，只派了一位手下的同志与冯亚生等领导同往。

他对记者说，他一直“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他说，自己上午根据镇里的安排，到另一个镇看望一位患了癌症的计生干部，中午开车到市里接人大主席梁发明，下午陪同水产局的同志下乡落实一个养虾项目的征地问题，“这都是镇里的工作，我根本就没有错”。

记者问他，“当天下午，冯副镇长叫你下去了解灾情，你为什么推托不去？”

他说：“并不是我推托，实在是人家水产局的同志已经等了我一个上午，再不陪他们去太不应该。而且当时还能抢什么险救什么灾呢？我回来时，早已风平浪静，太阳贼高，简直是扯谈！另外，你知不知道，我在镇里是管企业的，当然是把本位工作放在第一位。”

镇委副书记陈光鹤算是比较负责任的一个了。

当天早晨7时多，他起床洗漱时，发现外面已经刮起了大风，“估计有8级以上，我邻居家的玻璃都给刮破了”。

知道刮风后，虽然陈副书记的动作还是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不紧不慢——洗漱完毕又穿戴整齐后，夹上公文包到镇里的食堂心满意足地享用完早餐，之后才回办公室上班，但毕竟大风还是吹醒了他脑子里的某根弦，“看到邻居家的玻璃被风刮破，我就意识到出海作业渔民的生命可能会受到威胁。”

在办公室坐下不久，他就招上管下的镇团委书记一起，到自己分管的渔村了解情况。待逐一落实当天出海的船只都安全回港后，他于中午12时许回到镇里。然后吃午饭、睡午觉。“因为在镇里没听说有渔民遇难的事。”“到我感觉到我早上的判断可能应验的时候，已是傍晚6点多、听说港口漂回了一具本地渔民尸体时的事了。这时我又回了镇里一趟，打听到在家主持工作的人大主任梁发明和副书记陈跃、副镇长冯亚生等人已在着手处理时，也就没有过去问一下我能不能帮着干点什么，况且也不知道这次海难有这么严重。”

在镇里转悠了一会，陈光鹤就回了家，心安理得地享受“8小时以外”的安逸和家庭乐趣去了。

与记者谈起自己在这一天的表现陈副书记颇感自得，毕竟“在镇里所有领导中，我是当天惟一个有主动关心渔民安危行动的人”。

但雷州市纪委对陈光鹤的调查结果认为，（陈）事发当天上午8时就已了解到风暴的情况，但并没有以高度负责的责任感向镇里的其他领导提出研究防风抗灾措施，而只是组织自己分管的系统的同志到分管的管理区检查渔船回港情况，没有组织、也没有提议其他领导组织镇里的领导研究灾情，以采取更为全面有效的措施援救遇难渔民，也没有向市里有关领导和部门报告灾情。

因为在灾害面前“只想到自己的责任田”，陈光鹤受到了雷州市委的“批评教育”。

谈到“只管责任田”问题，记者与陈光鹤有过一段对话，现抄录如下：

记者：也就是说，当你意识到在海上生产的渔民有危险时，你这种意识也仅仅是针对所分管的管理区的。

陈光鹤：的确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能按党委的分工把自

己的做好就很不错了，哪里还管得了别人的事。

记者：但是，有一点你可能忘了，你是镇党委的一名副书记，镇里的领导之一，而不是某一管理区的主任，而且你还知道当时主持镇里工作的领导不在家，怎么就没有丝毫责任考虑全镇的情况呢，哪怕只是向别的领导打个招呼提个醒也好。

陈光鹄：你不太了解基层。在镇里，副职没有多大权力，充其量只是个劳动力。按你说的，我如果在关心自己分管的管区同时，还能与其他领导打个招呼提个醒，甚至建议其他领导一起开个会研究抗灾措施什么的，肯定是个有责任感的干部，但在我们这里，弄不好，别人说你多管闲事，甚至怀疑你是否想趁“一哥”不在时夺权。

记者：（哑言）

面对一群这样的官，别说死了 11 个渔民，就是更多，也不足为奇。悲哉！

时间：1996 年 8 月 8 日

作者：卢跃刚

蹊跷的特大毁容案

卢跃刚：一个人·一个村庄·一段历史

蹊跷的特大毁容案

惨绝人寰

这是一个发生在 8 年前的令人心悸的案件。

1988 年 4 月 26 日晚 11 时许，陕西礼泉县烽火村接待站北平房一间黑屋里传来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啊！——救命啊！——痛死我了！——妈呀！——你怎么不来管我了！——”烽火村村民武芳被仰面抡倒，有人骑在她的身上，有人抓住她挣扎的双手，在短暂的撕扯扭打过程中，一种液体朝武芳迎面倒下，随着便是强烈的烧灼感。液体顺着武芳的头颅，流进武芳的耳朵，流进武芳的眼睛，又顺着脸颊和脖子往下流……之后，有

人掀起她的毛衣，有人将罪恶的液体一面往她的胸部、腹部倒……

这种液体，经司法鉴定为浓硫酸！

这是一起惨绝人寰的特大硫酸毁容、毁身伤害案！其手段之恶劣、愚昧，为害之烈，后果之严重，极其罕见！经法医鉴定，武芳被毁容、毁身的面积达百分之二十三，呈三度烧伤！这时的武芳只有 31 岁，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1996 年 7 月 4 日，记者见到了已被迫远走他乡的被害人武芳。武芳揭开她的假发，撩起衣服。记者看到，武芳的头部、面部、颈部几乎全部烧毁，右耳全部烧掉，右耳道封闭，左眼失明，大面积烧伤的胸部、腹部已呈鳞状……惨不忍睹！8 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武芳的生活全毁了。她远走他乡，苟且谋生，身心受到了难以名状的伤害。

1991 年底，咸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首犯、武芳的前夫王茂新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共犯、王茂新之弟（提供硫酸并参与作案）王茂章被判处 13 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然而，被害人武芳对这种处理结果仍然不服，数年告状不止，武芳指控说，作案人不只王茂新、王茂章兄弟，还有其他人直接参与，这些人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接到武芳的控诉后，记者对这起特大毁容毁身案进行了重新调查，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此案有颇多蹊跷之处。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1988 年 4 月发生的案件，怎么到了 1991 年底才处理？

这是本案首先要提出的问题的。

拖了三年，谁玩猫腻

丈夫用硫酸毁妻子容貌身体的案例太罕见了。

这要从武芳、王茂新组成的不幸家庭谈起。

1981年，24岁的武芳由父母包办，十分不情愿地嫁给了烽火村的王家。武芳一米六八的个头，模样俊俏，心灵手巧，而王茂新其貌不扬，虽有一些不良行为，但基本上是个本分人，武家家境贫寒，武芳早早地定了亲，花了王家的钱。嫁也要嫁，不嫁也要嫁，这便种下了祸根。

结婚一年多有孩子后，王、武夫妻关系恶化，没完没了地吵，没完没了地打，不堪忍受丈夫殴打的武芳没完没了地逃。1987年，武芳逃到了陕西韩城市，呆了近一年，1988年4月23日，一伙人找到了这儿。这伙人中有烽火村的村干部，还有礼泉县阡东派出所的两名公安干警，有王茂新的哥哥。这伙人告诉武芳，“你家出事了”。一说“出事”，武芳便想到娘家。原来，武芳逃跑多次，王茂新多次到武家威胁。王别刀，翻院墙，上房顶，叫嚣不把武芳交出来，就“整死”武家人。

武芳着急了，第二天便跟这伙人回到了烽火村。

然而，这是一个骗局。

一到烽火村，答应“保证人身安全”的公安干警扬长而去，答应“帮助办离婚手续”的村干部则围劝武芳与王茂新同房。武不从，不回家，又不准回娘家，便在村干部的“保护”下，住进了村接待站。实际上，此时的武芳已被软禁。她失去了自由，变成了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羔羊。4月26日白天，武芳被王茂新等强行拽回家，王欲强行同房，武反抗，与王厮打。武被王关在了屋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来探望的两个姐姐发现

后，才把她解救出来。武芳又住进了接待站。

晚上，便发生了罪恶的毁容、毁身伤害案。

蹊跷的是，作案过程如此简单清晰、罪行如此严重的案件，却在县、市两级司法部门中旅行了三年多没有结果。这期间，只有首犯王茂新关在拘留所里，主犯王茂章收容没几天便取保候审回家；1991年7月才正式逮捕；涉嫌此案的其他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司法调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几个普通农民罪犯会有什么背景？

当时的礼泉县公安局长王治堂说：“这问题是不好解释。”

咸阳市检察院“武芳案”的主办检察官张双余说：“这个案子比较怪，我下去办案，县公安局和检察院都不配合。我感觉有人装葫芦，把我们办案人员当瓜子（注：‘瓜子’关中话，即‘傻子’。）！我感觉到有人想影响此案，但又不明说，总是在朦朦胧胧地笼罩着。”

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任维说得更加直截了当：“这么严重的案件拖了三年，实在是说不过去，有人包庇罪犯！”

任维告诉记者：“这里有个背景，王茂新、王茂章是烽火村的人，烽火村是市里的先进村。

一个“先进村”会有如此大的魔力？

记者一调查，烽火村好生了得！烽火村是1958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发明权的拥有者，当时以浮夸亩产15万斤粮食而威震全国。从“大跃进”到“文革”，一直是陕西省的一块金字招牌。80年代到90年代初，烽火村的党支部书记同时兼任咸阳市副市长。一些知情者告诉记者，这位王姓副市长可不是一般的副市长，直到现在对咸阳市乃至更大范围的政治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而烽火村是他的政治基础。

更重要的是，被害人武芳从司法调查起到今天，8年不懈指控王副市长的儿子王农业等人直接参与毁容毁身案。

然而，王治堂和任维告诉记者，在案卷里什么也看不到，也就是说，一开始便有人做手脚。记者查阅案卷证实，被害人武芳的一些重要指控在案卷里了无痕迹，司法机关对于王农业，只有发案三年以后的一次简单的询问，却花了很大力气调查武芳的“作风问题”。

武芳愤怒了。她不能容忍罪犯逍遥法外。她不能容忍司法机关故意推诿拖延的现状。这位被硫酸毁得不成人样的姑娘，伤情还没有完全好转，以超常的毅力，背上干粮，逐级告状，尝尽了人间冷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三年后，她来到了咸阳市人大。

当时主管市人大法工委的人大副主任郭建义说：“我接到案子后非常气愤。这么清楚的案件，拖了那么长的时间，太不像话！我们到礼泉县去调查，县公安局检察院的人什么也说不清楚。礼泉县当时的情况我知道。不能指望礼泉县破案！”郭建义曾任礼泉县县委副书记，深知礼泉这潭水的深浅。他也提到了烽火村的背景。

1991年6月，在市人大的直接干预下，“武芳毁容毁身伤害案”才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然而，武芳仍不服气。

神秘的关灯人

“武芳毁容毁身案”中有一个重大的犯罪情节没有搞清楚，是谁拉灭了电灯，提供了犯罪的现场和可能。

经批准，记者查阅案卷，公安侦查卷，礼泉县和咸阳市的检

察卷，里面几乎是干干净净没有记载。一个重大的犯罪环节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是被害人没有指控吗？是办案人员无意疏漏吗？

原礼泉县公安局长王治堂认为，“到底是谁关的灯至今没有搞清楚”。

武芳始终指控王农业关灯。她告诉记者：“我说的这些话，来调查的人根本不记。我问为什么不记，他们不说话。他们后来说，你再也不要提王农业，再提王农业，你的案子永远结不了。”她说，那天晚上出事前，三个村干部和王茂新在她接待站的屋里，调解僵持不下，这时实际在烽火村主事的王农业进屋。他对村干部说：“你三人走，到前房喝水去。我来劝。”三个人出屋不久，王农业转身即走，一面走一面说，“武芳，睡去，几个月没见面了，睡去”。武芳赶上前去，拉住王农业的衣角，说：“我们不能走。你们说保证安全呢。今晚我也不睡觉了，你们睡那儿，我就坐那儿。”王农业挥手甩开武芳拉他衣服的手，屋里的王茂新抱住我的腰往后拽，冲进来的女人把我往里推……门一直开着，我能看见门外院子里站着好多看热闹的人。”王茂新作案期间，还先后有王茂章和其他女人进来帮忙。也就是说，武芳被毁容毁身这出人间惨剧，是在众目睽睽、集体参与下发生的。

武芳从没有放弃这一指控：王农业是关电灯的人。无论王农业在此案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无论怀有什么样的动机，查清楚都是不难的。武芳强调说：“当时我的神智很清楚。”这些情节，在市人大干预的协调会上有明确记载。

后来的事情便有点眼花缭乱了。关灯人变戏法似地成了王茂章。在审判的最后阶段，王茂章突然出来为关灯“顶缸”，并得到法庭的认定。之后一段时间里，王茂章的家庭得到了烽火村的资助和优待。

事隔5年，关押案犯王茂章的陕西省铜川市崔家沟监狱狱方为记者出证说：王茂章对几名管教干部说，“（发案那天晚上）我去村接待站耍，有人让我进屋内给我哥帮忙；我就进去了。进屋后，屋里是黑的。灯绳我确实没有拉”。

王茂章的妻子王亚乐在与律师谈话时也强调了以上说法。

王茂新关在礼泉拘留所期间，曾与同监号的其他犯人吹牛，说王农业托人带话进来，一定会帮忙，不久就会出狱。王茂章不是很快出去了吗？还说灯是王农业拉灭的，王农业参与了骗武芳回来等活动。

“神秘的关灯人”并不神秘，只不过被人为地搞神秘了。咸阳市中级法院院长任维说，“有人包庇罪犯”。这人是谁呢？

本案没有结束

礼泉县这桩特大毁容毁身案办得如此周折、困难、蹊跷，总感觉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左右着案件的进展。

这种力量徇私枉法，有恃无恐，能化有为无，化大为小。但是，无论怎样遮盖，仍然暴露出许多蛛丝马迹。

本案的第一个特点是：案情简单，案犯清楚，时间短暂，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调查并不困难，却拖了三年没有音讯；如果被害人武芳不坚持上访告状，如果不是咸阳市人大对公检法行使监督权利，此案可能拖到猴年马月去了，可能烟消云散了。

本案的第二个特点是：公安检察机关出奇多地疏漏，重要案犯莫名其妙地“取保候审”（收审手续都是后来追查紧了才补的）；被害人指控的嫌疑犯不予调查或不认真调查，正如咸阳市中级法院院长任维所说，有着浓重的“包庇犯人”的痕迹。

本案的第三个特点是：主要罪犯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被

害人至今坚持不懈地追诉漏网的嫌疑犯，礼泉群众对此案的处理结果至今愤愤不平。有群众对记者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一个副市长的儿子！”

本案第四个特点是：1、参与人数众多：从公安干警替烽火村当差与村干部一起骗回、禁闭被害人武芳，到关灯、倒硫酸、脱衣裤，参与人数之多，令人惊骇。2、围观人数多：王氏家族多人集体作案时，烽火村的大院子里有许多人；其中既有恶意怂恿王茂章和王家几个嫂子进去帮助的人，也有怀着猥亵的心理看热闹的人。武芳看到了院子里的人。原礼泉公安局长王治堂、原市人大副主任郭建义根据调查也说，院子里有人，包括一些村干部。

本案第5个特点是：本案结案后，被害人武芳迫于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背井离乡，独自远行谋生；罪犯的家庭却得到了村里的厚待。当然，这种厚待是有限度的，以至王茂章的妻子要请律师为王茂章替别人承担的那部分罪责申辩。

各种迹象表明，1988年在陕西礼泉县发生的这些特大硫酸毁容毁身案并没有真正结束。武芳对记者说：“我的一生就这样被他们毁掉了。如果不继续追查其他参与作案的人，我死不瞑目！”

记者手记

一个人·一个村庄·一段历史

当我在黄河岸边面对武芳的时候，我便知道，我必须拔剑了。我无可选择。

我面前这个女人被硫酸毁得面目全非。她一面痛哭，一面诉说。8年了，没有一个人敢坐在她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坐在她面前，静静地听她诉说。她把她以前的照片给我看。何啻是“面目全非”，简直是由人变成了“鬼”！太惨了。以前，我只在电影《夜半歌声》中看见过被硫酸毁容的女人。那毕竟是电影。现在是活生生的人！她就坐在你的面前！

多巧的事，武芳与我同年同月生！这就是命运。命运把我与武芳捆在了一起。

其实武芳比我棒。1988年4月，在烽火村干部的纵容和参与下，她被包括丈夫、小叔子、妯娌在内的恶徒用硫酸毁容毁身。罪犯作案的时候，肆无忌惮，门大敞着，门外有村干部；房内哭天抢地，门外置若罔闻。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恶性案件，

竟有人出来干预司法，包庇罪犯，致使罪犯长期逍遥法外。三年以后，在咸阳市人大的干预下，将首犯主犯绳之以法，烽火村却厚待罪犯家属，迫使武芳背井离乡。但是，武芳认为还有人漏网，还有人没有受到法律应有的追究。为此，她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痛苦，顽强地活了下来。又结了婚，又生了孩子，一个女孩子。她给这个女孩子起了个男孩儿的名字：“国栋”。她说，她要把她培养成国家的栋梁！

我万万想不到，人的生命竟会如此强盛，人居然有如此大的生命潜能，人的生命竟有如此极致的表现。可谓惊心动魄。

武芳是一个人间奇迹。她深深感动着我，并鼓舞着我拿起剑来与恶势力决斗。

当然，我非常清楚，我面临的首先是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而且是一起发生在8年前的重大刑事案件。我必须重新调查这起案件，必须万分慎重地搞清楚案情的来龙去脉和蛛丝马迹，而且必须对我所调查的每一个情节和细节承担法律责任。

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个陈年旧案，像一只大粪缸，被严严实实封存了8年。案件的核心，是武芳8年指控不辍的犯罪嫌疑人王农业。王农业何许人？他是当时的咸阳市常务副市长兼烽火村党总支书记王保京的二公子，礼泉县烽火村农工商公司总经理。王保京何许人？光从他的职务判断他的角色是远远不够的。王保京是50年代就全国闻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文革”前后曾任咸阳地委副书记兼礼泉县委书记，并从50年代到今天一直兼任烽火村党支部、党总支书记。1958年浮夸，他号称亩产可达15万斤甚至240万斤而举世闻名。他在1957年反右、1958年浮夸、1959年反右倾、文革批刘少奇批邓小平批胡耀邦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个人署名文章（基本都是让人捉刀代笔）和报道连篇累牍，都扮演了先锋的角色，并攫取了权力。一个地级

副市长，官儿并不大，可他在陕西政治生活中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烽火村何许村？从50年代到今天，在王保京的英明领导下，一直是陕西省一面永远的旗帜，一张光辉灿烂的门面，享尽荣华富贵。报道中，关于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历史，我只写了200多字。为了这200多字，我在某图书馆请了一批人（严格规避了当地人），从50年代到90年代，一页一页检索了《人民日报》和《陕西日报》，整整工作了一个星期！为了这200字，我采访了上至原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市委书记、礼泉几任书记，下至普通农民数十人。

武芳案有太多的蹊跷，太多的疑点，太多的“为什么”。如此重大而简单的刑事案件，倘若发生在其他地方，可能早就“从重从快”了，为什么一放三年，犯罪嫌疑人抓了放，放了抓，可以长期逍遥法外？为什么面对如此清晰的犯罪事实却能堂而皇之地不问不查？为什么司法机关和各级接到武芳控诉的政府、有关群众团体如此麻木？就因为发生在烽火村？就因为涉及一个副市长兼村党总支书记的儿子？为什么法官在接受访问时要特别提醒烽火村的背景？为什么公安局长提起烽火村党总支书记就噤若寒蝉？为什么检察官办案阻力重重？为什么有人敢置事实不顾包庇罪犯？为什么烽火村人犯了丧尽天良的大罪却能若无其事？烽火村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怎会有如此大的魔力？王保京到底是何许人？不把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历史搞清楚，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

人们太健忘，历史已经丢失，特别是一些能证明历史和相关人物性质的细枝末节似乎躲进了“黑洞”。我的任务是打开黑洞，唤起记忆。

采访人数在不断增多，采访半径在不断扩大，资料摞起来有一米厚。追问更加复杂，更加深入。越往下追，我越意识到对手的强犬。

《蹊跷的特大毁容案》1996年8月8日发表后，王保京开始了反击。8月9日，报社及团中央、中宣部便接到了王保京和烽火村驳辩的长篇电报，第二天各报社便接到了中宣部“不得转载”的通知。10月，报社和我本人接到了西安中级法院受理王保京和烽火村诉《中国青年报》和我“侵犯名誉权”的通知。王保京有本事把一审法院放在毫不相干的西安，而不是侵权人住所地北京和被侵权人住所地咸阳。西安中级法院开庭后，援引“民事诉讼法”之“先刑后民”的原则“中止审理”，王保京好厉害，居然又把一审法院挪到了咸阳。陕西的法院像是给王保京和烽火村开的，想在哪儿审就在哪儿审，哪家法院对王保京和烽火村有利，就到哪家法院打官司。

反击还散发着血腥的味道。

1996年10月20日，王保京的说客找到武芳黄河岸边的藏身处，出价10万让武芳闭嘴。武芳说：“十万？当年（1988年毁容毁身后）住院动手术，我父母去找王保京（咸阳市副市长兼烽火村党总支书记）要五百元钱都不给，现在就是给我一百万也晚了！”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1996年12月9日傍晚，两个精壮汉子摸进了陕西礼泉县北屯乡北二村，直扑武芳娘家。

武母董金香把炕烧毕，刚出得大门，一个三四十岁、胡子拉碴的瘦黄汉子逼上来，满嘴喷着酒气问：“你是武芳她妈？”

“是的。”

“武芳在哪里？”

“你问这干啥？”

“你跟武芳说，把状子抽了。不抽，谁沾谁死！”

“你在胡弄哩！这是在中国哩！”

“你个老皮！你该入得土了哩！”

黄瘦汉子上来当胸一拳，将武母打倒在门槛上。他疯狂地喊着：“你该入得土哩！你该入得土哩！”武母大叫：“你咋这恶哩！”接着嚷了起来：“打人哩！——打人哩！——”

武芳兄弟闻声出来。瘦黄汉子又逼上去，抓住武芳兄弟的手，说道：“兄弟，我给你说，叫武芳把状子抽了。这事，谁沾谁死！再这样下去，绝没有好下场！”

.....

武母吃不住惊吓，两天不进茶饭，害怕“人家啥时候再来”。老人想忘掉那段家破人亡的事儿。她和老伴都是70多岁的人了。他们武家是“外乡人”，一辈子谨小慎微，担惊受怕，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但是“人家”不让。老人由恐惧而绝望，喝药自杀，被抢救生还。

经查，瘦黄汉子叫王爱社，又名王炳军，烽火村村民。

1996年12月13日，管辖北二村的赵镇派出所的公安干警到烽火村对王爱社进行治安传唤，遭到一些人的拦阻。他们辱骂公安干警，撕扯警徽警衔警服，拦阻警车，致使王爱社逃匿，半年没有音讯。

1997年6月1日晚8点半，赵镇派出所所长刘志权带领五名公安干警到烽火村传唤王爱社，结果被几十名烽火村暴徒打得落花流水，鸣枪示警无效。警车被扣，有的干警押解王爱社先走，有的干警落荒而逃。刘志权外警服被抢，内警服被撕烂，警衔被撕掉，本人被打成重伤住院。县医院诊断：“1、轻度颅脑损伤，左额部、枕部头皮血肿；2、左面部、左大腿多处裂伤；3、阴囊挫伤。”

烽火村一些人还怀疑县政协委员、原烽火村党总支副书记王行兴是“王爱社回家”的举报人，停水，断电，剪断电话线。6

月2日，闯进王行兴家打砸，用钉耙砸烂大门，破门而入，王妻劝阻，右胳膊被扭伤，还揪着王行兴的领口游街，大喊：“大家都来看！这就是咱村里的瞎种！叛徒！卖国贼！”还说：“你赶黑给我把人放不回来，我就要放你的血，跟你没完没了地弄个没完！”

殴打公安干警前3天，给我提供情况的咸阳市中级法院院长（审理武芳案时主管刑事的副院长）突然车祸死亡。凶杀还是事故，至今仍是一个谜。

血雨腥风，形势诡异。

西安开庭完后，武芳大大方方从证人席上站起来，走到被告席前，握着我的手说：“卢兄，多多保重！”

握着她那只被硫酸烧残废的手，我感到了特殊的力量和期待。我热泪盈眶。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我知道王保京在操纵司法。我为可能的败诉准备了“最后的陈诉”：“一开始，我就不对这次名誉权审理抱有幻想。因此，今天的结局我并不感到吃惊。我之所以来这里接受我们早已知道的结果，有两条理由，一是我必须尊重法律，二是此次审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限度的然而却是公开的讲坛，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陕西法制状况的机会。我今天能为一个被凌辱被残害的弱女子成为被告而感到无尚光荣。我曾经为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起码的公民生存权力，维护起码的社会正义，做过一些工作，并将继续贡献微薄的力量。遗憾的是，法庭的原告席应该属于武芳和她的律师，被告席上应该是她8年不懈指控的犯罪嫌疑人，今天的局面恰恰相反。我为此感到悲哀。我怀疑这次审判的独立和公正。武芳案一审法院院长任维先生生前曾经接受过贵法庭调查取证，他事后郑重告诉我们，‘他们带着明显的倾向，结局对你们不利’。今天果然如此。这次审判，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权力操纵的审判。看来，我们预先

承认的‘公平’、‘公正’、‘正义’的前提，在这里已经破坏了。在这里，法律被打了折扣，正义被打了折扣。今年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上，《信访快讯》全文刊登了武芳的控告信，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同志和公安部长陶驷驹同志明确批示，要求复查武芳案。陕西一方面对批示虚与委蛇，一方面加快这次民事案审理，是想以‘名誉侵权’的民事审理结果来混淆视听，寻找说法，打击舆论监督，掩盖武芳案事实真相，掩盖烽火村的历史丑闻，阻碍武芳案刑事立案复查，让犯罪嫌疑人继续逍遥法外。他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常识告诉我们，任何辜负了人民的希望、拿着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的权势者，最终都逃脱不了良知的审判，都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对此，我们有充分的自信。我们虽‘败’犹荣。我要强调的是，这个结局，并不能让我们放弃通过各种渠道继续为武芳伸张正义、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努力。”

时间：1996年7月19日

作者：刘健

泰山作证

刘健：关于《泰山作证》的模糊证词

泰山作证

——胡建学其人

在五岳独尊、名扬四海的泰山脚下，有座城市叫泰安，取“国泰民安”之意。

大约2500年前，孔夫子来泰山漫游，留下一句响彻时空的感慨：

《礼记》：“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有专家认为：“苛政”的“政”字在古汉语中通“征”，指繁

重的杂税及劳役。

苛政猛于虎！贪官污吏猛于虎！

从1991年起到1995年元月，有一位市委书记在泰安执政，他的名字叫胡建学，1950年出生，是当时山东省最年轻的地市委书记。

1995年元月27日，农历腊月廿七，胡建学因巨额受贿被捕。今年7月1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胡建学因而成为共和国历史上，自刘青山以后受到刑罚最重的一位地市委书记。

泰安廉政风暴震动全国。

—

胡建学突然被捕，犹如一声炸雷轰响在山东省的上空。一位胡建学过去的老领导事后说：“胡建学这个人嘛，会在政治上犯错误，这我早有预料。但我没想到他竟然会在经济上出问题。”在泰安市郊区农村，消息闭塞的农民则有鼻子有眼地传说：“胡建学因为加重农民负担，被中央抓起来了！”

我们——包括记者在内——都部分地误解了胡建学。我们不是检察官，当然看不到胡建学卖官鬻爵、收受巨额贿赂的内幕交易，只能从其思想、工作作风上判断，他是一个弄虚作假、好大喜功、见风使舵、官迷心窍的政客，是一个不惜用百姓血汗染红顶子的酷吏。直到今天，泰安的干部群众谈起胡建学，说得最多的仍然是他这方面的问题。

实际上，从为青年干部成长提供反面教材的意义来讲，这也确是更有价值的一个方面。

在胡建学如日中天的 1993 年 11 月，记者曾应邀采访过胡建学。事情起因很简单。因为原定 1994 年 5 月，泰安市要开党代会换届（实际上后来改到 1995 年元月胡被捕前不久才换届——记者注），胡建学想找个记者，在换届之前写写他这一届的政绩。一位朋友向他推荐了我。

朋友在向我介绍胡建学的时候，有一句铺垫：“胡这个人，只要是他想干的事，不管对的错的，也不管旁人怎么议论，他都敢干！”

胡建学重视宣传，对新闻界的那点儿道道，可以说门儿清。见面客套过之后，直接提出要求：“希望你把我们市委这几年的工作，用调查报告的形式，写一组‘内参’，设法发给上边领导。再写一篇反映我个人的长篇通讯，在你们报上发表。”

当时，我把胡对记者这种指令式的语气理解为“不见外”。后来才知道，胡当政后期，泰安市财政一年拨给市委宣传部专门用于向新闻界“公关”的经费就达上百万元，唯一的要求是：“该报的必须给我报出去！”他不相信泰安有想发而发不出来的稿子。

二

不过，胡建学想办的这件事情，确实还是办成了。1994 年夏天，他另请了高手。一部歌颂胡氏政绩的长篇报告文学，于胡被捕前 3 个月，刊登在一家有名的文学期刊上。在这期刊物的中间，夹有泰安企事业单位 7 个彩页的广告。除此之外，还登有与胡同案、被判处死刑的原泰安市公安局局长李惠民的贺函。

在这篇报告文学中，反复提到泰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在全国 180 多个城市中名列第一。这个第一是怎么来的呢？有个情

况可供参考：1994年，泰安市全年刑事案件共发生5000余起，而胡建学只允许上报800起！

胡建学吹的牛，还有比这更惊人的。1994年，泰安市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公布的数字是260多亿元。而最近结束的工业普查显示，实有产值只有40亿元。虚报的一块，竟然高达220亿元，凭空增添了五倍半！

人们常说，什么数字都可以吹，就是财政收入没法吹。但胡建学吹牛无禁区。泰安市1994年实际财政收入5亿多元，他敢对省里领导口头汇报12个亿！他在耍一个政治赌徒的小聪明：口头汇报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在正式的报表中该写多少还是写多少。他猜测，省领导可能没有这份闲功夫，去仔细翻阅枯燥的报表！

吹牛还不止在这一年。1993年底，省里一位领导到泰安，胡建学在汇报工作时，随口就来了个数字：当年市财政收入比“八五”初期翻了两番，即4倍，一年干出了一个莱芜（这年刚从泰安划出去的一个新地级市）。事后，市委一位负责写材料的副秘书长提醒他：根据统计局的数字，实际只增长了约1.7倍。胡建学道：“再去好好抠抠，看能不能抠出我的数来！”

胡建学在上头吹，下边县市区的有些领导也跟着学样。有一个区提出口号，要一年干出一个新区来！1992年，该区工业产值不到10亿元。之后，果然年年翻番：1993年上报23亿元，1994年上报47亿元。1995年初胡被捕后，该区吹牛快车仍然刹不住，要争取实现100亿元。而事实上，在挤掉大部分水分之后，1995年这个区的工业产值是23亿元，恰好等于两年前上报的数字！

“肥城数牛”闹出的笑话，曾传遍全国。

1994年秋，泰安大养其牛。畜牧部门发现，各县、市上报

的养牛数量水分甚多，就下去调查。在肥城——泰安城郊的一个县级市，抽查到哪个村，就让这个村的农民把家养的牛都牵出来，一头一头地数。没想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乡镇干部纷纷发动“借牛”。今天查这个村，把周围几个村的牛都牵到这个村来。明天查那个村，再把牛都牵到那个村去。数来数去，多半还是那些牛！

这件事虽然并非胡建学指导办的，是个别基层干部创造性的发挥，但它特别合乎胡的一贯路子，所以农民们编排：“泰安的每一头牛都认识胡建学！”

泰安农村群众申斥干部们：“吹牛，你们一级一级都需要，就是我们老百姓不需要！”话说得对。但问题是，胡建学这伙并不需要老百姓。奈何？

1994年，胡建学逢会必吹的一个话头儿是：“我们这几年最大的贡献，就是甩掉了一个‘欠’字，由‘欠发达地区’迈进了‘发达地区’行列！”问题是，不单泰安的百姓没有人感受到甩掉了“欠”字，泰安的干部们也没几个人愿意认领这份光荣。

事实是，泰安市经济至今仍处于山东省中等偏下的水平。在胡执政期间，泰安在全省的名次还有所下降。他吹起牛来脸不变色心不跳。

有一点，泰安市的各级干部至今仍一致认为：胡建学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你知道他吹的最大的一个牛是什么？是反吹牛！1994年上半年，胡建学从政治的高度论述吹牛浮夸危害和泰安市采取措施认真核查经济数字的报道，被许多报刊转载。泰安这个全国吹牛吹得最狠的地方之一，竟成了反吹牛的典型！

就在胡以反吹牛骗取名声的同时，他对市统计局局长私下强调的却是：“统计工作要为政治服务！”统计局长把这句话正确地理解为“不换数字就换人。”

三

对于一个一心想往上爬的政客来说，最荒诞的也是最符合逻辑的。胡建学还差点儿成了廉政的先进典型呢！你服不服？

他曾一再对上级打包票：“泰安的副县级以上干部不存在腐败问题！”而就在他吹这个大牛的同时期，一段小顺口溜儿、一份非正式的价目表，正在泰安的干部队伍中流传：“副科提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要四五万。”一位区委书记愤怒地说：“胡建学已经把提拔使用干部，变成他的第三产业了！”

不但送礼，还要效忠。泰安下属新泰市原市委书记齐志文，就是给胡建学写效忠信，加上送礼行贿，当上了泰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当检察官在法庭上宣读这封效忠信时，旁听席上一片哗然。

胡建学用人，有俩人用得全市人人侧目。

一个叫卢胶青，从郊区区委副书记提拔为市委秘书长、市委常委，后来实质上成了泰安的“二把手”。此人精通跑官、买官、卖官、搞女人，干了18个月，受贿数额高达100多万元，但却是法盲一个。当检察官去拘捕他的时候，他竟然不知道检察院是干什么的！

另一个叫郑洪昌。郑在郊区范镇任党委书记时，全镇农民人均集资提留最高时达四五百元，位居全市之首。农民不堪忍受，写出大标语：“范镇奔小康，先杀郑洪昌！”就是这么一个人，胡建学欣赏备至，把他提拔为郊区区委副书记。在讴歌胡建学“光辉业绩”的那篇报告文学中，专有一节标题是“杀不死的郑洪（鸿）昌”，反映胡如何大胆重用“开拓型”干部。

一位县区领导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个乡的群众集体到市委上

访。胡建学问：“你们反映什么事？”群众说：“我们乡的书记乱向农民集资敛钱，弄得我们都没法过了。”胡说：“你们都回去吧，感谢你们推荐了一个好干部！”后来，那个乡的常委书记果真被提拔起来了。

泰安的农民负担实在是太重了！据抽样调查，1994年全市农民人均交纳集资提留款项158.8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4.3%，超出中央规定将近两倍。在国家允许的“三提五统”之外，每个农民承担的集资摊派将近百元。也就是说，共向泰安全市430多万农民超收了4亿元人民币！

年复一年。胡建学在泰安的“政绩”，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用这些农民的血汗换来的。

中央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的三令五申，每次一到泰安就断了线。1994年，胡建学在三个座谈会上公开说：“今后泰安不能再提农民负担问题，广播、电视、报纸不能再宣传。”实在非讲不可的时候，他就玩文字游戏——不能笼统地说“减轻农民负担”，只准说“减轻农民不合理的负担”。

在法庭上，检察官义正词严地质问：“胡建学，你在任职期间，平均每天的受贿数额高达数百元。在泰安一些贫困村庄，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入还不到500元！你怎么忍心？”“胡建学，你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你说过，在三年困难时期，你爷爷为了给你省一口饭吃，自己如何忍饥挨饿。现在，你怎么忍心？”

胡建学的眼泪簌簌而下。现在，直到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彻底结束、从一个野心勃勃的市委书记沦为阶下囚的时候，他才想起自己的根。

四

泰安市的干部总结，胡的作风是“专断武断加垄断，谁提意见谁难看，并且当场就兑现”。所以不管胡怎么瞎说八道，市委常委和下级干部们都只能“腹议”，不敢张嘴。

胡在大会上讲：“要把泰安建成华东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台下干部们嘀咕：“泰安离济南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你想把它建成全省最大的集散地都不可能，还华东！”胡讲：“要把泰安建成华东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台下干部犯疑：“你把徐州摆到哪儿？”胡又讲：“到2000年，泰安要达到亚洲中等发达城市水平！”台下干部有气：“你能把泰安建成山东省中等发达城市水平就不错！”

可笑亦复可悲的是，当上级有关部门来考察胡建学时，泰安的许多干部都投了他的“优秀”票。记者问市政府一位局长：“你们这么反感胡建学，为什么还投他的票？”局长说：“胡大权在握，耳目又多。如果投了反对票，被他查出来，将遭到可怕的报复。还不如说他点儿好话，让他快点儿提拔走！”

五

胡建学已经以最耻辱的方式走掉了，他给泰安建设事业留下的后遗症，却是三年五年也消弥不了的。

当年胡建学最重要的有形“政绩”之一，是如今在泰安市干部群众中传为笑谈的松园小区。在城市的远郊，20亩地范围内，孤零零地矗立着10座20层高的住宅楼。将近一个亿已经投进去了，建筑框架已经完成，但要把里里外外都装饰完毕，能够投入

使用，还得一个多亿。你说继续建是不建？不建，已经投进去的钱就算扔了。续建从哪儿弄钱？建成以后卖给谁？

胡建学不管这些。在被捕前的 1994 年底，他就早已经为这个刚建半截的小区竣工提前剪了彩。他妄想着任期届满后自己就高升，把这 10 座半拉子大楼留给下一任修去吧。修好了，是他胡建学的功劳；修不好，是下一任没本事！

胡建学留下的另一个有形的“纪念碑”，是一座可容纳三万人的体育场。胡建学说：泰安将来要办全国的运动会、全亚洲的运动会甚至全世界的运动会！事实上，如泰安群众顺口溜儿中所说，“投资 8000 万（不包括下属各县市区无偿出工出料），用了两天半。”这两天半还是为用而用，不是非用不可。1994 年泰山国际登山节开幕式，在这里排练、举行。从 1995 年之后，登山节开幕式形式简化，体育场就闲置了起来。

胡建学就留给后任这样一个泰安！

在那部为胡建学评功摆好的报告文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叙述泰安过去怎么到省里和中央部委跑重点项目，说“某某项目建成之后，将会带来多大多大的效益”。可就是不说这些项目已经建成了几个。实际情况是，胡建学在泰安 5 年，铺开了 11 个摊子，设立了一大堆项目筹建处，每个筹建处都定为县处级单位，但一个项目也没建成！

去年胡建学被捕以后，泰安市委根据自己的财政状况，一压再压，把重点项目从 11 个减到 5 个。单这 5 个重点项目，概算投资仍需要将近 30 个亿，不知哪天才能把钱筹齐！市计委领导痛心地说：“如果胡建学不花 2.5 亿建那座岱湖大桥（泰安人谑称“逮胡大桥”），不建体育场，不建松园小区，现在怎么也该有一两个大项目建成投产了！”

胡建学就留给后任这样一个泰安！

也是在1994年年底，泰安市委的换届前夕，胡建学出台了一项收买人心的政策，几乎是一夜之间，把全市一万多名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办！全国许多报刊都曾突出报道过这一消息。中国的民众对官吏廉洁程度的要求向来是不高的。即使是在胡建学已被宣判死缓的今天，在这批“农转非”的教师和他们的亲友中，仍有一些人在念胡建学的好。

但他们不了解，泰安大多数县、市、区财政，根本无力支付这么多教师的起码工资，劳动部门根本无力安排这么多人的子女就业！当这些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他们肯定不骂胡建学，只会骂新一任的市委书记。

胡建学就留给后任这样一个泰安！

六

1984年，胡建学才是山东省计委的一个副处长，不到6年，他就成了泰安市的市长。又过5年，沦为阶下囚。按照泰安干部群众的说法，他“一心想当官，想当大官”，直到检察官们去拜访他之前的最后时刻，他的升官梦才彻底惊醒。

在1994年6月，胡建学出了一部文集。这部书定价十几元一册，共印一万册，全部由泰安市各级党委组织部门用党费购买。泰安人谑称“胡选”。书出之日，泰安市委举行了一个隆重的首发式。市委机关报《泰安日报》要求全市各级干部，“要结合《邓选》一并学习”！

由胡建学当泰山的“山大王”，是这座千古名山的不幸。他在泰安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题字题名也就罢了，竟然还在泰山十八盘险要位置刻上了一段“胡氏亲笔”，妄图不朽！

胡建学的“高峰体验”当然远不止这些。在泰安，他的权力

至高无上，想摆什么谱就可以摆什么谱。人几乎每次到下属县、市出巡，都是一个长长的车队，前边警车开道，后边数十名随从簇拥。所到之处，县、市党政主要领导要到边界迎送。有的会拍马屁的基层干部，还组织宾馆服务员列队迎送。

为了唬手下的干部，胡建学经常用“辟谣”的形式造谣。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他煞有介事地说：“现在，‘业余组织部长’不少，乱传小道消息。有人说，中央要调我到天津去当市长。我告诉大家，我哪儿也不去！”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人传他要上这儿那儿，只是他自己在造舆论蒙人。

胡建学的资历很浅，但论起资历他从不谦虚。泰安略有点儿级别的干部，都听他讲过，他1969年就在内蒙古管理过一家上万人的大煤矿。事实是，当时只有19岁、还是一个新兵的他，随部队到一家煤矿去支过几天左。凭这点儿由头，他就吹自己懂企业管理。

直到站在法庭上，他才承认自己既不懂工，也不懂农，更不懂法。

他唯一的过人之处，不过是一点政治上的小聪明。但他没读过鲁迅：“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他大大低估了我们党的自我净化能力。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彻底报销。

记者手记

关于《泰山作证》的模糊证词

关于《泰山作证》，我实在是不想再说什么了。

在有的新闻界前辈的文章中，在认识或不认识的同行的传闻中，关于我和我的主人公，有太多夸张的传言。当然，我自己应该对这些传言负一定的责任。在通讯的一个小自然段里，我提到了过去与胡建学的交往。这是一段奇缘，我忍不住写进稿子里去了，结果让同行们评说起来没完没了。其实，我只是作出了一个普通的记者很正常的职业反应。而如果当年给胡写夸奖文字不是一件我可做可不做的事，而是报社领导或更高级的领导安排的工作任务，我想我也就写了。毕竟胡当时还并不是罪犯，而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有那么多高级的领导、高级的组织对他做出了那么超卓的评价，而且在胡被捕前夕，上级到泰安搞“民意测验”——所谓“民意”，指的实际是当地县处级以上干部的“意”——他还荣获了90%多的优秀票，你不相信这些，还能相信谁呢？有的比我的总编辑级别还大的记者，不都亲自动笔夸他

了么？我如果也写，事后恐怕连我的总编辑也不好臭我。我当时没歌颂他，十分里有七分属于巧合。

我并没有预见到胡后来会出事。相反，我一直以为他多半能步步高升，升到省城，升到能管着我的总编辑的北京。事实上，当他被抓起来的时候，在我周围的同事、朋友中，没有谁比我更感到惊讶的了！因为我多少了解一点他的政治野心，了解一点他利用权力、追逐权力的巨大本领。另外，一开始，我也有点不相信他会贪污受贿——我以为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可能暂时抑制住对于财色的欲望。过去，全省人民都知道的他的毛病，不过是爱浮夸吹牛。吹牛总不至于吹到监狱里去。当然，我一点也不认为抓他冤枉。能把这个我一直以为不可能被抓的人抓起来，使我相信了，中国当今政坛上，确实还没有流通绝对安全保险的免死牌。这一点，在陈希同大人出人意料地掉进坑里时，被再度证实。

就这篇通讯，我现在没法真正说清、也没有能力说清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我周围，在我生活工作的这一片曾经生长出了如孔子、孟子等等一大串“子”的地域，出个把儿胡建学，实在是太不稀奇了。和同类人比起来，胡建学远不是干得最坏的，品质最差的，水平最低的。事实上，胡也不单纯是因为太坏、太差、太低而被中断辉煌前程的。胡之坠落与其升起一样，大体上基于同一种环境、同一种原因。所以，你说这是报应也行，你说纯属偶然也行——不论就他的坠落还是升起。但类似胡案的案子，某个人升起然后坠落的故事，早晚会出，必出无疑，就看是应在谁身上。

外地人——尤其是北京人——简直无法想象，我生活的这个地方的人们对于仕途是多么的向往、多么的热衷！从某些高官大吏到乡镇政府、县政府里跑腿的小办事员，几乎个顶个儿的都不

安于位，都是那么“有理想”、“有追求”。对于每一个按本本儿上说是那么“光荣而艰巨”的职位的“含金量”、“含权量”、“含面子量”，个顶个儿研究、掌握得都那么清楚。当上乡镇书记了，就想当副县长；当上副县长了，就想当县委副书记；当上副书记了，又想当正书记；当上正书记了，又想当副市长……不到被任职年龄的硬杠杠儿卡住，“理想”永不破灭。而年龄这东西，有权人是可以反复改的，不光五十七八的人改，连三十刚出头的人都改，因为有时要抢上“年轻化”的班车。至于学历，现在还有哪位有可能提拔的同志没有可以提拔的学历吗？没有。实际情况是，文化程度越低的人往往档案上学历越高，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的人，现在一般学历都是研究生。社会早已经建立了为没有文凭的掌权者颁赠合适文凭的机制。这种机制的服务质量，甚至能让被服务者在梦中都笑出声来！我有位如今官至厅局级的熟人，当年被选送到某干部学校去熬专科学历，结果一入校，她这个班突然晋级变成了研究生班！于是本只有高中学历的她两年后就成了研究生毕业。你不服不行。

没有哪位记者天生地乐于渲染黑暗。越是被阴暗面反复刺激过的心灵，越珍惜光明，只要这光明是真实的。

时间：1996年4月13日至16日

作者：孙凯 张文彦

宝鸡“3·12”事件追访

孙凯：表扬惹出的麻烦

宝鸡“3·12”事件追访

——追访勇斗车匪的两记者之一宁丽君

正义之感哪里来

宁丽君，这位“中国韬奋新闻奖”的获得者，这位个头高高的50岁的老新闻工作者，以她惯有的平和接受我们的采访。话题当然还是从“3·12事件”说起。下面，就是宁丽君的叙述：

其实，因为我和刘斌经常坐公共汽车下去采访，所以在车上照像遭歹徒恨的事不是第一次了。

1995年，有一次，我和刘斌在车上看到一个小偷偷东西，刘斌就给他照了张像，小偷吓得赶紧下车跑了。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外出采访回来，那个小偷在车上把我们盯上了，跟了我们两个多小时，我不太认人，刘斌认出来了，就去给司机讲了。那个司机挺好的，说：你们放心，他要敢动，我帮你们。那个小偷一直跟到快进宝鸡市区了，看一直没有下手机会，才下车跑了。

“3·12”那天，当时在车上，看到有个人穿的衣服，模样都像个干部，一个人坐在一排座位上，也没有参与其他歹徒的赌博骗局，我们就认定那是个干部，于是刘斌就坐到那人身边，觉得保险一些，然后就给其他抢钱的歹徒照像。结果没想到，那个干部模样的人马上站起来，抓住刘斌的头就往车玻璃上撞，把车玻璃都撞碎了。原来他也是歹徒一伙的。

我上了年纪，平时也不善于打架，那天豁出命了，死命去抢歹徒的铁锹把。到现在腰还疼。那个司机和售票员真差劲，歹徒让开车就开车，让停车就停车。我们叫他，理都不理。歹徒在车上他们这样还勉强能理解——怕歹徒报复，可后来歹徒已经下车了，他们还是不理我们的茬，最后还要叫我们给他赔玻璃。

那天那个司机把我们放到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我们俩都特难过，刘斌手捂着头说：“唉，宁老师，你看咱叫人打成这个狼狈样子。”一路走着找诊所，找到一家一看是个中医诊所，再找一家还是，一连走了4里多地才找到一家西医诊所，才给刘斌包扎上。最后到了宝鸡市，住到中医院，态度坏得很，把人训得不行。8个人一间病房，最后说了好半天才给换了一间房子，脏得一塌糊涂，让我们自己打扫、自己搬病床。我忍着腰疼和报社的其他同志一起打扫、一起帮刘斌搬床。到了第三天，报纸、电台都报道了以后，才有护士来给收拾房子。再后来领导一个接一个地来看，没地方坐，最后就给换到干部病房去了。

刘斌原来是卫生学校毕业的，因为喜欢新闻工作，后来到了

报社。在群工部里，他负责内参，我负责群众呼声版，都是要替群众说话的，而且我们要发出的稿子，必须经实地核实。我们部有一个自己定的准则：“记者多吃苦，群众少吃亏”。所以我们俩经常一起下乡去，每年总有个100多天。帮群众说话、解决问题的事就多了。1994年，有一次，有群众反映某乡办了一次轻微违法人员学习班，在这个班上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动用警械戏弄学习班人员的事，我和刘斌两人经过调查后发了内参。后来当地说我们胡说。于是我们和该县某领导一起再次调查，在一个农民家，当这个农民说有干部拿警棍戏弄他时，同行的县领导对农民说：你到底看清楚了没有？你到底认不认得电警棍？是不是把手电筒当成电警棍了？农民只好说：那可能就是手电筒。第二天一早天没亮，我们俩再次赶到农民家，农民受了感动，终于说了实话，说：我怎么能分不清手电筒跟电警棍哩？电警棍能冒火花花么。最后，我们给县里领导拿出录音，才使这件事得到了处理。1993年5月，扶风县有农民来反映，有十几户农民住在高崖滑坡地带的危窑里，由于个别村干部作梗，农民们向有关部门反映了3年仍无音讯，其间两次塌窑，3个村民蒙难。我和刘斌向领导汇报后马上赶去，冒着大雨，拄着棍，刘斌搀着我，我们一一细看了11孔危窑。农民们都流眼泪了，因为有的家里连儿子都搬走不进来了。一位老大娘说：“几年了，没一个干部进过俺这窑洞，这里太危险，你们赶紧出去吧。”我拉着大娘的手说：“大娘，你住着都不怕，我坐一回怕什么呢？”后来，《难道你们就不怕出人命》和《调查附记》公开见报，市县领导高度重视，3天就解决了11户农民的房基地问题。农民们从100多里外专门送来“解难顺民心 党报传真情”的大红锦旗。像这样的事太多了，不管是我还是刘斌，都可以随便讲出好多。宝鸡市的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是非常支持的，我们群众呼声版和内参上发表的东

西，大多数都有回音。我和刘斌都被市里评为“信访工作先进个人”。

刘斌挺能干的，去年写了个“吹牛纳税”的稿子，在全国都有些轰动。

他老家在农村，就像电影、电视上演的那些贫穷地区一样，家里特别穷。他自己在宝鸡，也就靠点工资，还要给老家寄。他原来有个媳妇，特别漂亮，在一家企业工作。后来企业发不出工资，他媳妇就在街上摆了个摊子，卖油茶、卖馍。他媳妇属于老百姓们说的那种“嘴上能说、手底下能做”的能干人，麻利得很，心气也强得很。每天早上都要让斌斌上班前先帮她卖油茶。刘斌好歹是个宝鸡日报的记者，爱面子，就低着头，生怕人看见。她媳妇却让他大声吆喝。时间长了就有了矛盾，最后就离了婚。这次刘斌受了伤，他媳妇还去医院看他。刘斌不理人家。人家问他病情，他让人家少管。他媳妇出来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劝了人家几句。

刘斌现在住着院，前几天还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赶紧把他的出勤奖给他送去，他没钱买饭票了。你说老百姓捐的那些钱呀？那可不能动！将来怎么处理报社还没研究呢。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奖金？那也先不能动。

你问我呀？我今年50岁了，新闻龄有30多年了。有3个孩子，都工作了。我祖籍是陕西，原来在哈尔滨市工作，后来我父亲一心要回陕西，就给我在陕西找了个对象，后来就调回来了。我丈夫是搞技术工作的，啥都好，就是天生的不爱说话。

自从调回来，在宝鸡日报群工部一干就是12年，大家对我都挺好的，“韬奋新闻奖”这么高的荣誉给了我，整个西北就我一个。邹韬奋的家乡——江西省鹰潭市授予我们荣誉市民的称号，我们获奖者都去了一趟，那儿的人特别好。这次“3·12”的

事公开报道以后，鹰潭市余江县县委县政府还给我这个荣誉市民奖了 1000 块钱，还号召全县向我学习。我特别感动。

其实，我和刘斌都没想到这个事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都觉得这和我们下去采访遇到的许多麻烦事一样，只不过这次麻烦大一些，吃亏大一些。我们都觉得，这个事遇上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遇上我们新闻界其他哪个同行，也都会这么干的。

车匪路霸谁来管

在宝鸡，围绕着“3·12 事件”，宝鸡人有许许多多的说法。

宝鸡市一运司驾驶员范迎祥说：大多数司乘人员在单车承包后是一辆车一条线跑到底，歹徒上车搞违法行动或行凶，多为团伙行动，你今天管了，明天他就来报复。我们宝鸡客运公司近 5 年来就有几十名司乘人员遭到歹徒殴打，但绝大多数报案后无结果，得不到公正处理。我就是 1992 年 7 月遭歹徒殴打造成视力下降，而且治疗、误工等费用还得全部自理，凶手至今未抓到，这也是许多司乘人员不敢挺身而出的原因之一。我说这些，绝不是为这次事件中的这类司乘人员开脱，他们实在太不像话，太缺乏人味了，应该受到社会谴责与严肃处理。但对广大司乘人员来说，治安环境问题也的确是个重要因素。

一运司一位职工说：我们的车往出包，按说包上绝对能挣钱，可是我们自己单位的司机很少有包车的，大多数都叫外面的农民包了。像这一次出事时的那个农民售票员，其实就是那辆车的承租者，那个司机是给他打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车匪路霸。

一运司保卫处赵铁牛同志说：“客车是个流动车体，一路上要经过好几个县。比方说车匪路霸从眉县上来，他开始作案，到

了周至，他下去了。你到周至报案去，问在哪儿发生的？在眉县，那你找眉县去。到了眉县又说让找周至去，相互之间踢皮球。我们一运司人员这几年被车匪路霸殴打的事，光是相互之间踢皮球，你推给我，他推给你，光推给交警去管的，就有10多起。到底谁来管这一块，到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以前是小偷小摸，现在是车匪路霸，以后会发展成黑社会势力，现在事实确实是这样子，出了事公安局去一看，这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认得，为啥？因为经常作案，说明不是今天一天的事。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发生的事越来越严重，性质越来越恶劣。最后好不容易有人管了，法院把官司断了，我们连钱都要不上。1993年我们有一辆跑西安的班车，因为一起经济纠纷，对方有个亲戚在一个派出所当指导员，当车开到那个派出所附近的时候，人家突然把刀子掏出来让把车停下，把车的钥匙一拔，说让给3000块钱，要不然不让车走。我们告到派出所，派出所反而要我们给对方3000块钱。最后派出所把我们的车扣了50多天，我们告到法院，宝鸡县法院判决让我们赔12800块钱，一直到现在都没赔。1994年到1995年期间，我们司乘人员在路上挨车匪路霸殴打有40多起，报了案到现在，有19起连个眉眼都没有。

一位司机说：1995年12月25日，我由宁夏的固原开车返回宝鸡，下午5点多进入宝鸡县境内时，突然有两个人边喊边追，要求搭车，我就停下让人家上来了。刚要起步，突然有一辆面包车从后面追来，挡在我的车前。面包车上的人让我下来，问我为啥要拉刚才那两个人？我说那你要拉就让你拉吧！人家说不行，要把我杀了。我一听简直是笑话，一车40多个人呢，光天化日之下，你说杀就能把我杀了？我说啥也不相信，我就说，那你想杀就杀么。没想到人家真的从座位底下抽出两把菜刀就到我跟前来了。直到这时候我还想着他是吓吓我，哪还敢真的杀人？结果

人家真的上来给我头上就是一刀。我那售票的儿子上来挡，人家也是几刀，下手狠得很。这时车上下来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公安，人家拿了个小本本一晃，把刀夺了下来，才把坏人吓跑了。我记着车号，就去报案，结果不管，砍人的人照常跑车。又找到县公安局，费了很大劲，才让凶手给了住院的我们两千块钱的医药费。后来到了法院，我是个开车的，不太懂法律，可是法官，天天跟法律打交道，要是不懂法律，那不是笑话吗？法官明明知道凶手够判刑，可是硬缠着我要跟我调解，直到现在，我不同意调解的话，人家就不开庭。这一次两个记者在车上遇上了，即使这次遇不上，迟早也要遇上，因为车匪路霸也不是偶然现象，这些年在路上发生的多了。记者突然遇上这个事可能奇怪。事实上不奇怪。两个记者见义勇为，值得我们学习。“3·12”这次车上的司机和售票员的行为太差劲，当然害怕歹徒报复的心情是人人都有的，但是他们不送记者去医院，还让赔玻璃，又不按我们的规定去报案，是错误的，连一点人性都没有了。

街头一市民说：这一次歹徒是把人打错了，如果打的不是记者，最后啥事都没有。前面为什么那么多老百姓出事都没有结果？

宝鸡市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范太民对记者说：“3·12事件”从发案到现在，我们公安机关的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的指导思想，力求通过这件事震慑罪犯，给群众鼓劲。总的来说，我们宝鸡的治安情况还是不错的，记者同志晚上可以出来走走看看就知道了。“3·12”这次事是个偶然事件，其实宝鸡的车匪路霸不一定就那么嚣张。从3月15号到28号，我们在全市开展了一次打击车匪路霸专项斗争，短短的十几天，共破获车匪路霸案件14起（新发案13起，隐案一起），其中重特大案件9起，涉及作案人员26人，已抓获21人，摧毁犯

罪团伙4个，成员20人，已捕5人，收审10人，追回赃款4万余元，大哥大两部，摩托车7辆，彩电两台。

宝鸡市公安局一位同志说：“其实南方的车匪路霸比咱西北厉害得多，人们好像都习以为常了，反而没有人说。我到南方去出差，在广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上，就遇见了几件事，比咱宝鸡厉害多了。”

宝鸡市政府一位官员说：“我到海南出差，我们一行几个人，在公共汽车上，小偷大摇大摆地就在人家口袋里掏钱哩，比咱宝鸡厉害得多。”

更可怕的是什么

在“3·12事件”中，上车的歹徒先是引诱乘客参与赌博，见无人理睬，便公开动手抢钱，当他们围着一位老农抢钱的时候，刘斌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这时，三四名歹徒围住刘斌拳打脚踢，要抢照相机，这时，车上其他乘客都保持沉默，没有人站出来。

歹徒更加猖狂，大喊停车，司机言听计从，歹徒跳下车，从公路旁拿上来钢筋、木棒和铁锹，上车让司机继续开车，然后继续对刘斌施暴。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车上近20名乘客大部分在中途停车的时候都跑了，其中包括被歹徒抢钱的乘客。

刘斌、宁丽君最后下车时，售票员说：别走，赔我们的车玻璃。司机说：谁让你们多管闲事。

刘斌住院治疗后，他的病房被鲜花簇拥着，有一千多名群众自发地前来探望。探望者中，有的是出于对英雄的敬慕，有的是以往在车上受过歹徒的欺诈，前来感谢刘斌“为经常坐车的人除了一大害”。

刘斌说，“3·12”那天他没有流泪，可是当这么多群众自发前来探望时，他流了泪。他说，他没有想到。后来，因为探望群众太多，以至宝鸡日报不得不在报纸上登出一则“假启事”，称刘斌已经出院。

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社会面面观”节目的两位节目主持人路漫、礼红在“3·12”后迅速赶到宝鸡，在3月20日对歹徒的公开处治大会上，他们问歹徒：你们作案为什么能屡屡得逞？歹徒回答：“没有人反抗么。”又问：大家如果起来反抗，你害怕吗？歹徒说：“害怕！”

宝鸡街头一位律师说：从法律的角度讲，票一买，上了车，就是一种民事合同关系，那么作为车辆的司乘人员，或者汽车公司，就要保障把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但现在这种法律意识好像还没有形成。

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一位记者说：“改革以来，考虑经济效益的人多，考虑树立良好的风尚、良好的道德的人少。社会道德的滑坡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宝鸡街头公共汽车站的防雨篷，漂漂亮亮的，结果一夜之间就有人把它戳得散了架。街上摆的花坛，好好的，二三百公斤重的东西，有人就硬把它推到街心里去。

“比如这一次发生的事，宝鸡第一汽车运输公司把车全部承包了，承包给农民们。承包合同里根本没有保护乘客等条款。一运司的内部管理制度里，见义勇为的职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近3年来，大约有100多人在和歹徒作斗争的过程中受伤，但这些人回来后，医药费得不到保证，车辆拖班误班还要罚款，承包费也一分不能少，不利于人们见义勇为。

“向社会广泛宣传刘斌、宁丽君，是希望通过这一件事，能引起社会的注意，引起关于社会道德的讨论。遗憾的是，一些领导，却认为已经宣传得够了，要降调子，甚至给宝鸡日报施加压

力。抓住这件事，宣传好，推动好，可以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很大的推动。但是现在却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说群众麻木，但是我认为：领导同志的这种麻木是最大的麻木。”

至记者发稿时为止，9名歹徒中，有两名仍然在逃。据公安局同志说：办案经费严重不足，是两名歹徒迟迟未抓获的主要原因之一。

公安方面已将此案移交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已正式批捕9人之中的6人。未抓获的两名歹徒也在正式批捕的6人之中。

据称：因缺乏证据，这些抢劫为业多年的歹徒无法以抢劫罪定罪，也不能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只能以流氓罪定罪。

据宝鸡日报报道：“3·12事件”中的这伙歹徒，即以宝鸡县慕仪乡第四村农民张成礼为首的不法分子，长期以来，以长途班车为目标，大肆进行赌博、偷窃、抢劫等活动。靠着不义之财，盖起了楼房，用上了摩托、彩电、音响、席梦思，成了暴发户。3月12日晚，当公安人员抓歹徒张天垂时，从干警破门而入到张天垂被抓走，他的两个女儿趴在炕沿做作业，始终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可见这位父亲在女儿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

对歹徒让开车就开车、歹徒让停车就停车，而对见义勇为的英雄则极端刻薄的司机与售票员的处理是：司机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售票员（即车辆承包人）解除合同，罚款2000元。有人说：对司机党内严重警告，等于是承认此人仍具备一个中共党员的资格，这真是对党的极大侮辱。

“3·12事件”在宝鸡家喻户晓，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时，被采访者告诉了记者许许多多：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赶赴宝鸡慰问刘斌、宁丽君的官员所乘桑塔纳轿车，在宝鸡被偷走了两个车轮。

刘斌的弟弟给刘斌送饭，被偷走了自行车。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赶赴宝鸡为两位英雄颁奖，宝鸡市主要领导无一人出席颁奖仪式，迄今，宝鸡市也未有任何奖励举措。

被采访者告诉记者这许多事件之后说：宝鸡一些领导认为宣传此事有损宝鸡形象。记者以此询问宝鸡市政府一位负责同志，他说：没有听到领导层对宣传此事有什么不同看法。

记者手记

表扬惹出的麻烦

陕西宝鸡“3·12”事件一发生，很快轰动全国。本报老记者张文彦前去采访，突发心脏病。在同去的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两位著名主持人的救护下回西安住院。报社遂调我接手。

马上收拾行囊奔火车站。到了西安，先去看望了老张，然后在西安采访。之后在老张夫人的关照下，乘老张夫人单位的汽车赶赴宝鸡。

一阵紧锣密鼓的采访，宝鸡日报一位副总编提供了许多方便。虽然现在已很少钦佩什么人，但宝鸡日报见义勇为被打的两位同行，还真让我产生了钦佩之心。

并不是他们的这一次义举让我动心，而是他们长年累月，经常深入到偏远的山村，为农民们一件件具体的难肠事奔走操心。平心而论，现在新闻界像这样的记者绝不多见。

采访结束，匆匆回到兰州，满脑子都是宝鸡的人和事，想得脑子发烧、发胀。一向睡懒觉的我，早上6点多就突然醒来，披

了件衣服，坐到了电脑前。不吃不喝一直写，写到宁丽君和刘斌时，我真是饱含深情。写到刘斌和妻子离婚，写到刘斌受伤后曾经妻子来看他时，我的眼泪涮涮往下流。

一口气写到下午三时，一组三篇、近一万字的稿子写完了。发给主编此稿的卢跃刚后，才一身轻松地刮胡子、刷牙、洗脸。

随后，一连三篇、加编者按，几乎一字未动，在本报显著位置刊出。紧接着配了三篇评论，紧接着大量读者来信，并被在报上连续摘发。如果我没有记错，本报近年来这样处理稿子及有这样的反响，绝不多见。在紧接着召开的记者会上，许多人一见面首先夸这组稿子，评价甚高。直到今天陈强、唐钰等不少哥儿们还能回忆起那次记者会时的情景。

但所谓乐极生悲，一桶凉水劈头盖脸泼来，而且来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

50多岁的韬奋奖获得者宁丽君老大姐给她所认识的全国记协的同志打电话，给报社领导打电话，告我稿件失实。

老大姐后来又直接给我打电话，说：“你稿子写了也不给我看，我想着和你随便聊聊，你怎么都写到稿子里去了？”

“我说我老头子不爱说话，你写出来，我老头子跟我闹；

“刘斌和媳妇离婚了，你写他媳妇好，把刘斌气得不行；

“这个医院开始不好，可后来好了，现在还在这住着呢，你说这里不好，我们和人家怎么相处？我们这小地方，以后用人家的地方多着呢，你这样一写，以后怎么办；

“让我自己说我是这里惟一的韬奋奖获得者，人家岂不说我这么不谦虚；

“刘斌的伙食费已经解决了，你这么写，领导不高兴……”

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我说：“宁老师，您搞新闻这么多年，您想我能专门千里迢迢只和您聊聊？”

最后，我说：宁老师，我是诚诚恳恳带着感情写的，您要确实不满意，您就跟我们报社党组正式反映。

宁丽君老大姐说，“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确实弄得我们不好办。”

宝鸡日报的一位曾热心协助采访的老同志也打电话说：你写了拍屁股走了，把我们弄在这难受。

细想一想，老大姐他们说的也有道理。从那以后写表扬稿也非常注意。还真是不能只顾自己痛快。我写过那么多的批评报道，从未出过纰漏。惟有这一次，一组三篇稿子，两篇批评的一点事没有，一篇表扬的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至今想起此事心里就不舒服。

时间：1996年4月9日

作者：景星 张坤 黄勇 高杰

民以水为天——淮河流域污染纪实

张坤：抓捕动人心魄的细节

民以水为天

——淮河流域污染纪实

1996年3月22日，淮河流域的许多城市，蚌埠、淮南、盱眙等地的人们，为了找到一口清洁无毒的饮用水，无奈地奔波忙碌着……

连日来在蚌埠市采访，眼见耳闻的，全是一个字：水！

“货真价实天然矿泉水，1角钱1斤，快来买呀！”这样的吆喝随处可听，人们急急来用大大小小的塑料桶买水，或拎，或夹带在自行车上，慢慢而去。

一位个体户在推销净水器。他现场表演：弄盆清水，倒入蓝墨水，再用净水器一过滤，水清如故，他“咕噜噜”将水喝下去，原以为会购者如云，不料观者反应淡漠。一市民说：“颜色能过滤，毒能过滤吗？”

在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大门口，赫然贴着该委公告：

“因自来水水质较差，外来打井水人员日渐增多，难以管理。经委专题会议研究决定：取消水卡，以水票代之，每个职工家庭每天供水 10kg……自 3 月 28 日起凭水票打井水。

在买水喝同时，许多单位和市民拿出自救办法：打井。每口井打到四五十米，造价 8 万左右，该市 7 家专业打井队平时闲得很，如今忙不过来。

记者采访“淮委”副主任张菊生时，见他手拄双拐，原来，他是骑自行车去取井水时不慎摔成骨折。

蚌埠市这次水污染事件从春节前开始，已历时 100 多天。3 月底连续一周大雨。雨过天晴，记者来到淮河蚌埠段，离河几十米就有臭味扑面而来，黑黄的河水触目惊心，可想大雨前河水的状况！

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副局长褚金庭告诉记者：蚌埠位于淮河中游，这次水污染事件是历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而据记者了解，这不过是淮河全流域近年来污染重症的又一次“打摆子”而已。

淮河，是我国六大水系之一。干流全长 1000 公里，在中原地区自西向东流经豫、皖，至江苏进入洪泽湖。然后，一路向东穿过大运河后流入长江；另一路向东北经苏北灌溉总渠汇入黄河。

淮河，流域面积 27 万平方公里。“江淮熟，天下足”。淮河流域有耕地 2.55 亿亩，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然而，淮河接纳的工业水和生活污水竟达二十三亿四千万吨！沿岸数十万个乡镇五小工业——造纸、酿酒、印染、电镀、制革企业星罗棋布，更为污染推波助澜，使淮河雪上加霜。

去年 3 月至 8 月，淮河流域水环境监测网进行了首次大范

围、高频次的监测，结果表明：1995年上半年，淮河干流上、中游约50%河段水质是五类或劣于五类（五类水按国家标准仅能用做农业灌溉；劣于五类已是废水）。下游地区大多数河段水质劣于五类。淮河主要支流大部分河段水质远劣于五类。

按国家地面水环境标准，这意味着，占淮河干、支流总长近70%约3000公里的河段，已经丧失了使用功能。

“于老万”变成“于光蛋”

河南省

“二十年前，颍河大闸一放水，两亩地大的闸塘就能关住万把斤鱼。哪条都有六七斤重，我亲手捕过百多斤重的草鱼呢！”

83岁的渔民王金文老汉，诉说着淮河最大支流颍河的变迁。

“当年，我们渔业社每个船队，哪天都有二三千斤的收获……”

“现在呢，颍河水人不能喝，鱼不能活。”

“吃河水有污染，洗澡身起癣。大鱼光、小鱼完，青蛙老鳖爬上岸。”王老汉念叨起顺口溜。

和渔业社的许多渔民一样，在颍河当了一辈子渔民的王老汉，不得不上岸另谋生路。

数百公里的颍河，早已变成黑水河。水面上，油污块块，白沫逐浪。设置闸坝的区段，更是臭气袭人。

沈丘县的槐店闸，是颍河河南段最后一闸。1994年，由于臭气上泛，大闸公园内养的猴子，眼睛被熏瞎，树木也枯萎了。100多人被硫化氢臭气熏得住了医院。

洪河，是淮河上游另一大支流。在洪河西平段，由于舞阳、舞钢市五家造纸厂作祟，污水泛起的黄沫能堆积数米高，淹没桥

梁，毁坏公路。

西平县洪铺村党支部书记控诉说：这几年，河里沫子特别多，涨得和桥面一样高。有的骑车人和机动车过桥时，误当成桥面，就掉了下去，已经死了几个人。大牲畜也死了几十头了。这五家造纸厂，年利润共1000多万元，却使西平县每年农业收入减少近1亿元。

涡河，淮河第二大支流。1991年，“网箱养鱼丰收计划成果鉴定会”曾在涡河召开。那时，百里涡河，百里网箱，一派繁荣景象。仅在一年以后，1992年5月和8月，污染事故发生，5000多个网箱的鱼通通死掉，“丰收计划”成为泡影。

安徽省

淮河干流淮南段污染最为严重。枯水期，流过淮南市的淮河水是黑色的。

1989年春节期间及1992年2月，淮南蚌埠满街都是提桶找水的市民。上百万居民没水喝，怨声载道。

淮南市自来水公司一位副总工程师形容：自1989年以来，我们这里自来水厂已成污水处理厂了。

1992年的污水过境，使淮南电厂5台机组有3台停产，每日少发电750万度，损失3000万元。蚌埠自来水厂创纪录停产42天，连途经蚌埠的列车也无水可供。

山东省

微山湖畔。微山县环保局长张相友：“70年代那会儿，一米多深的湖水，清得能一眼见底。截止去年9月，4000多个企业往湖里排污，入湖的53条河基本没有清水河，这湖水能好吗？前几年水少时，湖水连鱼都养不成。”

湖水黄褐色，船驶过湖面，翻起的浪花泛着泡沫。微风拂面，湖水闻着有一股异味。张说，昨天刚测过水质，微山岛东还

不如五类。他说，渔民还得喝这湖里的水。

于兴海在望湖兴叹。1992年，他还是靠养鱼致富的“10万元户”，不到两年光景，“于老万”变成了“于光蛋”，网箱报废，欠了一屁股债不说，躲雨避风的渔船也得卖掉。

江苏省

去年9月10日下午。东海县女县长聂长兰，对来此视察的国务委员宋健一行所致欢迎词是“106万人民欢迎来东海灾区”视察。

聂县长所指灾区，即江苏石梁河水库库区。水库是江苏最大的人工水库。由于每年承接鲁南数千万吨工业废水，十年前碧波荡漾的水，现在成了蓄污池。去年3月，水库泄洪闸附近检测结果：水质劣于五类，比能够饮用、养殖最低标准的三类水，各种污染物超标5—22倍。

雨季之前，水库8万亩水面呈酱油色。污染导致水产养殖、种植业遭殃，网箱养殖几乎绝收，银鱼绝迹，苇草、湖沙发黑。连云港市及东海、赣榆两县每年经济损失1亿元。

水库的水不能喝，腿上起疙瘩。东海县南辰乡村民周文志说：“牛喝了污水，老拉稀，瘦，不下犊仔。”“人下水洗澡，全身痒，不是滋味。”

污染还在扩散，有10多座中小水库靠引石梁河水库补水，黑水外泄，蔓延成一个庞大污染群。

当地人称，他们现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江苏省盱眙县，更称得上是灾区。盱眙位于淮南干流下游，淮水经盱眙流入洪泽湖。

一旦蚌埠闸泄洪，上亿立方污水下泄，盱眙境内淮河水色发黑，异味强烈，大片油污、泡沫漂浮水面。

此时的盱眙，俨然一座“死城”，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

工厂被迫停产，饮食店被迫停业。人们被迫饮用污水，中毒事件时有发生。进入 90 年代，污染事故频发，规模、危害越来越大。

自毁家园 为害几何

淮河水污染物堪称“五毒俱全”，既有有机污染，也存在无机污染和重金属污染。淮河身染沉疴的客观原因是：淮河丰水期和枯水期水量差别很大，涝、旱灾害频繁。解放后，流域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5000 个大、中、小型水库及渠道组成纵横交错的水网，淮河干流及一二级支流修建了 4000 座闸坝。水利工程令水患低头，但使河流原有的自然水文特征被改变。枯水季节，河水被众多闸坝拦蓄。河流基本成为静水、死水，水体的稀释自净能力急剧下降，导致污染物浓度的增高，水质严重恶化。在丰水期，尤其是上、中游泄洪，被蓄积多日的污水顺流直下，极易引发大规模的污染事故。

此外，淮河干流支流城镇密集，工业企业众多，仅河南省流域内，乡以上工业企业即达 60 多万个。况且淮河流域污水、废水处理率大大低于全国 47% 的平均水平，还不到 12%，至少 88% 的污水废水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河道。

人为因素更不容忽视，一些地区和企业甚至个人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只顾追求局部、当前利益，漠视以至无视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他们法制意识淡薄，置环保法规及国家产业政策于不顾，造成了污染严重的工业和乡镇企业发展失控的局面，流域内造纸企业仅占企业总数的 7%，其污染负荷却占总量的 60% 以上。

这种比竭泽而渔还严重的自毁家园行为，所得远远小于失，水污染严重地制约了这片多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据淮河流域水保局的不完全统计，至 1992 年底，十几年间全流域共发生大的污染事故 54 起，仅直接经济损失即 2 亿元。1994、1995 两年，每年直接经济损失都在 2 亿元以上。间接的、潜在的已无法计数。

严重的污染使淮河沿岸人民的健康受到极大摧残。

记者永远忘不了当地人民面对一河河黑水、一堆堆死鱼时，那一双双呆滞的眼睛。

发源伊始就接纳河南漯河市大量污水的黑河，污染最为严重，所有监控河段 100% 水质劣于五类。

河南医科大学对黑河上蔡段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沿岸人群死亡率比一般人群高 1/3，恶性肿瘤发病率高一倍以上。这里每 3 个成年人，就有两个肝肿大，每 10 个儿童有 9 个肝不正常，新生儿致畸率竟达 6%！上蔡县人武干部反映，有些村庄十几年选不出身体合格青年入伍。

沈丘县医院的统计表明，1993 年该地肝炎、消化道肿瘤发病率比 1983 年上升 40%。奎河受江苏徐州地区的污染，沿岸的饮水井大肠杆菌超标 7600 倍。这条河跨省污染安徽宿县，该县杨庄消化系统癌发病率高达 800—1000/10 万人。有一家 6 口人，4 人得癌症先后离世。

鲁南工业废水南犯，使昔日白马河变成“黑马河”，沿岸的江苏邳州市 150 多条农田水渠及地下水均被殃及，沿河手压井井水暗黄，井水中细菌及大肠杆菌数量超过用水标准 300 倍。该市的合沟乡连续两年征兵指标未完成。乡政府 30 名工作人员，9 人患肝炎、消化道疾病及癌肿。该乡彭庄村民癌症发病率为 500/10 万人。

“杀手”不仅仅是污水。淮河流域普遍引污水灌溉农田，作物会将污染物蓄积到茎、叶和果实里；鱼虾觅食在“五毒俱全”

的河湖内，更能将有毒物质富集到体内，蓄积和富集，实质是高倍的存储，人处于这种食物链顶端，吞食所有这些恶果，不罹患各种疾病才怪！

“淮河不清，无以对父老兄弟！”

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华夏大地上，从来没有向自然灾害低过头。

然而，在 20 世纪史无前例的全流域污染这头怪兽面前，今天的人们显得手足无措，惶惑不安了。

在河南省沙颍河流经的项城，一位老大娘闻知国务院的治淮执法检查团来到，前去迎接，她对宋健说：“中央来了这么多人，本来应该请你们喝口水，可现在连烧一锅干净水都不能……”

1994 年在河南槐店闸，一封交给宋健的信这样写道：“宋健不看不是清官，水清之日是官清之时。”

“人民有权利这样提，他们多么迫切，把治污同政府的效率、党的领导联系在一起。”去年 9 月 13 日，在治淮执法检查二次现场会做总结发言时，宋健当众重读此信。

1995 年的现场会随走随开，在连云港是最后一站。洪泽湖渔民得知后，不远千里，给宋健送来 3 封信。

盱眙县淮河乡洪建村，1993 年人均收入 1770 元，被誉为盱眙“第一村”。第一村因 1994 年特大污染事故，养殖业大幅度减产。1995 年，该村的网箱养鱼都被污水“一网打尽”，本利全无。

这 3 封信中，第一封是洪建村全体渔民写的。他们问宋健：“我们还能靠淮河生活吗？我们还能不能养鱼？”茶饭不思、心在滴血的渔民要求赔偿损失，要去省城、北京上访，“寻个说法”。

宋健念完信，会场一片沉寂。

在场主持会议的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此时心情肯定更加沉重。

1994年8月，解振华来到洪泽县老子山渔场，调查'94特大污染事故的后果。

一个60多岁的老渔民走上前，“扑通”一下给45岁的解振华跪下：“往后别再污染了……”

解赶紧搀起老人：“对不起，我们工作没做好……”

解振华慨叹：老人家只提以后别污染，对污染造成的损失都没提要求……

现场会议期间，记者不止一次听说沿淮群众向中央及地方领导跪下的事情。东海县东山后村百姓们是排着队下跪的。

当然，也有不下跪的。这些不下跪的人们，纷纷用不同方式同污染抗争。

——河南省舞阳县，曾为一年300万元的财政收入，任3家小造纸厂向河南肆意排污。忍无可忍的农民，装上流过村边的污水，来到县政府。他们用污水灌满办公室所有的暖水瓶，请县领导们，品尝品尝这黄褐色的毒水！

——江苏东海县的女县长聂长兰，前年春天“为民请命”上了北京。她说，东海县政府每年接待上访人员500多人次。群众讲要炸掉山东临沭的排污工厂。聂长兰告诉记者，当地老百姓还说了：水库这样了，国家还不管，我们要去北京告状！我们做工作，拦了没让去。作为一县之长，她却不能不去，她把酱油色的污水装瓶，带到北京，拿到国家计委、国家环保局申诉。

——石梁河水库渔政管理站站长万绪杰，自1986年起身背干粮到南京、济南的省政府、省环保局及法院上访。这个执著的苏北汉子向宋健同志汇报污染状况时心情激动，语不成句。“水

库过去是聚宝盆啊……”

——陈邃衡，八旬老翁。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陈老先生冒着炎炎酷暑，先后五次带领调查组去苏北考察了淮河污染及防治情况。去年，他还将有关调查报告送交全国人大、党中国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江苏的同志说，陈老先生肝胆相照，知无不言，为治淮立了一功。宋健致函陈邃衡：“……尚望指点。淮河不清，无以对父老兄弟！”

对污染要“壮士断腕”

环保专家警告，如果现在不采取果断措施，到2000年，淮河水将不再有任何用处，以1994年5月淮河流域环保执法检查第一次现场会为标志，党和国家作出战略决策——下大力气全面治理，拯救淮河，解救流域民众于灾深水污之中。

拟就《淮河水污染防治总体规划》（草案）的权威专家们一致的结论是，淮河流域水污染现状，起因于畸形发展的落后产业结构和环保欠账过多。而水资源的短缺，以众多闸坝调控河段，水体流泄不畅等特定自然条件，导致污、旱、洪、涝灾害交织一起，使解决淮河水污染问题愈加困难。

尽管跨流域的综合整治复杂艰巨，人民的政府仍然确定了根治淮河污染的总体目标——1997年治淮取得突破性进展，2000年使淮河水变清。

1995年8月8日，国务院发布第183号令，《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由李鹏总理签署，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了。

《条例》要求，“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这意味着，自1998年1月1日起，禁止一切工业企业超标向淮河流域倾泄污水，否则将被强制关闭。

记者获悉，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办公会，听取淮河治理情况汇报，李鹏总理和邹家华副总理都使用了“破釜沉舟”一词，强调按既定目标进行治理，即便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也不例外。国务委员宋健每到一地，都要求当地政府义无反顾，拿出“壮士断腕”的精神共同治污。随着淮河流域第一大污染源——国有周口地区味精厂废水处理项目的建成，人民盼望已久的淮河治污曙光初露。

宋健在接受记者们采访时深有感触：“发展，必须保护淮河这条生命线。不能再瞎干、傻干、蛮干、脏干了。别让后代骂我们是老糊涂……”

严酷的事实不容回避：我国正面临着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国家每年为此损失达 2000 亿元。中华民族的发展，已经受到极大制约和威胁。

持续发展，要求中国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素质和质量，改变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

这，同样是一个“球籍”问题。因为，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必须对环境污染说“NO”！

记者手记

抓捕动人心魄的细节

《民以水为天》一文，是我和几位记者合作采写而成。

文章发表不久，我到蚌埠出差，看到蚌埠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许多读者在谈论这篇文章中让人难忘的人和事。一位熟人见到我说：“让我最难忘的是那个细节——记者采访‘淮委’副主任时，见他手拄双拐，原来，他是骑自行车去取井水时不慎摔成骨折。想一想堂堂的国家‘淮委’副主任，因为被迫取井水摔伤，说明了淮河污染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回到家时，这位“淮委”副主任打来电话，诉说当地人在谈论他这件事情，让他感到有些难堪。这使我至今心里都隐隐有些内疚，因为当时水利部淮河委员会对我们的采访给予了不小的支持，而作为记者，当时在观察到这个细节时，产生的是一种职业的兴奋，对于作为长者的副主任的心理承受，真是没有想许多。

还有遇到一些令人心动的事，当时也没有想许多。比如到一家工厂采访，对方以为是采访生产经营，而我在仔细观察后，发

现了一个让人震撼的场面：生产果糖饮料的厂家购进数千只塑料桶，装上天然矿泉水出售。我及时用照相机抓拍了这个场面，配在文章中，显得很有说服力。

参与写作此稿的几位记者，可以说都是“没有想许多”，因为淮河流域污染的情景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只要是能反映这个主题，只要能使广大读者全面真实地了解实情，其他一切都为此让路。于是记者们深入、再深入，挖掘出一系列色彩强烈的、表现主题的细节。

比如几年前还是个靠养鱼致富的“于老万”，不到两年光景就变成了“于光蛋”，网箱报废，欠了一屁股债不说，躲雨避风的渔船也得卖掉；

比如一位老大娘闻知国务院的治淮执法检查团来到，前去迎接，她对宋健说：“中央来了这么多人，本来应该请你们喝口水，可现在连烧一锅干净水都不能……”

比如一个60岁的老渔民走上前，“扑通”一下给45岁的解振华跪下：“往后别再污染了……”

比如一位县长拦了上访的群众，自己却把酱油色的污水装瓶，带到北京，拿到国家计委、国家环保局申诉。

……

这篇文章由于穿插了大量记者采访的背景资料，要想使文章活泼起来，可读性强起来，细节精不精彩是关键，只有一个个精彩细节紧紧抓住读者，才能使读者如临其境，一读三叹。尽管我感到此文在行文处理上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文中的一个细节，确是记者费了一番心思、下了一番功夫才得到的。

时间：1996年2月5日至14日

作者：毛浩 吕彤 迟洪江

沈阳不相信眼泪

吕彤：沈阳冬天，寒冷的1995年

沈阳不相信眼泪

走进沈阳

1995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我们和年过八旬的李涛老人静静地坐在他的书房里。他是“一五”后期辽宁主管工业的省委副书记。他的言语不多，但我们还是从他的片语之间感受到了那个火热年代的辉煌。那时，全国支援沈阳，国家把4.4%的工业基建投资放在了这里，各路优秀人才汇聚到这里，经济高速发展，建设规模迅速扩大，这带来的成果之一就是充分就业。李涛还清楚地记得，1956年末，沈阳正式宣布失业已经消失。

与所有传统工业城市一样，沈阳今天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情

况：数年来，由于相当多的大中型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出现了大批产业工人“下岗”的现象。1995年，据估计，沈阳下岗职工约有30万，占职工总数的12.5%。而沈阳的产业工人人数占到了城区人口的四分之一。

沈阳正在经受一场阵痛。这是由它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一五”期间，全国694个限额以上的项目，沈阳占26个，其中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沈阳有6项。在沈阳铁西工业区，苏联人不仅援建了大型工厂，而且建造了大片苏式工人村及配套的學校、俱乐部和医院等生活设施，这一整套的工业体制和工业文明，奠定了现代沈阳的基本形态和在全国的地位。

辽宁在全国是“辽老大”，沈阳在辽宁是“沈老大”。也正是因为辽宁和沈阳在全国经济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它们进入计划经济最早，而退出计划经济最晚。90年代初，全国平均指令性计划比重为19%，深圳等沿海地区不足4.5%，而辽宁却在45%以上。这就意味着沈阳人在享受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稳固和荣耀后，现在正在为它的过去付出代价。

在全国16个大城市经济排位中，沈阳已由50年代的第三位滑到了现在的第七位。沈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刘语民对记者说，武迪生曾任满了两届沈阳市市长，他在全中国以“改革市长”而著称，然而，就是在他“鞠躬尽瘁”的8年任内，沈阳的下滑也没能被扼制住。这种情景如同1995年“十连冠”的辽宁足球队在中国足球职业化的第二年即从甲A降组那样，让沈阳人痛心疾首。

有人说，沈阳是一只恐龙，架子还在，气脉已虚。到了90年代中期，沈阳的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和思想观念已经和全国大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辽宁社科院副院长、省情研究所所长武

斌说，沈阳的经济早已降组，早就该打沈阳的“解放战争”了！

近年来，沈阳明显地加大了调整、改革的力度，用现任市长张荣茂的话说，沈阳现在的情况是，不进则退，小进也退。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了一句话：“本届政府是最困难的一届，我的后任可能会好过得多。”

沈阳目前承受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要真枪实弹地调整、改革，一方面要避免来得晚但因此会强烈得多的社会影响。1995年由于结构调整、资产重组，沈阳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到三分之一，下岗工人增加到30万。张荣茂说：“这都是市场调出来的！”

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他们背后的大烟囱有一天不冒烟了。原来以为百分之百牢靠的大工厂，突然气喘吁吁。工资不能按时发、或者只发基本生活费，许多福利也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工人们、干部们愕然，痛苦，在焦虑中求索。

记者一到沈阳，就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夏日，沈阳市政府办公楼突然拥进一群老工人。“俺们要见市长！”工人們的喊声打破了大楼的宁静。这是在武迪生任市长之前，李长春任市长的时候。正在办公的李长春市长闻讯赶到了现场：“我就是市长，有事坐下说。”

“俺们是工人，工厂开不出支，我们吃什么？”

“市里把我们调到有钱的厂子去吧，有饭大家吃，有福大家享嘛。”

李长春心里酸楚万分。他从兜里掏出几张票子：“同志们几个月拿不到工资，我当市长的也很难过。这几个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我们不要市长的钱，我们要国家的钱！”

“国家也不是点石成金的神仙，能变出金山银山。我看咱们

还是先唱支歌吧，来，我给起个头。”李长春说。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歌声中，市长和工人都百感交集。歌声中，工人们悄然离去。

如今李长春唱《国际歌》已成了一个典故。“全靠我们自己……”对于劳动就业来说，它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和另外一个时期的到来？在健全的市场经济里，新旧产业的更替、企业间的优胜劣汰、企业内部符合经济规律的用人制度等，都会使工人的临时性失业成为正常。只是在具有悠久的铁饭碗历史的沈阳，人们能够接受这个现实吗？传统的观念与严峻的现实冲撞会激起什么样的跌宕？在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它又呈现出怎样复杂的形态？让我们走进沈阳。

一哭一笑十年间

石永阶？这就是石永阶？！一个解放帽下露着白发，穿黑呢中山装，身板挺直，目光柔和中带点犀利的老头。

这多少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心目中的石永阶被凝固成10年前本报照片上那个忿忿不平又很无奈地叼着烟卷的形象。

10年前，石永阶和他所在的全国第一家破产企业——沈阳防爆器械厂一同成了新闻热点。本报1986年9月3日发表的照片后配了一段辛酸的说明：“正在闷头抽烟的是原沈阳防爆器械厂厂长石永阶。8月25日上午，他到厂里来领救济金证，市保险公司称他的问题正在调查中，目前尚不能发证。石永阶先是大发雷霆，尔后又眼睁睁地看着工人们领证。他在这里当过近两年厂长，此时此刻，不知他心里是啥滋味。”

历史，就这样被记载在一张发黄的旧报纸上。

“当时你为啥‘大发雷霆’呀？”

“他们让我退休。我说，我不退。他们说，那就病退。我说，我没病。”

石永阶至今仍然耿耿于怀。当然，此时此刻他的“心里的滋味”已大不一样。他现在是坐在自己开的沈阳长城防爆开关厂和沈阳长城电器开关厂里。这两个厂共有十几台车床，雇17名工人，固定资产40多万。

“我就是要赌这口气！”石永阶说话底气很足，除去头发更白了，他现在的模样比10年前还年轻。“我还是干的防爆，还是当厂长。”

石永阶看来是个“记仇”的人，他的玻璃板底下，至今还压着一张剪报，是当时的破产办副主任李振清后来因经济问题被开除党籍的报道。石永阶一直认为，是有人故意整他，拿他当典型开刀。

“哎呀，那会儿可砸死人了，我都不敢出门。”从他被撤了厂长，厂子挂黄牌起，石永阶有一年多没出门，成天憋在家里。一出门，街坊邻居都指指戳戳。老伴比他心窄，着急上火，急瞎了一只眼睛。

防爆厂破产，许多职工都掉过眼泪，石永阶也不例外。而且，他被罚免两年救济金，没了生活来路。这倒把他从屋里又逼了出来，他还真较上了劲儿！“还干防爆，让大伙儿都看看，咱老石不孬！”他向亲家借了1000元，又回老家借了1000元。防爆厂破产3个月后，石永阶只有一台旧车床的“小作坊”开业了。地点在民廉市场里边，离原来的防爆厂距离不到500米。

像所有创业者一样，石永阶经历了创业的艰辛。至今，他们老两口仍是最早到厂的：“多少年，习惯了。以前在防爆厂，我

也是最早到的。”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厂长，跟过去有什么不同？”

“大不一样。过去搞个产品，得去上级那儿报计划、申请经费，现在我一句话就办了。过去工人不干活，我只能劝只能说，现在我马上让他走人。过去产品质量有问题，谁都不说，层层给你打马虎眼，现在谁敢！过去我说话不算数，好几个副厂长，还有书记呢，现在就听我一个人儿的……”

还有呢？石永阶的老伴补充了，“过去花钱挣钱都是厂里的，现在都是自己的，真睡不踏实。”刚开业不久，石永阶要扩大规模上防爆开关，借了3万元钱。那时的3万元，相当于老石十几年的工资。老两口一宿没睡好。第二天，老石给都在厂里工作的儿子儿媳下了令：“今后每顿咱只吃酸菜豆腐，啥时候还上钱，啥时候吃肉。”

至今，石家还保留了酸菜豆腐的传统。为这，儿孙们常和老石闹别扭。家里买了房买了车，厂子开了分厂又开门市，石永阶夫妇却改不了酸菜豆腐这一口儿。

10年，当时的小孙子已上了大学。防爆厂破产那年，石永阶58岁。如果不是被撤职，企业又破产了，也许石永阶和其他退休工人没什么区别，遛遛弯儿，看看孙子。“当初就为赌这口气，没想到，还真成了。现在奔70了，可越干越有劲。”石永阶没想到，自己干了一辈子，机遇会在他临退休时出现——而这个机遇，竟然是厂子破产。

当然，10年前，破产这个“机遇”也同样出现在沈阳防爆器械厂每一个职工面前。

防爆厂破产时，共有职工136人，其中退休职工78名，由皇姑区人寿保险公司发退休金，人均不到40元，10年来经过三次调整，现在人均退休金为169.72元。任职的58名职工，由民

政部门将 12 名残疾职工安置在民政企业，由区劳动局、明廉街道办事处安置 23 人，有 12 人自愿下海，其他的是经过考工和亲朋引荐重新就业的。

去年，沈阳市总工会一位女干部苏莉走访了当初防爆厂的几十位工人，她把所有再就业职工的命运分成了三大类。第一类是破产破出了一批老板，像石永阶这样的老板有好几个，最阔的是当年的青工郝万春，企业破产时他只有 28 岁。我们在 1986 年 8 月 13 日的本报中找到了这个名字，在防爆厂的最后一次全体职工会议上，他就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如今党的政策开明，咱浑身有的是力气，咱今后的日子差不了。”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再去找个铁饭碗，而是开饭馆、卖猪肉、摆瓜摊，由小积大，后来开办了汽车修理厂和汽车装具、靠垫门市部，还盖了几家酒店，是公认的百万富翁。我们曾试图采访他，但他先是去韩国，后又去了唐山，终未谋面。

第二类是那些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王立新原来在防爆厂是三级电工，但他勤奋好学，自己学了几手焊工绝活。就这几手绝活在企业破产时救了他，很快在汽车总厂找到新工作。我们在金杯汽车公司见到王立新时，他刚刚完成工人技师的理论考试。现在他是总装车间的车间主任，去年金杯公司剥离富余人员，王立新自然不在其列。

苏莉说，现在最惨的就是那些没什么技术，又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人，当初防爆厂破产，有些人就认为是因为防爆厂太小，一定要抱个大厂的铁饭碗。听说当初有 4 名女工分配去了民族乐器厂，我们驱车去采访，结果看门人说，这厂已停产两年多了。苏莉还领我们去看她认为“最惨”的女工何凤珍。何凤珍原来在厂子是熟练工，企业破产后，她跟着几个姐妹办起了“新风有色金属加工厂”。可一年以后，客户收回了外加工业务，她再次失

业。区劳动局给她介绍过几家工厂，可她有病，不胜任重体力劳动。她也卖过菜，卖过瓜子，可人一多就算不过账来。现在她靠收破烂为生，丈夫又下岗，家里欠了一屁股债。

我们到沈阳前的两个月，也就是石永阶正着手再建一个分厂时，有 2200 名职工的沈阳防爆电器厂又宣告破产。石永阶不无得意地说：“现在沈阳生产联爆电器的，全都被我顶得差不多了。”他这个小厂的产品如今已远销美国、泰国。

据了解，沈阳防爆厂是沈阳第一个破产的国有中型企业，至此，沈阳实施破产的企业已达 37 家，数以万计的职工面临下岗、失业。他们今天所面对的，就是防爆器械厂人的昨天，而防爆器械厂人的今天，也许就是他们的明天。

送我们出门，石永阶忽然拉住我们的手：“北京来的记者，再给我拍张成不，笑的，也登报！”

早来的“夕阳红”

沈阳劳动力市场位于沈河区的繁华地段，这家 1995 年开业的劳动力市场宽敞的洽谈大厅，求职者三五成群。在大厅一角，我们和一位名叫刘金芬的中年妇女交谈起来。

46 岁的刘金芬，1993 年从一家国有大企业的后勤处下岗，两年来三天两头到各劳务市场上找工作，她自己也不知跑了多少趟了，但至今仍未有成果。

“难呐，俺们这年龄，不上下下的，又没力气又没技术。体面活儿，人家还不挑年轻点的、水灵点的？难！”刘金芬眼睛搜索着场内：“可不挣点钱不行呀，我爱人单位效益也不好，每月勉强能 70% 开支。我父母和公公、婆婆都是一个厂的退休工人，厂子一黄，退休金都错月发，如今这物价，吃饭都成问题。”

“我还有一个 19 岁的儿子，今年大学二年级了，每个月都要给寄 100 元钱。到去年 4 月，我觉得实在拿不出这笔钱，就跟儿子商量，看能否向学校申请困难补助。儿子回信说：‘只有农村来的学生才申请补助呢！’能不能跟上面说说，让他们知道下岗工人真的也很困难？”刘金芬的眼睛里含着恳求。刘金芬还给我们念了一段顺口溜：“最想的是上岗，最怕的是离厂，最倒霉的是老三届，最担心的是物价涨。”“你看这些都让我摊上了，可我做错了什么？”

我们在以后的采访中发现，大量的下岗工人基本年龄段在 40 岁左右。据市妇联的一份调查，下岗女工中，40 至 45 岁的约占 71.5%。她们的经历如出一辙。沈阳财经学院副教授赵文祥介绍，在 1978 年前后，曾经有一个历史上罕见的就业高峰，当时大批下乡知青回城，再加上新成长的劳动力，共有数千万人需要就业。那时国家采取了一项硬性措施，不管企业需要不需要，也不管本人的意愿如何，一律分到父母所在单位工作。国营单位由国家拨进工资指标，企业只需安排位置就是。这一措施如今的结果是：在企业进入市场以后，这批人由于年龄偏大又多无技术，就成了被剥离下岗的第一批工人。“夕阳”过早地照在了他们的身上。

有一个统计数字：沈阳的重工行业中女工占 40%，在军工行业中女工占 37%。可以想见在这些重体力行业中，随父母进厂的如此众多的女工们要撑起多么庞大的一支队伍。

刘金芬也是这样进厂和离厂的。“1969 年我中学毕业，那时沈阳企业都从农村招工，城里的知识青年都得下乡接受再教育。我下到铁岭的一个村上，一呆就是 9 年。等到 1978 年回城，我都已 30 了。高考我考过，没考上；招工也考过，也没考上，后来还是我爸提前退休，我才顶替进的厂。”刘金芬谈起这些，眼

睛有点湿润了。“该学技术的时候下了乡，该结婚时没有房，回城以后没人要，刚刚工作又下岗，你说我冤不冤？”

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李桂珍对我们说，前些年她们也很为大批中年女工被企业下岗鸣过不平，但现在不喊了，“还是实际地做好送温暖和再就业工作吧”。

1995年，沈阳机械系统一企业因效益不好，裁减了10名女工。这10名女工手持劳动合同到劳动部门告。劳动部门派员调查后认为，该企业生产尚能维持，并非到了没饭吃的地步，遂作出裁决，让该厂对这10名女工重新安排工作，并支付违约补偿金。此事被媒体披露后，人们称之为法律的胜利。然而此后企业背着沉重的包袱，日子越发艰难，最终工人仍旧拿不到工资。

市中心的八一公园，近年兴起了一个新型的行当——陪谈，即较年轻的下岗女工陪老头老太太们摆谈些“闲嗑”，陪着流点泪，并收取一点费用。

像这样的新行当在沈阳还有很多，像医院里的“护嫂”、宾馆里的“服务大姐”等等。我们曾下榻沈河区的皇宫饭店，这里的服务员清一色都是40岁上下的下岗女工。我们一打听才知道，她们均是1978年前后的回城知青，父亲或母亲均在房管局下属企业工作。她们随父母安置工作后，其工种竟都是很要力气的水暖工。

“那你们在原单位都干些什么呢？”

“送送开水，拿拿工具，递递毛巾呗。”

在企业纷纷走向市场后，她们自然被剥离了。

可出乎预料的是，女工们在被剥离后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据市妇联的同志介绍，这些“服务大姐”因其独特的温和、周到和敬业，颇能招些回头客。为了能接待俄罗斯客人，她们竟还学会了简单的日常俄语。为此市妇联把她们评为了1995年度的先

进集体。比起那些提前“退休”、拿不到工资的姐妹们，她们又是一种活法。

看不见的战线

轻工街第三居委会位于铁西区 and 于洪区的交界处，辖区有1112户居民。1月4日，雪后初霁，天气格外地冷。我们循着一个公用电话牌，找到了居委会的小屋。

小屋很小，墙上挂满了奖状。“真不好意思，我们原来申请的办公室让给赵静办切面店了，你瞧屋里这埋汰劲儿。”居委会60岁的王淑琴主任一边招呼我们，一边搬出一堆黄色的小本，“你们要了解谁，这里都有”。

查看这著名的“四簿八册”，我们发现这可能是中国最准确、最严密的统计管理了，在这里下岗有登记，安置有回执，无论是招工就业还是从事临时性生产经营，都有相应的凭证，甚至出国人员也有护照复印件。

陪同我们的街道妇联主任介绍说，三委有下岗工人63人，54人找到了正常的进钱路子。“他们大多是在老太太的帮助下重新起步的。有的想做买卖不懂规则，老太太就颠着小脚（或者大脚）给跑执照，争减免税；有的想办托儿所缺设施，老太太从家里拿来米面、油盐酱醋、锅碗瓢盆；一个女青年自学了裁剪想开个裁缝店，但开头没人认她的技术，老太太拿来衣料：‘闺女，俺们不讲究，你就大胆裁吧！’”

一天，居民区里的下岗女工韩寿华两口子来到委里，话未出口，泪已先流。原来这两人到市场上卖白菜，没赚着钱，反赔了老本儿。“大姨呀，你们能给想个办法吗？干啥俺们都乐意。”

铁西区环卫局一位局长住在三委辖区，老太太们一合计，决

定“泡”上他。第一次到局长家，局长说：“现在不缺人，缺人时再联系吧。”几天后，老太太又来了，反复说明了韩寿华家的困难。局长被打动了：“我给你们打听打听。”又过几天，重工街环卫所终于同意安排韩寿华夫妇当临时清扫工，每月工资 300 元。

“社会主义就得人帮人嘛！”三委的老太太说。

有人说，沈阳在目前的条件下进行如此剧烈的结构调整，是一种大胆的冒险。按国际上的常例，7%的失业率即为警戒线，然而在沈阳，30 万工人下岗而没有出现大的不稳定，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再就业工程”是本届沈阳市政府的八大工程之一，在全国也颇有知名度。据市劳动服务公司总经理宋乃义介绍，新办企业必须按其情况招收相应比例的失业或下岗工人，凡愿上摊自谋职业的，优先办照，减免部分税费。1995 年，市劳动局安置失业和停产、半停产企业放长假职工 36189 人。然而被政府系上保险索的，毕竟还是少数。像所有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的城市一样，沈阳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历史上没有这笔资金积累，对于在调整中自救的企业来说，拿钱也非常不易。有统计说，沈阳的失业保险金上缴率为 80% 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沈阳不得不启动了另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减震系统。

我们走访了包括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等在内的各种社会团体和它们的基层组织，作为社会“中间组织”，它们都是这个庞大减震系统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些社会网络上最细微的网点、尤其是上千个街道居委会对沈阳稳定起到了难以想象的重要作用。皇姑区塔湾街道办事处妇联主任刘淑凤给我们讲了两个故事。

1995 年春，街道辖区一位女工和丈夫同时下岗，生活困难。一天，她一觉醒来，越想心里越不顺，于是怀揣枕头来到厂门口

大闹，号称不给开工资就要生二胎。可厂里实在无法解决，担子还是落在了街道的肩上。

街道妇联帮助她在本街市场要了个摊位，让两口子卖鸡蛋，并免收半年管理费。家里有了收入，日子平静了，女工的气也顺了。

此事刚完，街道下属的东风委又报来险情：另一户双下岗的家庭，丈夫想不通，在家用刀子扎了自己十几刀，血流不止，幸亏居委会同志及时送医院，才保住他的性命。从医院出来，老太太们想，要真救命还得帮助他尽快找到谋生之路。于是一拐脚，就来到驻街的帆布厂。

“那时我们不知说了多少好话，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就差给人家跪下了，人家才答应收他做临时清洁工。”

出院后，老太太带着他到厂里报到。一个月后，这个男子汉又找到居委会，一进门就行个大礼，然后掏出一个纸包流着泪说：“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送给居委会，算是报答你们对我的恩情。”

这样的故事，我们在沈阳还听到很多很多，可惜没有也不可能把得到过他们帮助的人像政府部门那样，作个统计。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也正是这条“看不见的战线”拾遗补缺式的“减震”功能，弥补着社会保险系统的重大缺失。面对失业和下岗，沈阳人齐着心，咬着牙，完成着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艰难过渡。

厂长的肩膀

任永德，一米八几的大个儿，倒在沙发上，缩进军大衣里，一下子就没了。

“对不起，早晨有几个工人上访，抱歉，抱歉。”任永德是沈阳拖拉机厂的厂长，他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这天是元月3日。上班第一天就碰上要“债”的。元旦那天，我们冒着寒风走访了几户职工，其中孙长乐就是沈拖的退休职工，他和两个也在沈拖的儿子半年多没领到工资了。

沈阳人曾骄傲地把沈拖称为“大拖”。全国第一台蒸汽拖拉机就是从大拖开出来的，像孙长乐这样的老职工，都亲眼见过周总理视察。

“我先介绍介绍情况吧！”任永德习惯性地往兜里掏了一下，什么也没有。开工第一天，该是厂长最忙的时候，任永德却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大拖从1990年开始，已6年亏损，累计亏3.2亿。我们欠银行贷款3.1亿，欠贷款7.24亿，欠电业局1000万，欠职工统筹1000万，欠职工集资款600万……全厂平均工资只有300元，欠发最多的已达7个月……”

任永德胸中这本账够沉重的。他原是小拖的厂长，1992年调到大拖当工会主席，1995年受命于危难之际，那年他是第三个上任的厂长。前两位一个被免，一个住进了医院。“当时我给局里提出三个500万，技改投资500万，流动资金500万，还职工欠款500万。我跟局里说，不到这个数，谁干谁遭罪。可局里做不了银行的主，一共只给了300万。”

钱没有，人也不准动，6000多名职工，大拖都得拖着。沈阳市规定，企业富余人员，80%必须企业内部消化，10%行业内解决，10%可以推向社会。企业就像一道防洪堤，把富余人员拦在了企业内。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现象：失业者，也就是解除劳动合同者，他们每月可领到119~179元的失业保险金，享受免费再就

业培训。而有幸留在企业内的下岗职工，理论上只享受沈阳市规定的最低生活救济标准 85 元，由于这 85 元由企业支付，所以许多下岗职工往往空手而归。

任永德说：“好几亿欠款，还有那么多富余职工要生活，我就是打着滚也挣不出来！”

“要是让你随便裁人，大拖现在的规模和生产能力，你需要多少人？”

“3000 名吧，得裁多一半。”大拖有个冲压件车间，与台湾合资生产汽车覆盖件，原来有 400 名工人，结果只留下了 180 人，甩出来的退休职工要大拖养着，富余职工在大拖重新分配，现在这个车间的主任的工资是任永德的 3 倍。“要让这么干，我能比台湾人干得好。”

说归说，到底任永德还是一个国有大企业的厂长。工人需要吃饭，社会需要稳定，历史包袱得有人背，现实困难总得有人来克服。

为了过新年，任永德下令卖了库存的最后一批薄板钢材。大拖职工因此得到每人 100 元。

谈话变得凝重起来。“那你们想没想过申请破产？”我们问任永德。

“破产？谁不愿意破产呀！”任永德说，“债务解脱了，职工有了说法，我也就算解脱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破不起，大拖加上退休职工 8000 人，怎么安置？沈阳一年的破产准备金，也就够破一个大拖的。”

沈阳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两次专门召集会议，研究大拖的问题。任永德提出的方案是“大船搁浅，舢舨放生”。也就是说，把十几个车间和后勤部门都变成独立核算的法人，然后把固定资产、债务、机关人员也分下去，全下海，能游的就活了，不能游

的就死。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中央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针。任永德盼望着抓大放小的具体办法尽快出台。也许这个方针落到实处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难题可以迎刃而解。

“试验田”外看“庄稼”

记者“元旦”前来到了沈阳。

年终岁尾，沈阳各单位都在忙着给职工发年货，这是个老传统了。“花钱不在多，重要的是给人一种‘有’的感觉。”市总工会民管部宫部长一边吩咐手下到后勤领鸡蛋，一边对我们说，“可这两年，吃着鸡蛋觉得闹心。”

已经当了几十年处级干部的老宫如今仍住在铁西工业区，每天上下班从工人村经过。他给我们讲了一个颇有趣味的故事：有个在国有大企业干活的小伙子，过去享受的福利极好，过年过节都能从厂里领回一大堆年货，凭着这一点，他娶回了一个漂漂亮亮的妻子。可谁曾想结婚后头一年厂子就停产了。

厂里已放了半年的假，新年临近，单位不发年货了，老婆老挖苦他。这天他揣着一把发票找一个当干部的哥们儿报销了100多元钱，用这些钱买了一筐苹果和几条鱼，兴冲冲地回家。

“开门，开门！”小伙子喊：“俺们单位发苹果了。”这天夜里妻子格外地温柔。

谁料楼上住着的也是本厂工人。听说楼下的发了东西，却不见丈夫拿回家来，老婆便跟自己丈夫打起来了：“你们厂里发东西，你是不是都弄你妈家去了？嗯！”

后来，从楼下赶上来劝架的小伙子不得不把实情招了。

“有个社会学家认为，计划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体制，它还

是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在沈阳最突出的就是企业强大得挤占了许多社会的空间，而工人也习惯了把一切都交给企业安排，这种命运共同体要突然拆开是极其痛苦的。”宫部长建议说：“你们应该到铁西区去看看。那是传统工业文明比较典型的工业区。”

1996年新年刚过，我们就住进了产业工人最集中的铁西区。隆冬的铁西由于众多企业交不起取暖费，供暖公司的供暖很不正常，我们这几个从北京来的人被冻得不断搬家。

铁西号称“东方鲁尔”，现在各类企业933家，其中大中型企业133家，是中国企业布点最密集的地区。我们在铁西往来，一幢幢巨大巍峨的厂房目不暇接，一条条铁路专用线交叉纵横。区内一条建设大道把工业区和生活区分割开来，若干较小的通道又在其间规整分割，横的叫“路”，以阿拉伯数字命名，纵的叫“街”，以“工”字命名，有人说，这里与其说是一个大城区，不如说是个大工厂。研究沈阳城市史的专家张志强和我们站在一座大楼上放眼望去，这里的黄昏，雾蒙蒙一片。他随手一指：“你看，铁西处在沈阳海拔最低的地方。夏天刮西南风，烟尘刮到市区；冬天刮西北风，烟尘还是刮到市区。这都是当年为了铁路运输的方便而犯下的大忌。”

铁西的大型企业和许多生活设施大都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

记者看到的是一幅计划经济体制下粗放加工型的工业文明景象。

1月2日，沈阳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二场雪。我们敲开了工人村一家住户的门。主人姓董，是沈阳重型机器厂退休工人。房间是苏式结构，很高很大，但被木板分割成了4个小间。工人村这样的情形很多，因为往往是一家数口人都在一家企业里工作，企

业提供了从摇篮到墓地的所有服务，于是工人们就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子承父业，生生不息。

沈阳新闻界同行给我们提供了一份资料。资料说，到1987年，沈阳在全国率先进行的改革试验，已有18项之多，其中尤以企业破产试验、企业租赁制试点以及企业股份制试点这“三大试验”闻名全国，因此沈阳素有“中国改革试验田”的美称。然而，走进沈阳，我们还听到另外一种议论。一位政府官员戏言说，“沈阳是出经验不出效益。”有的改革经验往往在本地推广不开，而在南方却收到很好的效果。

“这就是因为沈阳这块大田被计划经济的工业文明板结了，再好的改革秧苗在这里也难以生长。企业破产试验，沈阳搞得最早，但10年只进行了不到40家，且都是中小企业。是沈阳不愿意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大这些经验吗？不是。问题在于沈阳自身难以支付这些改革的昂贵成本，而最大的成本就是要维持社会稳定。”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所所长武斌如是说。

有识之士指出，沈阳改革最艰难的时期到来了。

窗子内的风景

沈阳的冬天很冷，最冷时，摄氏零下20多度。在瑟瑟寒风中，我们看到工人生活区许多住一层的人家临街的小窗子敞开着，里面陈列着食品和小百货。

经济学家说，这是沈阳颇有意味的一景。

元月6日，冒着沈阳今冬第二场小雪，没有任何人引导，我们摸进了一户“窗内人家”。

说“摸”进去，是因为小楼虽然外表华美，楼道里却黑咕隆咚。

这片工人村是 50 年代前苏联设计援建的，俄式三层小洋楼，楼间是绿地、医院、学校、俱乐部、幼儿园，建筑幽雅，布局合理，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代表着计划经济繁荣时期的最高水平和生活理想。房主人叫张玉明，妻子叫王志。他们的窗户上贴满了花哨的雪糕包装纸。

屋子里很零乱，堆满了货。十六七平方米大的地方，摆了一张上下铺铁床。晚上他俩睡下铺，已上初中的儿子睡上铺。挨床摆着一个大衣柜，窗子下放着冰柜，估计是装雪糕的。张玉明家没有桌子，一盘剩菜被胡乱扔在啤酒箱上，是东北人爱吃的酸菜冻豆腐。

“这里可真够挤的。”这成了我们的第一句寒暄，因为我们全坐下，张玉明夫妻就得站着。

“还不都是这个小铺儿闹的。”张玉明夫妇以前是建筑工程公司的工人。前年 4 月，他们见邻居先后做起了小买卖，自己也合计着打开窗口。而这时，他俩已在家呆了半年了。

“怎么样，买卖还好做吧？”

“好啥呀，啥也不好卖，买的人越来越少，卖的人越来越多。”张玉明屋里的货很简单，烟、啤酒、雪糕、卫生纸、卫生巾，全是必需品，此外还有一部电话。“去年夏天，我两天能卖出一箱啤酒，今年一个星期也卖不出去。”不久前，张玉明还试着进了一袋面包，结果只卖了一个，剩下的只好便宜了儿子。

“现在卖菜的，星期六星期日比平时便宜，都想这两天挣点钱呐。”他俩刚下岗时，还没这么多人下岗，也没有这么多人做买卖。“现在你数数，从我这儿出去 100 米，我能给你找出 20 家开窗口的来。”

的确，沈阳窗口的稠密程度，真可以用“鳞次栉比”来形容，张玉明楼后有一家，就楞是从二楼甩下一根电话线，办起了

公用电话。

当初搬这儿来，张玉明夫妇老大不愿意，一层又脏又吵，又不安全。结果，这些倒在关键时候救了他们。

“倒是，比那些摆地摊日晒雨淋的强多了。”王志以前卖过一次云豆，结果站一天下来，只挣了一毛钱。“你看当初咱不干的活，像修车修鞋擦皮鞋，现在尽是咱沈阳市里人。”

“你怎么知道谁是沈阳人？”

“看呗，一看就看出来。咱沈阳人穿的比外地人好，脸皮也比他们白嫩，都是刚干没半年，脸皮还没全变过来呢。”

说起窗外的这些事，张玉明夫妇的牢骚才少些。当初为了进工厂，张玉明的母亲提前办了退休，他才顶了岗。“那会儿，国营和集体的都不一样，别说做小买卖儿。早知道这样，当初死命奔工厂干啥呀。”

“那你们厂现在怎么样了？”

“早不行了。现在咋样我也不知道。”张玉明夫妇已至少两年没去过工厂了，不开工资也不报销药费，还干啥去。听过来过往的同事说，厂子变来变去好几次，现在叫啥名，张玉明夫妇都不知道了。

比起现在的生活，张玉明夫妇宁愿回到过去：“那会儿多踏实呀，老了退休，上班有时有点，回来换身衣服也能串个亲戚啥的。现在虽然多挣点可操心受累的，冬天里，不管早晨多早夜里多晚，人家敲门要打电话，你也得爬起来。现在整天就算困死在这个小屋里了，外边啥事也不知道。”

但毕竟，张玉明没有关了窗子再找份工作，他以前是装卸工，没什么技术，如今40多岁了，找工作谈何容易。出来后沿着这条街，我们又陆续走进了几个窗口，情形大同小异，但有人说出了张玉明没说出的梦——就这附近几幢楼中，原来也有一户

窗内人家，现在发达了，自己开大酒店。

没有人统计过沈阳到底新开了多少这样的窗口，但有准确统计的是，1995年沈阳第三产业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7.6%，这个比重在全国仅低于广州居第二位。第三产业给沈阳提供了40万个就业机会和近一半的财政收入。

这也叫作“逼上梁山”。因为有了企业改制或者不景气，因为有了下岗职工，于是有了被迫打开的窗口。

沈阳市委书记张国光提出了“强化第一产业，优化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决策，沈阳得以从单一的重工业城市向多功能的现代化城市转变，形成现在“三二一”的产业比例关系。

当张玉明式的“窗内人家”正在为自身生计犯愁时，沈阳的学者们却从打开的窗子内外望见了另一番风景。经济学家林木西认为，沈阳第二产业最发达，第二产业最困难，但出路，很可能不在第二产业，而在蓬勃兴起的第三产业。这是与沈阳东北中心城市的功能相匹配的。

两个“30万”

铁西区工人村菜市场边上，有一溜儿擦皮鞋的摊子。说是摊子，其实全部家当只有三大件：一张高凳子客人坐，一张矮凳子自己坐，外加一个工具箱。元月4日这天，天气实在冷得厉害，我们捂着耳朵在摊子间溜达，想寻找一个合适的采访对象。

溜达完20多个擦鞋摊，我们终于和一个30出头的妇女搭上了腔。她皮肤白晰，衣着也较为整洁。上前一打听，果然是本地人。据知，给人擦鞋在沈阳是一件很“硌碜”的事，时有民谚

曰，“宁肯饿死，也不蹲马路牙子”，指的就是此类事。

这位本地擦鞋工姓刘，人家都叫她“刘姐”。她原在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工作，放长假已一年多了。“我是1994年12月开始擦皮鞋的，图的就是这一行不需要啥本钱，也不会亏。”刘的摊上没客，她站在摊边跺着脚和我们唠嗑：“我这人脸皮子厚，没啥抹不开的。有一次我儿子不知在外面听到些什么，回来对我说：‘妈，你能不能不擦皮鞋？’我回答说：‘你妈不擦皮鞋，你能上学吗？’也就没话了。”

话虽说得响当当，但在最初的半个月，刘还是戴上了口罩，看见熟人就赶紧低头。“我要是个姑娘我也不来擦皮鞋，这里的人都认识，以后怎么找对象呀。”刘指指周围的外地人：“不像他们，在这里低头挣钱，完了回家换身干净衣服，谁知道你在外面干的是啥？”这时有客来，刘一边掏鞋擦，一边补充说：“这活儿不错，比在单位强。”

确实，沈阳人的钱好挣，是出了名的。在外地人中流传着一句话：“沈阳钱没腰，捞不着是熊包。”也的确，每年外地人都从沈阳带走几个亿。据沈阳市劳动局劳服公司经理宋乃义介绍，每年到沈阳来挣钱的外地劳动力大约有30万人，而1995年已有下岗职工也是30万，这两个数字正好吻合，颇让人玩味。

宋经理认为，沈阳职工下岗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不要说擦鞋卖菜，就是正规企业里的脏累岗位招工也很难。”实事求是地说，沈阳对外来工的使用是控制得比较严的，但由于招不到本地工，沈阳1996年仍不得不向外地工开放15个行业的236个工种，其中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重体力行业招收外地工最多。

我们在沈阳还听到这样一件事：1995年4月8日，沈阳兴华造纸厂因资不抵债宣布破产。为安置失业的800名职工，铁西区

劳动局等部门第二天就在厂内举行了职工再就业洽谈会，前来招工的有国有、集体、私营和合资企业的 11 家共 30 多个工种。谁知已三四年没正常开支的“兴华人”竟对此没有表示多大热情，报名者只 100 多人，达成协议的不到 50%。

“兴华人”态度鲜明：“我们是国有企业职工，又没犯错误，凭什么要去大集体？”

“你们的工作都是临时的，以后老了怎么办？”

“听说某厂要全盘接收兴华，我们还是等等吧。”

有人总结了流传在失业、下岗职工中的“四不去”：“活儿累的不去，挣钱少的不去，离家远的不去，没保障的不去。”“都是让旧体制给惯的”，一位曾采访过此事的新闻界同行说。

离开擦鞋摊，我们继续对工人村进行家访。第三居委会的主任刘大妈听完来意便说：“你们也甭去别处了，就上俺们家吧！”

主任的老伴孙长乐今年 68 岁，是“一五”期间从山东来支援沈阳的“大工匠”。“我 1954 年进大拖，当时只从苏联进了两台 C62 型车床，我就开一台”，老头说起当年顿时神采奕奕：“1963 年我就评上 7 级工，工资比厂长还高几块。”

“可那活儿也累”，老孙话头一转：“俺们两口都是车工，知道那是咋回事儿，常常是一站七八个小时不下来。所以我的儿女们，都没让他们干这行。反正是大锅饭，能轻松点就轻松点。”老孙有 4 个儿女，现 3 人下岗，均窝在家里。

正说着话，老孙的师弟董振刚来了。老董也是大拖的退休车工，家里 3 个孩子，姑娘和二儿女都被放长假，大儿子光干活不开支。二儿子曾经试着到市场上去卖菜，但因为不会“弄秤”，赚不着钱只好又回家呆着。于是今年 62 岁的老董只好重新出山，在一家私人企业干起了车工活儿，他的报酬成了家里的主要生活来源。

“你的小儿子不也是车工吗？为啥不让他也去揽点活儿？”

“他那两下子，糊弄公家还行，要想让私人老板上眼，哼！”

老董的话让我们想起在中国沈阳劳动力市场上看到的场景：一边是冷冷清清的技术工窗口，数百个技术性工种的需要信息在大幅显示屏上眨巴着渴求的眼睛无人理会；一边是拥挤不堪的熟练工窗口，到这里求职的人自带干粮，在厅里一蹲就是一整天，可就是这样，通常的情形也是无功而返。我们从资料上查到这样一组数字可聊为这一反差作注：沈阳各企业每年仅车、钳、铣、磨四个主要技术工种就缺四五千，可在本市招工、调剂中补充不到20%。劳动部门只好到农村去招工，1993年招农村工500人，1994年增加到2000人。如此反差让我们唏嘘不已。

沈阳不相信眼泪

下岗，意味着被剥离原来充分依赖的那个生存系统，回到新的生活起跑线。这中间因各人的境遇、经历和性格而会有不同程度的心理落差。

贾桂敏是我们遇到的落差最大的一个。40多岁的贾原本是沈阳饭店馅饼部的副经理，由于工作出色曾被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劳模在沈阳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称号，在五六十年代，劳模几乎是一种超人，一个人能干几个人的活，技术也一准是最拔尖的，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由衷的尊敬。这种风气在出过孟泰、王崇伦、尉凤英等劳动模范和典型人物的辽宁，至今依然得以延续。

然而，1992年沈阳饭店大调整，贾桂敏竟被刷了下来。宣布名单那天，她坐在最后一排，但人们的眼光还是锥子一样扎得她抬不起头。回家她蒙着被子痛哭了一夜。第二天单位的姐妹们

纷纷来安慰她，可越是安慰，她的眼泪越多，后来看她的人越来越少，直到绝迹。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么？今后的路该怎样走？”痛定之后她开始扪心自问。

贾毕竟是个女强人，她决定出去见人。不久她承包了一个摊亭，销售些小食品。由于当过劳模，最开始，摊亭前好奇的人很多，这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可后来贾桂敏发现“劳模”是个“质量信得过”的金字招牌。她开始用心地塑造形象。两年多来，过期食品宁肯倒掉也不卖给顾客，摊亭上备有暖水瓶、针线包、打气筒等供顾客使用。如今“劳模摊亭”已在沈阳颇有知名度，从南站路过的人，都能看到一幅醒目的横标：“沈阳市劳动模范贾桂敏竭诚为您服务”。

有人说，下一次岗就是过一回“炼狱”，但炼狱之火能让蜡像溶化却使瓷器精美。

原沈阳市数据转换部职工刘洁，1992年刚结婚不到一年时企业解体，她糊里糊涂就下了岗。虽然家里的环境比较宽松，但她仍然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在她的一再要求下，亲属们给她凑了3万块钱，办起了一所计算机培训班。培训班开始效益不错，但半年后同类的培训滥了起来，她又陷入困境。此时，她怀孕已经6个月了。

守业难以维持，转业又要从头开始，妈妈和丈夫都劝她生下孩子再作打算。可有过一次下岗经历的刘洁想得不一樣：“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它能等我生下孩子再发展吗？”于是在深思熟虑后，她决定改行数据处理业。一次为了揽活儿，她来到北京一家公司，人家一看她那身板就说：“有业务也不会给你，快回家休息吧！”刘洁听了这话并没灰心，当她怀孕7个半月后，再次来到这家公司时，人们都被她的精神感动了。她如愿拿到了合同

书。

活儿有了，但难度太大，只能刘洁自己干。她把计算机搬到家里，一坐就是12个小时，丈夫心痛了：“你用不着这么辛苦，我能养活你。”婆婆打来电话：“电脑前面坐久了，当心生个怪胎！”但这是服务部接来的第一笔活儿，刘洁感到自己没有退路。快分娩了，丈夫陪她进医院，趁丈夫办手续的功夫，刘洁又跑回单位安排了一项被遗忘的工作。第二天，她顺利地产下一个男孩。她在分娩室胆怯地问医生，“孩子正常吗？”医生说，“很正常。”她这颗心才算落了地。

孩子刚满月，北京那批急活儿又出了新问题，刘洁不听劝告再上北京。一次办完业务出来，奶实在胀得厉害，她就走进一个地铁厕所，往池子里挤奶。一个打扫卫生的大娘看见了问：“你那么好的奶为什么不给孩子吃？”一听这话，刘洁的泪水像决了堤似地喷涌而出。

经过努力，如今刘洁的服务部以误差不超过0.05%的技术质量赢得了客户的赞美和信赖，并打开了市场局面。

我们在沈阳采访，也听到一些悲剧故事。我们决定采访一个处境困难的人家。1996年元旦这一天，我们驱车来到铁西区工人村。离马路最近的是第七居委会，在听完我们的要求后，居委会的李主任带我们来到特困户张秀芹家。

张秀芹和丈夫苏立仁先后都从厂里下岗，丈夫是个残疾人，她也患有骨结核。身高不到1.2米的张秀芹，18岁才学会走路，是父亲把她抱着长大的。1995年4月当了几十年工人的父亲病危，临终前一个电话把她召了去。她赶到时，父亲已说不出话，只在一张报纸上写了一句话：“开支了吗？”然后从身上掏出自己的退休证凝视了好一阵，才闭上眼睛。“他是放心不下我，”张秀芹说，“单位效益不好，已经8个月不开支了。”

幸亏街道上了解她的困难，把七委唯一的一张特困证给了她。然而凭这几十元钱生活是很艰难的。于是张秀芹和丈夫倒腾点小买卖，早上他们起得最早，为的是能占到黄金地段。因为怕赔本，每次他们进货量都很小，宁肯多跑些腿。由于人缘好，勤快，夫妻俩的小生意还过得去，“挣俩豆腐钱是够了，这不，过年我还割了一斤肉。”

张秀芹的家极其简单，一床一柜一桌，显著位置放着一个很旧的黑白电视机。当兵的儿子对她说：“妈，等着吧，我会给你买个大彩电的。”

“一个有病的人，有个家，尤其是儿子长大了，还是党员，我特高兴。”张秀芹说。

不知是哪个高人说过，改革就是要给能干者天地，给老实人归宿。

记者手记

沈阳冬天，寒冷的 1995 年

一

1995 年最寒冷的日子，我们是在沈阳的街头度过的。

两个星期以前，我们接到北京的急召电话，电话那头新闻中心副主任卢跃刚大声地说：“快来吧，我们要去啃一块硬骨头！”每次遇到富有挑战性的报道任务，卢跃刚总是像鬣狗闻到了血腥一样兴奋。

进入 90 年代，中国经济加速向市场经济转型，随之产生了大量的职工下岗。《中国青年报》和其他媒体一样，一直关注国企改革震荡，但一直不敢贸然介入。这是个超级敏感的话题，政府至今没有明确说法，稍有不慎，就要闯下大祸。

可这又的确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它涉及到的是千万人的生计，作为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无法熟视无睹。就这样憋着，国

内的媒体却似乎比试着忍耐的功夫，一直对此态度暧昧，闪烁其词；同时，又都睁大了眼睛，等着有人第一个冲上去。

尿憋久了，难免要憋出尿毒症来，更何况这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不然，咱们‘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杀到外地去？”我的这个提议立刻在编辑部获得认同。

“好想法，面上不好把握，先攻点。”副总编周志春点了头。这问题，他也一直在寻找突破口。“离开北京做新闻，许多问题就简单多了。北京是首都，不能有一点闪失，许多事情的成败，往往不在于动机，而在于策略。”周志春向以富于“斗争经验”在报社著称，他有著名的“鸡叫论”：公鸡啼明，大方向不错，但叫早了，就妨碍了人们的休息，其命运就只能是杀掉。关键在“度”。

接下来的问题是，选择哪个城市作为载体？我最初的提议是本溪或者鞍山，那些都是资源性城市，而且规模比较小，好把握。

“沈阳吧，沈阳好！”新闻中心副主任卢跃刚对沈阳情有独钟：“沈阳是苏联体制最大的受惠者，也是它最大的受害者。那里的跌宕一定很强烈。解剖好了转型期的沈阳，就解剖好了转型期的中国。”

“我们的主旨应当有两个原则，一个是推进改革，一个是人道主义。有些时候，这二者是相互冲突的。写出这种冲突，无论悲剧也好，喜剧也好，都会富有趣味。在沈阳这样的地方，冲突可能会更激烈，你们也可能会找到更精彩的载体。”报社的另一个“大腕”级人物张建伟也深表赞同。

这时，中青报驻辽宁记者迟洪江报来了沈阳机床集团计划减员三分之二的线索，考虑到报道问题的重大性和难度，报社选择了具有丰富经验和理论功底的毛浩作为小组领队，三人小组开赴

沈阳。

二

关外的冬天的确冷，一场寒流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沈阳的气温骤然降到零下 20 度。我们住到沈阳主要的工业区铁西不久，都病了。下榻的铁西宾馆本以为是这里最好的，不料由于收不齐取暖费，铁西区的暖气供应很不正常，宾馆白天没有暖气，晚上的暖气也弱如悬丝，我们把能加上的衣服都加上了也不顶用。

比冬天还要寒冷的，是沈阳的经济。号称计划经济最后堡垒的辽宁沈阳，经济的凋敝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昔日辽老大的影子荡然无存。曾经壅堵异常的著名的北二路，聚集了沈阳好几个万人大厂，过去为了解决交通问题，政府需要协调各厂的上下班时间，如今空空荡荡；远远望去，空旷的厂房一片沉寂，只有寂寞的钢轨和高大的厂房，证明以前这里曾经生机勃勃；“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工人新村，一派破败和荒凉，工人们自称“度假村”，因为没有工作大家都待在家里“度假”。

这就是 1995 年末 1996 年初的沈阳。这段时间正是圣诞和新年两节期间，应该最是商业繁荣的时候，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张张为生计奔忙得愁眉不展的人脸。

“最想的是上岗，最怕的是离厂，最倒霉的是老三届，最担心的是物价涨。”在开业不久的中国沈阳劳动力市场，下岗女工刘金芬给我们念了这句顺口溜。她 1993 年从沈阳油脂厂后勤科下岗，3 年来，她卖过菜、带过孩子，但总也干不长。刘金芬怨自己一辈子都没赶上好时候，“我们是该上学的时候下了乡，该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回城以后没人要，刚刚工作就下岗，你说我们冤不冤呀！”

这是我们在沈阳最初也是最深切的体会。元旦那天下大雪，我们徜徉在工人村，没有任何引导，我们是随意敲开每一个窗门。工人们是朴实的，虽说抱怨，世道不好领导无能有人贪污，但看我们冒雪造访的份上，许多人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跟我们唠家常，让我们备感温暖。这是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记者，第一次接触城市底层生活。透过这些蜷缩在没有暖气冰冷房子里的老工人们，看着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操起他们不熟悉的小买卖，不得不拉下脸来跟以前他们看不起的“乡下人”一起从事擦皮鞋修自行车的活计，我们心中不免油然升起同情。

三

我们的采访显然不受欢迎。中国的政府机构是一个封闭性很强的体系，只要是在它的运行轨迹内，它的工作是有力而且有效的。宣传报道也是这样，凡是纳入其计划，就有接口的部门和人员，你的几乎所有要求都能得到满足，要吃住有吃住，要车辆有车辆，要材料有材料，下去采访也是事前为你联系好，一环扣一环。可这次我们是在政府运作的体系外，它不是被安排的，而且这次采访毕竟有揭人家的伤疤的嫌疑，要求得理解得下许多功夫。因此索性来了个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

不曾想，这种“自由主义”的暗访竟半路卡了壳。首先的问题就是沈阳的下岗职工究竟有多少？如果只从官方的统计数字看，中国的就业形势真是阳光灿烂。1994年全国的失业率仅为2.9%，沈阳比全国更少，为2.86%。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活生生的下岗职工又都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到达沈阳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在“衙门”间奔走，想解开这个谜。那时候下岗还是一个政府部门讳莫如深的话题。我们先

到了劳动部门，那里拿不出数字，因为劳务合同签订情况没有异常；再到工会，工会的同志也不掌握情况，因为他们不掌管人事；我们后来甚至找了几个居委会，可局部的情况能不能以此类推，老太太们不敢保证。最后当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沈阳劳动服务公司——这个在外行看起来与下岗问题毫不沾边的单位却统计了我们所要的数据，据它统计，截止到1995年11月末，全市被剥离、放长假一年以上的工人数约有30万人。这个数字是全市职工总数的12.5%！

后来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他的一份报告里披露：1994年，除了官方公布的467.4万失业人口外，还有“在职失业”人口2600万，这样中国的失业率将是14.9%。如果这个事实成立，那么中国的失业率便居世界之首，远远超过了社会安全线！

四

病症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1994年中，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视察沈阳，提笔开出了一个处方：兼并破产，减人增效。按说处方也有了，但生活中需要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事。这里边，是非、道理、政策，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从个人说，那些下岗的人，都是没有体力没有技能没有文化的人，许多人还调皮捣蛋，计划体制下的铁饭碗养成了他们的惰性，如果不把这些人的腿踢出去，别的人也会比着不干活，企业无法取得效率。而且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反思的地方，毕竟有些人，在动乱年代，在别人蹉跎岁月荒废青春的时候，发愤学习，甚至偷着学习，恢复高考后他们脱颖而出，这个年代正是他们在各个岗位发挥作用大展宏图的时候。

但是，没有人能够要求大家都成为圣人，对于50年代出生

的一代人，应该说，社会的不公平是主要的方面，就像前边那位女工的顺口溜里说的那样，他们被命运之舟载负顺水漂流，他们错过了最好的年华，而他们今天付出的代价，其实是替这个国家那个社会付出的。在转型期社会，机遇对于每个人是无法公平的，为了效率有时会丧失公平。按说厂子破产了，跟工人们有什么关系？厂子都是国家的嘛。我们采访过一个老劳模，他一辈子勤勤恳恳，退休以后，厂子黄了，家里要动迁，没有钱，他豁出老面子跟厂子开口借，被拒绝，越来越想不通的老人最后吊死在厂门口。命运让他们承担了太多的东西，巨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告诉他们这是为什么？

对于一个城市也是一样，沈阳有沈阳的难处。为了弄清沈阳的历史，我们找到了《沈阳城市史》的作者、辽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张志强。他说，“沈阳的工业史充满了悲壮色彩。最早的四条铁路，第一条是沙俄人的，第二、第三条是日本人的，第四条是英国人的。都是军事占领，都是为了掠夺。这可能就是沈阳及辽中城市群的原罪，沈阳今天的痛苦从那时就已种下了。”

沈阳的周边城市都是从事工矿业、基础工业的。鞍山、本溪靠铁，阜新、抚顺靠煤，基本都是一个类型，都是单一产业城市，而且都是基础产业城市。五六十年代，国家从这里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但是由于中国底子薄，又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因此不得不沿用了旧有的工业基础和格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完成的时候，这些城市就好像自己还没长大的姑娘早早地做起了母亲，开始用发育未熟的乳房给内地挤供乳汁了。

沈阳也有“大工厂”的称谓。张志强带我们到窗前，随手一指：“你看，铁西工业区处在沈阳海拔最低的地方，夏天刮西南风，烟尘刮到市区，冬天刮西北风，烟尘还是刮到市区。这都是为了就近铁路运输方便，而犯下的大忌。”那个时候，一列列满

载着钢铁、煤炭和机床的火车，穿过山海关，奔赴祖国各地，而进关的火车车箱常是空空荡荡的。同时沈阳火车站也不知欢送了多少批懂技术有经验的好儿女，他们几乎遍布祖国大江南北，许多至今留在那里，成家立业了。据一项较早的统计，沈阳市近30年向全国输送了近40万中高级人才，提供机床20多万台、变压器两亿多千伏安、冶金设备60多万吨；建国以来它上交的利税达260多亿元，是国家投资的3倍。

30年过去，沈阳留下了50万退休工人和数目巨大的富余人员，却没有留下相应的积累。养老基金没有，失业保险基金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没有，这一切都换成了钢厂、铁路和油田，换成了我国初具规模的现代工业体系。下岗人员的基本年龄在40岁左右，市妇联的一项调查也表明，下岗女工中，40至45岁年龄段的占了下岗总人数的71.5%。

我国知名劳动问题专家冯南瑞先生也算了一笔账，在中国城镇国有单位1.09亿职工中，至少有富余人员2000-3000万，占职工总数的10-20%，若以人均年工资2000元计算，一年要侵蚀400至600个亿。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体制成本。

五

一个城市的兴衰，是整体性的。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感到，沈阳的痛苦在于它承载了某种中国的宿命。而下岗问题只是我们最先感觉到的表象而已，就像寒流袭来，我们最先感到冷一样。

也是在这一年，辽宁足球队从甲A降到了甲B，这一变化颇具象征性。辽宁足球队是旧时代的英雄，曾连续10年夺得全国足球联赛冠军，然而开展职业联赛（我们把它看作市场经济的）

第三年，辽宁足球被赶出了甲A，而风暴的中心就在沈阳。数万球迷为足球城的荣誉拼死呐喊，万众一心誓死保卫沈阳，市里仅有的几家效益尚好的企业大花血本，开出了本年度全国甲A一场获胜的最高奖金额60万元。然而，球还是只管往辽宁的球门里飞。最后的黑色6分钟，太阳神连进两球，把辽宁队送入了地狱。赛后，辽宁籍的太阳神主教练张京天老泪纵横：“辽宁队不该是这个结局的！”

下岗还带来另一种复兴。沈阳古有“行”、“市”之分，都是商业活动中心。到辛亥革命前后，南市北市被确立为商阜地，同时也随之兴起了众多的烟花巷。解放后，老建筑已被拆得差不多了，近年却重新冒出了不少卡拉OK厅、娱乐城和洗头房。接受采访的官员都小心地回避着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的报道也没有勇气走入这个“禁区”，但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比这些还可怕的，是信仰的丧失。我们查不到沈阳信教者增加的数字，但是从礼拜堂里渐多起来的年轻面孔看，速度不会慢。在沈阳市委大楼的对面，一座式样别致的建筑拔地而起，那是一个颇具规模的神学院。在采访中，我们随时随地听到人们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腐败成了最主要的话题，被指责的对象从车间主任到厂长到局长到市长，没有人仍然被普通百姓信任，偶尔有些被留恋的，也是许多年前的人和事。

老实讲，在沈阳前后长达两个多月的采访，我们也没有找到办法，也没有找到方向。一切都是凝固在那里的历史遗存，根深蒂固冰冻三尺。

但是不能因为困难，就停止改革。而且当时沈阳的实际情况是，不改革，仍然是死路一条。下岗分流减人增效，是在没有路的地方，开出一条路来。

六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生活中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在没有出路的地方，往往孕育着希望。采访中也是这样，为了拿到第一手的材料，我们必须“进入”，尽可能地在当事人方面考虑问题。而一旦采访完成，我们还必须“跳”出来考虑问题。

一位报社的老记者在我进入新闻行当的时候教育我：“搞报道，要真实、全面、积极、富有建设性。”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当时社会上弥漫着的，是对改革的痛苦、迷惑、不理解、甚至愤怒的情绪，完全把它照搬出来，倒是真实了，于事无补反而添乱，因为下岗也罢破产也罢，都是分娩前阵痛的过程，我们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更多地不是跟着痛苦者一起痛苦，还要站得高一点，给他们指出希望。

把思考问题的角度这么一调整，对许多同样的事物就会有全新的认识。比如在工人村，许多工人为了谋生，从自家楼上窗户上甩出一根电线，下边放个“倒骑驴”放台电话就开起了公用电话业务；那些住一层的人家，几乎都打开窗户，夏货回来开小买卖；更多的人在工人村摆起了小摊，比起在工厂没活干或者出工不出力，这种自食其力对他们和社会，都是一种进步。我们报道中写到的那对残疾人夫妇，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一对，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勇气和力量。我们还幸运地找到了当初第一个破产企业的厂长石永阶，他的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走出去是一片蓝天，今天的下岗也许会让一些人成就一份事业呢！这篇报道后来获得了中国新闻奖。还有我们写到的那些普通的街道老大妈，她们凭着自己朴素的情感主动帮助下岗工人们，成为这个社会不可

多得的减震阀。最后，我们写到了五爱市场，这是沈阳一道特殊的风景。沈阳被称为计划经济的堡垒，沈阳过去实际就是一个大车间，从事生产加工，而这里偏偏孕育出了市场经济的怪胎，形成了覆盖全东三省的大集市，我们把这一篇放在最后，是相信新生力量强大的未来。

这组稿子发表后，在沈阳和全国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而且政治上把握比较“准确到位”，没有任何麻烦。我们在同行中赢得一片赞扬，大家纷纷趁热打铁，下岗问题报道的沉默局面被打破。也正是舆论负责、富有建设性的报道，促使国家各级政府更加正视这一社会问题，拿出了许多切实的措施，帮助下岗职工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沈阳市委市政府事隔半年，盛情邀请我们二下沈阳，进行追踪报道。

除了这组稿子中的《一哭一笑十年间》获得中国新闻奖三等奖外，我和毛浩还在这次采访的基础上，完成了报告文学《自救年代》，发表于《青年文学》1999年第四期。

时间：1995 年 7 月 31 日至 12 月 20 日

作者：张双武

假种子事件调查

张双武：不受欢迎的采访

假种子事件调查

汗珠子摔八瓣的农民兄弟最容易满足。他们只求风调雨顺，连年有个好收成。收成不好，农民们更多地是怪自己不够勤快，很少想到去埋怨别人。

但这一次，广西邕宁县的 2600 多户农民愤怒了。面对 7000 多亩良田颗粒无收的惨状，老实巴交的家民跺脚骂娘。今年春上，他们种下县种子公司从浙江购回的所谓“汕优 63”水稻杂交种，辛辛苦苦耕耘半年，至今没有一分田扬花抽穗，绿森森的禾秆直挺挺的怪吓人。

7 月 22 日，记者来到了邕宁。

农民们被坑苦了

太阳贼毒。天气预报说今天邕宁的最高气温 36℃。

倒了三次车。从南宁到蒲庙，从蒲庙到大沙田，又从大沙田到那马镇，我七弯八拐地走进一个叫东平坡的小村庄。

农民们围着我，七嘴八舌，有的跺脚，有的骂娘。

这是一个有 140 多农户、600 多人口的自然村落。今年春节后，全村家家户户都买了县种子分公司从浙江购回的所谓“汕优 63”杂交稻种。多的种了 10 亩，少的也种二三亩，如今绝收已成定局。那些用全部责任田种下此稻种的农户，眼下几近断炊。

在吵吵闹闹的外围，有一个农民自顾自地闷头抽烟，偶尔用眼角的余光看我。村委会黄副主任说，他叫龚庭侃，51 岁。

我来到了老龚的家。

一进门，只见屋檐下直挺挺地堆放着几大捆绿森森的禾秆。“割了喂牛。”老龚说。“牛都不吃。太硬，简直像芦苇。”老龚的大哥补充道。

“今年春上，我买了 10 公斤稻种。27 元钱一公斤，插播了 6 亩责任田。上半年，光化肥我就每亩田施了 80 多公斤，打了 3 次农药，总共投入 700 多元，眼下颗粒无收。”说着说着，50 多岁的汉子抹起了眼泪。

据了解：老龚家有 9 口人，老母亲今年 80 多岁了。5 个孩子，4 个正上学读书。9 月份开学，4 个孩子共需学杂费 2000 多元。老龚直搓手。

“我们农民连年只盼个好收成。收成不好，城里的人不也没口粮吗？为啥要用假种子坑我们呢？”老龚想不通。

想不通的还有那僚坡的农民李永英。李也买了 10 公斤所谓

“汕优 63”，种了 10 亩责任田。如今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每年都是种浙江‘汕优 63’。往年的种子十几块钱一公斤，今年要 27 块。这品种产量高，贵就贵点吧。”李永英边说边撩起衣襟揩眼泪。“育秧的时候，芽发得很好，一蔸秧苗可以分成几小瓣。10 公斤稻种，我插了 10 亩地，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围成一桌，都说今年肯定是个好年成。没想到……”

喝着李永英泡的苦茶，我一句安慰的话也找不到。

在回村委会的路上，农民黄卫邦拦住了我，要我记下他的一段话。

黄卫邦说：“我的 5 亩责任田全部种上了假‘汕优’，一粒谷子也没收到。坑农害农的人，决不能让他有好下场。我们相信政府会有一个让人满意的说法，只是能不能处理得快一点。季节不等人，铲了早稻抢插晚稻，我们仍然是听县里的统一部署。我们已经相当克制了……”

据悉，广西邕宁县是我国商品粮基地县之一。这次县种子分公司从浙江购进的所谓“汕优 63”杂交水稻种，分别在该县的那马、南晓、蒲庙、中和、那楼等乡镇种植，共计 7179 亩，按每亩平均 400 公斤产量计算，该县今年夏粮失收大约 280 万公斤，价值约 560 万元。全县受害农户 2600 多户、12600 多人。

这是谁造的孽

农民龚庭侃、李永英等的早稻种是从镇农技推广站购买的。镇农技推广站是按合同为县种子分公司代销。县种子分公司是县农业局下属的一个事业编制企业管理单位。7 月 24 日下午，我采访了县农业局副局长黄慧厚。

黄副局长说：“6 月 24 日，那马镇农技推广站的覃宝凤同志

分别向那马镇政府、县农委、县种子子公司写了一份书面汇报，反映今年部分乡镇早稻不抽穗的情况。26日，县种子子公司经理梁祺康等4人赴那马、南晓等乡镇调查了解，证实覃所汇报的情况属实。随后，经自治区农科院等单位的专家鉴定，问题出在种子上。”

“这批种子是从哪里来的？”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先要交待两个背景。”黄副局长说：“第一：1994年7月中下旬，邕宁县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特大洪涝灾害，水稻制种田受到了严重毁坏，收获的早稻种不足15万公斤，而全县需要杂交种35万公斤以上，缺口比较大。第二：邕宁的农民比较喜欢种植‘汕优63’杂交水稻，但在邕宁本地制种，产量不高。为了夺取今年的夏粮丰收，县委、县政府决定从外地调种。”

“调种的经过？”

黄副局长说：“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由县农业局、农委、种子子公司的6位同志，分别赴浙江、福建、四川、湖南等地外调杂交种，先后调进种子10多万公斤。

“不抽穗的这批种子是从哪里、由什么人调进的？”

“这批种子是由县种子子公司的经理梁祺康和技术干部黄任川从浙江调进的。”

“具体经过如何？”

“先声明一句，”黄副局长说，“因为我没有直接参与调种，以下所谈经过的依据是：一、梁祺康经理的汇报；二、浙江方面的有关信件和电报；三、我个人根据购销合同的分析。

“元月13日，梁祺康经理和技术干部黄任川，第一次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种子子公司，调进‘汕优63’早稻杂交种14190公斤。这一批种子是真种子。调回邕宁后，各方面反映，种子太

少，满足不了农户的需要。于是，元月下旬，梁、黄二赴浙江。浙江方面称，仓库里已经没有种子了。梁便委托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种子公司的施××帮助找种子。施到湖南省汝城县三江口特区郊区种子分公司，通过何××找到了种子。但种子不是梁所要的‘汕优63’，而是‘Ⅱ优63’。在浙江的梁经理打电话回广西，请教自治区种子分公司总农艺师陆昆大，陆回答，‘Ⅱ优63’产量也不低，米质也好，如果是真的，可以进。元月23日，施说，这批种子不在湖南，而在江西省宜春市种子公司的仓库里。梁即赶往宜春。24日，在江西宜春宾馆，湖南方面与江西方面签合同，每公斤21元；浙江方面与湖南方面签合同，每公斤24元；广西方面（梁）与浙江方面（施）签合同，每公斤29元，合同数为170000公斤，合同上种子品种为‘汕优63’。

“元月26日，10768.5公斤合同上的‘汕优63’，实际为‘Ⅱ优63’的杂交稻种运抵邕宁。因为‘Ⅱ优63’在邕宁县只是少量种植过，没有供种基础，农民不接受。为了避免在销售种子过程中的阻力，县种子分公司抽出了‘Ⅱ优63’的内外标签，然后交给各乡镇农技推广站以‘汕优63’的名义代销。代销数目如下：那马镇5200公斤，蒲庙镇975公斤，那楼乡975公斤南晓乡975公斤，中和乡650公斤，另外县种子分公司的两个门市部留有1986公斤，总共10761公斤。

7月13、14日，自治区种子总站组织广西农业大学、广西农科院等单位的专家、教授，赴邕宁进行田间鉴定。经抽查10个点、面积27亩进行剥查和镜检，均未发现幼穗分化。从而证实这批稻种既不是早稻杂交组合“汕优63”，也不是“Ⅱ优63”，而是具有强感光性的晚稻杂交组合。据浙江方面日前的复函说，元月份调整给邕宁的稻种是晚稻杂交组合“Ⅱ优3550”。结果与专家们的鉴定一致。此晚稻组合在广西邕宁作早稻种植当然是不

能抽穗的。

7月16日，一纸通知贴在了邕宁县有关乡镇农技推广站的墙上。通知说：“昨天接县政府通知，凡在早造种植浙江‘汕优63’不抽穗的农户，从现在起，可以割禾翻犁，备耕晚造。”

割禾翻犁，意思是叫农民亲手铲掉自己辛苦了半年的劳动成果。

李永英哭了。

农民黄国军干脆狠心地把两头牛直接赶进了稻田。

种子专家如是说

7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种子总公司总农艺师陆昆大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陆昆大说：“通过我们的检测和鉴定，今年元月24日由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种子分公司调给广西邕宁县种子分公司的10768.5公斤种子，既不是早稻杂交组合的‘汕优63’，也不是‘Ⅱ优63’，而是具有强感光性晚稻杂交组合‘Ⅱ优3550’。‘Ⅱ优3550’这个品种在我国只能作为晚稻种植在北纬23度以南的地区。也就是说，该品种在广西邕宁作早稻种植肯定是不能抽穗的。”

“这是一起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的坑农害农事件。《条例》第五章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经营的种子质量应当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的种子质量标准，并附有种子检验、检疫合格证书。经营种子严禁掺杂使假、以次充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供种方有责任和义务向需种方如实说明所供种子的品种；二、供种方有责任和义务向需种方如实说明所供种子的适宜种植范围。在这起坑农事件中，供种方不仅没有做到以上两点，而且隐瞒了事实。那么，这次所谓的‘汕优63’种子从湖

南炒到江西，从江西炒到浙江，又从浙江炒到广西，这中间是谁隐瞒了事实？

“另外，《条例》还规定：种子调拨出县（市）的，经调进地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合格后，方可种植。检验的方法有两种：一、在室内检验种子质量，包括检验含水量、净度和发芽率；二、大田鉴定。限于我国的种子检验手段和水平，目前在室内还无法完全准确地检测出杂交水稻的品种，只能检测一些常规稻种。也就是说，对杂交稻种的检测，目前只能采取第二种方法，即通过大田鉴定。鉴定的标准是，稻谷的纯度必须在 96% 以上，否则，按有关协定，纯度每下降 1%，需赔偿常规稻谷 4 公斤。今年元月 24 日广西邕宁从浙江调进的所谓‘汕优 63’，其大田鉴定的纯度结果为 -100%，即颗粒无收。”

县委县府紧急行动

坑农害农的事件发生后，邕宁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县委副书记张国环说：“农民遭受巨大损失，我们非常痛心。县委、县政府一致认为，目前解决好农民吃饭和晚稻生产是首位问题。”

6 月 27 日，县委、县政府办公室联合发出通知，成立查处“假冒种子”案件领导小组，同时采取了四项措施：对受害农户每亩提供 1.5 公斤晚稻杂优种，暂不收款；组织干部特别是技术干部，深入各受害村镇，协助农民扩大晚稻种植面积，弥补早稻损失；妥善安排受害农民的生活，解决吃饭问题。由县种子分公司出钱，县粮食部门拿出储备粮 37.5 万公斤，按早稻种植受损面积每亩 100 公斤计算，作为补偿的一部分，发放给受害农民，以保证在晚稻收割前三四个月的吃饭问题。另外，对种植面积特别多、损失特别重、经济困难的农户，从民政救济粮中拨出一部分

给予救济；通过宣传和思想工作，稳定受害农户情绪。同时通过法律手段，责成供种方赔偿。目前，“重灾区”那马镇的受损农户名单、经济损失统计表以及诉讼材料，已清查、整理完毕。现全镇已向农户发放晚稻种 6500 公斤，县农技干部 10 余人已陆续下到该镇各村屯，具体指导农民晚稻生产。

邕宁县属南宁市管辖。7 月 23 日，南宁市市长宋福民、市委副书记李先明等深入邕宁调查研究。宋福明等深入邕宁调查研究。宋福明强调，假稻种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我们要高度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真把事件处理好。县委、县政府要进一步组织力量，把假稻种案调查清楚，追回损失，从快公开处理。宋市长决定，市财政拿出 50 万元，帮助邕宁县解决受损农户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日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委托邕宁县法院受理此案。对判决结果，受害农民正拭目以待。

假种子是怎样流入农田的

假种子致使广西邕宁县、安徽岳西县等地数万亩良田绝收的事件，经新闻媒介曝光后，在湖南汝城县引起了强烈反响。

9 月 12 日，为了查清假种子的来龙去脉，记者出广西，入湖南，追根究源。

9 月 14 日，汝城县公安局范局长拿着记者出示的一份种子购销合同，肯定地说：“这份合同是假的。”范局长说，“湖南省三江口特区郊区种子公司的图章是私刻的，‘没有在公安局备案，而县三江口经济特区根本没有什么郊区，合同上的郊区农行及其账号也是假的。”

据记者在汝城县的调查，“三江口农林牧种源公司”的由来，

假种子的来源和销售过程是这样的：

1992年，湖南省体改委批准汝城县在与广东仁化县交界的一个边界村三江口设立了“湖南省三江口边境经济特区”，鼓励各种经济成分单位及个人到这里投资，对有些企业的认定和组建，采取了变通的办法。

1993年8月，汝城县大坪乡上祝村农民祝和孝、祝本才和官路村农民黄分浩商定成立一个公司，经营杂交水稻种子，三江口特区管委会经济发展部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8月20日公司成立。大江口特区工商分局为其办理了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人代表祝和孝。

8月31日，经祝申请，县农业局种子管理站为其办理了《种子经营许可证》。1994年5月6日，又为其办理了《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

1994年，该公司在营业执照年检时，没有遵循三江口特区经济发展部的有关规定，没有在三江口从事经营活动，也未交纳管理费。因而，经济发展部未将其列入管理范围，“在江口农林牧利源公司”从此成为无主管部门的企业。

1994年10月至1995年1月，祝和孝等人先后5次从江西省宜春市湖田乡购进种子65870公斤，其中“汕优3550”和“协优3550”两个品种63155公斤。种子调进后，存放在汝城县三星粮站19号仓库。

1月3日，祝和教、祝本才和朱俭斌将汕优3550和协优3550标签改换为汕优63和协优63标签，以每公斤27元的价格销给岳西等地，祝持江西植保植检站的《植物检疫申请书》到汝城县农业局植检站办理转让手续，该站为其转办了产地检疫证书。祝等人又租用带有警灯但没有公安牌照的民用车护送出汝城边境。

按照有关规定，销往外省的种子要到种子管理部门办理《种

子质量合格证》和《种子外销准运证》。但祝等人往安徽岳西等地销种子时，自己印制并填写了由江西宜春湖田农技站加公章的、与湖南省格式不同的空白《种子质量合格证》。据朱成新（在逃）立案前反映，种子销售时，每斤提留了0.5—1.5元的信息费和回扣，由朱与安徽方三县购种人员分配。1994年12月，安徽肥东县种子分公司购种人员返回时，由祝出资6000元，绕张家界等地旅游。

1995年8月5日，汝城农民祝和孝、何学文被福建省宁化县公安局逮捕归案，现关押在宁化县看守所。原因是祝等人于1995年1月23日和2月16日，又将1万余公斤已换标签的假种子分两批卖给了福建省宁化县种子分公司，造成宁化县部分早稻失收。

假种子坑农害农的事件发生后，引起了汝城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

8月23日至9月2日，汝城县召开了7次紧急会议，专门研究假种子事件的查处工作。县政府印发了《关于三江口农林牧种源公司向外地销售杂交稻种造成大面积中稻失收情况的通报》，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吸取教训，并全力支持案件的查处侦破工作。

8月23日，该县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查访了三江口特区管委会、大坪乡政府等单位，掌握了案犯的部分犯罪事实。

8月23日，专案组收审了同案犯黄分浩、包显荣、朱俭斌和祝本才，查封、扣押了案犯的财产，冻结了其银行账户，并派员前往福建省宁化县提审首犯祝和孝。

据悉，假种子事件给汝城县的声誉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事实上汝城自制的杂交稻种从未出过质量问题。

汝城县表示，配合省、市调查组对涉及此案的有关单位及个人进行调查，分清责任，从严从快，查清一个处理一个。9月15日，在汝城开往衡阳的班车上，记者看到，农民们搬上搬下的都是成袋的稻种。一位40来岁的农民田社怀与记者聊起了假稻种事件。田社怀说：“我是汝城县井城乡的农民，制种杂交稻种已有13年。去年种35亩，收稻种1000多公斤，获利2万多元。今年种了3亩，因为母本不好，只收了400多公斤。出了假稻种的事后，400多公斤稻种一颗也没有出去。”田社怀今天搭乘班车的目的，是将这400多公斤稻种送往远在300多公里外的祁东县岳父家。

在农民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记者听明白了假稻种事件给汝城农民造成的危害：在汝城县的22个乡镇中，有5个乡的农民10多年来主要依靠制种摆脱贫困，其中大坪乡、井坡乡等地的农民家家户户都有制种地，有的制种地在20亩以上。多年来，由于汝城县地处湘南山区，气候适宜，杂交稻种的产量和质量都很高，销路从来不成问题。尤其是1994年，每公斤稻种卖到30元以上，乐得农民们今年又大制特制杂交稻种。

笑容写在脸上还来不及收回去，没曾想出了个假稻种事件。丰收了的汝城农民眼瞅着黄澄澄的稻种因信誉受损销不出去，急得忙着走亲访友，求岳父、舅舅、姑姑等“都分担一点”，象征性地每公斤收个十几元的成本费。即使这样，据记者了解，目前汝城县还有上百万公斤稻种积压在农民手里。

外地的假稻种坑苦了广西、安徽和福建的农民，也坑苦了汝城人。农民田社怀等说，对那些制造和销售假稻种的人“枪毙了也不解恨，要让他们赔偿我们的损失”。

汝城县委、县政府已决心追究与案件有关人员的责任。

是谁制造的假稻种？根据有关线索，记者近日赴江西宜春继

续调查。

假种子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经过广西、湖南、江西、浙江、安徽和福建等省（区）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努力，截至9月19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特大种子事件，其来龙去脉基本清晰。

1994年10月至1995年1月，江西省宜春市湖田农技站，分5次卖给湖南省汝城县三江口农林牧种源公司杂交水稻种66060公斤；1994年12月1日至1995年1月17日，三江口农林牧种源公司，分4次卖给安徽省岳西县等地种子公司51100公斤，1995年1月23日和2月16日，三江口农林牧种源公司，分2次卖给福建省宁化县种子公司1万余公斤，1995年1月23日，三江口种子公司卖给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种子公司经营部10790公斤；同日，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种子公司经营部卖给广西邕宁县种子公司杂交水稻种17000公斤。

整个事件的关键是：原产于江西宜春的水稻杂交种3550系列，是如何被假冒和制造成63系列，从而导致了这次特大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是谁在玩“狸猫”换“太子”的游戏，导演了一场调包戏？

9月18日，据记者在江西宜春的调查，这批种子的制种情况是这样的：1993年11月22日，宜春市种子公司经营部与广东茂名市种子公司，签订了代制3550系列杂交水稻种的合同，数量20万公斤，价格每公斤5元左右。收获种子时，因3550系列在宜春适应性差，产量偏低，承担制种的湖田乡农技站和制种农户要求提高收购价格，茂名方面表示不能接受。

经宜春地区种子公司袁新洪介绍，宜春市湖田乡农技站副站

长胡梅来，与湖南省三江口农林牧种源公司经理祝和孝、朱成新等接上头。祝、朱表示，我们公司计划收购这批种子，价格面议。

1994年10月31日，祝以每公斤12元的价格从湖田乡农技站收购汕优3550系列杂交水稻种16510公斤，其中江西省植保站开具了15000公斤种子的《植物检疫证书》。

11月10日，祝等人又以每公斤12元的价格收购汕优3550系列杂交水稻种15000公斤。

11月13日、12月21日和1995年1月17日，祝等人又3次收购成交，数量共29235公斤，品种均为3550系列。

1995年9月7日，据宜春地区种子公司袁新洪回忆，祝等人到宜春收购种子时，袁曾对祝说：“‘汕优3550’的生育期跟‘汕优63’差不多，但属感光品种，在江西不能种，在你们湖南也不能种。”祝回答：“这个情况我知道。”后在胡梅来的家里，袁又重复说了一遍，并举例说1994年江西萍乡和浙江金华因栽种这个品种，导致绝收的事实。

3550系列种子调回汝城县后，1994年12月1日，祝和孝、朱俭斌等以每公斤21元的价格卖给安徽省宿松县种子公司18000公斤。

1995年1月3日，祝和孝、祝本才和朱俭斌事先将3550标签改换成63标签，以每公斤27元的价格卖给岳西县种子公司7380公斤。

1月23日，何学文以每公斤24元的价格卖给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种子公司经营部“水稻晚杂”10790公斤，品种为“Ⅱ优63”。

同日，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种子公司经营部以每公斤29元的价格卖给广西邕宁县种子公司“水稻种子”17000公斤，品种

为“汕优63”。

1月23日和2月16日，祝和孝等人又将1万余公斤“已换标签”的种子分两批卖给福建省宁化县种子公司。祝本人因此8月5日被宁化县公安局诱捕归案。

至此，这起波及全国6个省（区）的特大假种子事件，其主要过程已基本清楚。有关县、市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有关检察机关也表示将尽快开庭审理。对审判结果，广大读者和被坑害的广大农民将拭目以待。

记者手记

不受欢迎的采访

1995年7月20日，当我听说广西邕宁县的7000多亩良田颗粒无收、老实巴交的农民跺脚骂娘的情况后，第一反应是从牙缝里蹦出了几个字：“这是谁造的孽！”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下邕宁、出广西、走湖南、奔江西，行程千里，历时两月，采访了包括省长、市长、县长、厅长，经理、教授、律师、农民等等在内的40余人，在留下了11篇稿子的同时，也留下了一次浑身皮肤过敏和腰部扭伤的经历。实实在在地过了一把记者瘾。

我是在1995年7月22日赶赴广西邕宁县的。这一天是大休日，最高气温摄氏36度。

采访县委、县政府等等有关部门是不可能的，大休日根本找不到人。我直接来到了受假种子坑害最严重的一个叫那马的乡镇，农民们是没有周末的。

镇委、镇政府的领导们麻将正打在兴头上，冷不丁地跑来个

记者要求到农民家里去看看，不合作的神情马上写在了脸上。

“今天休息，国务院没规定休息日不能打麻将吧？”

“是是是，国务院哪能这样规定呢。”

“找农民？自己找去不就行了？”

“镇长同志，是这样的，因为附近几个村子目前暂时还没有通车，走着去肯定要天黑，能不能麻烦你派一部吉普或者借一辆自行车？”

“哎呀，我们惟一的一部吉普车昨天刚好下乡了，私人的自行车嘛，怎么可以随便借人呢？”

他们已经猜到了我是来调查假种子事件的，所以故意刁难。

傻等不是办法。走出镇政府大院，我极力说服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带我走一趟，报酬是10元钱。

来到一个叫东平坡的小村庄时，农民们包围了我。吵吵闹闹，七嘴八舌。有的跺脚，有的骂娘。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在农民龚庭侃的家里，我看到了成堆的绿森森的禾杆和老龚的80多岁老母的那双无望的眼睛。之所以说是禾杆，是因为它们像芦苇一样，硬且有锯齿。“牛都不吃。”老龚的大哥说。

接下来，我又到了那僚坡等其他几个村庄，了解到的情况与东平坡基本一样。

晚上“下榻”在镇上一家私人开的小旅店里，4元钱一晚上。就是在这里，我荣幸地与老鼠、蚊子和跳蚤战斗了一夜，基本上没有睡成。熬到天亮后，带着一身过敏的皮肤继续在那马镇采访。

24日，星期一。赶往县城。

刚一接触，我就发现情况不妙。有关负责人拒绝提供任何文字材料，甚至拒绝介绍情况。

不对，有关负责人非常主动地提供了一份“书面材料”——《中共邕宁县委办公室关于加强我县宣传报道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包括五点要求，其中第一条是：上级有关新闻单位记者到我县各有关单位进行采访报道的，须经县委宣传部同意后方可采访报道，若未经批准，擅自进行采访报道，产生不良后果的，由提供报道线索的单位（或个人）和记者（通讯员）负责。

一纸《通知》马上产生的效果是，我及省报和省电视台的6位记者都被拒之门外。电视台的几位老兄扛着摄像机强行“扫射”，录下了一位副县长手挡镜头的场面。

耗着不是办法。我们几个一合计，决定主动出击。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有人认出了该县农业局的一位副局长黄慧厚同志。大家一拥而上，“挟持”黄到一偏僻的所在，摄像机打开了镜头盖，录音机摁下了录音键，只等黄开口。

谢天谢地，此人不仅厚道，而且熟悉假种子的调运情况。架不住大家左一支烟右一杯茶地奉承，我们可爱的黄局长便打开了话匣子。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软缠硬磨地在其他当事人那里印证了黄所介绍情况的真实性。

28日回南宁后，我又采访了几位种子专家，就有关技术问题互相交换了意见。

29日，打开电脑，噼哩叭啦地把调查到的情况写成了一篇稿子，这就是7月31日见报的这篇一版头条。在后来所有媒介关于假种子的报道中，本报的这篇头条是最早也是最详细的一篇。

8月初，围绕假种子事件，我采访了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农业厅副厅长、自治区工商局局长等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他们对记者在邕宁的“遭遇”表示同情，同时像听故事一样一笑了

之。“当记者还是蛮好玩的。”其中一位说。

在南宁的采访很顺利，见报了两个二版头条。

此后10来天，因忙于一个通讯员培训班的事，加上假种子事件的查处情况没有太大的进展，于是暂时放下了采访事宜。

9月12日，为了给读者一个比较好的交待，也为了督促有关部门尽快给农民们一个“说法”，我买好火车票，领命踏上了出广西、走湖南、奔江西的行程。

从广西出来的火车只到衡阳。换乘公共汽车摇摇晃晃了10个小时后，9月13日夜里我潜入了湖南省汝城县。这是个国家级的贫困县，藏在湘南和粤北的山旮旯里。一路上我就纳闷，那些坑农害农的几万公斤假稻种是怎么运进来的？路实在是太难走了，一不小心就会翻车。

14日一早，我就到县政府办公室报到。迎面的一块黑板上，有几行粉笔字：全体机关干部和职工今天到开发区参加劳动，工具自备。

我大叫一声“不好”，幸好没人听见，因为还没到上班时间，否则会认为我是爱偷懒的“机关干部和职工”之一。

堵在办公室的门口，堵住了一位拿铁锹的副主任。

山里人倒很干脆：“我们不欢迎记者，我们被记者坑苦了。”

“怎么个坑法？苦到什么程度？坐下来慢慢聊。”

大家居然就坐下来了。

原来，8月25日，某报用半个版的篇幅，报道“汝城假种坑农 岳西万亩绝收”。汝城县人认为，坑农的假种来自江西宜春，汝城县自制的稻种十几年来从未出过质量问题。这篇报道给汝城造成的直接影响是：全县当年至少有上百万公斤自制的良种销路受阻，不少原先已签合同的客户看了报道后纷纷要求退货。

“你们有什么需要解释和说明的，尽管解释和说明，前提是

实事求是。”

有了合作的基础，采访就顺当了。要车有车，要人有人。9月15日写出稿子，拿给县长一看，县长大人挥笔一挥：“同意发稿！”这就是9月18日的一版头条《假种子是怎样流入农田的？》。

三天下来，大家都成了哥儿们。

9月16日，在汝城县开往衡阳的班车上，我看到车厢里堆放着六七麻袋稻种，于是一路上就与农民们聊着这个话题。农民们发现今年的稻种不好销后，纷纷走亲访友，连卖带送地处理完了事。

抵达衡阳时已是晚上8点。就着候车室的灯光，我完成了一篇稿件，急赶着找邮电局传给了夜班，一直折腾到晚上10点。这就是9月22日见报的《假稻种坑苦了汝城人》。

开往江西宜春的火车凌晨4点从衡阳发车，索性也不住店了。夜色朦胧，灯火阑珊，干脆就在火车站附近蹓跶，只是频频受到“小姐”的骚扰。

9月16日，抵江西宜春，又是一个讨厌的大休日。

上午8点走进市政府办公室，向一位郑姓副主任说明我要采访假稻种事件。郑仔细验看了我的记者证，然后向在座的一位乡镇企业管理局负责人滔滔不绝地交待他应该和不应该交待的工作。我被晾在一边看报纸。

9点，郑再次验看我的记者证。10分钟后，郑带我到一个挂着“农工部”牌子的办公室，然后离去。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腿有点瘸的年轻人，自我介绍姓吴，农工部秘书。小吴掏出笔记本，开始给我介绍油菜面积的播种情况。听着听着我觉得不对劲，遂打断吴的介绍，再次说明我了解假稻种事件的情况，与油菜无关。

吴说，那是农业局的事，与农工部无关。

回过头来又找到郑，郑故作惊讶地说，你不是要了解扩种的情况吗？当我再次说明我不是采访油菜，而是采访假种时，郑第三次验看了我的记者证。然后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猛然问我有没有介绍信。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郑喜形于色，口气很硬地说：“没有介绍信我们不接受采访，记者证哪里都可以印，我们见到的假冒记者太多了。”

没想到这厮跟我玩这一手。我一时没了主意。

走下这幢去年新落成的市政府大楼的第38级台阶，我回头望望，发现此楼华丽而威严。

辗转找到《宜春日报》社，我想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个人引荐也许好一些。但我错了。《宜春日报》的同行们为避嫌，明确表示不介入此事。

无可奈何之际，我拨通了编辑部的电话，希望给我传真一份介绍信到宜春来。

11点左右，我拿着刚刚传真过来的介绍信，再次找到郑姓副主任时，郑一句话也没说，“热情”地把我介绍给了宜春市委宣传部。

一路上，我问了郑两个问题，郑皆无言。

“是不是采访假稻种事件一定要介绍信，而采访油菜面积的扩种情况可以不要介绍信？”

“既然郑主任到哪里都能搞到记者证，什么时候也帮我搞一个如何？”

据说，后来一位副市长狠狠地批评了郑副主任。这位副市长当面给我的解释是，郑副主任平时说话就口没遮拦，加上刚上任不久，不了解情况，还请多包涵。

正式采访时，我与宣传部、农业局、种子公司等部门的合

作都很愉快，见到了想见的几个当事人，看到了想看的材料，20日写出稿件，副市长签署“同意发稿”的字样后，遂传回编辑部。这就是9月23日见报的那篇《假种子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最后一篇见报稿（《种子问题备忘录》10月21日）是在北京完成的。编辑部的意思是，此时应该跳出事件写体制，举一反三。于是我又采访了农业部的有关负责人，弄了一个中国质量万里行的通稿，也是1995年度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的第一篇通稿。

至此，关于假种子事件的报道基本上可说功德圆满了。

时间：1994年11月24日

作者：叶研 陈彤

申冤无泪

陈彤：《申冤无泪》和后来一系列流产的采访

申冤无泪

1

出事当天，冯白兰坐立不宁。一大早，她鬼使神差地买了几十斤重的纸线，实际上过两天她父亲的忌日用不了这么多。

50多岁的冯白兰辛劳一生，她已用积蓄开了两个门市部，卖烟酒的给小儿子陈涛，卖服装的给马上就要从部队回到地方的陈巍。

这一天是星期六。陈巍从部队上回来已10天了，很少上街，正逢周末，陈涛说要带哥哥去舞厅看看。

当钟敲在十二点时，刚好收拾好厨房的冯白兰曾以为儿子回

来了，开过一趟门。

终于响起敲门声，来人却不是冯的孩子。那人说：“姨，银河舞厅出事了，把你娃给打了。”

“哪个娃？严重吗？”

“可能已经……不行了。”

2

当日夜间，西安市公安局 H 处干警徐志勇身着便装私带 64 式手枪一支，子弹十发和王某、丁某、袁某到银河舞厅跳舞。彭某几次邀请不相识的女青年跳舞被拒绝。袁纠缠不休，与女青年的男友发生口角以至于撕扯。女青年及其男友一方有人认识陈涛，叫陈涛去劝阻。陈涛到出事地点即被徐志勇用手枪指在脸上。这时，一位姓胡的过来劝徐志勇放下枪、有话好说，陈涛趁机跑掉。这时，在楼下久候陈涛的陈巍上楼找弟弟，恰撞到胡某被打得很惨。陈巍并不认识冲突双方，但挺身劝阻、制止这场凶残的持械殴打。

几乎即刻，舞厅枪声震耳。拉架的陈巍被徐志勇当众开枪打死。致命的一枪，是身材较低的徐志勇对着陈巍头部从下往上打的，弹头从下颌进入，穿过头部，留在头皮下。据悉，陈巍倒下后，徐志勇上前对其踢头踏脸，并挥枪威胁周围的人，“谁敢上前，这就是下场。”舞厅保安人员用电棍击昏徐志勇，才下了徐的手枪。

3

冯白兰闻讯如雷轰顶。她赶到医院，见那里已有许多干警。

陈巍未被送到抢救室却被送上了四楼的病房。冯白兰被拦在一层。

13日凌晨两点半，医院的一名青年职员悄悄用电梯把她送至四层。每一扇门都关着，她倚墙站在走廊里等。将近3点，看见陈巍盖着被单的遗体被人用钢丝床抬出病房，冯白兰死命扑上去，被数名干警牢牢拽住：“领导不让看！”

钢丝床被送进电梯，她被关在门外，医院里空空如也，没有人告诉她太平间在哪里。

12月12日黄昏，陈家人在南门外吃了一顿亲情融融的晚饭；12月13日凌晨，冯白兰失了魂似地回到家，陈家哭作一团。陈巍死了，22岁。

4

儿子惨死之初，冯白兰万万想象不到日后旷日持久的磨难，想象不到正义如此难以伸张。

当夜，她将白天鬼使神差买的几十斤重的纸钱一张一张地烧掉，白发人送黑发人上路。翌日，即托人买好墓地，但料想这墓地至今仍没有用上。

怪事连连发生了。

事发当夜，本应回避的西安市公安局H处并未立即回避；接着作为重要物证的死者血衣不翼而飞；同案犯王某被取保候审竟杳无踪影；而且凶手徐志勇在血案发生后的第八天才在有关领导过问下，被收审。1993年1月15日，市公安局局长亲自催捕，2月25日徐被批捕。

事发后第12天，进行第一次尸检。发现陈巍嘴角两处伤口，牙齿折断。公安人员说如果验明头部存有几颗弹头，得取头来

煮。

“不能照片子吗？”

“谁肯给死人照 X 光片？”公安的人说。

冯白兰实在不忍，自己联系好医院，雇民工抬着陈巍照了 X 光片，当夜送到公安机关。经验证，陈巍头部留 64 式手枪弹头一枚。嘴角伤及断齿被定为是由手枪柄弹夹凸出部猛力砸成的。徐行凶当日带子弹 10 发，事后剩 8 发。

到底开了几枪？冯白兰要看陈巍的血衣。而那件许多现场勘察人员都见过、左垫肩有两个弹孔的染血西装却莫名其妙地再找不到了。于是查找血衣成了此案不能走上程序的第一个理由。

1993 年 5 月，冯白兰又从办案机关得知两名那日与徐志勇同去银河舞厅的王某和丁某取保候审后“找不见人”。这一理由导致此案拖到 1994 年上半年。值得一提的是，血衣和王某至今仍没有下落。省市有关领导同志认为这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内部的人为因素。

5

冯白兰四处奔波，一直听到负责办案的单位这样回答：“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查处”，“他肯定跑不了”，“你要相信我们”，“不要再到处找人催了，一定叫你满意”……

而冯白兰到 1994 年 3 月才发现，上级主管领导听的情况汇报同事实存在极大出入。

徐志勇私带枪支到公共娱乐场所被说成是执行公务，枪杀无辜被说成是走火伤人。劝架的陈巍被说成打架的一方。

原来一切都被人颠倒了！

冯白兰又一次懵了。她来不及震惊发愣，马上又到四方机构

去申明陈巍是第三方、和打架的双方都不认识这一事实。以致西安市有的专门政府部门领导越过办案人员直接找冯白兰询问情况。

6

冯白兰有一组笔记本逐年、逐月、逐日记录着她奔走的足迹。她根据这组笔记本整理的一份情况纪要给本报记者，38000字，沉甸甸一叠。从案发当天的敲门声记到一年零九个月之后。

冯白兰不同于其他喊冤叫屈的“上访者”，她衣着整齐，不哭不闹，不胡搅蛮缠，不提非分要求。她只要求一点：依法办案。

冯是个善良克制的人，西安市委、市政府、市政法委、市人大以至陕西省的有关领导，都记得这位被害者的母亲，在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内，这位坚强的母亲无数次来要求伸冤，却几乎没有掉过一滴泪。

多数场合，她都耐心地坐等，约见，也曾几度打着“严惩杀人凶手”的白布幛直闯会议，指名要求见某位领导或给每位与会者面前放下一份对事实的陈述材料，发完就走。

遇到过不少办事认真，有同情心的办事人员，也遇到过推诿、搪塞、连蒙带唬，有阻挡习惯的人。

1993年夏天，冯白兰在电视里看到市长在市政法会议上讲话，第二天即去求见市长，秘书不准。约见，仍不准，“下礼拜行吗？”“下下礼拜也不行。”“那我在这里等。”秘书打电话叫来三个值班的：“把她给我拉出去！”“你们谁拉我一下试试？”“人民有难，想见市长……”

后来市长来了，和气地请冯白兰进屋：“我一直参与这事，

也找过有关部门分析过。你讲的全是事实……还有什么要求？”

“公安干警中有人犯法，我娃是制止犯罪，要求依法严惩凶手。”

7

常常可以听到诚恳、正直的声音。

——不能让死者家属再跑了。

——从现在起，不再往下批材料，马上向会议通报。

——有需要反映的问题可以来找我，进不了大门我派人去接。

——丢血衣、放证人不能说是失误、教训，不能下不为例，要查，查到谁就处分谁。

银河舞厅杀人案是非曲直，人人心里一面镜子。

到了办案层面，也是如此，徐志勇私带枪支到公共场所枪杀无辜，陈巍为制止犯罪被打死，这一基本事实，并没有多大疑问。但似乎始终有那么一股阻力顶着，人说要办成事儿，得上头说话。如今，多少个“上头”说了多少次话，也不灵。案件一年多一筹莫展，“案中有案”。

头一年的市人代会上访第二年的省人代会上访白布幛子上的呼声都变成了会议第一期简报的标题，案子还让个别人拖着。

下有冯白兰催问，上有领导机关催问。“办着哩，快了。”

3个月，催问，“办着哩，快了。”

一年，催问，“办着哩，快了。”

冯白兰真的累了。从骨头缝里向外辐射出疲乏。老伴事发之后精神受了刺激，一年多连班都不能上。小儿子抱着哥哥灵位痛哭3天之后，揣了家里的钱上街，要买枪报仇。因案子久拖无

果，且枝节横生，小儿子失去了信心。冯白兰在漫天大雪里找到正疯了似寻找仇人的陈涛。“拼命拼死了，冤案洗得清吗？”从此案子进展，再不敢跟老伴和小儿子说。

今年春节，陈巍遇难的第二个冷锅冷灶的春节，冯白兰倒在家里的沙发上，一种绷断了、熬干了的感觉。一年多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头胀得要炸开。一年多她走了多少政府部门，见了多少人，说了多少话，她也算不准了。由于四处伸冤，两个门市部先后关闭，一年多经济损失加花费，她几乎债台高筑。多少蒙冤的人就在这种拖延下放弃了努力。最后一丝信心正离冯白兰而去。她觉得也许该听取那句听了无数次的话：“别跑了，没用。”

“娃，案子拖了这么久不是妈不尽心。妈恨不能豁出去买捆手榴弹跟他们同归于尽。”自打儿子惨死，冯一直马不停蹄地四处申冤，写材料，上访，她几乎没有真正静下来好好地哀悼死者。新春佳节，她悲伤地守岁，恍惚间看到陈巍走进了幽暗的家，站在她面前，伸出两个手指打出“V”字，说：“我妈要胜利了。”

冯白兰一惊，猛睁双眼，屋里空空。但是她愿意相信这个冥冥之中的幻觉。事实上，濒于绝望的母亲真的就在这个幻觉的鼓舞下支撑下来。

8

这个节后，正月初五。冯白兰终于找到了一个重要证人。为此，她整整找了4个月。

4个月前，陈涛路遇被从徐志勇枪口下救出的胡某。冯白兰曾在陈巍遇害后的第二天找到胡某，当时胡泪流满面，哭着说：“姨，你娃被打死，实在太惨了……”他说他被打得要昏过去，

有人来劝，大致说：“别打了，再打要出人命了。”这样胡被放开，接着枪就响了。然而后来胡某却不肯作证。此刻陈涛见到胡某不由怒火中烧，当即要揍他：我哥救你被打死了，你连个真话都不敢讲。胡某说当时实在被打得什么都不知道了。

冯放弃了让胡作证的想法，她打听到另一目击者的名字，为了找到这个可能作证的人，她几乎问遍了每一个居委会，终于找到了要找的那个小院。但她几次上门，院里的人都说“他不在这儿住。”

正月初五那日，冯白兰一早就找到那个小院。她在院里守着，一直到下午，一个打羽毛球的青年来问她找谁。又问她“找他啥事？”冯说了陈巍被枪杀的案。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青年爽快地说。

这位青年怕家里担心，在叮嘱冯不要让他父母知道后，毅然出庭作证。

9

1994年上半年，“办着哩，快了。”但案子还在预审没起诉到法院，冯白兰又上访一年一度的省人大会议。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志鼎在1993年冯白兰上访时即认为人家一个娃，在部队表现不错，入了党，刚复员回家，年轻地就被杀了，人命关天嘛。马上催促西安市公安部门尽快查办。1993年底办案人员将此案上报省人大“销号”，后被郭志鼎发现制止。但是在办案人员预审阶段，郭志鼎也不宜过多干预。不起诉，不进入法院审理程序，人大很难实施监督。一年多过去，郭志鼎觉得没法对冯白兰解释。

“10天内，我一定让西安市公检法结束侦查，把这事提进司

法程序。”

冯白兰当时不信郭志鼎的话，她听许诺已听了一年多。

省人大会后，郭志鼎详细阅卷，感觉案子一直被人牵着走，先丢血衣又找血衣，后放同案犯又找同案犯。必须甩掉这些障碍，把业已查清的主要事实同办案过程中发生的情况分开，一案分为两案。

5月郭志鼎召集有关各方开会，提出主案中致死一枪事实清楚，应马上起诉，丢血衣、放同案犯另案处理，不再同主案缠在一起。

郭志鼎对到会的干部们说：“在场的都是50多岁的人了，如果死者是我们自己的子女，我们怎么办？”

一案分为两案之后，在省、市人大党委会的又一轮催促下，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6月20日作出一审判决。

10

今年6月西安市中级法院开庭，冯白兰见到了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徐志勇。

她看到徐志勇在法庭上满不在乎的样子，她明白了：报仇申冤还是第二位的，此害不除，百姓焉有宁日？

一审判决递到陕西省高级法院，1994年9月24日，省高院向省人大通报，认为徐志勇的行为已构成枪杀无辜之死罪，驳回徐志勇的上诉，维持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徐志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原判。但第二天徐的律师就上书省人大，题为“紧急呼吁，刀下留人”，强调血衣和个别证人不在等枝节。第三天全国人大电传转来了徐的律师发经全国人大的同一内容的“呼吁”。

郭志鼎和省人大的负责同志研究认为：徐志勇故意杀人犯罪事实清楚。不仅有现场目击证人证言证实，且有现场勘查笔录、物证检验报告、尸体检验报告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定案。即向全国人大有关部门汇报了情况，并把省高院的裁定传真给全国人大。

11

9月29日，初秋，晴空亮丽。冯白兰到西安市公安部门询问情况。

“你儿子的仇报了，徐志勇已于两天前伏法。”

冯白兰走到太阳下，秋日耀眼。她有时间哭了。但她在伸冤后落的第一滴泪是为另一个母亲。“可怜天下父母心，现在徐志勇母亲的心情就是我刚失去娃时的心情。”

“我并不是要她娃的命。”冯在得知徐已伏法后，整整在家躺了25天，打一个多星期的吊针。一年零九个月的官司，留在心头的东西太多太多。当有人找上门，要她开个价，买徐志勇的人头时，她那种心痛的感觉；当她因上访被警卫推推搡搡，大呼小喝时，那种说不出的对自尊的伤害体验。她是一个纯粹的母亲，她也曾想过，徐的父母生养儿子原也不是让他杀人放火，但是她不能容忍拿出钱来买人头，她觉得自己不是在复仇，她要求的是正义和公理。在感情上，她从来不恨徐志勇的双亲和家人。

冯白兰在病床上，感到自己浑身都散了架似地痛。她想到那些真诚地帮助过她的人，仗义直言愿作证的小伙子；多次过问案子的市委冯熙初书记，市政法委张留平书记，还有督促办案的省人大秘书长郭志鼎，以及为她案子批过条子的省委书记张勃兴。该谢的人数也数不过来。

冯仍在奔走，陈巍的尸身至今仍停放在太平间。冯白兰多次要求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后续，但一直没有消息。

官司赢了，她得到经济赔偿 2000 元。对于一年零 9 个月的官司来说，这显然是微不足道。有关部门同志认为：赔偿要考虑对方的经济能力，徐家赔不出更多。但冯认为她的案子之所以被拖了一年零九个月，与公安机关办案不力有关，而且有些因素是公安机关人为造成的，公安机关应给一个说法。而最重要的陈巍究竟是不是见义勇为，至今仍无定论。

生活之河兀自流淌，事犹未了。

一队鸽哨响过西安大南门。南门内，银河舞厅；南门外，陈家简朴的家。一切照旧。

不同的是，直至如今，只要见到一个高个儿当兵的背影，冯白兰仍然控制不住自己要撵上去，权当自己的儿子，多看几眼。

记者手记

《申冤无泪》和后来 一系列流产的采访

《申冤无泪》发表于1994年11月24日，到现在将近有5年。我印象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在这篇报道见报之后，我所收到的读者来信，大部分是控诉信，那些信我没有留着，只记得每天都是一大捆，如果叠加起来肯定也是“著作等身”了。他们都有类似的冤情，而且这些冤情几乎大部分都和公检法有关。遗憾的是，我因为很快加入一个希望工程的采访，在贵州山区转了将近一个月，所以那些信也就束之高阁。

我做《申冤无泪》的时候，还是一个到报社不到一年的新记者。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做的这个采访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我更没有意识到的是，很多的冤情和公检法本身的腐败有关。公检法是一个很难监督的地方，而且他有权对你说无可奉告。比如说我今天接到的一个案子，是河南的事情。一个农村妇女死了，女方的父亲是一个医生，一看现场就认为这是中毒而死，但是夫家强行掩埋。最后娘家人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开棺验尸，验尸的结果是没有毒。妇女的父亲认为这是因为夫家买通

了地方有关部门，最后上访到北京，公安部的结论是有毒，而且属于剧毒。老父亲要求严惩凶手，而当地公安说就算有毒，也不能说明你女儿是他杀，也可能是自杀。案子就这样拖下来，再找公安部，公安部也无能为力。

老父亲对我说，我看过你写的《申冤无泪》，你能不能帮帮我，我真的绝望了。我想了半天问他，你可能完全放弃你现在的的生活，把你的全部精力财力都用来打这场官司吗？你可能这样坚持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吗？而且你能不能做最坏的打算，就是很可能很长时间没有结果而在这个过程中凶手可能勾结地方势力对你以及你的家人进行造谣污蔑威胁你的生活以及给你制造压力？老父亲说，我要的东西很简单，就是地方公安人员能够实事求是地给我一个说法。比如说是不是毒死，这么简单的问题，几乎是常识，他们硬说化验没有发现中毒，而且明确告诉我已经排除了毒鼠强这种可能性。结果我到北京公安部，请他们检验，我特意嘱咐他们查一下是不是毒鼠强。结果恰巧就是。你说像这样的公安人员为什么不能把他们法办了？我对他说，是应该法办，但是他会有很多解释，比如仪器老化，或者就是责任心不强，技术不过关，最多写个检查，你还能怎么样？老父亲说，我找过几家新闻媒体，人家都说我这个够不上新闻，说要解决问题还是要找职能机关，而报纸是监督机关，让我上访去。可是我到了人大，人家说这里不管这个事情，还是回去依靠当地政府，要是当地政府能够依靠，我干什么到北京来？

我不知道这个老父亲会不会像当初那位替子申冤的老母亲那样，赔光家业，债台高筑，历时两年，直到水落石出！

这个《申冤无泪》案子因为牵扯到公安干警枪杀无辜，难度大大增加。其实说出来非常简单，西安市公安局的警察徐志勇荷枪实弹到舞厅玩，邀不认识的女青年跳舞被拒绝后发生冲突，一

个姓胡的青年好心劝说，结果遭到徐志勇的痛殴，这时年仅22岁的陈巍挺身而出，结果被开枪打死，死后又遭徐踢头踏脸……

问题是我听说这个案子的时候，一切都是倒过来的。空军某部战士陈巍被说成是社会闲人，他在舞厅调戏妇女，徐志勇开枪示警无效，最后在冲突时枪弹走火致死。

陈巍的母亲叫冯白兰，我记得她是在西安最热的一天中午来敲我的门，当时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很烦被打扰。那个老母亲把事情说得非常简明扼要，最重要的是她有一个笔记本，是从她知道儿子出事的那刻起开始的日记，上面有哪天发生了什么事，哪天找了什么人，哪天谁跟她说了什么等等，一共有60页，38000字。我说我要先和编辑部汇报，然后才能决定怎么办。冯白兰当时缓缓地对我说：“我已经找过好几家报纸了，人家都有难处。后来一个记者同情我，给我出主意，说找中央级的新闻媒体才有希望。地方报纸或者说和地方关系深的报社记者是不可能为我申冤的。现在报纸首先是经济效益，做这类文章吃力不讨好；另外地方报纸要顾及地方利益，说话也不方便。再说谁也不愿意得罪公安局。”话里的意思是她很明白，如果我不愿意管这件事她也可以体谅。我赶紧跟她解释，这是编辑部的规矩，不是托词。

这60页的东西到了编辑部，当时《社会周刊》的主编高富元嘱咐我不要听信一面之词，一定要去公安局，派出所，还有政法委地方人大去采访，叶研专门提醒我可能遇到的麻烦，并且让我做好心理准备，这个采访不是一个短期采访，他对我说这是一种“突破性”采访，要看我的突破能力了。

最大的困难是我介入的时候已经是事隔一年，根本谈不上当时的现场和证人而且连重要的物证都被办案机关弄丢了，更可笑的是与此案有关的同案犯被“取保候审”之后竟然“找不见人”

了。通过这次刻骨铭心的采访，我觉得对我刺激最大的事情是：第一，公安机关以及有关单位的麻木，这种麻木我在以后类似的采访中无数次遭遇。具体到《申冤无泪》的采访过程，很多时候我遭遇到的冷场简直让人气愤，比如说一听是采访这个案子的，就说没有破呢，甚至说没有破的案子多着呢，我们干警遇害的案子都有没破的，言下之意，这有什么呀！第二，就是假如公安机关或者公检法中的任何一节，他们如果要是做坏事，那么把这件坏事纠正过来的成本就非常高。因为他们又懂法又执法又有权力，这三者结合的可怕性远远超过高科技犯罪，比如说在《申冤无泪》这个案子中有很重要的一环，被害人陈巍的血衣竟然不翼而飞。为什么说这件血衣重要，因为这上面有一个弹孔，如果有这件血衣，那所谓的开枪误伤或者说子弹走火就都是无稽之谈，但是偏偏就丢了。丢了就证据不足了，证据不足就只好把案子先放在一边大家先找这件血衣，找来找去就容易不了了之。因为成本的问题，有时间成本，资金成本，还有人员成本。对我的第三个刺激是舆论环境的恶劣，那个时候我年轻，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恶劣的舆论环境是如何的有害。后来我知道很多上访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把自己磨得麻木了心灰意冷了然后接受一种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冯白兰在上访过程中无数次被人推推搡搡，无数次让人家良言相劝，比如说你的孩子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算了，让徐志勇家给你经济赔偿，重要的是人要活好。一般的人在冷眼与好言中打磨一阵，最后往往选择放弃，而有关部门甚至操纵或有效使用这些舆论，他们一方面给上访者冷脸，一方面又会劝他们结案、销案皆大欢喜。同样这种舆论也会对采访者造成心理负担，采访者在一团乱麻中找不到头绪，这个时候有关部门的有关领导或者红脸劝说你放弃，比如告诉你被害人是社会闲杂，家属是无良刁民，还无比关心地问你怎么和他们纠缠到一起？或者黑

脸整你，最普通的一种整法就是我们有纪律，在案子没有最后结束之前不能对新闻媒体公开。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发表之后，西安市公安局到有关部门告状，他们说这篇文章歪曲了公安形象，至少在当地造成了严重的误解，他们的解释是此案本身非常复杂，扑朔迷离，所以说办的时间长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申冤无泪》一文让人家觉得是公安局的原因结果把一个简单的案子生生拖了将近2年。他们举例说办案子是重证据的，血衣丢了凭什么说上面有一个弹孔。我当时非常愤怒，就提出了我的看法，血衣是不是在办案过程丢的？丢掉血衣是不是耽误了案情的进展？案子是不是公安局办的？你们负不负这个责任？那么读者得出结论认为案子进展不顺有人为原因有公安局本身的原因有什么不对？

顺便说一句，在文章发表以后，甚至有同仁问我和冯白兰有什么关系？我说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姓这个姓的，我本人也是第一次去西安，我在那里算是举目无亲的异乡人，什么关系也没有。后来那些同仁在对我表示敬意的同时说我“还是年轻”，如果我有家有口，一定不会招惹这些事情。后来在报社时间长了，才知道像这种事情简直每天都可以遇到，可是报社不是职能部门，它既没有侦破手段又没有尚方宝剑，不可能什么都做。况且对于普通的记者来说，大家更愿意做投入少、周期短、效益好的新闻，没有人愿意一件官司一接手就是一年半载，而且最后很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证据不足而使采访流产。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做经济类记者、都市新闻类记者或者是评论时尚等等，但是我们不愿意做良心记者，也许因为良心是一个很不可靠的词。

我在做过《申冤无泪》以后，又采访过几桩难度很大的案子，大部分没有做出来，也就是说流产了。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对自己做的事情发生了怀疑。大家经常说新闻价值，说报纸职

能，因此就有一个问题，同样类型的个案你做它有什么意义？它已经不是新闻了，再说弄清真相也不是一个记者要做的事情。可问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老百姓要状告公检法？难道他们都是刁民吗？其实他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就像冯白兰的要求一样，我儿子没有调戏妇女，我儿子是见义勇为，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冯白兰一家在快要绝望的时候，她的小儿子甚至想过买一把手枪把那些不办人事的人全办了。幸亏被冯发现，冯在漫天大雪里找到了几乎疯了的小儿子，她老泪纵横：“咱家不能再被人冤枉了。”冯对我说，如果事情出了，公安局秉公处理，我也不一定就要求杀人偿命。因为我听说徐志勇的妈妈非常疼爱她的这个儿子，将心比心。可是他们那种态度，真是让人心寒，把我儿子说成一个社会闲人！我儿子当时正在办复员手续，他生前是空军战士，共产党员，在部队曾两次抢救落水儿童，为病危战士献血，多次受到嘉奖。他们怎么能这样做！不过，反过来说公检法为什么要欺负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呢？我想主要是这些老百姓没有任何背景，另外就是公检法腐败。比如我上面说到的验尸，明明是中毒致死，验尸结果硬说没有发现毒物。为什么呢？我没有调查，但是我想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腐败、买通。我在西安调查《申冤无泪》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个老父亲找我，他是上访的时候认识冯白兰的。多次上访的人，很多会因为经常见面彼此交流经验最后成为莫逆之交的“难友”。冯白兰建议他来找我，但是我没有帮上他的忙。他的冤情是儿子被杀，杀人凶手被判处死刑，但是在执行之前竟然在牢房里自杀了。这个人不相信凶手自杀了，因为凶手自杀前，凶手的家里有些异常的举动，但是这个老父亲没有能力按照他得到的线索跟踪侦破这个案子，他只能到处上访。我为他走访了有关单位，人家说这个父亲在儿子死了之后，精神有点失常，常疑神疑鬼，另外他家里穷，想这么一闹

能多捞点经济赔偿。但是，为完成《申冤无泪》特意从编辑部过来的资深记者叶研认为这件事情一定有很深的水，不过我们没有能力来趟这塘混水。回到北京后，我搭车的时候和一个司机交谈这件事情，那个司机说买通他们还不容易，我实话告诉你我们邻居就是判的死刑，10多年了，有一天我拉活，看到一个戴墨镜的眼熟，他后来上了我的车，下车的时候一摘镜子问我：大哥，你不认识了？我一看寒暄了两句什么也不敢说。回家的时候本来想去告发，后来一想人家有那道，你告有什么用，没准给自己惹一堆麻烦。就算了！

在我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一个叫刘文秀的山西农民来找我，他自学法律之后，替当地农民打官司，状告乡政府和当地公安机关，结果遭到迫害，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他说自己是逃到北京来，结果前两天知道自己的儿子被公安抓去了，罪名是人家赌博的时候他的儿子恰巧在场。他跟我说他已经找了好几家报社，人家都不肯管这件事情，理由是新闻单位不是法院不是职能机关。有家报社的记者打长途电话过问这件事情，对方回答说没有迫害过刘文秀，刘的儿子是在抓赌的时候被抓的。记者对刘文秀说，你看我不能只听你一面之词。刘文秀说你为什么不去调查呢？记者说我去人家还是那句话我能怎么办？刘文秀举着一本最新版本的司法解释来找我，你说这法院、公安、乡政府串通来了整我，我该到哪里告呢？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在《申冤无泪》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心肠慢慢地变硬，血慢慢地变冷，我发现自己几乎很容易接受不公平的现实。新闻媒体不应该成为上访中心，不应该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但是这部分职责该让谁承担呢？这是我在写过《申冤无泪》一文之后，常常想不清楚的问题。

时间：1994 年 11 月 2 日

作者：王伟群

中国，不是国际垃圾场

王伟群：我太天真了吗？

中国，不是国际垃圾场

在我面前，矗立着一座垃圾堆成的大山。这是由废旧的电线、电缆、冷气机、IBM 电脑、监视器、瓦斯报警器、汽车电池、发动机、显像管、电话、可口可乐的塑封套等等工业垃圾堆成的大山，它们来自大洋彼岸——风光秀丽的美国。

进入 90 年代，同样风光秀丽的中国东南沿海，已悄悄矗立起上百座这样的垃圾山。

几十个打工仔各自干着不同的活儿：拆电线电缆，用重物砸开空气压缩机，拆下电脑主机板，或敲或砸或烧取出其中的铜钱和铜块。打开压缩机的空气包，一股污浊的油渗入地下，说不清这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垃圾场上空弥漫着一种刺鼻的怪味儿。这些人在干活的时候没有任何防护手段，他们每月工资约 500

元。

这是在中国深圳市宝安区的一家企业。据说，在深圳，类似的企业有七八个，在广东全省则有上百家这样接收处理洋垃圾的企业，而且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与台商有关。每月，经过南方的一些海关，涌进一个个巨大的集装箱、货箱里的正是这些洋垃圾，品种多达数千。

中国，是别人的垃圾场吗？

9月，在美国旧金山市的调查报道中心，我看到了这样一部电视片——《世界垃圾场》，这是该中心的记者和研究人员经过4年的努力，深入到全球的垃圾场，所采访到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他们记录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废弃物是如何运送到第三世界国家，给那里的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给那里的生灵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正把大量的有毒废弃物送给别人处理，给世界上穷人的肩膀上再增加一份重担。”其中，和我关系最紧密的受害者是我的祖国。

祸水西移

最先将美国的工业垃圾运入中国大陆的是陈氏东泰国际公司。此前，东泰的重点在台湾。

根据美国方面报道，运到台湾高雄港的废五金，从多氯联苯充塞的变压器到有石棉的旧电池，无所不有。许多废五金在废料场就地回收，没有面具或其他器材来保护工人不受石棉、多氯联苯及金属尘的污染。废五金商人走到哪里，污染就蔓延到哪里。在台湾一些地方，有些河流已经被废五金污染，成为死河，鱼虾不生。

陈氏家族的东泰国际公司是在美国旧金山市注册的，“他们

走遍全美，找废五金的来源，然后搭乘4小时飞机到亚洲，亲自监督运送，并且把提炼的贵重金属回收。”

东泰并不讳言废五金行业在台湾造成了环境问题，陈家老四陈增平公开承认废五金的利润是建筑在牺牲台湾河川、空气及土壤之上的，他相信许多进口的废五金含有多氯联苯或石棉之类的毒物。

1993年起，台湾环境署开始逐步停止台湾的废五金交易，并将彻底废除这个年交易额达1亿美元的大宗国际贸易。于是，陈增平的目标向中国大陆转移。而且他发现，这里的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法规更加松弛。

最初，他在广东珠海市附近建立了一个废五金回收厂。这是1990年，他每月输入150卡车的废五金到一座名为国富冶炼厂的空地上，其中95%来自美国，包括驾驶牌照、旧电池、发动机。铜厂的后面是一个郁郁葱葱的山谷，这成了陈的垃圾场，他打算把废塑胶和有毒材料，如传动系统、空气压缩机及变压器里的油，都丢到山谷里。

一年之后，《世界垃圾场》在美国的各大电视台播出，一位华人迅速向中国国务院发去了一份电传，报告了陈增平在珠海的作为。据说是国务院领导亲自下令取缔了这一厂家。

不受欢迎的采访

10月24日，我们到珠海国富冶炼厂，出乎我们意料，该厂的空地上依然堆满了大量的废旧电缆和电线，时值礼拜天，厂里静悄悄的，只有20几个打工仔正坐在一起吃午饭。

“知道这些旧电线是从哪儿来的吗？”

“美国，都是从美国来的。”

“一天能挣多少钱？”

“不一定，一个月拆两吨旧电线，差不多能挣五六百元。”

“你们用什么方法拆电缆电线？”

“电缆好拆，电线尤其是细的电线就用火烧。”

“拆剩下的胶皮怎么处理？”

“有的运走，有的就拿到后面去烧掉。”

“后面”是指一排厂房的背后，那里堆了废旧的电线胶皮。一墙之隔，便是那个郁郁葱葱的山谷，山谷里有鱼塘和成千上万只鸭子。鸭的主人对我们说：“鸭蛋减产两三成，不知是什么原因。”养鱼人则说上市的鱼有股怪味。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了国富冶炼厂，为避免不愉快的场面，我们请珠海市大金鼎镇的一位同志当向导。厂办公室的李主任说，电线不是国富的，是珠海珠明公司的货，又问起陈增平，他说陈早走了，还欠了国富大约 11 万元，现在好像在深圳和上海浦东都开办了类似的厂。

临别时，那位镇上的同志说：“我发现我们吃亏就吃在把自己的东西让外国人随便拍摄。”我们瞠目，无言以对。

下一个采访目标是珠明公司。在珠海市那座标有珠明贸易公司和珠明公司集团的大楼里，我们被不同的向导带到这里那里，终于在一个被确定为从事废旧电线进口的办公室里，一位自称姓魏的女士接待了我们。

当我们问及诸如“进口废旧电线电缆的情况”、“公司的名称”、“您所在办公室的名称”的问题，以及提出希望交换名片的要求时，对方均以“不知道”作答。

我们只好又找到了前面几位向导，被告知，魏女士所在的部门可以认为是“珠海国际有限公司”的下属机构，不属于珠明集团。我们又问是否了解国家有关废旧物资进口的管理条例，回答

说不了解，“但肯定是可以做的，否则为什么海关不禁止？只要海关不查你就没事了，只有国家允许才能这样做。”

的确，为什么海关不禁止？

要致富，进废物

到深圳，继续找陈增平。

这如同大海里捞针，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欢迎我们，只好撞大运了。

第一站，到宝安区布吉镇。我们得知这里有一家中方的铜材厂，遂请镇里的同志带我们去看一看。进入金鑫铜材厂，蓦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山！

在秋日的阳光下，这座“山”泛着刺目的光。据介绍，金鑫铜材厂有着一张令所有从事废旧五金进口商羡慕的通行证，在深圳，这是唯一的一张，由原国家经贸部颁发。与金鑫合作的境外废五金进口商，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陈增平。

在那座山一般的美国废五金面前，我见到了陈。陈今年38岁，从事这一职业已有16年之久。据说，陈家四兄弟，老大坐镇美国，搜集组织美国的工业废料，老三是开路先锋，把东泰的触角伸向中国大陆各处，陈增平主要“负责管理工作”，唯有老二，没有加入此列，而是在美国洛杉矶市开设了一家诊所。这真是一个极“完美的”的组合。

金鑫公司每年进口的工业废料约4万吨，营业执照是在1988年3月办下来的。金鑫公司一分厂占地1万多平方米，工人们即在垃圾场就地拆卸五金，回炉为铜，废铜在湖南省等地加工成电解铜，然后在这里拉成线材后销售。东泰与金鑫的合作实为互相利用，如果没有金鑫的牌子，东泰就无法合理合法地进口境外的

工业垃圾。早在 1988 年，金鑫与东泰的合作就开始了。

与金鑫合作的还有鑫旺、荣濂、鉴利、爱丝乐等 4 家台湾商人，这 4 家企业贩入的境外工业垃圾占地约 3 万平方米。金鑫尚富余 2 万平方米的空场地，等待新的合作伙伴。

铜材之外的东西，比如废塑胶、废渣按规定应该运出国境，但是这样做太麻烦，于是金鑫打了一个报告，希望能够在境内出卖这些废料，海关终于同意他们将剩余物资卖给海关指定的废旧物资回收站，从这里还可以回收铁、铅、塑胶。

我们曾与上述回收站联系采访，对方解释说，许多企业争相向他们购买这种废料，至于买回去用后是埋、是烧还是弃之露天，他们就管不着了。

我们还听说，在广东清远等地，大量的个体私营企业从事这种进口垃圾的拆卸工作，所用手段多借助火烧，剩余废料任意倾倒在山谷河边。

我们听到了一句顺口溜：要致富，进废物。

陈增平介绍说，废五金行业给台湾赚了很多钱，一年税收约 200 亿台币。他确信是废五金行业成就了今日的台湾，这似乎应该是大陆的楷模，陈氏兄弟在浙江北仑港、苏州等地开设的厂，规模比这里还大。东泰公司下一步将继续扩大规模，目前已与常州市电解铜厂谈妥，从境外进口废五金，在常州加工，目前在大陆这样的厂已经开办了 10 家。他希望今后能够向内地发展。据陈说，他在大陆的事业是从 1990 年开始的，这与金鑫厂方的介绍不太一致。

陈增平抱怨目前由于大陆经济紧缩，企业无法得到银行贷款，使得这一行业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因为这种交易大都为现金交易，而银行只把钱贷给什么房地产业，注意不到这个行业，其实这个行业资金周转最快。”

在金鑫一分厂的空地上，我看见几个工人在废渣中往外挑拣着小铜块，这是拆解铜材的最后一道工序了。我问：“剩下的废渣怎么处理呢？”

厂方负责人喜形于色地告诉我：“填地基，打桩，都用上了，一点都没有浪费。”

这回答令我不寒而栗。

据深圳环保局的朱贻安先生介绍：用未经处理的工业垃圾，尤其是境外垃圾填入地基是坚决不能允许的，这将给地下水造成污染，更为严重的是有许多工业仪表仪器含有放射性物质，将这种物质打入基桩，后果无法预料。

中国不是垃圾场

早在1991年3月7日，国家环保局和海关总署就已联合发布了《关于严格控制境外有害废物转移到我国的通知》，通知指出，境外有害废物和垃圾进入境内，实质是转嫁环境污染，不仅对输入国造成重大危害，而且也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产生严重影响。通知列举了23种被禁的有害废物名录。

《通知》规定：

——对于特别需要所列废物作为原料、能源或再利用的，必须经环境保护部门审批。

——废物进口单位和废物利用单位，通过当地行业主管部门向地、市级环境保护部门提出申请、登记，地、市级环境保护部门进行初审，再经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复审之后，报国家环境保护局审批。

——进口废物抵口岸，废物进口单位和废物利用单位应立即向有关环保部门申请报验，海关凭环保部门在进口货物报关单上

加盖的“已接受报验”的印章验放。

但是，据国家环保局污染管理司吴报中副司长称，本文所提到的全部专门从事进口废五金加工的企业，没有一家曾经经过国家环保局的审批。

根据美国方面报道，美国每年产生的危险废弃物事实上已达10亿吨。在90年代，这个国家至少每年丢弃7000万个汽车电池——也就是说要弃置700万加仑的硫酸以及超过10亿磅铅，铅会对人的生殖系统产生极坏的影响，更严重的是它对儿童智力的破坏将是终身的。在美国许多工厂主们看来，处理如此巨大、如此危险的垃圾的最经济、最保险的办法是“将它们运走。”

从1980年到1986年，在美国严格法规管制下，美国熔铅厂减少了一半。而与此同时，台湾进口美国的旧电池却高居亚洲之首，台湾熔铅厂的工人和周围学校的孩子深受铅毒之害。专家们说，“这些工人将来极可能会有肾脏及神经问题。”“这些孩子智商受损，发育迟缓，而且还会有行为上的障碍。”

1987年，美国曾与中国深圳市草签了一个每年进口72万吨垃圾的协议，协议规定，深圳每年接收美国的生活垃圾72万吨，每吨由美方支付5美元，在环保部门的强烈抵制之下，这一协议终于未能正式签署。

深圳升辉公司，设在西丽湖边，这是深圳的水源。1991年，环保局的同志偶然发现了这家庞大的废五金处理场，遂坚决要求取缔。未曾想到说客盈门，而最强有力的理由是，这是1989年夏季之后第一家来华投资的台商企业，政治意义不同寻常。

中国并不富裕，中国急需大量的外汇，但中国不是别人的垃圾场，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权力——以中国的蓝天、青山、绿水作代价，以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健康为筹码，来换取眼前有限的收入。

强迫我们在毒药和贫穷之间选择，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来发展经济，无疑等于自杀。

记者手记

我太天真了吗？

直到今天，我依然很清楚地记得我在深圳宝安区见到的那座绵延起伏的垃圾山，我依然十分清晰地感觉得到那座垃圾山在一刹那间给我巨大的震撼。这话一点不夸张。

—

那是1993年的秋天，我参加一个中国女记者代表团访美归来。在美国的最后一站，我们到了旧金山市的调查报道中心。这是一家完全民间的新闻调查机构，这里的新闻从业人员并不隶属哪一家新闻媒体，他们独立地对某些新闻事件展开调查采访，包括一些很重大、很内幕的事件。然后在世界各大新闻媒体上披露调查结果。这种机构在中国尚未得见，因为在我们的新闻机构之外，任何人没有进行新闻采访的权利。

在这个中心，主人向我们介绍的很多东西，我已经没有印象了，惟独那一座座国际垃圾场给了我太多太多的刺激。主人为我

们播放了一部电视片——《世界垃圾场》，这是该中心的记者和研究人员经过4年的努力，深入到全球的垃圾场，所采访到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他们记录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废弃物是如何运送到第三世界国家，给那里的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给那里的生灵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

根据美国方面报道，美国每年产生的危险废弃物事实上已达10亿吨。每年这个国家至少丢弃7000万个汽车电池——也就是说要弃置7000万加仑的硫酸以及超过10亿磅铅，铅会对人的生殖系统产生极坏的影响，更严重的是它对儿童智力的破坏将是终身的。在美国许多工厂主们看来，处理如此巨大、如此危险的垃圾的最经济、最保险的办法是“将它们运走”。“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正把大量的有毒废弃物送给别人处理，给世界上穷人的肩膀上再增加一份重担。”

墨西哥是美国最大最方便的垃圾场。妇女因为饮用了被垃圾污染的水，生下了一个个怪诞的婴儿；无辜的孩子们用盛废油的桶洗澡，身上长满了疥疮。但是墨西哥还是太小。美国的富商为了逃避本国极其高昂的垃圾处理费，宁肯将自己的工业废弃物装船，花钱送到世界另一个角落，包括南美、非洲和亚洲的几乎每一个国家。包括我们中国。

当轮船在一国的港口受到谴责和拒绝的时候，他们就会起锚前往另一个国家的港口，有时觉得走来走去，成本太高，这艘船上的垃圾就会人不知鬼不觉地在大海上消失。

假如你的邻居把你们家的阳台或者后院当做垃圾场，你会有什么感觉；假如他一边这样做一边在外面谴责你是如何如何地懒惰没有教养没有公德没有良心等等等等，你又会怎么想？

反正我当时特别生气。

更让我生气的是，将工业垃圾引入中国大陆的恰是中国人自

已。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并不存在这一问题。而在此同时，台湾是美国工业垃圾的一个重要储存地。在 80 年代，台湾进口美国的旧电池高居亚洲之首，根据美国方面报道，运到台湾高雄港的废五金，从多氯联苯充塞的变压器到有石棉的旧电池，无所不有。许多废五金在废料场就地回收，没有面具或其他器材来保护工人不受石棉、多氯联苯及金属尘的污染。废五金商人走到哪里，污染就蔓延到哪里。在台湾一些地方，有些河流已经被废五金污染，成为死河，鱼虾不生。

我记得，片中讲述了一个小学校，学校围墙外就是熔铅厂，工人在那里焚烧废弃的电线，砸毁旧的蓄电池，污水流入地下，污染地下水源，那里的孩子们深受铅毒之害，极大地危及肾脏和神经系统。

台湾的商人走遍全美，找废五金的来源，然后搭乘 14 小时飞机到亚洲，亲自监督运送，并且把提炼出的贵重金属回收。每年，在美台之间，工业垃圾的交易额就达到了 1 亿美元。

当台湾环境署终于决定停止这项交易的时候，台商的目标就转到了中国大陆。美国的记者跟踪调查了台湾陈氏兄弟的家族公司东泰国际公司在中国大陆的行径。

陈氏兄弟发现中国大陆的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曾经极度贫困的人们对财富的渴望更加强烈，而这里的法规更加松弛。

美国记者的调查是 1990 年的事情了。他在广东珠海市附近建立了一个废五金回收厂，每月输入 150 卡车的废五金到一座名为国富冶炼厂的空地上，其中 95% 来自美国，包括驾驶牌照、旧电池、发动机、铜线、电脑、镍镉电池、变压器及含多氯联苯的电容器。国富冶炼厂的后面是一个郁郁葱葱的山谷，这成了陈的垃圾场，他打算把废塑胶和有毒材料，如传动系统、空气压缩

器及变压器里的油，都丢到山谷里。

一年之后，《世界垃圾场》在美国的各大电视台播出，一位华人迅速向中国国务院发去了一份电传，报告了陈增平在珠海的作为。据说是国务院领导亲自下令取缔了这一厂家。

那么今天那里怎么样了？陈氏兄弟真的罢手了吗？我很怀疑。

二

在当时，国际垃圾的问题并未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新闻界的高度重视。中国的普通百姓对这一问题更是知之甚少，甚至当他们成了受害者，也并未了解受害的原因。

回到北京，我向编辑部反映这一线索。我们立刻决定到广东进行采访，寻找陈氏兄弟的踪迹。

说真的，当时前景未卜，我们除了知道在珠海有一家叫做东泰国际公司建立的国富冶炼厂之外，而且是3年前的企业，别的线索全无。

我们只有撞大运了。我和刚到报社不久的摄影记者李建泉就这么上路了。

那时候珠海还没有机场，我们先飞到深圳。然后乘船来到珠海。一下船，上一辆出租车，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司机打听：“你知道不知道有一家国富冶炼厂？”

“知道啊，就在金鼎镇。”

“啊！真的呀？”我大喜过望。“金鼎镇在什么地方？”

“嗯——离珠海大概30公里，你坐小巴，到镇上，然后就会有‘摩的’，你给他5块钱，他就会送你去的。”

他说的摩的，是指的摩托车。

到了那天的下午，我们的采访队伍突然壮大了两倍。广州《粤港信息日报》的两位摄影记者听说我们到珠海采访，也没打听具体是什么事，开着车就来了，加上珠海本地的一位新闻爱好者，加上司机，一共6个人。

用不着“摩的”了。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开着车直奔金鼎镇，到了那里，没费什么事，就打听到了国富冶炼厂的具体位置。我们想从正门进去，被拦住了，说是今天休息，厂领导不在，不接受采访。

那家厂在一个小山上，我们围着厂区绕了一圈，决定从后墙翻进去。车熄了火，我们悄悄地绕到工厂的后面。就和小时候玩侦查兵的游戏似的那种感觉。其实一到那里，我就觉得这里似曾相识，这不就是电视片里的那些熟悉的镜头吗？一条小河在山脚下环绕，小河里有一群鸭子，河边有一个寮棚。我们走过去，向棚子里的人搭话。

鸭子的主人说，一到晚上，这里就升起一股很难闻的烟，像是烧塑料的味道。说鸭蛋的产量最近两年减产了两三成，河里的鱼有股子怪味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们从工厂的后墙进入了厂区，这种做法大概不算太好。可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的新闻稿里记录了后来发生的事，转引如下：

出乎我们意料，该厂的空地上依然堆满了大量的废旧电缆和电线，时值礼拜天，厂里静悄悄的，只有二十几个打工仔正坐在一起吃午饭。

“知道这些旧电线是从哪儿来的吗？”

“美国，都是从美国来的。”

“一天能挣多少钱？”

“不一定，一个月拆两吨旧电线，差不多能挣五六百元。”

“你们用什么方法拆电缆电线？”

“电缆好拆，电线尤其是细的电线就用火烧。”

“拆剩下的胶皮怎么处理？”

“有的运走，有的就拿到后面去烧。”

.....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了国富冶炼厂，为避免不愉快的场面，我们请珠海市金鼎镇的一位同志当向导。厂办公室的李主任说，电线不是国富的，是珠海珠明公司的货，又问起陈增平，他说陈早走了，还欠了国富大约11万元，现在好像在深圳和上海浦东都开办了类似的厂。

临别时，那位镇上的同志说：“我们吃亏就吃在把自己的东西让外国人随便拍摄。”我们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三

我和建泉又回到了深圳。我们的广州同行必须回报社复命，没能和我们一同回来。但是，有意思的是，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深圳特区报》、《深圳法制报》的记者也听说了我们的事，积极帮我们找线索、找车，我们又一同去了布吉镇。

布吉是深圳最大的区，因为各种企业众多，因此也成了外来人口最稠密的区。仅这一个区就有企业上万家。我们一不知道企业名称、二不知道中方的合作者，到哪里去查呢？而且，绝对不会有人欢迎并且配合我们。这真的是大海里捞针。

特区报的记者来过这里，好歹是一张熟面孔，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方便。

在我们这个队伍里，只有我一个是文字记者，剩下几个小伙子都比我年轻。所以所有的公关的事肯定是我的。我只好硬着头

皮上了。

“嗯——我们这趟来，是想了解一下废物利用行业的年轻工人们的情况，最好是中外合资企业。您看能不能给我们找几家？”

“废物利用行业……”主人很认真地打开一个个大本子，开始查了起来。

我在一旁如坐针毡，觉得自己很不够意思，怎么可以骗人。细想想，好像也没骗人。

主人又打了个电话，叫专门分管三资企业的同志过来一趟。一位很干练的女士进来了。手里也拿了一个大本子。

我又重复了一遍上面编出来的话。她说，废物利用行业在我们国家是不允许外资经营的。

那么比如什么五金材料厂，比如铜材厂之类的企业有吗？

呃，那个倒是有的，金鑫铜材厂就是和台湾合资的。我给你问问看，他们同意不同意接受采访。

电话那头同意了。干练的女士带我们乘车到了金鑫铜材厂。

一进工厂大门，我的呼吸顿时停止，蓦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山！要不是当时的情形不允许，我一定会激动地大叫起来。说是大海里捞针，没想到一网下去就捞上来了一根金针！

见有那么多的记者，中方厂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把我们让进了会议室。

我们的摄影记者们却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我朝他们挥挥手说：“你们下去转转吧，我一个人采访厂长，你们别打搅我们。”

说实话，我当时小心翼翼的，生怕一不留神，暴露了我们真实的目的，被人家打将出门。这种事发生了不少。

但是接下来，我和厂长进行了一场十分友好的采访。他给我介绍了工厂近年的飞速发展状况。

金鑫铜材厂有着一张令所有从事废旧五金进口商羡慕的通行证，在深圳，这是惟一的一张，由原国家经贸部颁发。厂长因此觉得无比自豪。

“那么与你们合作的外资一方是哪里呢？”

“姓陈，是台湾人，他们家兄弟几个都是干这个的。”

我当时觉得我的心跳又快停止了。

“陈先生现在在这里吗？”

“在，就在深圳，是他们家的老四。”

“您问问他，我想和他聊聊，不会占很多时间的。”

在那座山一般的美国废五金面前，我见到了陈家老四陈增平。陈今年38岁，从事这一职业已有16年之久。据说，陈家四兄弟，老大坐镇美国，搜集组织美国的工业废料，老三是开路先锋，把东泰的触角伸向中国大陆各处，陈增平主要“负责处理工作”，惟有老二，没有加入此列，而是在美国洛杉矶市开设了一家诊所。

金鑫公司每年进口的工业废料约4万吨，营业执照是在1988年3月办下来的。金鑫公司一分厂占地1万多平方米，工人们即在垃圾场就地拆卸五金，回收废铜，废铜在湖南省等地加工成电解铜，然后在这里拉成线材后销售。东泰与金鑫的合作实为互相利用，如果没有金鑫的牌子，东泰就无法合理合法地进口境外的工业垃圾。早在1988年，金鑫与东泰的合作就开始了。

与金鑫合作的还有鑫旺、荣濠、鉴利、爱丝乐等4家台湾商人，这4家企业贩入的境外工业垃圾占地约30000平方米。金鑫尚富裕2万平方米的空场地，等待新的合作伙伴。

铜材之外的东西，比如废塑胶、废渣按规定应该运出国境，但是这样做太麻烦，于是金鑫打了一个报告，希望能够在境内出卖这些废料，海关终于同意他们将剩余物资卖给海关指定的废旧

物资回收站，从这里还可以回收铁、铅、塑胶。

我还听说，在广东清远等地，大量的个体私营企业从事这种进口垃圾的拆卸工作，所用手段多借助火烧，剩余废料任意倾倒在山谷河边。

我们听到了一句顺口溜：要致富，进废物。

记得在当时，我和陈增平以及中方的厂长们交谈时的气氛一直非常友好。这给我的同行们带来了一些方便。四五架像机同时对着那座垃圾山按个不停，我们取到了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那情形似乎像是有人出击，有人掩护。我们配合默契。

取到证据后，我们采访了深圳市环保局。一位老同志满怀愤慨地向我们介绍了这中间的一些背景。但这一介绍却使他招致上级的批评，认为他不该向外人胡说。当然这是小道消息。

大道上的消息有令我们极振奋的，也有令我们不那么高兴的。

回到北京后，我马上写成了这篇《中国，不是国际垃圾场》一文。送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审阅，局长迅速批复：“触目惊心，应该揭露。”

于是，我们在第二天与广州《粤港信息日报》同时刊登此文，并配发照片。

四

不久，全国人大举行招待会，为参加1993年“中华环保世纪行”的记者们庆功。会上，田纪云副委员长和曲格平同志专门又提到了《中国青年报》，提到了这篇文章，说一定要严肃处理。

文章引来了各地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令我们想不到的是我们的另一部分同行的行为。当时一个采访团恰在深圳，团内有国

内最重要媒体的有关负责人。据说也打算采访国际垃圾场这一线索。没想到我们已经刊发了，于是就有人很不高兴。建泉好心专程去为他们引路，却被人训斥为年轻，办事不牢靠，明明人家是收旧利废办好事，怎么能说人家污染环境呢？并且还有人想从正面来歌颂这里如何在注意保护环境的同时利用了废物。建泉据理力争，并拿出几天前拍摄的照片，对方不说话了。

又过了一个月，“中华环保世纪行”组委会为1993年的环境新闻评奖。评委中有人提出，《中国，不是国际垃圾场》一文失实，不能获奖。

本报的回答十分明确：“如果‘垃圾场’一文不能获得一等奖，我们《中国青年报》将拒绝所有的奖项。”

几天后，我终于站在主席台上领取了这一年度“中华环保世纪行”好新闻一等奖的证书。

这一年，本报的甘肃记者孙凯写了《长江，还能负载我们多久》，河南记者王方杰写了《流不尽的是忧伤》，等等，都是极具震撼力的好新闻，好文章。但是只给了我们一个一等奖的名额，给我了。我总觉得，这个证书之外，似乎还有些别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这篇文章到底对中国的环境问题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但我知道，从那之后，中国的各种新闻媒体、各地的环保机构开始密切注视这一问题，国家环保局中国海关总署重申——严格控制境外有害废弃物入境，并为此重新颁发了规定和废弃物标准。

当洋垃圾终于成了过街老鼠的时候，它就会对自己的行为掂量掂量、揣摩揣摩，观观风向，总不至于大摇大摆、毫无顾忌了吧。

我太天真了吗？

时间：1993 年 10 月 28 日至 12 月 30 日

作者：叶研 张志钦 李方

谁对新生儿生命负责

叶研：生命调查

谁对新生儿生命负责

1994 年 10 月 3 日出生于沈阳市妇婴医院的李庆一的孩子 10 月 31 日送中国医科大学门诊部进行抢救无效，当日死亡，这是目前所知，在沈阳市妇婴医院暴发柯萨奇病毒感染以来死亡的第 18 名婴儿。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今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18 日停止接收产妇，该院出生 244 名新生儿。其中发现近 50 名感染。沈阳市妇婴医院对疫情没有及时报告，也没采取有效的控制办法，并继续接收产妇至 10 月 18 日，致使被感染和死亡的婴儿增加。

这 18 个哭声嘹亮的男婴、女婴再也回不来了。死亡诊断书上“年龄”一栏以“天”计算。最小 8 天，无人超过 20 天。

十几个眼神呆滞的男人聚集在一起，人们不敢正视他们那种

眼神。

晚婚的刘宇砂把爱人的分娩医院选在了沈阳市妇婴医院，他说：“我母亲徐惠兰是那里的老职工，是累死在岗位上的。让孩子在那里出生，是对老人家的一种纪念。”

10月9日，小生命来到了这个人世。看着把他们夫妇俩的优点集一身的小生命，他们满怀欢喜。高高的鼻梁，他俩想，这孩子长大了一定不难看；长长的手指，他俩坚信孩子将来会成为出色的钢琴家。

然而，孩子仅活了11天就死亡了，他难以相信这个事实。静下心来，他记得，那天他送妻子住院时，有人说：“这医院出事了，你们还不知道？”但又有人悄悄告诉那人：“产妇是徐惠兰的儿媳妇。”那人欲言又止。回想起来，刘宇砂很是心寒。他在医院里哭喊：“母亲呀母亲，您怎么就这么没有人缘，有人明知医院有感染，却不愿告诉您的儿子！”那天他为孩子输了第一次血，先后两次共600CC，并在抢救时亲手按住孩子身上的出血点。最后他看到裹着孩子遗体的小包裹放在一处墙角时，才大放悲声。他紧紧抱住死不瞑目的女儿，痛不欲生。

每天早上，不知真情的孩子的母亲就催他快去医院看看孩子的病情；晚上，刘宇砂想尽办法编出一些情况来哄骗妻子。“今天孩子的体温降下来了，也开始排尿了。”

在这一批死亡婴儿的家长中，赵伟安夫妇年龄最大，他43岁，他妻子40岁。

中年丧子的痛楚使得赵伟安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人们说：“赵伟安夫妇是不幸中的不幸。”两年前，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长到12岁时，在一次事故中不幸身亡，妻子冒着生命危险剖腹产下了这个孩子，又没了。

赵伟安说：“我没做什么孽呀，老天爷怎么给我这样的报

应？”

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他妻子在他怀里不住地流泪，他安慰妻子：“孩子快好了，别老哭哭涕涕的。”关了灯背过脸去，赵伟安自己却落泪不止。

王凯军的妻子有慢性肾炎，十月怀胎产下一个女孩。10月4日，孩子在家里出现病症，被送回医院治疗。40分钟后，大夫从急救室出来告诉王凯军，孩子99%没有希望。王凯军一听急了，告诉大夫：“只要有1%的希望，我们全家砸锅卖铁也要抢救。即使孩子将来残疾了，我们也要。”抢救无效。

每天他回到家里，妻子都吵着让他把孩子抱回来。不曾想，10月20日辽宁电视台简单地报道了沈阳市妇婴医院新生儿大面积感染的消息被他妻子看到了，从那天起，他妻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再也没说过一句话，整天一个人呆坐着，不吃不喝，满嘴起泡。

10月2日，李东旭打的送他那位即将分娩的妻子去医院生产。车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司机问：“是去市妇婴（医院），还是去省妇婴（医大二院）？”李东旭想，自己兄妹几个都是在市妇婴医院出生的，就去那儿吧。事后他自己说：“万万没想到，我的这一选择，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了死亡。”

死亡婴儿及受感染还在抢救的婴儿的父亲们白天聚集在一起，向有关方面反映他们查清事故的要求，虽然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但他们仍顽强地在坚持着。

然而，他们不敢回家。

隐瞒疫情要负什么责任

谁对转瞬即逝的18条生命承担责任？

“柯萨奇”？

那么导致“柯萨奇”蔓延的究竟是“偶然”还是失职？

假定是“偶然”，用什么办法才能杜绝这种“偶然的”巨大悲剧再次重演？如果有失职，又当如何区分、确认这里“职”与“责”的关系？

谁也不希望发生的悲剧发生了，谁也不希望出现的新闻在继续；关注人，关注生命，就是关注我们自己，逝去的永不再回，但对社会、对未来的责任，就抓在我们手里！

现行法规能否对“柯萨奇”构成约束，这是记者近日关心的主要问题。

新华社沈阳11月8日电中称：“辽宁省卫生防疫站一位权威人士说，集中发生同样三个病例以上，就应向防疫部门报告。但是，沈阳市妇婴医院没报告，也没采取有效的控制办法……直到10月18日才关闭产科病房，致使被感染和死亡的婴儿增加。”

本报记者阅知，有关法律就传染病防治及其细则均有明确规定。

据1989年2月21日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三章第二十一条：

“任何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都应当及时向附近的医疗保健机构或者卫生防疫机构报告。”

“执行职务的医疗保健人员、卫生防疫人员发现甲类、乙类和监测区域内的丙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必须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限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卫生防疫机构发现传染病流行或者接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炭疽中的肺炭疽的疫情报告，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立即报告当地政府，同时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第二十二条：

“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

另外，还有关于报告时限及报告办法的规定。

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肺炭疽病人及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时，在城镇应于 6 小时内，在农村应于 12 小时内以最快通讯方式报至发病地所属县（区）卫生防疫机构，同时报传染病报告卡，接到疫情报告的县（区）级卫生防疫机构应逐级报告上级卫生防疫机构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政府。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时，在有通讯条件的地区、城镇应于 12 小时内，在农村应于 24 小时内向发病地所属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出传染病报告卡。发现暴发疫情时，应以最快方式报告疫情。发现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应以最快通讯方式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

柯萨奇病毒不属国务院公布的甲、乙、丙三类传染病，因其较罕见，未列入。但是，法规中关于适用于“疑似病人”和“暴发疫情”的规定是否适用于类似本次沈阳市妇婴医院的事件，尚需进一步向有关部门，有关专家咨询。

追踪“空气”

11 月 8 日，记者为沈阳新生儿感染死亡事件前往市卫生防疫站。

因为空气传播是卫生部专家组提出的柯萨奇病毒的主要传播方式之一，还因为今年 5 月沈阳市卫生防疫站对市妇婴医院进行过例行检测，据悉检测结果，该院“空气含菌量严重超标。”

防疫站接待人员明确表示：“凡是涉及市妇婴的事，找市卫生局谈。”

11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沈阳市卫生局，被告知局领导“今天上竿全部外出”。

记者随即赶往沈阳市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卫生部派来的专家和市卫生局领导在该院五楼会议室分别听取死亡新生儿家属代表和市妇婴医院的陈述。楼道里，记者请主管鉴定的市卫生局领导向市卫生防疫站打个招呼，请他们接待采访。

该领导表示“得由分管的局领导来安排。这位领导现在外出差”。记者表示理解。

11日，沈阳市卫生局局长告诉记者。

“我们没有规定不接受。没有见过采访还要经过我们的。采访是新闻单位的权力。”

下午，记者再次来到市卫生防疫站，又问市妇婴医院空气检测结果一事。站领导说：“空气传播是这次感染的主要传播渠道之一——这是专家的说法，我不完全赞同。我认为主要是粪口传染和接触传染，但不排除空气传播。”

站领导认为“5月份的检测结果和这次柯萨奇联不上。”

记者问：“那么空气含菌量是否反映医院消毒防疫工作的状态？”

“我们一年检测一次，防疫站今年对该院的检测是在5月下旬。如果在一月一次的封闭消毒之前的那几天就不能完全反映它的工作状态。”

记者问：“防疫站在检测之后是否对该院发过检测不合格的通知？”

站领导：“我们建议他们加强管理，作为指导，提醒一下。从现在报上报道的消息看，如什么暖气刷银粉，消毒怎么样啦，

隔离怎么样啦。从这些报道看，应该是什么状态就清楚了。”

记者理解。“空气追踪”到这个份上，可以停手了。

等待院长

11月8日沈阳市卫生局作出决定，该院院长樊世荣停职检查。

11月12日9时，记者带着诸多疑问冒雨赶到沈阳市妇婴医院采访樊世荣。

9时15分，记者敲开该院办公楼三楼会议室，院领导正在开会。

记者问：“请问，樊院长是否在这儿开会？我们想采访院长。”即有人请记者到院办公室，但不回答樊院长是否在会议室，9时55分记者再次来到会议室外，想等散会后见见樊院长。院党委书记从会议室出来，记者又问院长是否在这儿开会，书记请记者到党委办：“来吧，先到这边坐坐。你不是想采访院长吗？我肯定给你安排。”

一名记者从命，来到党办公室。另一名记者在会议室外继续站着等候。10时15分会议室散会，与会者先后在记者眼前走过。

记者见会已开完，又请书记同院长联系一下，书记出去一会儿回来说：“今天恐怕不行了，不知道院长到哪写检查去了。”记者想给樊院长家打个电话，书记表示不知道号码。

记者说：“我们知道。”

书记说：“我这个电话打不出去。”

电话一点没毛病，可以打出去。

说到停收产妇的时间问题时，书记说：现在看来，是（关闭

产妇)晚了。10月14日我们院有人说可能是柯萨奇,我们抽了8例血样送去化验,……如果14日做出来(查出柯萨奇病毒)马上就关门。你们的报道还……跟得挺紧的。

记者:“那是,人命关天。”

记者又请书记帮着找一下院长,如院长不愿或不便或没时间接受采访,请明确告诉一声。下午两点半,记者等候院长没有音讯,到院长办公室请值班人员找一下副院长。因为有些问题问一下副院长也可以。

11月12日,雨。记者从上午9点15分等到下午5时,计7小时45分,没有见到院长。

当日上午,樊世荣在沈阳市妇婴医院三楼会议室开会。与会者包括院党委书记都知道记者等着采访樊世荣,而且知道记者不认识樊。

10时15分散会,樊世荣从等待他的记者跟前走过。

患儿家属走入“怪圈”

沈阳市卫生局11月12日“根据卫生部专家调查结果及市医疗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结论:‘此次事件构不成医疗事故,但该院对此事负有一定的责任’……本着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及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的原则”做出了善后处理(经济补偿)意见,并于11月下旬开始通知家属(含患儿死亡和存活两部分)。

据了解,由于多数家属对鉴定结论和善后处理意见存有疑议,到目前为止仅有10余位家属在善后协议书上签名,而包括绝大多数死亡新生儿家属的近40名家属拒绝签字。

个体服装经营者李庆柱的儿子9月28日生于妇婴医院,10月5日因感染送入医大二院,10月19日出院。

李庆柱就他去市卫生局签名的事回忆说：“11月23日左右，市卫生局一位姓杨的呼我的BP机10余次，我回电话，杨说让我去卫生局签名处理善后，他说家属基本上全来了，大家基本上都签名了。我赶去卫生局，再次问家属是否都已签名，杨回答说基本上都签了，只剩下个别几个婴儿死亡的家属还没签。于是我就在协议书上签了名。

沈阳市医院技术鉴定委员会于11月10日就婴儿集体感染事件做出鉴定结论，并于结论后面注明：“医患双方如对此鉴定不服，可在接到鉴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卫生部门申请也可向法庭起诉。”

患儿家属对鉴定结论不服，于11月18日去辽宁省卫生厅要求重新鉴定，该厅信访办的答复是如果重新鉴定，仍需根据沈阳市卫生局提供的申报材料。鉴于省卫生厅工作繁忙，建议患儿家属去法院申请，由法院来委托他们鉴定会好些。

11月18日至20日，患儿家属去沈阳和平区法院行政庭申请，该庭认为应回沈阳市卫生局拿出行政处理意见给他们才可以受理。

11月20日至27日，患儿家属多次去市卫生局索要行政处理意见。卫生局认为对妇婴医院的调查尚未结束，故尚未形成行政处理意见；何况根据有关规定，出示行政处理意见也存在一个合法合理的手续问题。

在此期间，患者家属多次奔走呼号于省市各级行政、司法部门，各部门均表示愿意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只是因合法手续等原因而使问题无法进展。

患儿家属代表刘宇砂认为：鉴定书有关如不服在十五日内如何，现在看来只是留下一条走不通的路。他们将继续“打起精神”呼吁此事，为了死去的孩子，为了对在这次感染事件中幸存

的孩子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安排，更为了千千万万个已出生或未出生的孩子不再遭此悲剧。

记者手记

生命调查

我怀念 1993 年。那一年中,《中国青年报/社会周刊》对 20 多个新闻事件进行了连续追踪报道。大量的调查性的事件报道构成《社会周刊》的鲜明特色。其中关于沈阳新生儿集体感染死亡事件在 4 个月的时间内发出了 10 组近 30 条信息,是这 20 多组连续报道中反应最迅速、最敏锐,时间跨度最长,篇幅最多,信息最密集、最充分的一组报道,同时也是一组调动人力最多、采访最艰苦的调查性报道。报道引起社会广泛重视,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人民日报》等随后都加入了报道。1994 年八届二次全国政协会上,7 名政协委员就此提出提案,要求对沈阳市新生儿感染事件进行重新鉴定。

那年《社会周刊》刚面世,就制定了“周二发稿部署”和“B 日快速反应计划”。“B……计划”是假设新闻时间发生当日为 A 日,在现有交通、通讯条件下,尽一切努力在第二天发出新闻的操作方案。“周二发稿部署”是根据《社会周刊》周四出版而制定的工作流程。即出刊日所有编辑记者开会,研究下期选题并

在五、六、日采访，周一写稿、周二发稿这样一个工作程序。

关于那年《中国青年报/社会周刊》的业务实践，周刊同仁经过研讨，每人写了一篇论文，《青年报人》出了一期专集。后来的新同事和实习生要了解周刊，就拿一本专集看看。其中在社会新闻的价值判断上，多数文章采取了一个社会科学的普遍标准——关注人、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命运。这成了我们当时判断新闻量级的一个外部指标，即死了人没有，死了多少人。因此，再也没有比“20个新生儿的死亡”更震动我们的神经了。从理性到感情，谁也不能漠视20条生命。

1. 连续追踪——对较长过程的重大事件始终保持关注

1993年10月21日，《社会周刊》出刊，所有人集中开会“发动”下一轮的报道。这时沈阳来了个长途，通报沈阳市妇婴医院发生新生儿集体感染事件，而且死亡人数仍在增加。我和张志钦当晚乘机赶到沈阳，23时见到第一批死亡婴儿的父母，即展开周密采访，于当月28日发出第一组报道，很快向公众报告了这一消息。

因为医院感染造成刚刚出生的婴儿接二连三地死亡的事件本身关系重大，引起了社会震动。我们对这一较长过程的事件始终保持着关注，并对事件的各阶段进展进行了连续报道。即现在经常说的实时性报道。后续报道及时对有关查清病源、患儿救治、造成医院感染的原因、事件调查鉴定、医患纠纷等读者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信息，使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情况的要求得到满足。

2. 把握证据——对复杂事件进行深入扎实的调查性采访

只有准确才谈得上客观公正。而在有些调查性报道中事实准确不仅在于对事实的判断准确和叙述语言准确，而且在于直接把握证据。

这是多年来我（或许还有别的同事）参与调查性采访的一个

重要心得。曾有位资深编辑和我有过一次交谈，涉及到证据问题：

——（编辑）这一段为什么没写？

——（我）情况复杂。

——复杂就不写了？那你记者的判断呢？

——记者判断当然有，但不能照判断写。事实和判断是两回事。不仅不能根据判断写新闻，而且有时对已知事实仍然不能写。特别是涉及利益冲突的报道。

——为什么？

——没弄到事实的证据。如：现场记录、录音、文件，当事人不愿作证等等。一旦报道事后发生诉讼，能在法庭上证明报道没有谬误的，是法庭认可的证据。

——那怎么办？

——收集证据。如果10分事实，6分证据，报道里就只写6分。

沈阳新生儿集体感染死亡事件是典型的专业性强、后果严重、情况复杂、牵涉到责任与利害的那一类新闻事件，不仅采访异常艰苦，而且必须头脑冷静、态度严谨、调查细致，对于见报事实反复核实、严格把握。所有见报细节都要有充分的直接证据，不允许有一点点、哪怕是对于某个细小环节的主观推断。比如对新生儿死亡数的认定，除家属口述外，要拿到孩子的出生证明和死亡诊断书；对某一场合发生的情况，如宣布妇婴医院停收产妇，其时间、地点、人物都要经过不只一个方面的印证方可确认。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要求，一方面也是对事实负责、对当事各方负责。有时，宁可掌握十分情况报七分，或掌握了情况一时不报，而绝不把话说满。其主要考虑除有利于事件的公正处理，争取较好的社会效益外，根本的就是一定

要把握证据。这也是时代对新闻的要求——报道者要为自己的报道承担法律责任。近几年的情况表明，敏感的新闻报道完全有可能转而成为法律上的官司，因而关键性的采访材料应同时具有法律上的证据效益。为了做到直接把握证据，我们的记者在严寒季节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京沈之间，而且由于事件的复杂背景，往往投入成倍的艰苦劳动才能得到有限的效果。

感染医院的院办主任说：“死了多少新生儿的数字是个科学的问题，哪能瞎报呀……”我说：“没错儿。”潜台词是：“到法庭咱们再看证据，我报了几个我拿几套证明。看看谁讲‘科学’。”

但是明知该院在婴儿集体死亡后还开会组织各科伪造假病历，明知新闻界同行握有会议记录，我们却没报。因为记录没在我们手中。我和李方后两次去沈阳都是奔着会议记录去的，未果。一位编辑部领导听了汇报后说，这样如果报了的话，我们是被告，那个新闻单位不是当事人，可以出庭作证，也可以不出庭作证。我理解，这就是“直接”掌握证据和“不直接”掌握证据的区别。

因为始终坚持这种严谨态度，因为占有证据材料，《中国青年报/社会周刊》对沈阳新生儿集体感染死亡事件的整个报道具有一种不容置辩的冲击力。

3. 客观公正——从众多角度观照同一事件

我们从多次调查性采访的经验和教训出发，形成了对存在两个以上当事方面的事件过程从当事各方角度去考察事物的习惯作法，而且形成了在可能的条件下直接从这些角度进行报道的作法。前者有助于我们避免片面性，而后者则体现了舆论应有的公正。在总体事实清晰的前提下，有限地保留各方在枝节问题上不尽一致的陈述。这样既保证了当事各方陈述情况的同等机会，给读者以一定的判断余地，也有利于避免以往由新闻媒体对存在纠

纷的枝节问题作出判断的尴尬情况。事实证明，这种容许在具体问题上保留不同陈述的作法不仅没有影响报道的确定性，而且加强了报道的准确性。

在沈阳新生儿集体感染死亡事件的报道中，我们从第一组报道开始就注意从当事有关各方的角度展开组织报道。整个报道涉及了感染医院、救治医院、患儿家属、卫生管理部门、防疫部门、有关专家等不同角度。

客观性当然有多层体现。但最起码的是叙述事实。第一是事实，第二是事实，第三还是事实；第一是叙述，第二是叙述，第三还是叙述。

调查性报道因为涉及利益关系，出不得丝毫差错。对象配合报道或对象阻挠报道，所造成难度上相差极大。第三次去沈阳，是我和李方一道去采访院长。一大早院长被我们堵在了会议室。书记出来说：“你不是想采访院长吗？我给你安排。”而且百般“热情”地要求我们去她办公室坐，直到拽我胳膊的地步。我被一名中年妇女拽着，不得不就范。但我大喊：“方子，你守在会议室门口！没我的话别离开！”后来，等了一整天，书记却又都说院长找不着。在会议室里，与会者在门边站好，把院长夹在中间，突然一群人涌出会议室。李方真顽强，一人追着一群人拍了6张片子，直追到楼梯拐角。这天我们故意在书记办公室一直坐到天黑。回京后，请人辨认了照片上谁是院长，登出了院长照片，并配文《等待院长》，讲述了院长利用记者不认识他，当面从记者跟前逃开的过程。所照、所写，都是事实。对方无话可说。有资深同仁说，“调查性采访干到这份儿上，也算到顶了。”对调查性报道来说，肯定没有顶，但那院长是下了台。

不仅在院方，在有的主管部门，在该市的防疫部门都遇到了采访阻力。记者对感染病毒的“空气传播”追到了防疫部门。领

导对记者的提问缓慢而强硬地说：“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你。”防疫是事关大众健康生死的问题，而这位领导对公众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的知情权就可以作这样回答。于是有了《等待院长》的姊妹篇《追踪空气》。报道仍然只在讲述事实，但有人在出现了新生儿集体死亡事件之后，因一己（一方）之利对抗采访的嘴脸呼之欲出。

4. 调动多种报道手段——使读者轻松方便地了解情况

1993年我们尝试并大量使用了以多种手段对某个事件进行报道的做法。即以一篇主干消息为中心、数篇报道进行信息补充，以消息为主、运用各种样式的信息进行全面报道的做法。

在信息传播日益加快的形式下，长篇通讯的适应性在缩小。一是现在再弄大通讯显得太慢，用统一结构处理全部信息极不方便，吃力不讨好。二是读者阅读时间缩短，阅读情绪浮躁，很少仔细读完一篇长东西。主报道与相关报道组成的散篇集束报道砍去了所有信息之外的抒情、议论，省去了启承转合、上下呼应之类文字，拼接组合灵活、信息密集、制作快捷。并为前面提到的多种角度的报道提供了方便。而且，为了使信息表达直观明快，还采用资料表格、示意图、照片、大事记、观点访谈、专业引文、知识介绍等方式，力图对事件进行全面、充分的描述。其信息的丰富性还可能超过同等规模的大通讯，给读者的印象也更生动、强烈。

报道的前后方连接非常成功。第一组报道是李方在编辑部深夜值班处理的。主打新闻是200字左右的消息。头条位置是死婴的父亲扑向小小尸体的大幅照片。事件经过由“事件时间表”交代。最震撼人心的是一篇特写：产妇并不知道新生骨肉已死，为了把真相瞒一段时间，十几位死婴父亲不敢回家。

时间：1993 年 1 月 15 日至 2 月 15 日

作者：张建伟

中国第一村揭秘

张建伟：探视农民帝国

中国第一村揭秘

“奔驰 600”：大邱庄的图腾

奔驰 600 型超豪华轿车国内罕见，大邱庄目前也只有一辆，是该庄企业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禹作敏的坐骑。

按照中国的行政级别，每天来大邱庄的 2000 名访客，随便拉出一个来都比禹作敏的官大。他们大多本来是带着“取经”的目的千里迢迢来这里的，但一看到那辆奔驰车静静地停在像宫殿又像城堡的大邱庄办公楼前，便摇着头说：“没法学！”

这时，“没法学”就像“没法说”一样带有意深长的情绪。对此，禹作敏说：“带着封建的思想来看大邱庄，一是学不了，

二是不理解。”这就更让一些来访者愤怒。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封建”。

一位记者来大邱庄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坐这样豪华的轿车，别人怎么看？”

禹作敏回答：“问这种问题本身就是不懂商品经济。在我看来，坐卡迪拉克、奔驰汽车本身就是一种投资环境。大邱庄已经和美、日等国建立了30家合资企业。如果我们还像过去那样骑着毛驴、腰里揣根旱烟袋、头上包块白羊肚毛巾，一副穷酸的老农形象，外商敢跟我们合作吗？”这时，“奔驰600”有了经济含义。

一位在职的官员曾质问禹作敏：“中央各部的部长都不坐这么豪华的奔驰，你是什么级别，你敢坐！”

禹作敏回答：“我们农民没有级，别拿我们跟有级的比！”

这时，“奔驰600”成了敢与“官本位”抗衡的象征。

一位已经离体的高干对禹作敏说：“我是流血流汗扛枪打仗过来的，现在也才坐一般的轿车！”

禹作敏很客气地回答：“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这时，“奔驰600”成了跨越历史的媒介。

所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汽车含义，都是外部的压力成就的。而对于4500多大邱庄人来说，禹书记的“奔驰600”是大邱庄的生产力图腾。

“禹书记的车在那哩！”每天，大邱庄人上班路过村办公楼，只要见到那辆“奔驰600”，心里一准这样想一下。

中国的农民不会说官话，他们这样“想一下”，也就是“农民的政治”了。

一个村民说：“俺就是这样，只要看见禹书记的车在，就放心了，要是不在……”

说个故事：禹作敏曾多次挨整。有一次，“上头又整禹书记了”的舆论在大邱庄传扬开来，看报纸，果然正在批判禹作敏说过的话。村民们去瞅禹书记的车，不在，便都慌了。头一天，大家还忍着，第二天，见禹作敏的车仍不在，便开始去银行存钱，以备“后事”。直到禹作敏的车又出现在办公楼前，才安心，说：“没事了，禹书记又回来了！”；便仍然是每天工作12小时，“放开胆子和禹书记一起富！”后来，禹作敏知道了他的汽车居然还有这样的作用，便在由于外界的压力而人心容易动荡的时候（例如又风闻要整他或批判他说的话时），把他的奔驰车整天停在办公楼前，而他乘别的车外出。

在大邱庄，本来并不需要玩什么政治的、只想一心致富的农民，把“奔驰600”当成“政治稳定的定心丸”。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禹作敏后来总结他面临的一次又一次“奔驰事件”说：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敢于先富起来，实际上是在为企业中的能人富起来承担政治风险。大邱庄并非只有他禹作敏一个富，但“炫耀”最富的总是他禹作敏。他实际上是在说：我就是首富，谁要“杀”富，就整我一个人好了！

他果然为此几次挨整、遭非议。他知道这就是政治。他回避不了。那好，他一个人担着。他因此成功地使大邱庄人一次又一次地摆脱了那些莫名其妙的政治旋涡，一门心思搞生产力。大邱庄只有一个政治家，就是禹作敏。

去年11月，香港记者方凌造访大邱庄，刚到村口，一辆豪华奔驰迎面而来。按照大邱庄的礼宾规定，远方来的贵宾，需接受大邱庄的专车迎接。在大邱庄，这样的礼宾车（都是奔驰）有16辆。这位香港记者觉得“受宠若惊”，对大邱庄的富裕和气派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西方或港澳的所有记者都不会理解奔驰车在大邱庄的图腾

含义。

一位西方记者问：“大邱庄已经这样的好了，它还能有多好，发展还能再快吗？”

大邱庄企业集团公司总经理禹绍政指着禹作敏的奔驰车像开玩笑似地回答：“老头（大邱庄许多人亲切地称已经 63 岁的禹作敏为老头）的车有多好，大邱庄就能有多好；老头的车开得有多快，大邱庄的发展就有多快。”

这像玩笑的话绝不是玩笑。

反弹琵琶不走调

最近的信息表明，“重视农业”的呼声再次受到重视。与此相对应，新闻再次瞩目大邱庄，“富了不忘农业”成为关注大邱庄的焦点。

大邱庄的农业现状的确像神话一样传奇。

大邱庄只有三个人种地，种 4800 亩地，亩产吨粮。这三个“种田人”都有高级农艺师的职称，在他们的背后，还有一支由 240 名专家教授组成的农业顾问团。

大邱庄是个盐碱窝，但在一米多深的农田下面，交织着密密麻麻的排碱暗管，有真空泵自动抽排地下涌上来的碱水。这一措施使颗粒难收的盐碱地成为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去年，大邱庄为建设百亿元工业区占用了 1800 亩农田。但同时，大邱庄又垦荒 1800 亩，并有能力使之再成吨粮田。

大邱庄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从播种到收割、打轧，有 50 多台、套世界一流的农业机械伺候着。

中国的农业专家指出：大邱庄的农业已经“五步成龙”：完成了农田基本建设，搞了科学种田，实现了机械化，养殖业全国

第一，“立体农业”已经起步。大邱庄的农业发展令人陶醉。

在中国版图上，像大邱庄这样的自然村多达 100 万个。从中央到地方都希望它们像大邱庄一样“重视农业”。

然而，你也得像大邱庄一样对农业“重视得起”——

大邱庄为改良土壤结构，搞了 8 年秸秆还田。这一看起来十分简单的措施背后，是 100 多户农家做饭取暖不用烧柴。

为搞地下排管，大邱庄仅此一项就投资 3000 万元。

世界一流的机械化装备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有一个大邱庄“重视农业”的事例让人感动。大邱庄去年 3 月就作出了建设百亿元工业区的决定，但建设即将开始的时候，正是地里高粱红的季节。1800 亩尚未最终成熟、收割的高粱一旦毁掉，即使对已经巨富的大邱庄农民来说，也是一件心疼的事情。于是，大邱庄领导层决定：高粱收割后再建工业区。但大邱庄的工业是市场经济，“工业区必须今年建成，以抢占明年的中国市场”。为此，大邱庄要求基建队伍“抢时间”：按照大邱庄领导给出的竣工时间表，早竣工一天，大邱庄将给予“承包总额 20% 的奖励”，而这一工业区的总投资是 7 亿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 1800 亩红高粱。

在目前的中国，只有大邱庄有能力对农业重视到这份儿上！而这种“能力”（说得粗俗一点：“你有钱重视农业吗？”）的获得，在大邱庄有一个历史的反弹过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徽的小岗村农民用血手印宣告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大邱庄的当家人禹作敏走了另一条道路。

他回忆说：当时他三天三夜没合眼，每天抽 3 包烟，一个人在团泊洼的盐碱滩上走来走去。他考虑的是，大邱庄人均一亩盐碱地，即使承包到户了，大邱庄人就真能富起来吗？大邱庄的农

业就能腾飞了吗？他的回答是“不”。没有理论，只有经验支持着在当时来说太大胆的这个“不”字：解放前的大邱庄有两户地主，只管“土里刨食”的那个地方，尽管是个剥削阶级，可也是个穷地主；而那个在城里有产业的地主，才真是个“财主”。农民不会也不能不爱土地，但必须先富起来，有了向土地投入的能力，农民才能“爱得起”土地。

于是，在全国农民风起云涌搞“包产到户”时，大邱庄的工业已经起步。当中国的农民意识到“乡镇企业”的时候，大邱庄的工业发展已经到了有能力向土地进行高额投入。

反弹琵琶，但没走调。大邱庄的农业“死去活来”。

现在，率先搞乡镇企业的大邱庄已经巨富，大量的农业投入使它的农业发展中国第一，甚至在某些方面世界第一。

“重视农业”的第一要义是大量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这是毫无疑问的。

世界公认，美国的农业发达，但在这一发达的背后是：农业每创收0.5元，国家向农业返还投入1元。

中国呢？农业每创收10元，国家向农业返还投入1元。中国国民收入总值的37%来自农业，但每年国家给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只有3%。

而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农业创收和国家返还投入的比例大致是2.5:1。

不能设想中国100万自然村都像大邱庄一样走一条农业“死去活来”的道路。但也不能设想没有巨大的投入能够使农业在一两年里飞上天。

不能要求中国100万自然村都像大邱庄一样“以工养农”、“以工建农”，但起码应像大邱庄一样“富了不忘农业”。

不能要求中国所有的有关部门都像大邱庄一样对农业“爱”

到不计成本地投入，但起码应减少一点对农业的剥夺！

而且，大邱庄告诉我们，投入农业，农业将双倍回报：1992年，大邱庄农业公司的产值达到4.5亿；按照发展规划，到2000年，大邱庄农业公司的产值将达160亿元。届时，大邱庄农业综合发展的产值将超过大邱庄的工业公司。

经济政治学

“胜利在于经济”是“禹作敏语录”，它诞生在去年10月“十四大”闭幕时。那天，禹作敏听十四大的报告后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向董事会成员和五大企业集团的总经理们作了《加深理解一百年不变的方针路线之三》的报告。“胜利在于经济”是该报告的主旨。

这句话本身就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像中国的所有企业一样，大邱庄不能不问政治。

1985年，大邱庄已经富了，禹作敏也成了名人，开始受到瞩目。就在那一年，他说了一句顺口溜：“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就是大邱庄的“经济政治学”，它说的是：“完美的经济效益之花，必然结出丰富的政治之果。”它把曾经被颠倒了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颠倒了回来。

这是农民语言。对大邱庄人来说，这句话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意思。它遭到了长达5个月的新闻舆论大批判，甚至直到今天没人敢提这件事。

当时禹作敏的头脑里刚孵出这句话时，就有一个有头有脸有学识的人“警告”他说：“这句话要说也得改改，把‘钱’字改成‘经济效益’，把‘前’字改成‘共产主义’。否则准惹麻烦！”

禹作敏说：“你到商店里买东西给钱的时候说什么？说‘给

你10块经济效益’？”

大批判真的来了。第2年，经济学家于光远赞扬了禹作敏的这4句话，把它刊登在一家小报上，以后，他就不再安生过。

这次批判的中心点是：禹作敏的话是“一切向钱看”，因此是“资产阶级的”，也因此是“政治方向性质的错误”。这种声音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

去年10月，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批高级官员参观了大邱庄，禹作敏向他们介绍情况时又提到了这4句话。

他把这4句话又说了一遍，然后一挥手，发出一连串的问题：“你们都是高干，难道你们就真的不喜欢钱吗？你们不也知道物价一个劲上涨，工资不够花吗？你们高干的工资不也比一般的干部高吗？难道你们就不想过富裕日子吗？国家建设，没钱行吗？我不过是说了你们也想说而不好说又不敢说的话罢了！有什么错？”

他接着说：“我是个农民大老粗，说了这几句话，还没错，只是让一些人听了不顺耳，就批了我4个月，在一个农民大老粗身上下这么大工夫，这也算是能耐？”

据说，当时在座的，对禹作敏的话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但5年前，没人给禹作敏鼓掌，当时的舆论恨不得要把“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禹作敏给吃了。

1987年4月29日，在禹作敏的话被批的第5个月，农业部召开企业家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薄一波同志问禹作敏：正在遭批判的那4句话是谁的发明？

禹作敏说：“是我的。与别人无关。”

薄一波同志问禹作敏，那4句话的原本意思到底是什么？禹作敏作了解释。

薄一波同志说：“你说得很好，没错。”

此后，报刊上的批判停止了。

禹作敏把这种跟风政治归结为“穷光荣”、“左有功”、“假得利”、“风得势”……

一天，禹作敏问一个来访的乡镇企业家：“你每月的工资多少钱？”

“200多块。”

“那你怎么抽得起‘三五烟’？”

“啊，是这样，我安排我弟弟开了一个商店。烟是他提供的。”

这就是说，一个企业家，他本身不能“豪华”，但可以让他的亲属“豪华”，然后把这“豪华”反馈给他。禹作敏认为：这就是中国经济领域的通病——把搞经济变成了玩“政治猫腻”。

改革也是政治。大邱庄是改革的产物，当然也就是政治的产物。但在中国的许多企业，越是改革，经济运行和机构设置就变得越是复杂。禹作敏认为：这不是改革，这是给自己做套自己钻。改革就是把复杂的东西变得简单——这就是大邱庄的改革观。

大邱庄党政一体：董事长禹作敏兼任党委书记；总经理禹绍政兼任团委书记，依次类推。大邱庄没人“自己跟自己扯皮”。“这能保证你大邱庄不姓资吗？”有领导问禹作敏。禹作敏说：“我们农民没有权利姓资。党中央绝不会姓资。”

大邱庄妇女回家。这曾经是闹得最为沸腾的大邱庄新闻之一。舆论都把它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来考察，把它称为“妇女政治地位问题”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前进或倒退问题”，只有禹作敏没把它当回事。被记者们问急了，他提出了个“生产力原则”。

“你们别老说妇女解放的理论，我没研究。但说妇女就业人少了，就不是解放了，我不赞成，学大寨那阵子妇女们都出工，

可一个分值8分钱，算什么解放？就说现在，妇女出来工作，跟男的平等了，可回到家里还得接着干，这平等吗？你们宣传安徽姑娘进城给人当保姆是进步，怎么我们的妇女在自己家里当保姆就是倒退呢？这算什么道理！我说还是看生产力，妇女回家，我们的生产力更发展了，这就好；要是生产力倒退了，才算不好。”

这些事例似乎同大邱庄的发展速度没什么关系。但我在大邱庄呆了一个多星期，越琢磨越觉得正是这些表面看没关系的事情成就了大邱庄，它们实在是大有关系的重大事情。一个物体运行的速度要快，一要推力大，二要阻力小。大邱庄的大事小事是为了一个目的：极大地加大生产力的推力，尽量地减小政治对经济的磨擦和阻力，相反，加大它的促进力。

禹作敏到美国访问时，曾和美国人开玩笑说：“你们两手抓经济也不过如此。我们曾经一手软，一手硬，就翻了一番；等我们协调好，两手一般硬的时候，超过你们不在话下。”

禹作敏说：“玩笑归玩笑，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哪只手软哪只手硬都不行，必须准确准确再准确，可千万不能再出现失误了！”

钱围着人转 人围着钱转

“重奖”的锣鼓一敲，大邱庄实行多年不变的“包字分配政策”变得不再时髦。人们的眼睛时刻盯着哪一个企业家或科技人员又“发了一笔横财”。总不会让你失望：隔三差五的，总有那么一个省，一个市，或者一个地区，把一笔巨款（多半还加上一辆轿车和几间房子）扔给一个走运的“有贡献的人”，这一“扔”，伴着震天动地的“宣传”，所有人的目的都达到了。

但大邱庄在分配上不敲鼓不打锣，甚至为某些人的“年薪收

人”保密。它不要那个“多重效应”；它只是把以效益为准的、不封顶的“包”字分配方针一贯到底。

有一个传说：大邱庄的分配方针是，个人得大头，集体得中头，国家得小头，所以大邱庄人才干劲冲天。

事实是：大邱庄个人所得的收入只占他们所创造的纯效益的1%。去年，大邱庄的纯效益5亿元，给国家纳税1亿，农业投资3000万，扩大再生产新建百亿元工业区投资7个亿，动用了大邱庄几年来的积累。只是大邱庄的那块“分配蛋糕”很大，虽然切给个人的只有1%，但对创造了1个亿经济效益的经理来说，分给他的这1%就是100万！依此类推：大邱庄400多口子人，去年人均存款10万，户均交税10万！

大邱庄分配政策的特点之一是：“不变”——以“不变带来千变万变”。不变的是“以效益为准的承包分配标准”，变的是“效益年年翻番，分配步步登高”。在这里，分配观念的含义是：创收。

与此相映照。中国许多企业经常改变分配政策，跟着“风”变——以“千变万变带来不变”。千变万变的是各种工资外收入的“名目”，不变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标准”。在这里，分配观念的含义是：福利。

大邱庄分配政策的特点之二是：解决了长期解决不了的分配差距的问题。大邱庄人不大愿意从理论上谈这么“尖锐”的问题，他们怕“惹麻烦”。但在大邱庄，对这个尖锐的问题的答案是明晰的，也是“离经叛道”的。如果一定要用“养活”这个词来表达贡献和作用的话，那么，在大邱庄人看来：帅才“养活”着将才，将才“养活”着一般的管理人员……依此类推，直到一般的工人和打工仔。大邱庄的分配方案也依此由高到低。

举个例子，关于大邱庄去年有4个工业公司的总经理收入超

过100万，大邱庄人是这样看的：“这是按纯利润的1%给工业公司的总经理为工资，利润是1个亿，总经理得100万，大家还得9900万。”

实际上，“谁养活谁”的问题要说得清，关键出于养出什么样的人 and “养”出什么样的经济效益来。禹作敏说：那些“说不清”的分配方针“最大的危害是养了三种人，一是懒人，二是滑人，三是奸人。”而大邱庄在实行这样的分配政策以前，也有许多“三种人”，但在“大邱庄分配政策”的利益感召下，“三种人”都变成了“能人”。

来大邱庄访问的人都想摸清大邱庄分配的秘密。但“摸清”了以后极失望，甚至认为“受骗了”，以为大邱庄的分配除了那个“包”字，肯定还有别的“猫腻”。

但大邱庄的分配正是这样“简单”，而正是这个“简单”，却是许多企业没能力或没勇气学的。

例子多的是——

大邱庄不允许发生“变相捞钱”；不允许下级请上级的客，不允许下级向上级送礼。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大邱庄将“惩治腐败”。禹作敏认为，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这种没有规则的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上。

大邱庄不允许设立所谓的“企业公关基金”。企业领导人要请什么人吃饭或送东西，可以，但必须是用自己的钱，不能用集体的钱。有一个时期，几个有关部门连番“轰炸”大邱庄，想查出“不正之风”。但查来查去发现：大邱庄连个“白条”都没有。

大邱庄有几百名业务员，他们是开拓市场的先驱。但他们也没有什么“市场开拓费”。他们在大邱庄被视为“功臣”，以“包”字核准的工资很高。如果哪个业务员的市场是需要钱来打开的，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大邱庄没有任何一项开支提供给你

“开辟市场”。

实际上，大邱庄是使社会上流行的一切“猫腻分配”和变相的“灰色收入”都简化为一个“包”字。大邱庄分配的本质是效益和能力。

对许多人来说，大邱庄的这一切都“说不清”，但对大邱庄人来说，这一切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禹作敏总结说“包字不封顶带来不平衡；包字不变带来千变和万变；包字当家治掉了与其对立的平均主义；包字当头治了懒滑奸；包字为准使人们追求的是才能与本领；包字兑现解决了说不清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包字的文凭不好拿，就是改革的路子不好走。”

对禹作敏的这番话，经济学家肯定也觉得说不清。

就在这种“说不清”中，大邱庄的生产年年翻番。

人才归之如流水

来大邱庄的人才，谈及大邱庄的人才生存环境，一言以蔽之：“简单、舒适、有价值、累死你！”

从古代的帝王到今天的平民百姓，关于人才，有数不清的至理名言，可以说已经“好话说尽”。

但今日的人才们似乎已经不大相信那些百无一用的花言巧语，他们在被捧上天的同时，更愿意看到点实际的东西。在这方面，南方做得好些，而大邱庄的似乎“不成体统”的人才生存环境更让书呆子们心向往之。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好话说尽”的人才观都发源于北方，但“孔雀东南飞”早已不是新闻，且还在成群结对地飞。飞不过长江，或竟反向从南方飞向北方的“人才圣地”，似乎只有大邱

庄。每年投奔大邱庄的有高级职称的人才，人数总在二至三千，其势如过江之鲫，珠落玉盘，构成一幅归之如流水的人才走向图画。

考虑到大邱庄的户籍人口不过老幼 4000，10 年前 50% 是文盲，今天虽然大多达到了初中水平，但要如此众多的都很觉得自己了不起的高级人才来伺候，无论如何也得有点绝招才成。

两个内地研究所来的高工，对大邱庄的一家机械厂进行了技术改造，使之增值 4000 万，禹作敏说：“每人奖励 100 万。”据当时的报道，这两位高工惊呆了，不敢拿。但这次记者了解到，他们终于还是拿了，但条件是“隐其名”。这样的高额奖励是高于大邱庄企业经理的 1% 效益提成的。但是禹作敏认为，该厂应用了科技人员的科技成果，其增值不是管一二年，而是管好几年，因此他们得到的奖励高于经理是合理的。

给钱，而且，给很多的钱，当然奏效。大邱庄“知道有价，而且有个很合理的价”，当然就把那些标榜“知识无价”并冠冕堂皇地剥夺知识价值的地区或单位的知识分子给吸引了过来。

舒适而无后顾之忧，这是大邱庄刻意营造的人才生存环境。别墅一样的小楼是为定居在大邱庄的人才造的，你只要有能力住进去，便“一切都齐了”；如果不是定居，而是来走走，那么，有单元楼房，一样的豪华和一应俱全。大邱庄的福利是“共产主义”的，一切免费，你哪里还有“后顾之忧”？

但大邱庄对人才最大的吸引力是“简单化”，这一条说什么人们也不信，所以大邱庄也就不说了。说了还容易惹麻烦。可记者采访定居在大邱庄的外来人才，问起“你为什么定居在这里？”那回答除了“钱多，舒适”外，准定跟着一句：“没那么多闲事。”

原来，大邱庄对所有的人才只有一个标准：生产力。禹作敏

的说法是：“来财必有才，有才财必来。”财与才在大邱庄是一个意思，也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一到大邱庄，一切都简单了，随着就是“简单”的行为：你创造出第一的生产力，就立刻兑现给你第一的报酬，第一的舒适。那些政治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还有没有呢？有的。大邱庄在中国，而且在北方，岂敢漠视“伟大的东西”。每年一次的评劳模、评优秀党员都要进行，只是比别的单位简单一点：翻开工资表，你的工资收入排在第一位，那么，你就是劳模，你如果已经是党员，那你就算被评上优秀了，要还不是党员，很快就会履行手续，发展你入党。大邱庄人的解释是：这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个点围着中心转”。

中国的人才到了大邱庄，才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可以一门心思干自己的专业了！而这一干，就是“累死你”了。不是大邱庄要把你累死，而是你要得到大邱庄准备给你提供的“简单、舒适、有价值”的生活，你甘心情愿地“拉生产力的车一直拉到死”。

某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一领导同志也到大邱庄取致富之经。

禹作敏说：“中国能富不能富，关键就在你组织部。长期以来，许多地方干部以穷为荣，以愚为忠，传达文件，一字不拉，标点符号，一个不差，具体意见，一点不拿，一句错话不说，一件好事不办——这都被看成是好干部。可是这种人能把经济搞上去吗？！”

组织部的该领导连忙说：“对你这个看法，我应作反面理解。”但这话把禹作敏说得“不理解”了：“难道看人还有个‘反面理解’法？”

禹是聪明人，他“细细地想了想”，便把至今阴魂不散的反面理解人的各种特征归纳出来：

“用封建的思想看人，愚人是忠人；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人，好人当坏人；用‘文革’的观点看人，能人成罪人；用派性的观点看人，逆我者是仇人。”他由此也总结出正面理解人的人才纲领：“用改革开放的观点看人，到处有能人。”

这就是大邱庄人才归之如流水的并不神秘的新闻背景。

新潮着，同时也传统着

大邱庄村民石家明家在院落里发现了一只鸡。

大邱庄的养鸡场年产7万只鸡，但不允许个人养鸡。看模样，这只鸡也不像大邱庄的鸡。石家明认为这是邻村的鸡，便把它暂圈在院子里，等候邻村的人来找。

第二天，邻村一个村民果然来找他的鸡，见还在，千恩万谢地抱走了。但石家明发现院子里有一个鸡蛋，断定正是那只鸡下的。这时，石已知道那个村民所在的村庄，便在晚上下班后，把鸡蛋送了去。

据统计，大邱庄每天平均能逮住4个小偷，全是外村人。大邱庄已经巨富，如“闭关”，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但大邱庄始终“开放”，只是多了几个保安。

俗话说：“一夜可暴发一个财主，三世难养出一个贵族。”大邱庄通过改革开放的15年，使大邱庄农民成了有现代化观念、现代化气质的“文明人”，可以说“进化”神速。

大邱庄人除了户籍是农民，实际上已经没有“种田人”。大邱庄人除了办公的文职人员，大都在企业，但也没有“蓝领”。大邱庄人是企业经理，是会计，是业务员，或者，比如说许多40岁以上年龄的女人，干脆就是家庭妇女。大邱庄人已经全部进入“白领阶层”。

但全身的“皮尔·卡丹”，有260多辆小轿车伺候，住豪华楼房，玩“卡拉OK”，这些还都是表层的变化。真正发生在骨子里的“农民革命”才是深刻的。

当然，首先是物质催化出精神。10年前，大邱庄50%村民是文盲，通过巨额的教育投入，现35岁以下的男女青年都达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许多青年戴上了“大学校徽”。大邱庄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即使与国内最好的相比也毫不逊色。楼房宽敞明亮，有冷热空调，有聘来的最好的老师任教。今年，大邱庄正准备办自己的大专院校。

但“物质变精神”也不易。所幸的是大邱庄有个禹作敏，他现代的、传统的、政治的、经济的、民主的、“专制的”、教育的、“威胁的”，各种招术“齐抓共管”，一个目标：由表及里地改变农民已经延续几千年的狭隘意识。

先说最简单的：服装。10年前，禹作敏就意识到，白羊肚头巾小夹袄的农民形象已经是大邱庄发展市场经济的障碍。他下令：用集体的钱，全村人每人一身西服。但没人穿。都在家里试穿了一下，都觉得自己“很可笑”，没一个人再穿。禹作敏说：“谁要是整天都穿西服，有奖；谁要不穿，做西服的钱自己掏腰包。”说完，他自己穿上西服，在村里转了一圈，做“榜样的力量”，回到办公室，出了一身冷汗。但大邱庄人从此就西装革履了。

再说“彩电事件”。钱少省钱、钱多存钱，再好的东西没钱亲，是农民普遍的心态。大邱庄人小富时，都有了黑白电视。当时城里人的水平也不过如此。禹作敏要大邱庄人把电视都换成带彩的，“显显农民的气派”。但许多农民心疼钱，不换。禹作敏说：谁家彩电，今后用电免费，不买彩电的，一律交电费。这才有了当时“电视机厂的彩电车开进大邱庄”的新闻。

其他诸如扒土炕土房，卖老家具，取消每户老祖先留下的地基（为了土地的规模经营），用禹作敏的话说，“都曾经成为矛盾斗争的焦点”。但靠着禹作敏的威望，都“强迫执行”了。现在，大邱庄人都念禹作敏的好，“多亏了禹书记，现在大邱庄人能吃好、穿好、住好、有钱花好，在全国农村数了第一。”

但“计划生育不好办”，这是中国富起来的农村最挠头的事。按说，大邱庄人富得流油，富了就想多生，就敢多生，就不怕罚。大邱庄人每户生10胎，都被罚得起。但大邱庄每年都得“计划生育红旗”，没一对夫妇超生。而且，大邱庄几乎不“抓”计划生育，这使所有来大邱庄“取经”的人如坠雾里。

原来大邱庄人是想多生的，而且，“呼声很高”，也有“不怕罚”的心理准备。对此，禹作敏也觉得“众怒难犯”，何况，他老人家本人也觉得“这农村人只让生一个娃是残酷了些”。但他又是大邱庄的党委书记，计划生育的国策必须执行，他于是召开了全村人会议。

他说：“你们都想多生娃儿，这我知道，我也觉得只让咱农民就生一个娃儿，这不合咱农民的理儿。”

台下掌声雷动：“对！不合理！不合理！”

他接着说：“那就有两条道儿，一条是生，反正也不怕罚，就生吧！”

台下举起了拳头：“对！生！生！”

他再接着说：“第二条道是：你们中有一家人多生一个，我做检讨；有第二家人又多生了一个，我就下台。”

台下鸦雀无声。禹作敏斩钉截铁地说：“大邱庄人，你们选择吧！”台下忽然呼声一片：“我们不生了！不生了……”

禹绍政说：“事情就这么简单。10年来，大邱庄没一户超生。也没做什么工作。”

只有理解“没有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才能理解为什么禹作敏这种“部落长老”式的说服工作可以奏效。

没有比这样的工作方式更传统的了。大邱庄已经不是庄。大邱庄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大邱庄人已经是现代人。大邱庄人仍然是传统人。他们不是像理论家们所说的“正站在从传统迈向现代的门槛上”。起码在现阶段，大邱庄人认为：做一个现代人与做一个传统人，都是绝对正确的。大邱庄让人想起新加坡。

大邱庄的“道德委员会”是正儿八经的一级组织，是大邱庄所有行政设置的一个层面。但这的人员和所有其他层面的人员构成截然不同，工作方式也截然两样。其他层面都实施的是现代化管理，只有它是土得掉渣的“传统管理”，它专管“家里的事”：家庭纠纷，敬老爱幼，婚丧嫁娶，精神文明。其他组织的人员都年轻化，这个组织强调老年化：年老、辈大、资格高。它用最“不文明”的语言解决家庭文明问题，比如邻里纠纷，他们便倚着自己的“三老”身份，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双方都骂个狗血喷头；如是“家庭内部问题”，就更是如此。大邱庄人都认可他们的这种“工作方式”，因为大邱庄人认为，所有这些家里家外的“纠纷”，没什么是与非，纯属“吃饱了撑的”，有个“组织”出头骂他们一顿，太好了。而经此一骂，据说都能化干戈为玉帛。

“德委会”也使用经济手段。如果哪个当儿子的不孝敬老子，比如说没“按月给钱”，那么，那个儿子当天在挨了“德委会”成员的骂之余，还会被通牒：限期把钱（比如说500）交给老子，逾期一天，钱增一倍！没人敢不服从“德委会”的裁判。

一边是“能挣会花”，一边是“古老道德”，大邱庄人新潮着，传统着，安居乐业。

这一个农民不是那一个农民

无论对多高级别的官员，禹作敏总是强调：“我就是个农民！”

他的户籍是农民。他只上过3个月的私塾。除了这两点，他哪一点都不像农民。他出入乘坐着“奔驰600”，他住着600平方米的豪华楼房，他要出更多的钱把“正大综艺”买下来，换成“大邱庄综艺”，他背对着一位副部级的领导，一摆手，“不见！”他先拿出6万元给了小靳庄的王作山，没几天，又把50万元馈赠给大寨的郭风莲。他问一位记者：“我的办公室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他的电话号码是：948888……

但他说：“我就是个农民！”

即使已经有了数不清的新闻报道，人们仍然认为“大邱庄是个谜”，谜在哪？谜在禹作敏。我写了七组报道，与其说是写大邱庄，不如说是写禹作敏。但我只能理解这个老人，却解不开这个老人的谜。他可以看透我，我看不透他。他是一个政治家，一个企业家，一个家长，一个“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式的人物，还是一个大梦先觉的智者？或者，他全是。

他曾经是个农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四处大寨学“政治种田”，三到小靳庄学唱诗跳舞，直到1977年，大邱庄穷得仅光棍就有252条，唱诗的唯一成果是：“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三中全会后，他发誓再不当这样的农民。

他仍然是个农民。他古铜色的脸庞千沟万壑，布满岁月的风尘。他把大邱庄最豪华的饭店起名为“九龙”。他在大邱庄的村口起了一座高大的牌坊，亲书“天保九如，地阔八方”。他规定来自远方的贵宾必在牌坊前换乘大邱庄的迎宾车。他最美味的佳

肴仍然是棒楂粥，他最感舒服的坐姿还是盘腿。他最了解的是农民的苦难农民的血汗，农民的渴望，农民的喜怒哀乐，“像了解我自己一样”，他于是才有这样的语言：“我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受气！”

他决不是个农民。他睡不着觉，已经巨富，还老在睡梦中想乡亲们过去熬过的苦日子。他一年四季，无论多冷的天都不戴帽子，“冻着，可以使我头清目明：一不信邪，二不听谣言，三有自己的准主意。”他用一个盘子来比喻怎样用足用活政策：“你在盘子的中心，永不会进步，但你走出盘子，就摔下去了。你必须走到边，但别出圈。”像中国所有的企业家，他无法回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但他有本事“不钻官僚的圈，不进形式主义的套”，他的方法是：对官僚主义的话，听而不用，对形式主义的话，不听不行，明听暗顶。每天，他的书房的灯光亮到子夜，许多时间在考虑如何使“政治运作”成功地作用于大邱庄的经济。他只读过3个月的书，但他写了几百万字的“书”，没有出版社出版，他自己印（大邱庄有一流的印刷厂）作大邱庄改革和发展的教材。

他像农民一样认“死理”：“社会主义决不是穷，穷决不是社会主义！”

他死恨农民的狭隘意识，他用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手段也要改变它。

像中国多数农村一样，大邱庄的历史上也是家族宗族成风成派：五大姓中，张家出霸，刘家能说、会说、乱说，马家心眼多、势大压人。他让马家心眼多的均当会计；张家爱称霸的均搞技术；刘家能说的都当业务员，“跑外”。一举破了宗派风。他要“生产力标准”在大邱庄的企业成唯一的标准，但有一个有成就的青年入党两次通不过。他断然“采取措施”：一句话，“同意入

党的别举手，不同意的举手”，结果全体党员无声无动，他宣布：“通过！”

他已经改变了大邱庄人的素质。他每天还在为大邱庄人的素质发愁。去年，他决定派一百名有培养前途的农民后代出国留学。他本人出访过欧美七个国家。

几乎所有的人读了关于大邱庄的报道都问：大邱庄富得这么快，是否还有别的“真经”？潜台词是：大邱庄靠的是不正之风，发的是不义之财。

在中国，确曾有过靠歪门邪道支撑一时的经济增长，但几乎都是“一锤子买卖，长不了”。大邱庄连续 15 年每年经济翻番，要说是靠“送红包”成的气候，谁信？

如果我说，大邱庄的企业有世界一流的设备，你信吗？如果我说，大邱庄的企业里有中国最好的经营和技术人才，你信吗？如果我说，大邱庄有在目前看来最能发挥人的积极性的分配制度，你信吗？如果我说，大邱庄对中国经济的冷热期都能提前判断准确，从而总是“大梦先觉”，甚至“众人皆醉我独醒”，使别人的“丧失”成为大邱庄的“赢得”，你信吗？而所有这一切，才是大邱庄能在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华北平原“一月独辉”的先决条件，你信吗？

我信。因为即使所有的这一切只是一个分式的分母，而分子只有三个字：禹作敏。分式等号的另一面是，大邱庄 1992 年的产值 50 个亿。

禹作敏的分量太重了。禹作敏是中国首富村的全部秘密。

他是个农民，但，这一个农民不是那一个农民。还是“说不清”好。

瞧，那个农民的办公室

“奔驰 600 型”豪华轿车静静地停在办公楼前，这就是说，天津市大邱庄的当家人禹作敏没有外出。他在办公室。

三辆“大邱庄一日游”大轿车里拥出了 100 多个参观者。从办公楼的 4 楼望下去，这些参观者分散在楼前足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上，像一堆堆焦虑不安的蚂蚁。他们被告之，为了不干扰楼内的公务，只能在外面瞅瞅。他们每一个人都比正坐在楼里办公的那个人官大。

他们大都参观过中南海。他们不记得中南海里可有这样豪华配套的办公楼：正面是主楼，董事长楼，四层，大理石建筑，颇像宫殿；主楼两侧，两座圆形建筑，正副总经理楼，各双层，大理石建筑，像城堡；再两侧，一边是游泳馆，一边是健身房，房顶一律的玻璃构件，在阳光下闪着光，像宫殿的翅膀，仿佛正要展翅飞翔；主楼的左前方，一座可容纳几千人的大礼堂，是禹作敏发表讲话的地方。这就是中国一个最基层（村级）单位——大邱庄的办公室。

这天是 1993 年 2 月 2 日，一个普通的日子，像往常一样，禹作敏正在办公。

他正书写《大邱庄 1993 年发展规划》。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露了一面后，他连夜赶回大邱庄，然后就开始写这个规划，从初一到现在，每天从早晨 6 点到午夜 12 点，除了会客，他一直写着，写着……

他一点也不担心各企业是否会正常运转。去年，大邱庄 260 个企业的产值是 50 个亿。他在于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今年怎样达到 100 个亿？他在办公室里办的就是这件翻一番的事情。“精

神是可以变物质的。”他说。

他每产生一个思想，二楼的“办公服务系统”就把它敲进电脑，然后打印机再“吐”出来，一条无形的“思想履带”把它传送到各个企业。整个二层楼都是为他的思想服务的。

他也不担心有人干扰他。一楼有笑容可掬但忠于职守的保安人员。没有他的许可，外人不得入内。

杏黄色的纯毛地毯从一楼铺到四楼，他有时也上四楼去看看，那里有各种健身器材，但他几乎从不使用。

他的办公室在3楼。中间的一间，有近100平方米，豪华到看不出豪华，简单到一看就知道很豪华，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套沙发，两个很小的书柜，各占据办公室的一方。就这几件东西，他们的价值在5万元以上。四壁如洗，没一件饰物，因为没有任何一件饰物值得他敲一个钉子眼，挂在直抵屋顶的护墙板上。从过去的旧办公室里，他只带来了他的书。一些过去认为“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和无数的锦旗，“都锁进了地下室”。他有了新办公室。他要一个新起点。

这个新起点是从去年的12月26日开始的。原订今天元旦他搬进新办公楼，但他突然决定25号就搬。这就有了一个巧合，那天是毛泽东的诞辰。

那天，恰好本记者在大邱庄采访，于是成为新办公室的主人接待的第一批访客。

一个月后，他已经记不清在这间办公室里接待过多少人了。这些人中有中央部委的部长，也有国内外的投资者。

“你可以写我的办公室。”他对记者说：“我的办公室就是大邱庄的投资环境。”

这是他为他的办公室赋予的第一个意义。几年来，在众多的非议声中，他曾经为他的“奔驰600型”轿车和他的600平方米

住宅赋予同样的意义。

一个月来，至少有美国和香港的两个大老板，犹豫了一段时间，但看到禹作敏的办公室并同他在办公室谈了话后，决定投资大邱庄。

“同样，你还可以告诉人们，我的办公室就是消灭‘三大差别’。这个差别，大邱庄已经消灭了。如果中国的100万个村庄，都有了这样的办公室，整个中国就消灭了‘三大差别’。”——第二个“意义”。

“还有，这样的办公室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但，“我很孤独。”他突然这样说。说时，这位63岁的老人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他很想“深入基层”，到260多个企业中去看看。一次“深入”时，一个企业正开生产会议，见他来，会议立刻停了，“请禹书记作指示。”他说了几句走了。过了一会儿，企业经理来见他，一脸的愁云。

“禹书记，以后我有什么不对，您把我叫到您办公室，打我骂我都行，就是别到厂里去了，行吗？”

禹作敏满脸的迷惑。“我没说你什么呀？”

“可您一去企业，底下人就认为我这个经理犯错误了……”

“呃，呃，是这样？”禹作敏喃喃地说：“是我错了……”

从此，他再不到工厂里去。他只在他的办公室里召见他的下属。他的指示都写出来，字斟句酌，生怕有歧义，给下属“惹麻烦”。

在大邱庄，他的威望太高，高到“一举一动都要小心”。

于是，他的办公室成了他的半个家，“每天至少在办公室呆12个小时。”

于是，一个老农民变成了一个思想家，一个只上过3个月私

塾的农民“写了 200 多万字的东西”。

正是这些“纸上的东西”指导着大邱庄的生产年年翻番。

他苦笑着说：“我生产思想，下面生产效益——我还能干什么呢？”

那表情，好像他是这间豪华办公室里的“囚徒”。

记者手记

探视农民帝国

云里雾里大邱庄

1993年，中国发生了一个很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大邱庄事件。因触犯刑律，大邱庄党委书记禹作敏和他的小儿子，以及几个同案犯，被逮捕，并被判徒刑。这一事件轰动了全国。

此前，大邱庄是中国新闻媒体报道最热烈的题材。由于我的一组系列报道，恰好在大邱庄事件发生的前夜推出，而且报道规模很大，很引人注目，因此在事件发生后，许多人很自然地把我的名字与大邱庄事件联系在一起，认为“肯定有关系”。于是谣传很多。

记得当年的下半年，我赴西安采访，一位好友一看到我，惊讶万分，头一句问候语就是：“你怎么放出来了?!”

我说：“从哪放出来?”

他说：“嗨，你不是给抓进去了吗？”

我大笑。这位朋友的夫人是西安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也说：“建伟，你得到我们电视台去露一面，西安都传遍了，说你给抓了，你在西安露一面，谣言就破了。”

我说：“不必。这用不着解释。这谣传能传到大西北，说明有多少读者还记得我呀！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于是又是大笑。

谣传的因由，确实因为我的那组报道。它同大邱庄事件在时间上挨得太紧，而我在报道中，又对禹作敏描述太深。

众所周知，我当时是《中国青年报》驻天津记者，报道大邱庄本来是早该进行的事情。但我过去对这个题材没什么兴趣。了解我的报道思路的人知道：当记者们一窝蜂似地报道某人某事时，常常见不到我。我“发现”新闻的地点常常不在热闹的地方，因此倒常常能够出奇制胜。

但在1993年，我忽然对大邱庄有兴趣，由几个因素构成。

1992年初，两会报道之前，我担纲总撰稿，为中央电视台摄制专题片《第一生产力》，是中央电视台成立以来第一部规模最大的科技题材电视片。拍摄到“农民与科技”的关系时，我建议拍摄大邱庄。这主要因为新颖有趣：大邱庄只有8个人种地，其中3个是农业教授。摄制组成员也都觉得很有趣，于是便决定了。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大邱庄这个题材，也是第一次见到禹作敏。

我受到了震撼。当时我就觉得，大邱庄有个谜，值得我去揭示它。

无论从什么角度说，大邱庄都是个谜。1992年30多亿产值，到1993年已经发展到50多亿。天津有10来个区、县，哪一个

县的产值和效益都没有大邱庄一个村高。更重要的是：大邱庄的当家人禹作敏从来都是个“争议人物”。一个“争议人物”领导一个村庄创造出如此惊人成就，这就更不可思议。

当时，不仅我们的电视专题组，全国各界传媒纷纷涌到大邱庄。因为当时有一个传闻：邓小平要到大邱庄去“看一看”。

但我知道，这传闻是个谣传。邓“南巡”后，回北京的时候，可能有过到大邱庄“看一看”的设想，但未成行。我听说的原因是：通往大邱庄的静海县公路太烂了，车行路上会太颠簸。考虑到小平同志的高龄，老人家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取消了这次视察。是否真是这个原因，也未经证实。但已经回到北京的小平同志还要专程去视察大邱庄，我却可以肯定是谣传。

新闻这东西很有趣。许多报道正是谣传促成的，甚至有些报道本身便是谣传。两会后，各路记者潮涌大邱庄，但很快就是潮退，潮来潮去都很快。我在报道中从不弄潮。在这方面，或者说，在“抢新闻”方面，我不够当记者的资格。因此，虽然我已经对大邱庄有了兴趣，但不愿去赶潮。

到了年底，忽然发生了一件小事。本报一位摄影部实习记者去了大邱庄，回来发了一张照片。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大娘，在一座残破的仿佛废墟般的正在拆毁的楼房前，叫卖着格调低下的杂志，照片说明是：“俺们大邱庄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新华书店！”

当天，禹作敏的小儿子禹绍政把电话打到天津记者站：“我向《中国青年报》提出严正抗议！你们造谣，毁坏我们大邱庄的声誉。你们要更正，否则我要到法院去告你们！”

在拍摄《第一生产力》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了他，听他气势汹汹的，就说：“你怎么啦？吃错药啦！”

“你们怎么造谣说我们大邱庄没有新华书店？”

“你们有吗？我好像也不记得你有新华书店。”

“怎么没有？你可以来看嘛。总之，你要更正。”

“更正不更正的，得查实了再说。再说，就是你有新华书店，有就有呗，也不值得发那么大火！”

“那不行！总之，你得再来一趟。”他忽然说，“你也该来一趟啦。别的报社，电视台记者都来了，就你不来。”

“那么多人都去啦，你大邱庄够风光啦，还缺我一个？”

但我还是同北京总社打了个招呼：“我决定去一趟大邱庄。一来把照片事件给平了，二来看看大邱庄到底是怎么回事。”

报社党委书记和新闻研究室主任听说了这事，也很有兴趣，致电给我，说“也想到大邱庄看看”。我说：“来吧。一起去。”

实际上，我先到了大邱庄，书记和主任后至。我既然去，肯定要搞报道，他们只是“看看”，我自然要先到。

在先去的5天时间里，我同禹作敏谈了3次。这很不容易。禹作敏当时已经“牛”到这种程度：北京的部长们前来参观，他想不见就不见。

大邱庄的经济成就确实令人瞩目。但大邱庄的谜只在禹作敏一个人身上。大邱庄是个经济帝国，禹作敏就是这个帝国的皇帝。这种感受，我敢肯定，所有采访过大邱庄的记者都曾有过，但没一个记者这样写过。

我想：既然这就是真实的大邱庄之谜，为什么不向我们的读者揭出这个谜底呢？

我决定了。采访7天后，我连续推出了7组报道。总栏题就是“中国第一村揭秘”。每组报道都由一篇“消息”和一篇“新闻背景分析”组成，是深度报道“充分信息化”的一次新尝试。

再访大邱庄

七组《中国第一村揭秘》发表后，首都新闻界对这组报道展开了热烈讨论，一致认为“在深度报道很不景气的今天，张建伟以他新颖独创的报道形式，再创深度报道的新辉煌”。当时在《中国记者》上，有的报社总编辑甚至要求新闻界“关注这组报道”，进行更深入的研讨。本报同仁也为这组报道写出了一万多字的业务评论文章。

但后来发生的事件，使这次业务研讨中断了。

有一天，我接到禹作敏的电话，请我再到大邱庄来看看。这一天，恰好广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带着一位责任编辑，看了我的报道后，专程到天津找到我，希望我写一部关于大邱庄的专著。我当时没有答应，但愿意陪着他们到大邱庄走一趟，看看再说。禹作敏的电话正好打来，他们自然也可以受到禹作敏的“接见”了。

把新闻报道扩充为报告文学专著，在作家界，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对作者来说，报告文学有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和表现天地，写出来常常比新闻报道要丰富一些。对此，我从不否认，也经常有所实践。

然而，这并不是说“新闻报道”比不上“报告文学”，因此是“浅层次的”，而报告文学才是“深层次”的东西。它们不是一回事，也不能这样比。在同一个题材中，如果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么，我们可以说，它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可能是优秀作品，而且，从传播效益来说，虽然由于“时效性”的逼迫，新闻报道肯定要比报告文学“简约”甚至“粗糙”，但其在读者中的影响，是报告文学所不可比拟的。

总之，正是因为一个希望把大邱庄报道扩展为报告文学专著的提议，我再访大邱庄。

这一次，我看到了禹作敏的新的“办公室”，那天，他刚刚搬进去不过一个多月，从一楼到四楼，搬家工作尚未完成，但他的“办公室”已经安置好了。

我当然又一次和他谈了许多。但那天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办公室”。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异常的东西。再访大邱庄之后，我把我的这种印象写了下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我没有想到，这是至今为止，我写的关于大邱庄和禹作敏的最后一篇报道《瞧，那个农民的办公室》。

农民帝国的覆亡

这篇报道中的最后一句话，成了一个真实的寓言。

报道发表后的第三天，我刚从北京回到天津，禹作敏的电话忽然打到我家。

“请你来一趟。”

“怎么啦？”

“大邱庄让天津的武警给包围了。”

我大吃一惊。“怎么回事？”

“你来了就知道了。”禹作敏说，“顺便问一句，你是不是天津公安局派到大邱庄卧底的？”

“这话从何说起？”

“你最后那篇报道。你说我是‘办公室里面的囚徒’。我估摸着，武警包围大邱庄的事儿，你早就知道。”禹作敏说着，在电话里笑，“和你开玩笑哩。你快来一趟吧。”

这一年，《中国青年报》准备在天津增加一位记者，我选中

了南开大学的青年讲师刘武。禹作敏打电话来的时候，刘武正在我家和我聊天。

我把电话内容告诉了刘武，说，“怎么样，和我一块到大邱庄去一趟。估计有一场‘好戏’。”

刘武很高兴。我们出门叫了辆出租车，朝大邱庄驶去。

实际上——我后来才知道——包围大邱庄的武警部队已经撤离了大邱庄。但这次事件极为严重。

数千名武警官兵（一说数百名）整整围了3天，居然没能进入大邱庄。武警部队把大邱庄一包围，禹作敏便宣布“辞去大邱庄党委书记的职务”，这就是说，大邱庄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他概不负责。大邱庄本村虽然只有4000多口人，外来的打工仔却有近4万人。我后来听说，武警围住大邱庄后，几乎所有的“大邱庄人”，每人拿了一根“钢筋”（大邱庄有的是钢材）当武器，准备“保卫大邱庄”。事态一触即发，一旦冲突起来，就会是血流成河的后果。何况（后来查出）大邱庄内有枪。

应该说，天津市委领导对这次事态的处理是明智的。武警围了3天，始终没有进去。据说为了“不扰民”，武警是在野外“埋锅造饭”的。

我和刘武到达大邱庄时，武警部队已经撤离，但大邱庄内外，还是笼罩着紧张的气氛。我们的汽车停在大邱庄村外，便遭到盘查。后来还是大邱庄里面出来人，把我们带了进去。

我又走进了禹作敏的办公室，他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我发现有好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在场，包括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大邱庄事件后来已经公布：一个人被打死了，天津市公安局追查疑犯，遭到禹作敏的抵制。公安局人员到大邱庄查案，被禹作敏指示扣压，这才导致武警部队包围大邱庄，目的也是追查疑犯。后来疑犯被捕，禹作敏等人也涉嫌被抓，终于诉诸司法，禹

作敏以下多人被判徒刑。

后来，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终审判决时，禹作敏对他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但在他被捕以前，在他把我们很多记者找去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他认为，这次事件，是天津市领导对他带领大邱庄人搞改革致富不满，是有意打击报复他。他希望我们这些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们“站出来”，为大邱庄“说句公道话”，至少，写几篇“内参”，让中央领导人知道。

第二天我赶到北京总社得知，中央各新闻单位已经接到指示，关于大邱庄事件，各新闻单位一律不准报道，内参也不必了，以免干扰司法。

当然，后来有的小报很大胆，向公众披露了事件的所谓“真相”，引起不小的反响。但老实说，即以我所了解的情况，这些“真相”其实并不那么“真”，连真相的“皮毛”都谈不上。这不是因为这些小报的记者不努力（他们能刊登出来，我认为这勇气就很值得我们学习），而是大邱庄此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不是今天能够解释清楚的，可以说是“时候未到”。这因果，也不是指司法上所认定的东西，而是司法之外的更深层次的东西，即，一个带领大邱庄农民走上富裕道路的杰出改革者，为什么竟会并胆敢向国家法律“宣战”。

我在本报天津记者站驻站有年，司法界自有许多朋友。大邱庄事件后，一位深知内幕的朋友对我说：“你要不要写更深的东西，我这里有你用不完的材料。”我想了想说：“仅有司法材料，这个事件还是写不透。以后再说吧。”

而在这里我似乎必须解释的是：我写了那么多的大邱庄和禹作敏，为什么没有察觉紧接着发生的“大邱庄事件”。

对此，我的回答是：在司法系统都没“察觉”大邱庄事件真相的时候，记者更不可能“察觉”它。而且，即使大邱庄事件发

生后，大邱庄在禹作敏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改革和建设，仍然是必须肯定的。这也是中央在大邱庄事件发生后的“口径”。

至于有人怀疑我是否拿了禹作敏的许多“好处”才写出那么多报道，我后来在参评“范长江新闻奖”时有所说明。

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的举荐工作，时间紧挨在大邱庄事件被处理之后。本报在我曾获得首届“范长江新闻奖”提名荣誉后，仍要我竞争第二届奖项，这在全国新闻记者中没有第二人，是对我的新闻业绩最高的评价。但报社领导有个“犹豫之处”：外界风传，张建伟写了那么多的大邱庄报道，可能接受了大邱庄的“好处”。据说，这种传闻在评委中也有一定市场。对此，我的回答是：

第一，关于大邱庄的系列报道，我至今认为是真实的，有深度的，是《中国青年报》深度报道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如果不是因为大邱庄事件，我个人不会公开给予这组报道如此高的评价）。我希望这次参评所上报的“张建伟作品”，必须包括这组作品。如果因为这组作品不够“参评资格”，我决无话说。那是我水平不够。

第二，关于那些传闻，它是谣传还是真相，不能由我个人认定。大邱庄事件发生后，地方和中央有7个工作组曾在大邱庄“办案”，他们的“认定”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另外，我提供了一个可以进一步查清事实的线索：据说禹作敏有个“小本本”，他如果真送了什么人什么东西，都一笔一笔地记下来。如果张建伟真的有什么问题，决不难查清楚。

事关重大，不可不慎。我理解报社领导的苦衷。后来的具体过程我不再说，只是上报的“报社参评意见”中，有了这样一段话：

1993年1月，张建伟经过深入的采访，写出了《大邱庄系

列报道》。报道一经见报，就得到新闻界同行的好评，认为张建伟以系列消息加新闻背景分析的方式，再次开拓了深度报道的一个新的领域。4个月后，“大邱庄事件”爆发。有人曾怀疑：张建伟写出了那么好的大邱庄报道，是否接受了大邱庄的什么好处。对此，在张建伟采访时也在大邱庄访问的报社党委书记和新闻研究所所长说：“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而张建伟只是说：“天津地方和中央有七个工作组正在大邱庄查案，我即使只拿了大邱庄一分钱，也跑不了！”又过了几个月，“大邱庄事件”结案，事实是：工作组既未对张建伟的报道提出任何疑义，也没发现张建伟拿过大邱庄一分钱。这一事件使报社领导更加坚定了这样的看法：张建伟是一个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经得住任何考验的记者。

最后的结果众所周知：我获得了“中国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在中国新闻界，我是惟一的一个与“范长江新闻奖”有过两次亲缘的记者，时间是1991年（提名奖）和1994年。

时间：1992年7月

作者：吴甘霖 朱一强

这算什么博交会

吴甘霖：批评是“软”“硬”兼施的艺术

这算什么博交会

四方代表聚海口 只见卖方无买方

21日中午，记者接二连三接到全国一些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打来的电话，他们纷纷反映说：我们是应海南科技信息服务中心的邀请，前来参加'92全国部分省市科技成果企业产品博览交易会的。但到这里之后，才发现这是——

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接到电话之后，记者奔往这次会议代表们所住的地方采访。

江西南昌市代表团带队的市经委的李建反映：今年3月，海南科技信息服务中心主任包九龙，带人来南昌市经委，在出示有关证件之后，又出示了一份关于该中心决定举办1992年度海南科技成果企业产品博览交易会的邀请书。包九龙介绍：一、将邀150—200名东南亚、香港、台湾、独联体等国家和地区的外商。二、将在《经济日报》、《文汇报》、《海南日报》、《海口晚报》和中央电视台、海南电视台为所有参展企业作广告，并一定在开幕以前登出来。三、为参展企业在海南代办业务两年，没有成功的分文不收。四、我们的主管单位是省总工会，你们完全可以放得心等等。

这的确是够让人心动的，于是南昌市派出了有15个单位、48人的代表团。通过同样手法，包九龙等人骗来了来自10个省份、130个单位的442名代表。

该中心要求每个参展单位交3500元参展费（不包来去交通费）。虽然不低，但大家还是爽快地交了。抱着一股将科技成果、新产品迅速推向市场的强烈愿望，在7月——海南最热的时候来到了海南。

允诺——落空 开幕即是闭幕

代表们坐飞机或乘轮船来到海口市。可奇怪的是，召开这么一个号称“全国部分省市……”的会议，竟没有安排人到机场、码头接站。住宿费是包括在会议费里的，原来答应的是每人每晚40—80元的房子，都有空调。现在大多数是20元左右的房子，没有空调。基本没有电话。甚至连一个装有会议代表名录及所住房间的资料袋也没有。

之后，代表便在开幕之前到展厅去，气愤地发现：他们按布

展要求先寄来的产品、样书扔了一地。有的代表竟然拿不到展版。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制药厂的产品样品早在几个月前就派专人送过来，可现在再也找不到了。

原说 19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不少单位都准备了材料，不知何故又取消。

原说在开幕之前将企业广告登出来，现在却踪迹全无。

连会议的时间也压缩了。

20 日上午，博交会开幕了。代表们这回是彻底失望了——展厅里所见到的都是卖方代表，没有买方。更没有原来包九龙等人所吹嘘的 150 多个外商。

代表们愤怒了，博交会再也无法开下去。21 日，他们派出代表向海南省政府上访。

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

作为这一次博交会的总导演、总策划和主要演员，包九龙至今不承认自己有欺骗行为。而且只答应退给每个单位 500 元。

代表们对此十分愤慨。据统计，包括所交的参展费和飞机、车、船等各项费用，这次给参展单位造成的损失已上 100 万元。济南市经委的张占山处长说：“对这种打着改革开放旗号来骗人的骗子应当严惩！”

南昌经委的李建说：“海南科技信息服务中心虽然不是海南省工会主办，但几个月前已挂靠在它名下，毕竟是主管单位。现在事情发生后，工会的态度是将所收的 1 万多元管理费退掉就完了。这不是纵容坏人行骗吗？”

所有代表一致呼吁：我们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有一种新秩序。即经济单位之间遵守契约、法律；

部门监督，保护契约兑现；对不遵守契约者严惩。不这样，市场经济就会一团糟，就会是骗子们的天下。

值得指出的是，海南以前也举办了多次这样的大型展销会，包括今年4月举办的国际椰子节，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像这次的博交会毕竟是极个别，但依然不能容忍。因此，23日，本报记者和《人民日报》记者一起找了海南省委秘书长王厚宏，向他汇报了该事件的经过。24日下午，记者得到：海南省委书记邓鸿勋、副书记杜青林、秘书长王厚宏都已在记者反映的情况上作了批示。邓鸿勋批示说，建议监察厅立即派人严肃查处，海南科技信息服务中心所收企业款要立即退回。

此事最后处理结果如何，来自全国11个省市的442名代表正翘首以待。

行骗者倒打一耙

7月28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参加“全国部分地区科技成果、企业产品博览交易会”的参展单位代表处，正看见代表们义愤填膺地议论着什么。看到记者来到，一位代表将一份材料递过来：“你看看，这不是在颠倒黑白吗？”

这是一份题为“紧急申诉”的材料，是这次“博交会”的举办单位——海南科技信息服务中心所写。该材料说：“少数代表别有用心的操纵和鼓动，是‘博交会’被迫中止的主要原因。”“强烈请求找出幕后操纵者和带头闹事者，并追究其法律责任。因为，他们是破坏大特区形象的真正元凶！”

该材料的确是颠倒黑白。仅举一例就可说明——文中说：22日，少数代表“围攻指出他们的条件太苛刻、应适当降低的省政

府代表、省信访办的陈副主任”。事实上，陈副主任不仅没有讲过半句代表们所提的条件“太苛刻”的话，而且对该中心和包九龙提出的十分严厉的批评，当时记者就在场，陈副主任说：“老实讲，我对老包你们这一方的态度很反感。你们毫无组织观念、政府观念！你们真的只是没有经验的问题吗？我看你们是一直没有从灵魂深处认识问题！”

经过这几天的精疲力尽的折腾，参展代表们并没有达到退还参展费用的要求。28日下午，省总工会经济工作部一位副部长告诉大家：最后向中心“做工作”的结果是，每个代表退300元，其中150元现在可以拿走，150元以后再寄。

代表们在沮丧之余是加倍的愤愤不平。事实上，中心在收了每个单位3500元后，竟连许多代表的房租都没有交满，逼得代表们只得自己再次掏腰包。济南代表团81人，一天各种开支就5000多元。有的代表只得四处借钱回去。河南巩义市小关化工厂的赵丙新、巩义市电热电器厂的郑继红告诉记者，他们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了，只得每天吃两餐应付。

代表们最气愤的是海南总工会有关领导的态度。南昌市经委的李建、济南市经委的刘清寰介绍，包九龙等人到他们那里去行骗，拿的是海南总工会经济工作部的介绍信。为了防止上当受骗，他们或打电报、或打电话问该部咨询，都得到明确回答，公司是他们的下属单位，是要开这么一个“博交会”。所以他们才敢到这里来。现在“博交会”已暴露是一个大骗局，总工会的有关领导又采取推卸责任的态度，只愿意将中心交的管理费退掉就拉倒，在封该中心账、责令中心退款方面并不积极。

于是，他们谈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第一个观点：“我们有关‘主管单位’，不要充当了骗子行骗的‘道具’和保护伞！”

对这件事，海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非常重视。24日，省委书记、省长都有明确批示。如对包九龙等人，书记的批示是：“责令包九龙交待、检查、听候处理。”省长的批示是：“要让中心的人作出认真交待，如果不认识错误，关闭中心，不能让这些做法影响海南的声誉。”可奇怪的是，包九龙在26日，还依旧写出如此颠倒黑白的“紧急申诉”，他还并没有得到严肃的处理，济南第一印染厂的副厂长滕祖义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真想大哭一场，我不知在我们的大特区，党和政府的威信到底还有多大多高！”他谈了第二个观点：“市场经济新秩序，必须有高效的政府来保证！”

鹰潭市经委的刘平孙最后说：“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关键是法律，法律尊严需要严格执法来保证。不对违法者法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新秩序！”

据了解，海南省监察、公安、审计等部门已开始对这件事调查。海南省长已批示要省总工会作检讨。442名代表，已开始陆续离开海南，但442双眼睛，将期待着正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新秩序

海南“博交会”事件曝光后，引起了各界高度重视。7月31日，海南部分教授、博士、政府工作人员、企业界人士以及新闻记者，相聚在海口市滨海大酒店会议室，就“博交会”事例引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

“这是一个关系到改革开放命运的大问题”

海口饮料厂厂长张春昌说：“中国青年报在全国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问题，实在太重要、太及时了，‘博交会’

事件并非个别。就我们厂来说，这一段时间以来已深受市场秩序混乱之苦。我们有 30 年历史的鹿龟酒到处被人假冒。在河南，一家饮料厂冒用我厂厂名生产芒果汁等产品，有关部门竟为它出具一切合法手续。在武汉，有几场官司我们明明赢了，可就是执行不了。都乱套了！这样的经济环境叫我们企业怎样生存呀！实际上，我们改革开放带来的不少效益都被这种乱给抵消了。”

原来在国务院农研中心工作、如今在中国兴南集团任总裁秘书的蔡锦云硕士说：“中国经济要发展，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而在它的初期，又必然会出现秩序乱的局面。目前，它实际上已给企业、社会造成了很大伤害。‘中国质量万里行’所披露的质量问题，不过是它一个方面的反映而已。现在是到了赶快提出‘新秩序’问题的时候了。如果现在不提出并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也许再过一两年，反对改革开放的人就有可能将一切归咎于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又有可能受挫！”

必须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要求来确定新规范，首先要尽快确定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新规范

《人民日报》记者鲍洪俊说：“市场秩序乱根源在于产品经济、僵化计划体制基础上的旧规范失灵，而新规范还未建立或未完全建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来抓紧确定新规范。如至关重要的利益调节机制，必须按‘我提供服务，才能得到收益’的原则来定轨。像这次‘博交会’，海南科技信息服务中心没有给参展企业提供服务，就没有权利要企业 45 万多元的参展费。同样，省总工会没有将‘中心’管理好，作为主管单位就不称职，更没资格收 1 万多元的管理费。”

海南大学教务长曹锡仁教授说：“‘博交会’所出现的‘乱’，乍看起来，是经济主体—企业经济人违反规则所导致，但往深层

追下去，却是与政府运作中某些不守规则的行为密切相关。所以建立新秩序，应当从政府做起！”

海南省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海外处长周文彰博士立即表示赞同。他说：“新秩序最主要的内容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信誉和公正。信誉靠个人或企业本身来提供，公正则需要政府和执法部门来提供。实际上，政府和执法部门所提供的及时、有效的公正服务，也是个人或企业能保持信誉的保证。”

中国亟须树立全民契约精神

在讨论过程中，记者披露了这样一个情节：海南科技信息服务中心到全国行骗时，与每个参展单位签订了一份合同，上面对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都作了各 10 条十分严格的规定。最后还有这么一句：“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条款，将负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可骗到钱以后，中心对此根本不认账，甚至倒打一耙。这些人就是这样敢于将“负法律责任”视为儿戏。

中国法学理论研究会理事唐琮瑶副教授大声疾呼：“中国实在太迫切需要让全体公民树立契约精神了！这一方面靠严肃执法来强力推行，另一方面公民得自觉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否则市场经济就成了坑人骗人的代名词了。”

曹锡仁教授说：“美国的国防报告把教育看作是一个国家对其未来命运的最有远见的投资。因为他们已深切地感受到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未来命运的主要威胁，不是别的，而是来自其它国家更高国民素质的挑战。我们也应当从这里得到启示，从新的高度来认识提高我们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加强公民人格、素质的训练，让每一个公民懂得：只有遵守规范，人们利益才能有保障，只有遵守契约，社会才能有效发展。”

海南大学讲师王国华说：“提倡树立全民契约精神实在太重要了。它不仅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性措施，而且也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人治转变为法治的一个根本突破。”

记者手记

批评是“软”“硬”兼施的艺术

众所周知：批评报道是受读者欢迎的报道，也是难搞的报道。由于它的“碰硬”特色，而我们又处于这样一个对批评报道还有不少人无法正确对待的阶段，搞批评的人就常常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处境：要么不干而半途撒手，以免引火烧身，要么义无反顾前行，但与之相伴的，往往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即使报道刊登出来了，报社、记者都已弄得伤痕累累。

批评只是“碰硬”的艺术吗？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我们有没有可能减少批评报道成功的成本？或者，如果批评报道的悲壮色彩难以避免的话，能否增加点别的手段，在悲壮的上面积累，产生更大、更理想的效益？

海南“博交会”报道，实际上也是在一定程度的“悲壮”气氛中开始的。耐人寻味的是，记者首先进入的、必须先碰的“硬”，竟然不是这场海南骗局的主要责任者——海南科技信息取

务中心和海南省总工会，而是一些身负“维护海南正面形象”重任的“好心人”。一百来名受骗的厂长经理因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集体到省政府上访。记者闻讯前去采访。首先是两位值勤的武警来干涉不让记者采访，以检查记者证上有没有钢印为由，将记者证撕成了两半。之后，公安厅一位工作人员又进行刁难。他一定要查记者的身份证，记者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将身份证带在身上。他却说：“我是干公安的，除了身份证别的什么证不认！”说：“如果有身份证，就回去拿来。否则就不能采访！”记者知道他们的意图是想将记者从现场支走，所以决不离开。他又要收缴相机，记者不交，他便要将胶卷没收。记者说：“你们要拿去也可以，但得打收条。”他们不干，记者也不让步。最后又磨了两个多小时，晚饭都没吃，直到快9点了，拿到了收条，才让他把胶卷拿走。

此时记者的愤怒是可想而知，但责任心使记者得先把自己个人受的委屈和伤害放在一边，而首先对事件进行报道。回到记者站，立即给报社老总打电话，我直言不讳地讲了自己的想法。总编说：“能不能弄到省里主要领导人的意见？”我答应试一试，但心里直打鼓——连有关部门都如此强调“海南正面形象”，主要领导人又会有怎样的意见呢？

其实，当时尽管这事已闹了几夭，但海南省主要领导连情况都不知道，更谈不上什么意见。于是，本人就和《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做了一件省里有关部门应做而没做的事——最先向省委领导直接反映此事。出乎意料，省委书记、副书记、秘书长十分重视，都批了得力的处理意见。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海南才开始真正认真处理此事。此时本人的喜悦是无与伦比的，不仅是拿到处理意见就好发稿了，更主要的是，由于自己的努力，真正促使了问题往理想解决的路上行进——我们写报道，目的不也就是这

样的吗？

有了主要领导的意见，发稿就方便了。这时本人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是否能够将海南“博交会”事件当作一般的骗局来对待，将其披露就了事？这一事件如此触目惊心，里面有没有蕴藏着更深刻的、对当前中国改革开放更具普遍性的主题？沿着这条思路挖下去，“市场经济新秩序”的主题，在第一篇报道中就出来了。

“这算什么‘博交会？’”第一篇报道出来后，在北京的各位高手就不断地“远授机宜”了。记者部主任宁光强再三叮嘱：这是一个连续报道的好题材，一定要盯住搞下去；经济部主任梁长春要求拓开报道面，将“新秩序”这个主题弄得更深更透。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为了将这一事件蕴藏的“市场经济新秩序”的观念挖掘更透，在海南对该事件主要责任人和单位进行了严肃处理之后，记者没有就此了之，而是主动组织海南一些教授、政府工作人员、企业界人士，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出“市场经济新秩序”，是一个关系全国改革开放命运的大问题”、“中国亟需树立全民契约精神”等当时有冲击力的观点，以“市场经济呼唤新秩序”的大标题刊出，得到了各界的叫好。

应该说，这套报道搞得还是比较成功的。在各家新闻单位中，最早介入，弄得也够大胆和彻底，有始有终，促使问题得到了较理想的解决。更主要的是，批评报道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在全国首先提出“市场经济新秩序”这个大问题，因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好的评价，《文摘报》等在头条位置转载。

该报道获得了当年度的全国新闻奖。

还有一点颇值得一提。尽管这一套报道让海南“丢了丑”，但海南省主要领导们并没有责怪记者。省委秘书长的秘书还专门

告诉记者：秘书长赞扬记者为促进海南工作所作的努力，尤其是记者在发稿前先向省领导反映情况，让他们的工作主动，秘书长对这种做法很赞赏。

通过这一套报道，本人对批评报道有这样一些认识：

一、勇敢面对问题，迎接难题的挑战，这是搞好批评报道的基础。中国搞批评报道的环境还不太理想，所谓“维护正面形象”，往往是各级官员维护自己地位的“遮羞布”，因而出现了问题，记者从来就是他们第一“防备”的人物。假如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知难而退，要搞好批评报道，只会是纸上谈兵。像这次报道，公安、武警的无理取闹，就是明显的证明。而其撕毁记者证等问题，记者向有关领导反映，也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记者要把问题解决，的确需要忍辱负重、所谓“不忍辱焉能负重”？不把个人的恩怨放在一边，就难以把工作做好。

二、固然，“碰硬”是批评报道的主旋律，但“碰硬”并不排除争取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支持。毫无疑问，凡事要得到有关领导的支持才敢批评，这是作茧自缚，在目前的情况下，有时就意味着放弃舆论监督。但是，当有可能得到支持，而放弃争取，同样是作茧自缚。记者永远要记住：写批评报道的第一目的，是为了促使问题得到最理想的解决，其他问题，毕竟还是次要的。这是我们写批评报道的“纯念”。有这一纯念，你就会从效果的角度来考虑，就会更有建设性。

三、中国的社会经济处于一个大调整、大变动时期，这时记者所遇到的一些批评报道题材，很可能蕴藏着一些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大主题。作为记者，不要浅尝辄止，满足于就事论事，而应当尽可能将里面的大主题“抠”出来。这样就超越了一般揭露、批评的层次，而是更具思想深度的新闻了。

四、从技巧上来说，在捕捉比较大的主题后，记者主动组织专家、政府官员、记者、经济界人士，对此问题进行全面的研讨，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这一方面可以将这问题讲深讲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大报社影响。这一模式，我在后来的数次新闻实践中运用，如“海南红十字会卖假药”一文刊出后，我又围绕文中提出的“生命线与责任线”问题，组织相关人士进行研讨，并对之报道，效果都颇理想。

总结以上四点，我觉得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观点：批评报道并不只是“碰硬”的艺术，更是软硬兼施的艺术。这个“软”，包括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也包括尽可能将题材“软化”——将纯粹“硬碰硬”的批评，变为提升出新观点、新思想的报道。这样，批评报道的投入产出之比就会大大改观，就会事半功倍。

时间：1992年4月10日至18日

作者：刘云 殷红

蒜苔突围记

刘云：我成了“新闻批发商”

蒜苔突围记

各种颜色的“大盖帽”警惕地注视着过往车辆。他们奉命镇守交通要道，堵截个体蔬菜收购户拉运蒜苔的卡车逃出通海县境。

个体户骑着摩托车侦察瞭望，若发现关卡稍有懈怠，便发一声喊，满载蒜苔的汽车吼叫着绝尘而去。关卡紧锁之际，他们便旱路不通走水路，以夜幕作掩护，把水灵灵的蒜苔装到小船上，手忙脚乱划入杞麓湖中。

政府进行“蒜苔阻击战”，个体户则采取迂回游击战术。

3月上旬，云南通海县的早春菜蒜苔呼啦啦翠了田野。正逢市场淡季，菜农们攒足了劲要狠赚一笔。按往年的老规矩，所有蒜苔由供销社收购、调运出省。县里制定的“五统一”政策主宰

着蒜苔的命运：统一组织生产、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经营、统一价格、统一返还利润。全县 15000 亩蒜苔是笔可观的大款，供销社为扶持菜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今年事情突然变得复杂起来。嗅觉灵敏的个体户们闻到了蒜苔的钱香味，不约而同开始“第三者插足”，他们携着成捆现钞，从四面八方奔通海而来，在“五统一”对面摆开了擂台。

供销社眼见“入侵者”掠占领地，愤然倾全力而出，在产区各村遍设收购点，亮出统一收购价：每公斤 1.80 元。个体户们是玩弄市场的老手，针锋相对，吆喝着提高收购价：每公斤 2.20 元。菜农大喜，抛弃了供销社，涌向个体收购点。双方对擂数日，供销社终于败下阵来，每天收购的蒜苔仅为对手的 1/10！

在此之前的 2 月 20 日，县里召开了 300 人规模的冬春早菜调运会，堪称“蒜苔收购誓师大会”，5 套班子出席，工商、税务、公安、物价等等部门参加，县长还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给菜农“最惠待遇”：每交售 1 公斤蒜苔奖售 8 公斤平价化肥。

然而，优待政策在高价诱惑前黯然失色。

供销社阵地丧失殆尽，看来只有动用行政指挥棒了。工商、税务、公安紧急出动，分兵把守关口。事态慢慢发展到双方对峙的严重程度了。

杨广乡镇海村村长岳家秀对着高音喇叭苦口婆心劝告村民：“乡亲们，这蒜苔不是金箍棒，要好好想一想，不要被个体户多抬几个钱把眼睛迷住了。供销社扶植起来的商品，还是交给供销社……”

但收效甚微。

关卡堵得个体户和菜农们喘不过气来。3 月 12 日，数辆大卡车开到关卡前，第一车是人，第二车是蒜苔，他们要闯关。

“我们又没倒卖黄金、海洛因，为哪样堵我们？”有人手里扬着近期有关改革开放报道的报纸，有人力陈中央关于放开三类农副产品、搞活流通的政策。

再死堵下去，后果堪虞。当天深夜，县政府紧急开会，作出决定：撤销“五统一”，全面放开。

顺应市场，蒜苔价格很快趋于合理，3月18日，每公斤下降到1元左右。群众怨消。

统了10年，一朝放开，商品大潮涌入通海，不适应在所难免。值得庆幸的是，通海当局效法了大禹，未酿成更大的风波。

3月，云南通海曾发生“蒜苔擂台战”，个体户和供销社为抢购蒜苔而“剑拔弩张”，政府为维护冬春早菜的国家利益采取了堵卡措施，个体户们以中央搞活流通的政策作“开路先锋”，冲破了统购统销的壁垒。县政府因势利导，幸未扩大事态。

通海邻县江川原也设关堵卡，报纸传递了通海“放”的信息后，江川迅速效法。（本报4月10日一版对通海蒜苔风波有报道。）

如今，浓郁的蒜苔味渐渐随风而去。本月12日，记者再入通海，见对擂双方已鸣锣回营，万亩菜田被犁起黑油油的沃土，菜农们正忙着种下一茬蔬菜和粮食。

记者收集了菜农对“蒜苔突围事件”的议论。其中一位说：“放开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本事高的多赚点，能耐小的少赚点。好在今年没烂市烂价，家家的都卖出去了。”

县供销社主任何俊松松了一口气，“放开是大势所趋”。他回顾了这场前所未有的“硬仗”：全县15000亩蒜苔，总产量700多万公斤，开始时个体户高价买进，供销社门前冷落。但我们最后还是占了上风，收了500多万公斤。扫尾那几天，蒜苔价格下跌到9角一公斤，“老个”见势不妙，溜得比泥鳅还快。我们供销

社可不能也撒手不管，看着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菜烂在田里。我们收购了剩下的 100 万公斤，昆明销不出去，只好派出 18 个推销员跟车到外省去销。从目前情况看，供销社恐怕要亏损 40 万元。

通海副县长陈瑜说，今年发生的事为明年产销探了路。陈承认当时着实捏了一把汗，报纸登了消息对我们触动很大，关卡以后不会再设了，经验值得总结。

“蒜苔擂台战”激烈时诚心劝导农民不要钱迷心窍的杨广乡镇海村长岳家秀体会很深，“放开是好，但不能只让几个人发财，供销社为我们做了多少事，不能让人家兜着破烂走，去做赔本生意。明年我要还当村长，就定个土政策：愿意的跟供销社签合同、交押金，到时产销兑现退还押金，见利忘义的不退！不愿签的自找门路。”

本报记者约请云南省副省长保永康对此事发表评论时，这位思想开放的领导说，放开是对的。政府行为的重点应该是帮助市场发育，起指导作用。生产者也要有市场观念，从只重数量转变为数质并重。“很多东西靠行政手段行不通了。”

云南决策层正高度重视流通问题，以解决农民产品的虚假过剩，为羞涩的“财政口袋”增添进项，使全省人民的日子过得更快乐些。

记者手记

我成了“新闻批发商”

1992年4月发生在云南省通海县的蒜苔风波，能及时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出，并引起轰动效应，得首先感谢《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站站长殷红以及慧眼识真金的该报编辑。时隔7年，至今回想起当时的采访过程，记者仍激动在“突围”之中。

蒜苔突围产生记

记得当时，我作为《云南日报》记者，前往玉溪地区参加全省农资生产供货会。当晚，偶尔听到一位同志给驾驶员聊天：通海的公路走不通了，个体户为了将蒜苔运出去，与“大盖帽”在搞游击战，一方设关堵卡，一方便开着汽车冲关。农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与个体户打联手，旱路不通，走水路，白天行不通就夜里行，将一担担新新鲜鲜的蒜苔悄悄装上小船，运入杞麓

湖中，绕道将货送给个体户。矛盾弄得可尖锐了。

听到这一消息，记者眼睛一亮，顿时感到好新闻来了。联想当时形势，邓小平南巡讲话刚发表，长期受计划经济约束的农民们便不甘寂寞，拼命摆脱套在他们身上的“绳索”，勇猛地向市场这个大海奔去。在水中，他们还不会游泳，会不会被淹没？农民们的命运怎么样？这一夜记者没有入睡。第2天清晨，便在当地找了一辆车前往通海县采访。

玉溪离通海县有100多里路。虽然当时路况不好，由于采访心切，路上老催驾驶员把车开得快一些。上午10时到县城，阳光明媚，但整个县城却笼罩着一股“火药味”。街头巷尾，人们交头接耳，纷纷议论蒜苔一事。一些老头、老太太说：“再这样闹下去不得了，要出人命的……”见此情景，记者没有进县政府大院，而是一头插进事发地点——该县杨广乡。

杨广是云南省的蒜苔之乡。当时正值中午做饭时间，村庄里静悄悄的，农民们一家一户屋顶上很少见到炊烟，村头喇叭里却传来了这样的声音：“乡亲们，这根蒜苔不是金箍棒，你们别以为种出来就了不得，要好好想一想，不要被个体户的几个钱把眼睛迷住了，供销社扶持发展起来的商品，还要交给供销社……”这不是在阻止农民卖蒜苔吗？记者边听边走，不一会来到蒜苔基地。菜园里，见农民们饭也顾不上吃，埋头拼命在采摘蒜苔，有的农户人力不足，四处搬兵，惟恐赶不上最好的市价，干脆对蒜苗开肠破肚，用小刀将不太成熟的蒜苔剥出来出售。

在竞争中，个体户每天可收到上百万斤蒜，而供销社却只能收到10万斤。面对这样的局面，政府动员工商、公安、税务、派出所等部门在各交通要道，设关堵卡，不许个体户贩运蒜苔。然而，你白天堵，我夜里行，你陆地上堵，我就往水面上行，哪里有空子就往哪里钻。随着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农民们见蒜苔运

不出去，便开着汽车去冲关卡。并拿着报纸上有关加快流通改革的报道去找政府部门评理。他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又没有卖黄金、白银、海洛因，你们为啥堵我们？”“中央三令五申强调搞活农产品交易，并放开经营，你们为啥设关堵卡？”看来农民们的思想观念是走在我们的政府官员前面了。

采访完毕，已是傍晚。回到县上，记者找到县政府一位分管蔬菜的副县长了解整个情况，并交换意见，请求报道上给予支持。这位领导有些无奈，他说：“看来你们是‘先斩后奏’了，能不能缓冲一下矛盾再报道。”“蒜苔事件是新闻，容不得再拖了。”我的回答很肯定。这位副县长说：“希望你们手下留情。”回到玉溪，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记者摊开稿纸，一气呵成，连夜写出了《发人深思的蒜苔风波》。第1天一早送到报社。部主任看稿后，当即拍案叫绝，说“这个新闻太好了，太好了。”《云南日报》立即将这条新闻安排在第2天的头版头条。

作者成了新闻“批发商”

《发人深思的蒜苔风波》在《云南日报》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第2天一大早，素来对新闻敏感的《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站站长殷红，第一个冲进我的办公室找我采访。我们都是同行好友。我让他把《云南日报》发表的那一篇加工一下发表就行。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能这样做，请我把现场见到的详情讲给他听，并要求与我合作。我深知他是个十足的“新闻狂”，拗不过他，只好将我采访的东西进行“贩卖”。殷红在较短的时间内写出了较为生动，可读性强的《蒜苔突围记》，并刊登在《中国青年报》1992年4月10日的头版头条。还将我的名字排在前边，紧接着《中国青年报》就云南通海的蒜苔事件在全国开展讨论。

我和殷红再次合作，采写了续篇《蒜苔突围后记》，该报又组织有关人员写出了《蒜苔突围农民没有胜利》、《中国的市场正走向成熟》等系列报道，一时间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云南流通领域里的市场培育和管理由此拉开了帷幕。在这段时间里，中央驻地方的各新闻单位和本地的一些新闻单位也纷纷找殷红和我了解这条新闻背景，我们成了新闻“批发商”。我当时统计过，全国约有16家新闻媒体先后报道了云南通海发生的蒜苔事件。

时间：1992年3月24日

作者：卢跃刚 李雪红

半个世纪的论证

卢跃刚：不吐不快

半个世纪的论证

避祸趋利·人类的抱负

长江三峡这一巨大的历史舞台正上演着最辉煌的一幕：江水湍急，惊涛拍岸。高唐神女，裙裾袅袅。巫山烟云，梦魂萦绕。多少英雄豪杰今天荟萃于此，寻找着昔日的风骚。一个浓重的湖南口音吟诵着那气势恢宏的词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2年后的1958年，毛泽东就把“高峡出平湖”的伟大理想端到了在广西南宁召开的有关领导人的会议桌面上了。毛泽东不仅是个浪漫的诗人，更是个伟人和立志于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政

治家。三峡筑坝，蓄洪发电的宏伟设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1919年，孙中山早在英文写作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指出了三峡“闸堰”开发的问题。

1944年，中国战时生产局顾问、美国经济学家潘绥提出了在三峡修建水力发电厂的“潘绥报告”。这份报告引起了另一个美国人——世界著名大坝权威萨凡奇博士的极大兴趣。经过实地考察，他在中国同行的帮助下，于四川长寿县完成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著名的“萨凡奇计划”。

1944年10月，国民党政府将该计划托请正在重庆访问的美国战时供应局局长唐纳德·内森转交罗斯福总统。据美籍华人、著名水利专家徐怀云先生回忆说，“白宫将此世界最大水利工程透露新闻界，轰动全球！”

在萨凡奇的推动下，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先后派出了54名由徐怀云先生为领队的工程技术人员，赴美进行三峡大坝的初步设计工作。由于国民党忙于内战，资金短缺，完全丧失了一个巨型工程所必需的社会环境。1947年5月16日，初步设计被迫中辍，人员遣散。

历史翻到了五星红旗的一页，毛泽东亲自过问长江问题了。

1953年，新中国百废待兴，毛泽东登上“长江”舰，召来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在听取长江防洪问题汇报时，毛泽东说：“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修一个坝）卡住它呢？”

1954年汛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特大洪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京汉线的专列上，专门听取了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不久就照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请求苏联政府派遣专家来华，协助进行长江流域规划。

1954年百年一遇的洪水和1870年千年一遇的洪水，时刻都在窥视和威胁着富饶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引起了毛泽东万分的忧虑。防洪成为毛泽东下决心修三峡水库的直接动因。他填《水调歌头·游泳》时，以三峡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已初具轮廓，并已有了三峡建坝肯定性的结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最后阶段，把三峡问题正式提交政治局讨论。

毛泽东说，把林一山接来。

当即有人提醒说，林一山赞成三峡，也有反对搞三峡的人哟！

毛泽东问：“谁？”

“李锐。”

“那把李锐也接来！”

一位是三峡工程积极推动者，一位是三峡工程的坚决反对者，在毛泽东的调度下，两个人在南宁相遇了。在会议饭厅吃晚饭时，人们笑他们是“两个冤家碰了头”。

这是三峡论证史上的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场面。

林一山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小个头，山东文登人。30年代中期，他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学历史，做白区的地下党工作，后返胶东组织抗日斗争，指挥了当时震惊全国的“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抗战的第一枪。全国解放前夕，他任辽南省委书记兼辽南军区政委。然而他放弃了继续南下赴广西给张云逸当副手的机会，一头扎进长江，在武汉组建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革命家向水利专家的转变，在“长委”实力很强的知识分子群中树立了很高的领导和技术权威。

林一山关于长江三峡的设想，应该说对毛泽东有着重要影响。

李锐也非等闲之辈。他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高个、英俊，武汉大学工科学机械出身，有很好的科学理性训练。1952年，

他从湖南省委宣传部长调任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局长。按他的说法，是“改行做一点实际工作”。南宁会议后，他任毛泽东秘书，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为止，被称作党内高层的“秀才”。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坚持反对三峡工程上马。

与林一山充满激情、知识广博相比，李锐更具有理性，更注意抽象归纳和表述的逻辑性。

其实，在南宁会议狭路相逢前，关于三峡，林、李已打了2年的笔墨官司。

1956年，《中国水利》5、6期合刊，刊登了林一山2万多字的长文《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

针对林文，李锐也回敬了一个2万字：《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并组织了一批水电专家分别著文，在当年的《水力发电》“长江规划专号”刊出，就长江规划总的指导思想、防洪、发电、航运、地质、水文等方面的问题，系统地阐述了完全不同的意见。

林文认为，“长江流域规划中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而“三峡是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区”，有了三峡还可以发电和改善川江航道。林一山的指导思想是三峡建坝，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水患。

李锐则针锋相对。他认为林文过分强调以三峡水库解决千年一遇的防洪问题，因而离开了综合利用原则，不能从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得到充分谁。他的指导思想是，三峡建设要考虑综合利用，综合国力，长江开发，应逐级开发，“先支后干”。

这便是水利界著名的三峡问题“林、李之争”。争论一直延续到李锐1979年复出后的整个80年代。要么是林文李驳，要么是李文林驳，直到林、李白发皓首。

南宁会议·“冤家”聚首

李锐“单刀赴会”，人们为他捏了一把汗。

1958年“过热”的政治形势，对李锐反对上三峡的主张极为不利。当时，政治上加速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进程，准备为尽早跨入共产主义铺路架桥；经济上，超英赶美，为即将展开的群众性的大炼钢铁、大兴水利作了舆论铺垫。

更重要的是，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大批“反冒进”，而且打算上三峡。

李锐反对上三峡，冒着反对毛泽东的危险。

他略有些不安，然而事已迫近，容不得他有丝毫犹豫了。而且召他来，就是要听反对意见。

林、李乘专机到达南宁的当天晚上，就同时参加了“南宁会议”。

大家坐定后，毛泽东即问林一山，“你要讲多少时间？”

“2个小时。”

毛泽东又问李锐，李答，“半个小时。”

林、李针锋相对的意见讲完后，毛泽东再次加码：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3天交卷。

毛泽东当堂就三峡命林、李“作文”，这一着，林、李二人在开会前都没能想到，不免有些吃惊。

这是一场异乎寻常的竞赛。

3天交卷，时间太紧了！

林一山一者手头材料缺乏，二者，他的右手腕在1938年2月的胶东“雷神庙战斗”中被子弹打残废，平时写作就很困难。可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残废的手半握着笔，居然2天写了

20000字，洋洋洒洒，提前一天交卷。

李锐似乎更难一些。他说：“我的材料更少。林一山还跟着个秘书，拎着个大皮箱，我只夹了个寒酸的小皮包。”他写了8000字，按期交卷。

两篇文章在第3天晚上便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了与会者。

李文提纲挈领，观点鲜明，且行文流畅，深得毛泽东嘉许。

林文纵横捭阖，材料丰富，逻辑严谨，有如关于长江的长篇科学论文。这篇文章后来成为“长江流域规划”的概论。

毛泽东在会上简单地评价了林、李文章后对周恩来说：“三峡的事情交给周总理管吧。”周恩来谦让道：“还是主席管吧。”

毛泽东说：“我哪有那么多时间？”他向周恩来伸出4根大指头：“你每年至少管4次！”

“南宁会议”之后，2月底、3月初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与国务院、有关部委和省区领导、中苏专家100余人，乘江峡轮由武汉逆水而上，召开了三峡工程现场会议，会议的议题是如何积极准备修建三峡枢纽。

“三峡会议”上，李锐第一个发言，总的看法虽然有些转变，原则上同意建三峡，但是基本观点仍然与积极上三峡的“主旋律”有很大差异。

从整个程序看，“南宁会议”和“三峡会议”都是3月份的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三峡决策的预备会。

关于南宁会议，三峡会议林、李之争的结果，孰胜孰负，孰优孰劣，双方都各有解释。但是从“成都会议”通过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即“三峡决议”）的行文内涵来看，“决议”在肯定了三峡“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同时，紧接着说，“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

作出决定”，并且制定了“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吸取了正反两方面意见的积极部分。这显然是一种条件尚不具备、暂时搁置的办法，以防止三峡像 1958 年许多水利工程那样“大呼隆”上去。

如果分析是可靠的（实际上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充分考虑了反对意见，他们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采取了科学和民主的态度。

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

毛泽东领导着中国共产党人，28 年打下江山，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3 年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人；3 年实现了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有把理想变成现实的无限魄力和权威，独独在三峡这个超巨型水坝前犹豫了。这之后，经济面临困难局面，世界政治格局处于冷战时期，逐渐加深了这种犹豫，以致于毛泽东在 60 和 70 年代，数次拒绝上三峡的请求。

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我国著名大坝专家潘家铮先生同意“成都会议”对三峡是“热背景，冷处理”的说法。他目前是三峡工程的积极推动者，1958 年上三峡，无论是国力还是认识能力、技术水平，条件都是不具备的。在“大跃进”的情况下“热”上去，一两年后肯定要停下来，后果将是严重的。

葛洲坝·“反对派”当权

历史是这样的复杂，1970 年 12 月，正当神州大地经历着“史无前例”浩劫的时候，葛洲坝工程上马了。

历史又是这样有趣。“南宁会议”12 年后，林一山扮演了与李锐一样的角色。

林一山 12 年前力主三峡上马，12 年后却极力反对在三峡大坝下游 38 公里处修建葛洲坝，成了名副其实的“反对派”。

12 年时间，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文革”中期，毛泽东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甚至成了“神”。反对毛泽东的意见，简直是自取灭亡。

所以，林一山比 12 年前的李锐承担着更大的政治风险。

在长江规划中，葛洲坝是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三峡工程下游反调节的航运梯级。规划是先三峡而后葛洲坝，或者三峡、葛洲坝同时建成。

如今却完全颠倒了。

林一山反对上葛洲坝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葛洲坝先建，抬高了水位，会给未来三峡大坝造成水下施工的困难局面，二是葛洲坝在当时根本没有搞初步设计。更有意思的是，上马报告中央尚未批复，葛洲坝已集中了数万工人和民工翘首以待了！

林一山极度矛盾。他在 1970 年初刚被周恩来从“牛棚”中解放出来，1 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上周恩来祝贺他解放出来的掌声还在耳畔嗡嗡作响。要么面向可能发生的恶果，随大流，苟且偷生；要么实事求是，犯颜上谏，担着身家性命。

他选择了后者。

12 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通知林一山，要求他立即把意见写出来，与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兴建葛洲坝的报告一块报给毛泽东。

林一山毫不犹豫，一夜数千言，上书毛泽东、周恩来，其勇气，令人慨叹。

在武汉军区、湖北省、水电部等一边倒的意见下，毛泽东批准了葛洲坝工程，但是在批示中留有余地：“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

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林一山说：“毛主席在冒一个很大的险。他实际上批准了一个三边工程。这严重违背了基建程序，违背了科学。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很有艺术，我理解是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同意，第二层意思是有可能干不成，第三层意思是修改设计、换人。”

事情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葛洲坝在动工2年后，由于重大的设计和施工问题而被迫停工。

当时的情况在今天简直是不能想象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团1000多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单位，实行军队建制，出现了“千人设计，万人审核”的荒唐局面。而且工程设计图纸都没有工程技术人员的签字！

工地第一指挥是武汉军区司令员，第二指挥是宜昌军分区司令员。林一山等专家位列十名副指挥之中。没有实权。

周恩来愤怒了。1972年11月，中南海西花厅。“第一指挥长、第二指挥长，都是司令员、分区司令员，都没有搞过，怎么能搞，容易瞎指挥。”

“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

他大声强调：“1958年南宁会议，李锐反对长江筑坝。……李锐现在关着。可以把现在的设计材料给李看一下，提点意见，也是劳动嘛。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要有对立面！”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改组了葛洲坝决策层，出乎大家意料地起用了“反对派”林一山，省长、部长们在林一山的麾下组成了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

林一山临危受命，担起了拯救葛洲坝的重任。

这是他的性格。

这个由革命家转为水利专家的“长江通”，这个“文革”中被关在“水牢”里还央求造反派给些水泥、沙、砖，试验修坝防“洪”的老共产党人，不爱当官爱水利，把一生都献给了长江。

林一山临危受命，更重要的是他手中握有法宝——“长办”（却长委前身，“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一批水利界一流的人材。

林一山是清醒的。

解放初期，他广罗因战乱而隐匿穷乡僻壤的饱学之士。后来林一山为了壮大长办技术队伍，办了两件关键的事情。一是调整内部专业结构，使长办成了有 200 多个专业的综合规划设计部门。现在的长江三峡勘测总队的总队长兼总工程师、勘测大师陈德基就是由水工转学地质的，如今在工程地质领域具有很高的名望。二是 60 年代初期，采用“刮碗底”的办法，录取了一批品学兼优、但有所谓“家庭问题”的高考生，办起了长江工程大学，解决了长办技术力量“三代同堂”、后续有人的问题。这批人才陆续成为长办的骨干。老一代的如李镇南、杨贤溢、曹乐安、文伏波、魏廷琿、洪庆余等，中年一代的如王家柱、邵长城、洛叙六、陈德基、刘崇熙、肖德俊等，都是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其中许多人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知名水利和大坝专家，与上千正在成长起来并担负重任的青年专家一起，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中，为长江的事业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在这一非常时期，为了保证技术委员会有效地工作，纠正以往弊端，林一山提出了三条原则：一、委员会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像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样“大国一致”；二、各委员点头摇头都必须把问题弄清楚再表态；三、每次技术委员会会议达成协议的文件，委员们都要签字负责。

技术委员会有效的工作以及一些重大的决策，力挽狂澜，为葛洲坝 1974 年复工、1981 年大江截流、1988 年基本建成创造了

可能和条件。

这期间，林一山患癌症，右眼摘除，左眼又是高度近视，几乎看不见东西，处于半失明状态。他以非凡的生命力和毅力继续主持了 1973 年 10 月以后的 10 次技术委员会！

林一山大难不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既是他本人的幸运，也是长江和我们民族的幸运。

葛洲坝后来被称作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葛洲坝不起，何谈三峡？！至今思来，惊心动魄！

从宏观决策角度看，毛泽东、周恩来在关键时候起用“反对派”林一山，最后干成葛洲坝，表现出了决策者与实干家信念上的高度默契。

中国大坝·民主与科学永恒

三峡论证几起几落，饱经沧桑。

三峡论争，从 50 年代的林、李之争比较局限的范围发展到 80 年代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周恩来在处理长江问题上心情的自我描述，是三峡论证工作的形象注脚。它使三峡论争公开化、社会化，使三峡论证进一步走向民主、走向科学。

在葛洲坝发电并即将建成时，三峡工程又提上日程。1984 年 4 月，国务院原则批准兴建三峡工程，并即行施工准备。决定成立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筹组三峡行政特区（后为省）和三峡开发公司。

这一举动，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应。

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一些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的投资、移民、生态、防洪等问题提出质疑。

全国政协经济组进而要求吸收具有不同意见的单位和个人参加论证，以集思广益。

与此同时，重庆市对国务院批准的“150 方案（吴淞基面，海拔 150 米正常蓄水）”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该方案既不能改善川江航道、使万吨船队直抵重庆港，又可能造成库尾泥沙淤积，恶化重庆航道环境。

考虑到重庆市和全国政协一些著名人士的意见，1986 年 6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了慎重起见，责成水电部邀请了全国 412 名一流的专家学者重新论证三峡工程。为了保证科学化、民主化，14 个专家组水利界以外的专家占一半以上，并特别吸收了有不同意见的专家，为重新论证制定了严密的审议程序。与此同时，三峡省筹备小组撤消。

4 年广泛的论辩，4 年大量的基础科研，终于以 403 比 9 的结果，为三峡半个多世纪论证划了一个句号。

当把这个句号划完时，我们似乎才突然弄懂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琿所说的，他们长委 1 万多名职工，在三峡论证过程中采取“十倍的工作，百倍的努力，千倍的耐心”态度的确切含义。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

美国人在 80 年代的一份报告中，把三峡工程称作“史诗般的治江壮举”。

萨凡奇老人把三峡大坝称作“中国大坝”。

1946 年，他在重庆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三峡计划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杰作”。“我已经 65 岁了，……如果上帝给我以时日，让我看到三峡工程变为现实，那么，我死后的灵魂一定会在三峡上得到安息！”

1963 年，82 岁高龄的萨凡奇，十分伤感地对前去探望他的

徐怀云先生说：“中国大坝是一定会建起来的。你们中国有许多聪明人，不会把巨大的财富长期摆着不用。只是，对于我，已是一个失落了的美好而又痛苦的梦境啦！”

我们来到设计大师曹乐安先生的家中。1991年，他75岁时患肝癌故世。曹先生生前曾参与设计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和葛洲坝工程，因其卓著的贡献而被国家授予“设计大师”称号。他的写字台，是一个红色而陈旧的三屉桌，用了好几十年了，今天依然如故地摆放在客厅里。桌面上，还保持着曹先生生前的老样子。曹老夫人告诉我们，曹先生生活简朴，不抽烟，不喝酒，一生淡泊而无所求，他临终前唯一的愿望，就是把一部分骨灰撒进长江，一部分骨灰埋到葛洲坝，墓碑朝着三峡大坝！但是这一微薄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

毛泽东生前曾对林一山说：“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来给你当助手，帮你修建三峡大坝？”三峡渺茫，他又把“高峡出平湖”的希望寄托在葛洲坝上。然而遗憾的是，葛洲坝不像请示报告者所估计的那样，只需要“五年左右竣工”，足足干了18年！没有根据的空想与客观现实就那么无情地拉开了距离。毛泽东曾伤感地说：将来我死了，三峡修成后，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呵！

作为科学家的萨凡奇、曹乐安与作为诗人和革命家的毛泽东，怀着对三峡工程的那种痴恋和怅惘，走完了他们的人生旅程。他们的心情是那么惊人的相似！

再看看活着的人。

林一山双目已经失明。但是他谈起长江、谈起三峡，豪气不减当年，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的头顶墙壁上，依次排开着荆江分洪闸、丹江口水利枢纽、陆水三峡实验坝、葛洲坝水利枢纽4座大坝的大幅彩色照片，证明着这位81岁老人昔日的辉煌。

李锐更不显老。他比林一山小6岁，为了保持思维和身体的活力，他几乎每天上午去北京养蜂夹道游泳。对于他来说，好像并不在乎403比9的论证结果。他一生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已经写了两本书20多万字了。他还在继续写。1992年元旦这天，他完成了给党中央的“最后一次上书”，建议推迟三峡工程的兴建期。

他的行动似乎顽强地证明着，论证结束了，论争并没有结束；论证结束了，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还在继续。

李锐和他所代表的一批“缓上派”专家们，林一山和他所代表的“主上派”专家们，还有已经故去的毛泽东、周恩来、萨凡奇、曹乐安等等伟人、大师和科学家们，一块筑起了一座“中国大坝”。这座“大坝”向世界顽强地证明着一种生命现象：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对人格的追求，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都将经受历史的考验，直至永恒！

记者手记

不吐不快

《半个世纪的论证》发表后，第2天文中说的“反对派”李锐即打电话来，要报纸，要见我。他夫人告诉我，李锐读完报纸后激动地说：“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得了！真不得了呵！”

第2天，文中读到的原长委会主任林一山也打电话来要报纸，要见我。他夫人打了多次电话到报社，托人把新电话告诉我，急于要与我取得联系。林一山和他夫人说，没想到历史还能这样看这样写，林一山作为“反对派”领导干成葛洲坝，对于今天的三峡，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意义会如此重大！

李锐曾是毛泽东的秘书、党内高级干部中的才子，是三峡上马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反对派，其后半生是积极反对三峡上马的后半生。

而林一山是三峡大坝始作俑者和最积极的推动者，他领导着长江水利委员会几十年来从未放弃过推三峡上马的努力。

他们作为三峡工程反对派和促上派的代表人物，是我们文章

的骨干，作了充分的展现和历史评价。

正是这对冤家，三峡工程不可协调的对立面，对《半个世纪的论证》都给了很高的评价。作者对历史事实的把握与判断，这两位当事者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和质询。

文章发表前，按照报社意见送能源部总工程师、三峡审查领导小组技术总负责潘家铮先生阅。潘先生除了斟酌个别字句，还对原文作了作者都有些顾虑的强化。他也是文章的积极推出者。

事情的结果完全出乎作者的意料：促上派和反对派的头面人物对同一篇文章持同样的态度。

这是我在采访写作时绝不敢奢求的效果。这也是一篇事关重大的新闻报道极为难得的效果。

这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欣慰。

其实，每次重大采访，我始终只有一个最幼稚的念头：证明我是最好的最优秀的。

关于温州模式、年广久、关广梅、人体油画大展、辛未水灾、三峡工程的采访皆如是。

这些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世界级的新闻人物和事件。其共同的特征是：重大、敏感、复杂、深沉。由于记者作家云集，曝光度极高，新闻要素有极强的可追究性，使我未敢稍有懈怠。

每次采访、写作都充满了挑战和刺激的意味。

而今，我又上了三峡。

三峡与以往有很大不同。

它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三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似乎上自五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人不分老幼不分南北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是非曲直来；二、三峡论证时间漫长，人物众多，渊源复杂而深广，有些问题专业性极强；三、根据已有材料分析，后期论证的深层，已远远超出科学论证的范畴，论证过程已掺进去了政治的

因素。直接对共产党人的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提出怀疑。第四、三峡论证自 50 年代初期以来，就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阵营，这些反对派大部分都是党内外有着相当名望相当号召力的专家权威，有一套与我国经济体系和发展状况相匹配的理论体系，曾在三峡论证的过程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写三峡论证不写反对派，那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然而，宣传的惯例，无论是“下中雨”还是“下毛毛雨”，都不太可能直截了当地写到反对意见。第五，关于三峡，30 多年来，有许多人都在系统地收集材料，或者已做了相当深度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作家、记者和学者写了大量的影响广泛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材料太多了，多得吓人，多得让人望而却步！材料太明朗了，明朗得俯拾皆是，没有秘密可言，没有独家可言！

然而，更麻烦的是，1988 年以后，特别是《长江，长江》出版发行后，知识分子群中弥漫着一种与三峡上马相抵触的又与科学论证毫不相干的情绪，与我国历来民主生活不正常搅和在一起；与宣传一边倒的逆反心理搅和在一起；与建国几十年来不重视科学民主、决策屡屡失误搅和在一起，与重点建设管理水平低、经济效益差搅和在一起，构成了一堵思想认识的巨大屏障。给人印象是人发言都很有权威，是人发言都有不可置辩的分量。

情绪化的倾向，十分可怕地影响着对真理，对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追求。

我还没出门，就有朋友打电话到家里，问：“听说你要去凑三峡的热闹？”我说：“是的。”他说：“如果你要写三峡上马的文章，你将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毫不客气，不留情面，充满了火药味。

此时我心里并没有底。去年江淮水灾前，报社决定让我介入三峡报道，我对三峡的了解实在是“小儿科”，启蒙读本恰恰是

反对派的代表作《长江，长江》和报告文学《三峡，三峡》。

《长江，长江》作者全部都是北京新闻界的高手，本报亦有数名记者参加。个个打抱不平，振振有辞，不可谓没有道理。

飞到重庆，刚下飞机，一位采访了三峡工程多年的报告文学作家便告诫我：三峡是个巨大的漩涡，一个理不清头绪，陷进去便很难拔出来的漩涡。

这在心理上给我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的准则是：舌头长在我的嘴里，我可以不说，但不能胡说；有时不能说真话，但更不能趋炎附势去说假话，或昧着良心说话。对于记者这种记载历史的职业，公正、客观，不待自说，更重要的是必须去扎实地采访调查，必须通过自己的眼睛通过自己的大脑去探索和思考。

中宣部、水利部1月份组织首都记者团赴三峡采访，由武汉出发逆水而上至重庆，很有诱惑，这是个能吃好睡好玩好的差使，呼啸而来，呼啸而去。

这趟差使本是派我去，可我深知此番采访三峡，干系重大，随团采访绝对不行。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记者团逆水而上，我与驻重庆记者李雪红顺流而下。琼瑶有歌云：“我愿顺流而下，找寻她的方向，却见依稀仿佛，她在水的中央”。

李雪红是个琼瑶专家，在码头上等船，在烟草味和肉腥浓浓地混合在一块的四等舱里，在过门呜咽的汽笛声中，在路边灯火暗淡的个体户餐馆，在大宁河洁若碧玉的水上行船，她给我讲着琼瑶所写的故事和琼瑶本人的故事，她能记住琼瑶所有小说中写到的所有人物——那些让少男少女们又哭又笑的故事，那些让少男少女们如痴如醉的人物。末了，我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也没有记住，枉费了她一片苦心。不过，由她，我知道了琼瑶得以在大

陆流传的原因：真是够煽情的。

这一点上，三峡与琼瑶有某些相似之处。

三峡也煽情，北京话说，火火地煽。瞿塘峡之巍峨，巫峡之磅礴，西陵峡之峻拔，多少千古绝唱，多少神奇传说，多少伟人遗韵，少年意气风发，老年苍凉怀古，文人墨客一领风骚……

沿江而下，涪陵、丰都、忠县、万县、方阳、奉节、巫山、巴东、秭归等县市在那灯火明灭中发出深深的叹息，10多年后，它们将会带着对过去平静生活和祖宗基业的无限眷恋而沉没。10多年来，将会有100多万移民，完成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迁移。

无论是谁，想到这里，都不免伤感。更不要说那批环境保护主义者了。

人的伟力和人的局限，人的梦想和人的短视，人类社会企求改变生存现状和逐渐恶化的生存环境，就是这样奇怪而矛盾地纠缠在一起，无从简单地作出孰是孰非的判断。

最让我们痛苦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人类的局限和短视及其无可挽回的后果，却不能不去牺牲，去殉道，去付出代价。

这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处境，这是“生存与发展”所必须回答的沉重主题。

轮船一进门，便拉响了汽笛。崇山峻岭中回荡着呜咽的声音，人们在瞿塘高峡下匆匆穿行，生命显得那么渺小和脆弱。我的胸中壅满了苍凉和悲壮之感。

半个世纪前，著名的美国大坝权威萨凡奇老人冒着挨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去勘察三峡工程坝址；34年前毛泽东顺流而下，去圆那“高峡出平湖”的梦想。他们似乎都看到了生命的尽头，看到了历史赋予他们的有限，看到了那不远处可望不可即的三峡大坝。

中华民族是一个创造史诗的民族，它注定会不甘寂寞，继万里长城、大运河之后，为世界做出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这是一个历史的宿命。

在长江上航行，我被这种宿命感深深地笼罩着。让我在冥冥中感到三峡工程乃命中注定，乃是上苍不容逆转的召唤；长江乃是像毛泽东、周恩来、萨凡奇、林一山、李锐这样一批伟人和天才游戏的地方，后来的论争，要么无关痛痒，要么毫不相干。怀着某种道德素质责任去回答建与不建，去回答庞杂的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去回答谁是谁非，只会误入歧途。

三峡工程的采访头绪繁多且复杂。半个多世纪曾有美国、加拿大、瑞典、世界银行介入过。1989年，世界银行委托加拿大一家公司专门为三峡工程作了可行性研究报告，专门在四川忠县洋渡镇作了移民试点报告。1953年到现在，中国所有的政治家都介入三峡宏观决策，光是1958年就动员了1万名以上的科研人员进行“三峡万人科研大会战”。后期论证牵涉进来的科研人员更是不计其数，投入资金也是不计其数。在较短的篇幅里写谁不写谁，谁主谁次自然成为首要的问题。

在采访中我们强烈地意识到，第一，三峡宏观决策，反对派的意见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二，三峡决策的关键不是一般的科学家，而是伟人和天才。

搞清楚重大的史实，追踪重大的历史细节，对重要的历史材料进行新的分析处理，特别关注伟人和天才们在三峡决策中非常特殊的心态，以支持“反对派意见的存在是三峡科学和民主论证的根本保证”这一判断。

在处理历史材料时，我吃惊地发现，我们关于三峡、关于葛洲坝的重大历史现象被一些堪称“经典”的作品忽略了。后来人们把它解释为“历史的局限”。这倒是一个十分圆满的解释。然

而这种解释为任何短视和功利的追求大开方便之门，为弥漫在新闻界的愚弄公众、投机取巧的萎靡风气创造了合理性。

我给自己定了个原则：不见到李锐、林一山不写一个字！不让写反对派，我也不会写一个字！

写伟人，写天才，写反对派，强化科学和民主精神，是我写《半个世纪的论证》的不可动摇的想法。

然而，动笔时颇犯踌躇。

一是“反对派促进和发展了三峡工程的科学与民主论证”、“无论是社会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经济生活要有反对意见形成社会制衡关系”的思想是否通过？这是全篇精髓。然而，当时的局面是一边倒宣传，尺度把握在哪里？

二是科学家和许多普通人的努力与伟人、天才的努力是一种什么关系？我发现了畸轻畸重。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只写谁谁谁。我说，你看完毛泽东、林一山、李锐在三峡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谁谁谁还有分量吗？那么“多层面”怎么表现？多少科学家为三峡作出的毕生努力、为三峡呕心沥血、死不瞑目的精神怎么表现？然而，我们不能不面对“英雄创造历史”这一基本事实。相对于“英雄”来说，一般人的努力将怎样评价呢？

第一稿就是在多方都照顾到的犹豫中完篇的。

第一稿写成后，我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我最想写的东西最应该展开的东西被压到了二分之一篇幅内，开头用微观切入的办法，写了几个科学家非常感人的故事。

我知道这种东西在现有的气氛下也能发表。但是给我的感觉实在不好。

我的直觉告诉我，稿子先别直接交上去，先找人看看。

晚上11点半，我打电话到李大同家，把李大同从被窝里拉出来。

约李大同第二天9点在报社见。可我一觉睡到了8点半，一骨碌爬起来，不洗脸，不刷牙，下楼叫了个出租车，直奔报社。

找李大同看稿子真是个鬼使神差的念头。我从来没那么晚给他打过电话，从来没给他看过我写的任何稿件。坐在出租车里，我只有一个念头，稿子一定要给大同看，一定要听听大同的意见。至今想起来，那股子劲头，颇有点可笑荒唐，不像一个写作近百万字发表数十万字并得过大奖的成熟记者的举动。

大同也是那种对新闻“中毒”很深的大编辑。即使赋闲，手里只要一沾上稿子，就有一种迷狂和痴情，一种莫名其妙的责任感。这令我敬仰。这与那种“玩新闻”的哗众取宠有着天壤之别。

看完稿子他叫我上去。开始谈时还有几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犹豫，可他耐不住我这份热情和真诚，同时也耐不住他那特有的激情。

他终于说：“那我不客气了。”

他说：“你知道我在你这篇东西里最想看到什么吗？我最想看毛泽东、周恩来这样一些伟人在三峡论证中所起的作用，最想看林、李之争，最想看林一山干成了葛洲坝！”

这种批评正中下怀！我已经预感到他接下去想说什么了。

李大同进一步阐述说：“你前面写到的几个人，故事不可谓不感人，细节也很生动，但是这些人相对伟人和天才们的作用，分量如何呢？而且你实际表现了一种道德精神，可是这些道德精神与三峡大坝的科学论证和民主论证毫无关系！与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毫无关系！”

这是最致命的一击！

三峡采访，是我最动感情的一次采访。我本是有名的铁石心肠，无论是何等惊天动地的事情，无论别人如何动情，我都能保

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不为情绪所左右。可我们到宜昌采访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地质大队已经逝世5年的大队长肖德俊的事迹时，从头到尾，眼泪止不住地流。肖具有突出的人格魅力，先人后己的道德力量，有着大量感人至深的事例。在我的第一稿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表现他。

可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我特别适应这种一步到位、切中要害的谈稿方法。

我意识到原来那些诸方照应的顾虑是不可取的。切入的“断面”也太小，妨碍了后半部重大新闻事实的铺开，冲淡了主题。

刚好经济部主任梁长春路过，我冲出去一把拽他进来，一块听李大同的意见。梁长春也支持李大同的意见。

我决心改。一刀下去，切掉了前半部5000字！

修改稿经李大同、梁长春精编后送总编辑。这时，我们已经断定这是一篇好稿，一篇能引起反响的好稿。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总编辑会上讨论这篇稿子时，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甚至还有争论。末了副总编周志春归纳他的意见：“要写大人物，不要写中人物、小人物。”这实际是肯定了文章的基本思路。

第三稿便是见报稿了。小标题是周志春提炼的，李锐叫好的结尾，也是按照周志春的和李大同的意见强化的。

严格地说，《半个世纪的论证》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是一帮在重大题材的写作上企图突破旧的观念，刻意求新求真求实、新闻业务上想有所作为的“新闻虫”们努力的结果。

我本人要说的是，现在见报的内容，仅仅是我全部采访材料的十分之一，而且我的感觉，关于三峡工程的采访，我只完成了不到一半的工作量。这种题材，从采访、写作到发表，实在是累。心累。那种难以沟通难以对话必须把真实的想法藏着掖着的累。但是我必须说明的是，这种“累”是不可避免的，是我心甘

情愿的。我想，世界是多元的，是丰富的，笃定有部分人活得轻松，有部分人活得累。我可能是属于那种活得累的人。甚至知道并时常告诫自己，“活得累”是与愚蠢、狭隘、较劲、死性、别扭、压抑、郁闷、寂寞、惆怅等等不太美好的心理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可我想，总得有人去累，总得有点理想主义去直面人生，总得有人去为理想为信念而论争而辩护，总得有人去打破沉闷的气氛，总得有人去认真地想问题，总得有人去艰难跋涉以期得到理解，总得有人在略有点不合时宜的时候去努力改善环境去创造未来。

我是最怕合作的人。面对一天便会成功的合作，我倒愿意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苦思冥想一年！但是，这次我要说：合作愉快！

我也怕与具体的对象竞争，把我放进考场，其结果一定是与期望值相距很远的尴尬。但是，这次我要说：竞争愉快！在与对手竞争中证明自己是最好的，愉快！

时间：1991年7月13日

作者：许珂 郭宝 胡野秋

含泪再炸邱家湖

胡野秋：真实是新闻的要义

含泪再炸邱家湖

“要炸，他们自己去，我不当这个坏蛋！”安徽省颍上县半岗区委书记两眼血红，火爆爆地冲着报话机嚷。尔后，他甩掉话筒，看也不看在场的省防汛指挥部来人一眼，转身奔代家湖指挥护堤而去。

报话机仍开着。县防指负责人语调硬如铁：“为确保下游两岸煤矿、津浦铁路和重要城市安全度汛，邱家湖炸堤必须执行。工兵即刻就到。”

“明白了，我们执行！”正在接待记者的副区长杨淑华赶紧抓起话筒替书记回答。话未落音，这位女区长已泪湿衣襟。

为了全局的利益，邱家湖人民的牺牲已经够大了。6月16日的第一次炸堤行洪，已使88个自然村、5万多亩耕地顷刻化

为汪洋。近3万人栖身庄台土墩，缺柴断粮，疾病流行。再次实施扩大口爆破，便意味着要再进行数万人大迁徙，更多的村庄及土地再被吞没，将来复建大堤时，需付出千百倍的辛劳。

然而，事关全局，命令如山。干部们在感情与理智的煎熬中深明大义，担起重任。

文前那位“胆大包天”的区委书记，昨夜里就摸着黑带领干部下到湖里，逐村逐户地动员、组织群众迁移。他忙乎了通宵，也受了通宵的气，有人指着鼻子骂他：“你是只会保乌纱帽的坏蛋。”

“坏蛋”们踩着齐腰深的水帮老乡们搬运行李，转移牲畜，领着乡亲们走进刚搭起的简易窝棚。这就是我们的基层干部，为服从大局，他们默默咽下了几多委屈。

执行爆破任务的解放军某部工兵船向邱家湖驶来。船至堤口，被疲惫的群众包围。

“好人啊，手下留情吧！再一炸，俺那破房子就要震倒了！”一个大嫂拽住扛炸药箱的战士苦苦相求。

“不能再炸了，你们走了可知俺们修堤取土要遭多大罪？”一个汉子怒吼着抓起一束雷管扔进湖里。

面对四面人墙，执行人员和区乡干部耐心地向他们解释。省防指派来的工程技术人员，索性摊开地图，比比划划地从上游说到下游。

工兵部队的那位团长，做思想工作算到了家。他拍着汉子的肩膀，笑咪咪地告诉群众：“这湖里的雷管可是隐患，将来万一谁家的孩子不小心碰响了还了得？”说着，团长转身命令战士下水打捞，两名战士一次次潜入冰凉的河底，憋得脸色青紫，直到捞起雷管。

扔雷管的汉子后撤了。群众们慢慢地、慢慢地向外退。

“是呵，下游的人家也需要保，俺们已经遭了灾，再熬一阵吧。”人们互相簇拥着站到土台上，噙泪向自己的家园投去最后一瞥。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邱家湖行洪堤中口门豁口再次贯通、拓宽，淮河水向圩区内长驱直入。

下游的人们哪，记下这些上游农民兄弟姐妹的牺牲吧！

记者手记

真实是新闻的要义

转眼8年过去了，我生活在远离水灾的地方，重新打量那些湿淋淋的文字时，我发现，历史的滋味并没有被洪水冲淡，相反她呈现给我另一番景色。昨天并不古老。

重新回到邱家湖吧，回到8年前那个不可磨灭的一天一夜。

当时安徽的水灾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我每天在下面东扑西颠，一篇一篇地向“家”里发着稿。但自己总觉得缺点儿什么。缺什么呢？我也不清楚。

于是，我总在朦朦胧胧地等待着，像等待戈多。

1991年大水，确实是百年不遇，与之相比，现在的年度大水只能算“例汤”。百年不遇的水情，百年不遇的慌乱，百年不遇的冲突，百年不遇的震撼。人与大自然的一切纠葛，都在一瞬间爆发了。作为记者，我们也是首先以被动的角色现身的。

本来，我与陕西记者张文彦一道跑了大别山的3个省，为科学部写一组科技扶贫的稿子。我俩憋在记者部的“夜游斋”赶写

稿件，希望早点写完，早点回到阔别近 50 天的家。

稿件快写完了，我的注意力被天气预报拽了过去。每天 CCTV 的天气云图上，我的家乡都被浓重的雨云覆盖着。我一向是个悠哉游哉、漫不经意的人，但这次有种“大事临头”的警觉。

大别山的稿件三下五作二地写完，笔一丢，便跳上了北京开往合肥的 127 次直快列车。我很庆幸，因为 7 月 7 日的这趟车是华东方向发出的最后一班车，第 2 天起这趟车便停开了。

车过蚌埠，宛如军舰驶进海洋，环顾火车左右，水天相连。火车喘着粗气在缓慢地蠕动着。从这一刻起，我预感到我的工作、生活日程要以这汪洋的进退来“对表”了。

到合肥后，先跑了省气象局省三防办，除了得到一大堆图表之类的东西，别无所获。那些资料都很宝贵，但它对于新闻记者和新闻读者而言，作用实在是很有有限的。我意识到，我不能再呆在省城，水灾不在这里。

第 2 天，我出发了。我用尽一切办法接近灾区。坐橡皮舟、铁壳船、水泥船、机动三轮，坐只收钞票不给车票的“客车”，最奇特的是坐过一回 14 吨的大吊车。靠着这形形色色的交通工具，我到了受灾最重的地区，看到浮在水面如水瓢的古城寿县，目睹 20 分钟被灭顶的三河镇。

目击，目击，全是目击。那些坐在家里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场景、情节和人物，教会我什么是现场新闻。

那是在一次暴雨间隙期，我来到了邱家湖。同行者还有《安徽青年报》记者郭宝、许珂。我们计划在这个不知名的地方呆上一天，然后去蒙洼行洪区。

一路上，不时见军车急驰，车厢被雨布遮得严严实实，这情景另人犯疑：送救援物资，没这么快。那能是什么呢？

当时同行的有一批记者，有人开了句玩笑：别他妈是炸药吧！

闻言心中一震，暗想，谁敢说不是呢？这一带是连片行洪区，出事的概率极大。

别的记者在邱家湖歇歇脚就走了，我和郭许两个同伴却悄悄地“潜伏”下来。

果然，我们亲眼目睹了一幕不可复制、撼人心魄的历史场面：两眼血红、火爆爆地冲着报话机嚷不愿再当炸堤坏蛋的区委书记；泪湿衣襟，不得不表示“明白了，我们执行”的女区长；怒吼着“不能再炸了，你们走了可知俺们修堤取土要遭多大罪”的汉子把一束雷管扔进湖里，以及最后相互簇拥着站到土台上的群众，噙泪向自己的家园投去的最后一瞥。邱家湖人民在感情与理智的煎熬中深明大义、担起重任，选择了牺牲与奉献。

然而，这种牺牲与奉献，决不是我们在媒体上司空见惯了的英雄壮举，这是一种深刻的痛苦与无奈。

还需更多的笔墨吗？用白描的手法把这一切忠实地记录下来，这便是我的唯一初衷。

其实从写作上看来，这篇东西没有刻意雕琢。一切按原生状态展开。

当《含泪再炸邱家湖》见报后，评论如潮，有些溢美之辞让我汗颜。如果说这篇东西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那应该归功于生活，是生活的力量给她注入生命。

有评论曰“胡野秋恢复了再现的权威，使真正的新闻走上了报面。”我想说，关键是真，只有真才能撼人。

什么是新闻？什么是记者？我经常自问，每隔上一段，我总习惯地搬出这个巨大的困惑，好生折磨自己一阵。

应该说，是一场大水，激发了我的新闻敏感，我教会我新闻

的本质：真实，新闻的第一要义，它只能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新闻就是新闻。新闻不是哲学、不是社会学和经济学，不是这学那学。

获普利策新闻奖的新闻作品，都只传播读者想知道的信息，并不需要什么深层次的爆破，但他们同样惊世。

我总觉得，记者的职业价值就在于把“现场”再现给读者，如之效果便可观。反之，我们累得四脚朝天，最后是“一地鸡毛”。这有些废话的味道。

但我固执地如此认为。

即使是在8年后，即使是在远离水灾的地方。

时间：1988年8月19日至30日

作者：卢跃刚 邓琮琮

十万吨查私聚丙烯假合同案追踪

邓琮琮：扮情人深入虎穴调查

十万吨查私聚丙烯 假合同案追踪

疯狂的交易

“有聚丙烯吗？”

“要说有也有，要说没有也没有。看谁买。”

“货是哪儿的？”

“日本进口聚丙烯中夹有海洛因，被海关一块查获的。”

今年7月30日6时30分许，大雨滂沱，记者在北京清华园宾馆2308室大连罗湖塑料厂驻京办事处记录下了上面的对话。

在此之前的两天，7月28日，《经济日报》二版右下一块不显眼的位置登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海关声明”。声明说：

“我关是国家的进出境管理机关，从未与任何单位签订聚丙烯合同……”

看来，这份花了 800 元钱登的“公开声明”，收效甚微，没有阻止住这场牵动全国的疯狂交易。记者在海关“公开声明”后历时 10 天的追踪采访证实了这一点。

“北京海关的声明您看了吗？”记者问一用户。

“声明归声明，货肯定有。”

“合同是假的，章是假的，我们都知道。海关的人和中间人王礼说了，等到货后，再重新签合同。”河北沧县工商综合公司与所谓的北京海关签订了 32000 吨聚丙烯 PPF401（价值 1.47 亿元人民币）的购销合同，在接受县政府的询问时，它的经理姜锡年非常自信地说。

作为国家的管理机构，海关的权威受到了获取暴利的强烈欲望的挑战。

故事编得恰到好处：今年年初（还有一说是 1986 年）海关在日本进口的 10 万吨聚丙烯 PPF401 中发现 200 公斤走私毒品“海洛因”。连同走私毒品一起，海关没收了全部货物并作价出售。这故事易流传而无人查证。

据记者调查，一个名叫“王礼”的中间人“牵线搭桥”，以北京海关的名义，先后与河北省沧县工商综合公司、华北油田光华实业公司、大连市罗湖塑料厂等签订了 10 万吨聚丙烯 PPF401 合同，以与沧县合同单价每吨 1600 元人民币计，价值 4 亿 6 千万。实际上，聚丙烯市场价已达 8300—8700 元一吨。再经倒腾，到用户手里，每吨价格可达到 10050 元。

巨大的价差，成百万上千万直至上亿元的巨额利润，仿佛是唾手可得。

河北沧县一个偏僻小镇的一个小皮包公司，5 月中旬到 6 月

中旬，一个月的时间，账户上就骤增了 1384 万人民币，都是购买日产聚丙烯 PPF401 的定金！这个镇的工商银行办事处主任吕国栋告诉记者，他负责的办事处从来没见过存入这么巨大的款项。

一时间，我国沿海的重要港口处处开花，北部的营口、大连、天津，东部的上海、青岛、汕头、厦门到处都有日本产聚丙烯 PPF401 的影子！

几张伪造北京海关的业务章签订的合同，牵动了全国的神经。记者看到，合同涉及的有黑龙江、辽宁、河北、北京、山东、上海、江苏、湖北、浙江、贵州、广东等几十个省市。连部队也加入进来。已经流动的资金，按收取 30% 的定金。粗略估计，也在亿元左右！

据沧县工商综合公司业务副经理姜长林回忆说，该公司在北京永定路花园村 35 号的办事处，最高峰每天接待 100 多人，早上三四点就有人敲门，晚上到午夜，还有不走的人，缠着要订聚丙烯。有的客户把成千上万的钱硬塞给姜，恳求姜保证供货。

北京海关成了客户注视的焦点。6 月 0 初开始就不得安宁，全国各地的客户都来咨询日产 PPF401 聚丙烯的货源。严重损害了海关的声誉，不得不于 7 月 28 日在《经济日报》发表了公开声明。

然而，经济运行中的真亦假、假亦真、真真假假真假难分的混沌状态，并没有使声明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盗用北京海关名义签订的合同有很大的欺骗性。除了几枚海关的章之外，还有海关代表“方秀亭”的签名，还有开户银行：“天津塘沽工商银行”。

传说“方秀亭”是天津海关关长。但经沧县政府顾问郑孟和专程到天津海关查询，答复是，天津海关没有“方秀亭”此人，

便谈不上什么关长了。

又传说“方秀亭”是国家海关总署第三产业总经理。而北京海关方面再次向记者郑重声明：

一、北京海关绝对没有所谓查私内部处理之日产 PPF401 聚丙烯；

二、海关总署没有第三产业；

三、海关系统没有“方秀亭”此人；

四、合同上所盖的海关印章均系伪造，而且原章已经作废。

那么，日本聚丙烯向中国出口的状况如何呢？

据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所属塑料有限公司（记者注：该公司开展国内进出口聚丙烯咨询业务。）提供的日本海关公布的聚丙烯出口中国的资料表明：1至6月份，日本一共出口中国聚丙烯 22123 吨，其中包括部分 PPF401 牌号。

有关专家告诉记者，PPF401 在日本只有三井石化公司出产，该公司年产能力 12 万吨，其中只有 20% 用于出口。中国只占一小部分。

也就是说，日本出口中国 PPF401 聚丙烯，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从今年的出口量来看，与目前中国山南海北“大炒”的 10 万吨来比较，真是谬以千里！

看来，这是一起盗用海关名义进行的重大诈骗活动。其范围之广，涉及资金之多，都是全国之罕见。

一切都该结束了，一切又都没有结束。还有许多人跟着一个叫“王礼”的中间人正盯在广州作发财梦呢！

神秘的中间人——“王礼”

在北京清华园宾馆 2308 房间，有他的踪迹：穿海关服来订

合同的大个子。

在河北省沧县，作为乙方河北省沧县工商综合公司与所谓“甲方”专门打交道的业务经理罗贵财和姜长林被沧县公安局收容后，沮丧地告诉记者：这个人个高，特胖，大肚子，短分头；方圆脸，体重至少 200 斤，40 多岁，北京口音，为人办事镇定，稳重，很难看出破绽。

他自称“王礼”。

谁也说不清他家住北京哪儿，谁也说不清他真的工作单位，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沧县工商综合公司给他办了个工作证，职务是“办公室主任”，用名“王礼”。华北油田光华实业公司也给他办了个盖钢印的工作证，用名“安立平”。

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个叫“王礼”的神秘人物，抛头露面，南奔北走，穿针引线，导演了这场牵动全国的聚丙烯大战！起码也是这场闹剧的主要人物！

他首先编造了一个故事，给 10 万吨聚丙烯货源加上朦胧而神秘的色彩，“查私没收物资”、“内部处理”、一大串莫名其妙的海关印章，极大地恰到好处地刺激着许多想发横财的冒险家的胃口。至于他与这批货的关系，他向沧县工商综合公司业务经理罗贵财解释说他与海关关长是朋友，一天去关长家，谈起海关查获一起在进口聚丙烯中夹带海洛因案件，没收了全部货物，并委托“王礼”销售。

沧县乙方想咨询，而“王礼”却警告说：“你们如果去海关咨询，张扬出去，上面查起来，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甚至对沧县将“货”卖给谁，“王礼”都要进行干预。他说：“别跟北京人做这笔生意。北京人滑，麻烦事多。”

就沧县方面来说，从今年 4 月至 8 月，一切都被“王礼”紧

紧地操纵和把握着，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与海关订合同，转签合同，收取定金和付给“王礼”好处费。

滑稽就滑稽在“按部就班”上。因为作为中间人的“王礼”在编造故事和牵线搭桥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有明显的破绽。

一是，甲乙双方成交几亿元的生意，却不让乙方见到所谓“供货的甲方”。按他们的话说，到现在为止，“海关的门往哪边开都不知道”。

乙方法人代表的委托人罗贵财从4月30日起，曾先后代表3家公司和企业（包括现沧县的乙方）与所谓“北京海关”签订了8份合同。8月8日，他向记者描述说：我们与“北京海关”签合同，每次都是我和“王礼”包车到天津盖“甲方”的章。每次去都是那辆车，米黄色的“伏尔加”。每次都是把车停在天津劝业场，“王礼”把我们撇在车上，独自徒步去盖章，说是天津海关不让进，怕出事。我说，不管，只要你给货。

这个“从来就没做过大宗生意”的经理回忆说：当他“拿到盖有海关章的合同”，心里“挺高兴”。

且不管盖的是什么章。

“王礼”巧妙地利用了外界对海关业务的神秘和无知，巧妙地利用了国内流通领域里紧俏商品交易的某些不正常状况。

据北京海关官员介绍说，加盖在沧县与“北京海关”所谓聚丙烯合同的海关印章，都是海关对内业务用章。盖在合同上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而且“王礼”有个重大疏忽，74号验讫章、57号行邮章、13号核放章，海关已于1987年5月1日前收回并停止使用。

再者，记者看到的几份合同，都有显而易见的漏洞。有的合同条款笼统简单得惊人，甚至产品质量技术标准、供应办法、交货运输办法及地点、商检及验收办法、结算方式及期限、供需方

经济责任等全部空缺，只填一个合同有效期限。

从“合同”可以看出，“王礼”、“方秀亭”和充当乙方的罗贵财等，对“PPF401”聚丙烯的商品知识和“经济合同法”等有关知识几乎等于零！如果说以后的合同以及沧县转签的合同比原先稍有些象样子的话，那也是“现炒现卖”、“边干边学”水平。

然而，“王礼”却是个消息灵通人士。

6月16日北京海关和持高检介绍信的北京朝阳区检察院去沧县调查，“王礼”此时在福州，很快就知道了情况。

7月28日北京公安局二处找沧县工商综合公司驻京办事处的业务副经理姜长林了解情况，“很秘密”。可是据姜说，第2天，“王礼”就来电话核实此事。

“王礼”的老谋深算和神通广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夸大了，因为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说到他，莫不带有一种敬畏的口吻。

“王礼”的行动，每一步都似乎经过了深思熟虑。有关方面分析，首先他有意地避开北京的许多大公司，筛选出沧县工商综合公司、大连罗湖塑料厂、华北油田光华实业公司等地处偏僻、经济力量绝对不能胜任、发财欲望极强、咨询渠道不力的皮包公司或小企业。第二，控制与“北京海关”签的正本合同，理由是，由他拿到港口盖章办手续。

记者在沧县得知，工商综合公司的所有正本合同都在“王礼”手里攥着。

据罗贵财说，眼下，神秘的中间人“王礼”正带着一帮“乙方”在广州豪华的宾馆或酒家转悠呢。

“王礼”何许人？“王礼”——方秀亭，他们是一个人吗？因为至目前为止，谁都没见过“方秀亭”。或许他的背后还有更重要的人物在遥控指挥？这些都只能是猜测。

祸起萧墙

沧县工商综合公司先后与“王礼”所谓的“北京海关”签订了5份经济合同，可供日产聚丙烯32000吨。

5月上旬开始，北京永定路花园村35号工商综合公司驻京办事处的大院里，32000吨“炒”得热闹非凡。数量急剧上升，甚至超过了供“货”数量。

6月30日止，工商综合公司已签出聚丙烯32800吨。

7月25日止，合同供“货”数量猛增至42200吨。而且这个数量仅仅是北京办事处姜长林统计的数据，还不包括客户跑到沧州定的合同数。

有意味的是，福州、深圳、汕头、大连、宁波的一些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的大、小公司也是不辞辛苦来到河北，沧县兴洛镇的一家极不起眼的小公司签订成千上万吨的聚丙烯合同。南方的这些公司经过多年对外开放的洗礼，做生意谨慎、刁钻是有名的。“不见兔子不撒鹰”，几乎在商品交易中被奉为原则。

这次“日产聚丙烯PPF401大战”却违反了起码的规则，所有的客户都没有见到“货”，都没有见到必要的外贸进口的手续和证明，就匆匆忙忙地将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的巨额资金像下赌注一样拨入所谓的“供货单位”账户。这种畸形的商业信誉从何而来？

工商综合公司驻京办事处对外业务的主要经办人姜长林告诉记者，他对外签合同主要依据两点，一是沧县公司与“北京海关”签的5份合同；二是依据沧县工商局的8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鉴证合同（当然还有那个“王礼”为货源编造的神秘的故事）。

沧县工商局鉴证的8份经济合同无疑是严肃地向外界宣布，

与沧县工商综合公司的日产聚丙烯 PPF401 生意受到法律庇护。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货源的可靠性。

记者在沧县看到了 8 份鉴证合同的其中 5 份（另外 3 份据说已经作废），上面赫然盖着“合同鉴证专用章”。鉴证的聚丙烯数量 12000 吨，资金总额 10355 万元，定金及预付款 791 万元。

记者在沧县工商局被告知，“这些合同是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鉴证条例办的”。可是“有关材料”中最主要和关键的材料，沧县与“北京海关”的所谓合同，就有明显的问题。甲方提供给工商局唯一的证明货源的“北京海关”合同不是正本，而是“影印件”。再者，该合同加盖在甲方上的印章，不是合同专用章或对外合同用章，而是北京海关 74 号验讫章。

就此事，记者请教沧县工商局负责鉴证的官员。这位官员解释说：“当时因为是复印件，看不清里面的字”。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工商局鉴证“审查当事人主体资格”时，也是先鉴证，后审查。鉴证程序也有漏洞。审查过程中对乙方严，对甲方宽，因为工商综合公司在当时的银行的存款只有几十元人民币，怎么有能力做几千万乃至亿元的生意呢？

工商局负责鉴证的官员解释说：“我们当时考虑工商综合公司这笔聚丙烯生意，实际上是代销的关系，与鉴证的乙方又是办的‘托收承付’。”

为什么工商局和鉴证合同鉴证过程那么匆匆、粗疏，对甲方有着某种默契、宽容？每份鉴证合同都通过得那么顺利？

人们知道沧县工商综合公司与沧县工商局有一种渊源关系。在沧县提到工商综合公司，人们会说，“噢，那是工商局的公司。”

藕断丝连，很难避免鉴证过程不偏不倚。甚至有意无意地支持了鉴证甲方的不正当经济行为。

比如，在合同上反映，工商综合公司聚丙烯的买进价每吨4600元人民币，而卖出价却是每吨86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法律不仅保护了皮包公司的买空卖空，而且还保护了甲方能以每吨差价4000元来牟取暴利！

我们不能否认，沧县工商局在鉴证合同后，做了许多咨询和调查工作。他们派专人于6月初到北京海关核实货源，当他们得知这是一起私刻海关印章的诈骗活动后，立即回县采取行动，冻结了鉴证合同预交的定金和预付款791万元（记者注：令人费解的是，当时账上有定金1千多万元，为何工商局只冻结了鉴证的那一部分？）。他们在发函咨询了鉴证乙方的情况后，终止了部分非法合同。

令人遗憾的是，从鉴证到冻结定金和预付款，中间相隔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合同翻合同，倒买倒卖，现在谁也说不清“北京海关”所谓的合同繁衍了多少子孙。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认定的，沧县工商局的8份鉴证合同，以法律的名定证实了沧县与“北京海关”的假合同，对这次聚丙烯大骗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外有“北京海关”，内有“鉴证合同”，不由人不信。这样，祸水便畅通无阻地流向了全国。

黑吃黑

一盘嗲声嗲气的流行歌星磁带的B面，记录了一场“黑吃黑”的黑幕：

（数钱声。）

“这是2万。……2万5。”

“你拿过2万5吧。拿3万5吧！”

“3万5呵?”

“你拿4万。不够再给你拿。你拿多少我拿多少!”

“我拿5万吧。”

“胡说八道。”有人插话。

“5万就5万! 咱哪儿跟哪儿呀!”

“到港时间……”有人问。

“还说不清楚, 顶多6月份, 多了7月份。……我绝对相信你们, 但有一个问题……”

录音时间, 5月初。录音地点, 北京丰台某地一个叫周志坚的人家中。

在沧县公安局, 工商综合公司业务经理罗贵财告诉记者, 沧县与“王礼”所谓的“北京海关”订了日产聚丙烯 PPF401 合同后, “王礼”即要索取10万元的“定金”。后经讨价还价, 沧县只付给“王礼”约6万5千元现金, 分两次付清。上面的录音, 是罗贵财携带小录音机在第一次付钱的现场偷录的。

“王礼”吃罗贵财等, 罗贵财又吃别的客户。

5月中旬, 浙江象山县石浦塑料电子电器厂一个叫金克勤的打电话给北京海关保卫部门, 称沧县方面做聚丙烯生意条件苛刻, 看一次与“北京海关”签的正本合同, 收费2000元; 看一次合同副本, 收费100元。他付100元看了副本。

买进4600元一吨, 卖出8600元一吨, 这么好的事儿, “王礼”哪能让罗贵财白赚了去。4600元一吨, 多公道的价!

按照“王礼”与罗贵财之间的口头协议, 如果成交后, 每吨聚丙烯, 罗贵财就要付给“王礼”好处费500元, 32000吨, 一共是1千6百万元。同时, 付给“海关”或“港口”方面每吨1900元现金, 一共是6千多万元, 由“王礼”代转。两者相加, 总共是7千6百多万元现金!“王礼”解释每吨1900元的用处,

主要是上下打点“海关”、“港口”的有关人员。

一个敢张口要，一个敢说给。生意做的有鼻子有眼。然而又谁都知道，这7千多万现金，无论如何是拿不到手的。

“王礼”与沧县等想发财发了疯的人打交道，有张有弛。聚丙烯到港期一拖再拖，港口一变再变。最后“王礼”将条件压低为每个港口给“打点费”20万元。沧县的5个港口共100万。

罗贵财谈到付给“王礼”钱，还自以为聪明地说：“我们还算给得少的。”

河北任丘市华北油田光华实业公司也是一给钱大户。该公司原是沧县工商综合公司的乙方，后来直接变成“王礼”的乙方。为此，他们付出了比沧县更多的代价。

据罗贵财说，光华实业公司先后付给“王礼”40多万现金。一次在福州华侨大厦514房间罗贵财和“王礼”住的房间里给的，15万现金。光华实业公司经理张××付的。罗在场。6月19日，在福州东湖宾馆9楼“王礼”与罗贵财的套间，张××等数人又付给“王礼”21万现金。

罗贵财付了钱给“王礼”，就专门盯住了“王礼”。“王礼”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7月6日罗贵财乘飞机飞到广州。然而“王礼”却不告诉罗自己的住处和电话号码，“王礼”说：“到时候给你货不就完了吗！”

7月14日，“王礼”和光华实业公司经理张××到罗在军医大学招待所的住处，一进去，首先检查罗的全部行李，看罗是否有录音机偷录谈话。

7月16日光华实业公司的张××打电话给罗，要他退回光华实业公司原先付的200万定金。此时，张已控制了“王礼”。罗威胁说：“有货钱退你。没货的话，你把‘王礼’交给我，我

再退你钱。”

7月27日沧县公安局在广州收审了罗贵财。晚上，“王礼”在电话中又出现了，说8月15日提货。

在广州期间，“王礼”不知从何处得知，罗贵财在付款时曾经给他录过音，就大发脾气，声称不交出录音带，就不给罗发货。

“王礼”深知录音带的厉害，他在7月底赶回北京，和另外一人，穿着海关制服到永定路花园街35号找姜长林和肖军，姜、肖不在，又到花园街2号工商公司的另一处住房找到公司的人，警告说：“你们如果不交出录音带，影响发货你们负责。交了录音带，8月上旬保证发货。”

其实，“货”永远不会有。然而，“王礼”却留下了永远也抹不掉的痕迹！那盘记录了他与沧县工商综合公司黑交易的录音带，眼下已锁进了沧县公安局的保险柜里。

敞开地狱之门

记者乘车来到沧县，探访沧县工商综合公司。这家公司在这场聚丙烯大战中出尽了风头。他们先后在“王礼”画好的大饼上一共分得了32000吨的销售权利。

这个敢做2亿多元人民币大生意（按该公司的售出价每吨8000元计算）的公司，是一个小院子，很不显眼地蹲在京福公路旁。门口除了公司的牌子外，还挂着一张“沧县渤海汽车配件公司”的牌子。杂草已经长过了最下面的“司”字。

这家公司原来只有一个经理，5月份飞来聚丙烯业务后，经理增至5个。在北京永定路租了花园村35号和2号作为办事处，拉开了架式与“王礼”联手倒腾聚丙烯。

一架机器的运转，为了减少摩擦力或阻力，要不断地添加润滑油。经济活动的润滑油是金钱。

聚丙烯 PPF401 的巨大生意从 4 月份到 8 月初，天上飞，地上跑，觥筹交错，花销巨大。钱从哪里出？

记者在沧县工商银行兴济办事处查证工商综合公司聚丙烯生意前的账目资金情况：

账号：66010；金额：64 元 8 角 9 分。

而且该公司欠外债六七十万，加上积压物资，有 100 多万。

生意做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份上。

再看看大连罗湖塑料厂的状况。该帮有职工 100 多人，年产值只有几十万元，是个街道小厂。

可是该厂在北京的花销惊人。他们包租了清华园宾馆 2308 一个套间，每天租金 135 元；包了一辆超豪华“皇冠”，每月租金 6000 元。仅这两项每月就要开支 1 万元以上。

钱从哪儿出？当然是在全国各地想发聚丙烯财的客户身上出。记者采记中看到的绝大部分合同乙方都是皮包公司中间商，他们的钱也是别人的。甲方是乙方，乙方变甲方，供需双方逐级变换，组成了一个连环套。大连开发区辽贸购销经理部（或称辽宁省外贸局机关服务公司）7 月 17 日汇入沧县工商综合公司的另一个账户——沧州市建行署西街信用社 170 万元，资金就是辽宁省外贸局“支持”的。

辽贸购销经理部算是一类乙方，上级挂靠单位或部门支持资金。还有一类乙方钱来自何方，上级主管部门根本不知道。

记者 8 月 5 日在河北任丘市采访了华北石油管理局器材供应处。这个供应处拥有流动资金 2.5 亿。它的办公室主任介绍说，“每天一开门就得付几百万元。”可是他们对下属的“华北油田供应处物资经销公司”与沧县的 4 千吨聚丙烯 PPF401 这样巨大的

经营活动却是“一无所知”；1000多万元也没出自供应处。而这家公司从5月27日开始，几天内就付给沧县定金1000多万元。

在任丘还有一个财大气粗的乙方：华北油田光华实业公司。记者找到他们年级主管——华北石油管理局劳动服务公司（对外称农工商联合总公司），他们的经理让一位副经理来介绍情况，结果是一问三不知。

光华实业公司看来腰杆很硬。为了使乙方经济上不受损失，沧县有关部门专门派人到任上调查，这家公司态度蛮横地说：“200万元算什么！我们的大生意一笔就2亿多！”

这些大头钱不知花的谁的？

沧县工商综合公司经理罗贵财就是左手拿过宁波客户交来的3万元现金，右手就给了“王礼”。

沧县工商银行兴济办事处主任吕国栋告诉记者，综合公司已从定金中支取转账资金244万多元，用于还债等。

工商综合公司和“王礼”全国各地跑，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豪华宾馆。罗贵财数了大连、上海、福州、广州一堆高级宾馆后，说：“最高一晚380元，最低也是一二百元一晚。”罗贵财比划着说：“上来对虾，都是一尺长的。”

沧县公安局的老张到广州收审罗贵财，看见这帮人在广州大把地花钱，绘声绘色地形容说：“好象他们家都开着印钞票的机器，钞票花光了回家去印。一点也不在乎。”然而，家里是印不了钞票的，钱只能出自客户定金。那么客户的定金缺额到底多少？目前还难说清楚。

人们不能忘记1984年的公司热期间全国发生了几起重大诈骗案所带来的灾难。

灾难总得有人兜着，巨大的资金漏洞和空缺，总得有人填补。国营、集体、个人，总有倒霉的。倒闭、逃亡、自杀、进监

狱……不知道该谁碰上。

总之，地狱之门打开了，它正冲着“弄潮儿”们微笑！

记者手记

扮情人深入虎穴调查

《十万吨查私聚丙烯假合同追踪》是11年前的5篇一组调查性报道，作为新闻，这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当时，这起涉及一个多亿的经济诈骗案算得上是一个大案。多少年后，我和跃刚还常常提起。

1988年7月底的一天，跃刚拿着一份材料找来，问愿不愿一起去搞个案子。当时他从总编室到经济部不久，我所在的信息部也刚刚改成机动记者组。三言两语我们俩就说好了，决定先去踩点。

要去的清华园宾馆在京城清华东路，是倒腾聚丙烯假合同的一个窝点。两人一路骑车一路商量，说采访肯定不行，最容易套近乎的法子是说要买聚丙烯。这身分，看上去有点江湖味道，跃刚的形象凑合，黑白两道，警匪不分，要说我也是去倒腾那玩意儿，打死人家也不信。商量来商量去，干脆，扮成情人，跃刚要横，显出江湖上熟门熟路的交道；我则显得越没心眼儿越好，整

个什么也不懂，就知道跟着。

骑着骑着，天下起雨来，一路狂奔，总算冲进了清华园宾馆，按照事先打听好的，找到了2308房间，这是聚丙烯连环诈骗的中介之一——大连罗湖塑料厂驻京办事处。见到两个半湿不干、来路不明的人，进门就要买聚丙烯，办事处的人一脸的狐疑：“你们从哪知道的？谁说我们卖聚丙烯？没有，没有。”

这下，只有看跃刚的了。按事先商量好的，我不能瞎掺和，得装作心不在焉、谈成谈不成都无所谓的样子。没了发言权，耳朵不敢闲着，心里跟着一块儿较劲。

跃刚知道这次“拜访”是速战速决不了了，开始软磨硬泡，一会儿追问货源的可靠性，一会儿讨价还价，不时煞有介事地看看我，问对价格的意见，好像真要买似的。东拉西扯中露出一两句内情信息，仿佛知根知底，其实他知道的就那么点儿，再往深里说也没了。我则不懂装懂，有一搭无一搭插上一两句，显得简单无知。就这样泡了两个多钟头，硬是把气氛给泡软了。领头的人不像开始那么戒备了，似乎愿意相信我们真是来买聚丙烯的，转而做起推销来。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一个重要线索——穿海关服的神秘人物“王礼”。

见好就收，佯称筹好款再来，我们和他们“拜拜”了。

回来的路上，大雨滂沱，浑身透湿，我和跃刚很兴奋，猛骑，大笑，像两个疯子。下一步，我们决定乘胜追击，沿着“王礼”这条线索速下沧州。

沧州，耳熟能详，皆因几百年前有个林冲。只是没想到，改革开放10年后，沧州还是那么穷。在沧县县委招待所，接待我们的干部满脸对不起，连说：“条件太差！条件太差！”开始以为是主人客套，住进去才知道，人家是实话实说。正值三伏，又闷又热，屋里不要说没有空调，连电风扇也只是个摆设——不转。

床上的席子又黑又黏，支蚊帐的竹竿东倒西斜，上厕所、打水，要下楼到院子里去找，最要命的是伙食。当我和跃刚兴致勃勃去进第一顿晚餐的时候，灶间的情景令我们目瞪口呆，偌大的面案上，黑压压地铺满了一层苍蝇，一位中年壮汉上来轰了轰，就开始揉面，他的指尖里满是黑泥，印在面团上黑白分明。被他轰开的苍蝇，舍不得似地在他身边龙飞凤舞，能落下来就落下来。我和跃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问“还吃吗？”这时，吃饭的人陆续来了，举着碗，敲着筷子，挤到灶间窗口往里看，告诉后边的人：“今晚好口食，面条！”我和跃刚已经饿了一天，黑灯瞎火的也不知上哪再去找一家饭铺，既然人家能吃，咱也能，当记者的，什么没见过？吃！在后来采访的日子里，我们在县招待所食堂吃过很多次，面条实在是最好的伙食了。

接下来的采访，许多都已经写在稿子里了。也许是因为穷，也许是急于要摆脱掉这种穷，显而易见的一宗诈骗案，当地工商局和一些县政府官员竟出面担保，致使事态发展到荒唐的地步。只有县公安局的人对我们的采访很支持，几乎是有求必应，甚至还让我们旁听了提审嫌疑犯。在那些日子里我领教了跃刚采访的细密，因为中暑，这种细密的印象就更加深刻。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拿到好不容易搞到的一张定票单，到北京站专为记者和军人设置的窗口去买票，不知为什么，那天买票的队伍排得特别长，不大的屋子里转了好几圈，半天也挪不了一步，没有电扇，闷热裹着汗酸味儿、脚臭味儿和乱七八糟的味儿，熏得人喘不过气来，从晚上9点一直挨到11点半，才算把票买上。也许就在这两个多钟头里，我中了暑。第2天早上起来，头重脚轻，走路轻飘飘，像踩了棉花。奶奶说：“告个假，别去了吧。”我说：“那哪行，票在我这儿，人家还等着呢。”

到了沧州，马不停蹄投入了采访，3天下来，我已经支持不

住，采访时，晕晕乎乎，想不起问什么，也不知人家说了什么，只觉得头昏脑胀，时间又慢又长，跟在跃刚后面，蔫头耷脑，连他跟我说话也懒得搭理了。跃刚总算弄明白我中暑了，让我在家躺了半天，以后虽说还一起采访，我已经成了被照顾的对象。

沧县工商综合公司是“王礼”实施诈骗的重点之一，账面上只有几十元钱，竟敢做上千万元的买卖，经营操作严重违规，调查取证却十分困难，采访像挤牙膏，挤出一点线索，穷追不舍，常常又不了了之，于是再挤牙膏，再追。到后来，我们的判断常常得到县公安的首肯，也搞不清是他们在断案，还是我们在断案。

在沧县的日子，赶上跃刚过生日，8月3日，我请他在县里的餐馆好好吃了一顿，花了15元钱，算是很丰盛了。这顿饭后，跃刚进入了而立之年，也让我留下话把儿：“你可是我看着长大的。”每当这时，他便哈哈大笑。

在沧县的采访终于结束了，县公安局无论如何要为我们饯行，再三推脱也没有推脱掉。临走前的中午，县公安局开出一辆挎斗摩托，说是要带我们去县城边上的一家餐馆，让跃刚先上车，回头再来接我。1988年，北京早已开始实行女士优先了，跃刚很绅士地往旁边一让，对我说：“琮琮，你先上吧。”我毫不客气地刚要往车里迈，被旁边的公安同志一把拽住，连声说：“你等等，回头再来接你。卢记者，你先上。”跃刚还要推脱，县公安的同志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把他推上了车，一溜烟儿地开跑了。我在原地足足等了有半个多小时，才见那辆摩托转了回来，没想到开出去没有二里地，车抛锚了，司机鼓捣了半天，毫无起色，一脸无奈地对我说：“走不了了，你帮我推到农机站里，回头我再来取。”我们俩呼哧带喘地把摩托车安顿好，一步一个脚印地向跃刚两顿饭都吃完了的餐馆赶去。一进门，听完遭遇，跃

刚忙起身，让我坐上座，旁边的公安同志一肩膀按下去说，“你坐着，你坐着”。这回，我客气地坐在了下方。

回北京的火车，朝着女士优先的方向启动了，这以后，有了座，我先坐，我的包，他背着，感觉很不错。

第一篇报道见报的第2天，诈骗嫌疑犯“王礼”闻讯，携240余万元现金逃澳门，在珠海口岸出境时被捕。

据我们所知，记者与警方同步调查，用报道撵出犯罪嫌疑人，在80年代独此一例。

时间：1988年7月23日

作者：傅成立、叶一帆

私营企业家联名推举市长候选人

付成立：我们目睹了市长选举

私营企业家联名推举市长候选人

一群想显示政治力量的私营企业家，奏响了福建省石狮市公开竞选市长的序曲，20个私人企业代表将盖满了二十几个图章的举荐市长候选人的信件送到了泉州市委组织部。

7月19日，记者来到了石狮侨联时装厂，董事长蔡友鏢神秘地告诉我们：“我们准备联名举荐市长。”记者走进他的空调房，在那里，被称为石狮四小龙之一的石狮华侨旅游用品联营总厂厂长施义芳正忙着代表二十几个私营厂家在举荐信上盖印，桌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图章。

有“小香港”之称的石狮市，是块藏龙卧虎之地。这几年，私营企业发展迅速，590多家企业产值已超过1.2亿元，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这二十几家私营工厂基本代表了

石狮各种私营企业类型，有合资、侨资、合股、独资等，大部分产值都在百万元以上。蔡友鏢是从香港回来独资办厂的，目前年产值已达 700 万元。他对记者说：“这次选举，应增加透明度，竞选人要充分表现自己，让石狮群众真正认识了解候选人。但规定只能听四十分钟的演说，而仅仅听演说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决定联名举荐候选人。”

记者从他的举荐信上，看出他们确实对举荐人有充分的了解。这里有在引进外资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作出成绩的领导，也有被誉为石狮“活字典”的侨务工作者。

不过，全国 100 名优秀农民企业家之一的石狮胸罩服装厂厂长宋太平没有在举荐信上签名盖章，据这次举荐信的组织者透露：“宋太平对有的候选人有看法。”

一家企业老板公开表示：“我们农民企业家说到底还是‘草头王’，我们要推举能代表我们利益的政界人物参加竞选。”

尽管如此，这些企业家对这样举荐仍心存忧虑。他们说，现在我们联名提出候选人，会不会说我们结帮拉派？如果我们推举的候选人没选上，会不会招来麻烦？

记者手记

我们目睹了市长选举

福建石狮的市长公开选举，以泉州市委组织部推选的候选人当选而告终。

结局如大家所料。

然而，在这一场选举的过程中，出现私营企业家联名推选候选人的插曲，却颇有些出人意料。

当时，我们赴石狮采访公开选举的记者目睹了整个过程。

石狮建市前是个小镇，小镇不大，只有 8.6 万人口；小镇很小，小到整个镇的路口只有一个红绿灯。但是，小镇在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却有 30 多万人；小镇有闻名全国的摆满大街小巷的各种小商品市场；小镇有占全镇企业总数 98% 的充满着无限生机的私营企业。

1988 年，国家批准石狮建市。小镇建市引人关注。福建省政府当时明确规定石狮要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要“在体制上更活一点、机构更小一点、经济管理权限更大一点、

干部素质更强一点”。更引起世人注目的是，省政府作出：第一任市长要在社会上公开选举。

市长公开竞选的公告是1988年7月4日发布的。按公告提出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将民主推选市长1人、副市长3人。凡在职国家干部、优秀企业家（包括乡镇企业）、有影响的归国华侨都可以报名，也可以由群众联名举荐或组织团体推荐。

公开竞选市长、副市长在当时全国尚属首次。

因此，我和新华社、《福建日报》等几家新闻单位的同行，冒着闽南七月的流火来到石狮，准备采访这一新闻事件。

当地政府将我们安排住在石狮的华林宾馆。这次选举是在华林宾馆进行。

我们来时，所有带卫生间的房间都安排给有关部门的领导，我们要住，只能住没有卫生间的房间，对于一动就是一身汗的炎热天气，住这样的房间确实很不方便。我们提出，能不能安排二间有卫生间的屋子给年纪大的或女记者住，接待人员表示，参加的人多，房间已安排出去，他们也爱莫能助。

听到我们在跟接待人员交涉，石狮的私营企业家吴夏云走过来对我们说：“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到我那里住，我那里有几间接待客人的带空调和卫生间的房间。”

吴夏云，我们来的这些记者里好多人都跟他认识。此人在当地很有些名气，他的出名可以说是因为一部电影，这是在“文革”后期拍摄的一部记录片《铁证如山》，此片记录了当时晋江、石狮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各种罪证，吴夏云也名列其中，因为他当时就开始倒卖些东西，赚了点钱，属于严重的投机倒把行为，因此，被关了几年。改革开放后，不甘于寂寞的吴夏云如鱼得水，开了公司，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因为认识，大家都很乐意到他那里去住。这一住，也使我们抓到了一条好新闻。

第二天上午，吴夏云过来看我们，很神秘对我们说：“这一次选举市长，我和蔡友鏢第几个私营企业的厂长经理也准备推选一个自己的候选人。”

《福建日报》的一个记者开始泼冷水：“你们举荐了也没有用，选举还不是一种形式，这次绝对是泉州市委组织部推选的候选人当选，不信你们瞧。”

吴夏云说：“不管能否选上，大家都觉得是个机会。石狮的私营企业界力量还是很强的，在这次评选的代表里，我们还有好几个代表呢。石狮的经济主要由私营企业支撑，能选上代表我们利益的市长是最好的，但不管谁当选上，我们都可以借这个机会显示我们的存在。”

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想法，通过这一次选举，确实谁当上了市长，也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

这一天晚上，吴夏云带我们到石狮侨联时装厂董事长蔡友鏢的家，蔡友鏢的家和厂房是连在一块的，石狮的好多私营企业的老板都是这么做的，从这也可以看出家族企业的影子。蔡友鏢我曾采访过他，和他也比较熟，他也是这次评选委员会的代表之一。在蔡友鏢的家，此时石狮华侨旅游用品联营总厂厂长施义芳正在那里埋头往举荐信盖章。

蔡友鏢告诉我们，当他们把要举荐自己的市长候选人和其他一些在当时较有影响的厂长经理时，大家都很高兴，都要联名参加举荐，许多人把印章交给我们，说你们把举荐信写的，将我们的印章盖上就行。

这时，我们发现施又芳的桌上确实堆了二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图章。

这封举荐信交给了泉州市委组织部，没想到也给我们记者惹了点小麻烦。

也可能是有人告状，说我们记者在替私营企业的老板的出谋利策，有意要刁难这次选举。

因此，在正式选举前的当天，泉州市委组织部部长把我们这些记者召去开了一个会，告诫我们要配合这次选举工作，不要给政府制造难题。

我们当即提出：这是私营企业家的自发行动，我们只是客观地观察这一事件。就这一举荐活动，我们认为是一件好事，它表明了私营企业家的强烈的参政议政的欲望，它不是给政府出难题，而是经政府出了一个新课题，它让我们用更新的眼光去关注这一个新的利益阶层。

如果说，这次记者们有给当地政府制造难题的话，那就是一块去采访的福建日报社的一名记者，看着有60多人报名参加竞选，也心里痒痒，自荐自己作为市长候选人，当即被筛选下来。此公不服，找市委组织部的领导论理，被告知：记者不是行政职务，不够公告中规定的市长须在副县级以上岗位任职两年以上，或在党政机关科级以上岗位和企事业单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三年以上的条件。

不管怎么说，这次选举因为有了私营企业家的参与，而必定会在中国的选举史上留下一笔。

时间：1988年8月

作者：叶研 李伟中 李珽基

重铸一代海魂

叶研：在那水天相连的地方

海权忧患

重铸一代海魂

血光照耀着蓝色国土

1988年3月14日的太阳，像百万年来的每一个星辰那样，照耀在南中国海永不平静的万顷波涛上。

赤瓜礁海域，挺立着40多名越南军人。他们迎着已高竖在赤瓜礁上的中国国旗，迎着宣过誓“绝不后退半步生”的中国护旗士的枪口，冲上礁盘，将两面越南金星国旗，牢牢插在中国国土上。

中国旗舰指挥台。海军编队总指挥陈伟文将军怒目瞪出了

血。

“这里是中国领土，你们马上离开！”中国军人通过扬声器用越语喊了上百遍，越南海军两艘武装运输船导索口的步兵轻机枪和一艘登陆舰上的8门细脖子小炮，对抗着三艘中国护卫舰。

近40年的岁月里，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发表声明维护主权，尽管中国台湾海军一直驻守在南沙主岛太平岛行使主权，但是越南等国仍将我南沙其余露出水面的岛屿全部非法强占。

中国舰艇编队每次巡航在南中国海，海军将士们都痛心扼腕。

然而，越南人啃着地瓜干，嚼着咸菜叶，驾着破旧舰船顽强地缠着中国海军的战斗舰艇，又强占了一座座中国人刚刚考察过的礁盘。眼下在赤瓜礁与中国舰队对峙的指挥舰HQ505坦克登陆舰，即是强占我大现礁、无乜礁的越南“功臣”舰。

现在——当中国军舰在赤瓜礁竖起国旗的时候，越南军人又以武力再次证明他们对这块土地的入侵意志。为了把这种意志变为永久存在，连机动小艇都装备不上的越南官兵，10多个人站在赤瓜礁齐腰的海水里，扯一条小臂粗的缆绳，连接到HQ604船右舷，脚踩舢板手拉缆绳，把中国人还来不及而他们早已准备好的搭“高脚屋”用的U型工事钢管、水泥柱和弧型铝合金板，运到这块浸没在海水中的礁石上。

“你下去！”陈伟文将军指着不畏我军威的越南军人，命令南充舰教导员李楚群，“他们把国旗插在我们的国土上呵！等他们的工事修成，赤瓜礁就要落入敌手。”

李教导员立正听令。

“把他们绳砍断！把他们的旗拔掉！把他们轰下海去！”陈将军大吼。

“是！”李楚群抄起一把海南农民常使的平头大砍刀，手枪一

挥，率七名头戴钢盔的冲锋枪手鱼贯跃上汽艇。向架着黑森森枪口的越船驶去。

高速汽艇撞破一两米高的黑浪，直插到连接敌船和礁盘上越军的缆绳间，七支冲锋枪子弹上膛，抬起来对船上和礁上的越南官兵实行警戒。

一切在中国海军面前有条不紊地进行。枪口下眼都不眨一下的越南军人在微笑，他们指指礁盘，指指西边的越南国土，又指指中国军人，摆摆手示意他们走开。

越南人满不在乎的笑深深地刺痛了李楚群和战士们的心。

朝阳一般把南中国海夜空和海面映得通红的，是一座座他国的石油钻井平台不灭的灯火，是喷涌燃烧的石油天然气。

“第二个波斯湾。”中外经济专家这样评价发现了大片厚达千米以上第三纪沉积岩层的南中国海海域。南沙构造脊上的岛礁，成了开采现代工业血液——石油的天然钻台。

当一个穷困的小国因为在南沙海域打了几口油井，几年之内跃为东南亚的福利国家后，特产鱼、贝和椰树南沙顿时腾现出金光灿灿的现代魅力。他国对南沙群岛的覬覦变成明目张胆的侵占和掠夺。1974年南越建的椰树9号井，当年每天采油300吨，天然气50万立方米。一个民族的生存意志没有因制度的变化而改变，今天的越南当局又把越南人民渴望富强的生命力，错用到中国国土上。他们勒紧裤带，实现了对南沙大部分岛礁的军事占领。

今天，意识到要改革开放的中国派出了她的铁甲海军，李楚群教导员下令：“砍断缆绳！”

水兵龙田山把大砍刀高举过头顶，狠狠刹下去！

他用尽平生之力捍卫南沙82万平方公里蓝色国土砍下的一刀，意味着捍卫年可捕量近百万吨计的经济鱼类，意味着捍卫储

量以百亿吨计的近海石油，意味着捍卫理论蕴藏量为 10 亿千瓦的海洋能源，意味着捍卫成亿吨的各种海滨矿砂和大量矿产资源，意味着捍卫中国对外贸易大部分运量的运输通道，也意味着要实现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宏伟前景。

缆绳嘭然断开，拉缆的十几个越军全部跌倒在东海里。

驶向世界的航道

海南岛农民打出的平头砍刀，没能结束越南军队对赤瓜礁的军事占领。跌倒在海里的越南士兵爬起来，笑着冲中国军人喊叫、吐痰，有的还冲中国军人撒尿。

沉郁的中国水兵拉开了弧形散兵线，脚底尖利的海石花在咔嚓脆断，坚硬的珊瑚岩在湖蓝果绿的斑驳水影中实实托住这群中国人，他们平端着冲锋枪，一步步朝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人迫近。

这些中国水兵被反复告知，不准先打第一枪。“对踏上中国岛礁的外国军队也没有打第一枪的权力吗？”散兵线中的副枪炮长杨志亮钢牙咬得咯嘣响。他死盯着不远处两杆越南国旗，耳边响起熟悉的呼唤。1981 年加入海军来到南海之滨接受新兵训练时，千古不息的海涛滚滚而来，把南中国海深处的呼唤一直推到他的脚下。

南中国海为世界各国军事专家瞩目。中国南沙海域西通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咽喉要地马六甲海峡，南接巽他海峡，东连巴士海峡、收林塘海峡，是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之间海上往来的重要通道。

日本大本营海军部·联合舰队《1940 年度帝国海军作战计划》中，“战争初期兵力部署”8 个地区中的前三个地区为：南

中国海和吕宋岛海区、香港及中国南部沿海海区、南洋群岛海区。发生在南中国海周边地区的美日对抗，直接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二次大战中，南海周边的印支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发生了反复争夺，日军与美、英、荷、澳等国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海战和登陆战。日军在上述地域最终失利，战略上受到美军扼制，成为奠定太平洋战争结局的重要因素。

“我们是中国海军，欢迎你们有机会到大陆看看。”海军将士难忘编队在南沙海域巡逻，时常与台湾商船擦肩而过。

“谢谢。也盼望你们能到高雄来。”台湾商船上用清晰的标准国语回答。

每天，有 270 艘各国商船通过南沙海域，每年通过商船 10 万艘，美、日两国占其中 50%。因此美国在近年实行“前沿战略”对全球重点设防的 16 个“咽喉要地”中，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望加锡海峡就在南沙附近。美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海军基地是美国在北约国家外最大的国外军事基地。苏联则在金兰湾布置海空军，竭力形成在南中国海的对美均势。人们十分清楚，这是两个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与匹敌的海军力量雄厚的军事强国。

1946 年 12 月 12 日，林则徐之侄孙林遵海军上校作为南京政府委派的指挥官，率“太平”、“中业”两舰接收南沙群岛。见岛、礁、洲、滩在舷外掠过，禁不住激情哽咽：“南沙，南沙！你终于回来了！”

南中国海潮起潮落，岁月如流。

当中国科学考察船队来到南沙，南沙群岛的主要岛屿除太平岛外已被周边国家肢解殆尽。

杨志亮和战友忘不了那天早晨，水兵眺望着南沙浩淼海波，

问舰长：咱的岛在哪？”

舰长脸色铁青，搂住水兵的肩：“在越南人手里。”

中国海南省渔民在南沙海域见到了中国大陆海军编队。“你们收复南沙，我们就会发大财，国家也会发大财！”

于是刚从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毕业的杨志亮，在越军枪炮下那么大声喊出“人在旗在礁盘在！”的誓词。喊完又像要挽着他那位漂亮的大连姑娘逛“超级市场”，穿上崭新的鞋子和崭新的黑丝光袜说是“为南沙，咱死也要死得风光。”

一阵刺耳的尖啸，外国侦察机从中国海军编队的旗舰上方掠过。

指挥官陈伟文将钢盔撂在一边，两脚稳稳地像焊在指挥台上，双手缓缓举起了望远镜。

“多少年来，都是人家从海上堵到家门来打我们。”陈将军总爱回忆他在广东台山读小学时，老师告诉他打鸦片战争的英国兵不到一万人。1840年仅仅只有四千名英军，就让千年锤炼的“中国功夫”威风扫地，民族英雄关天培喋血虎门炮台，仍不能挡住他们沿海岸北进。军师浩壮的天朝帝国不得不俯首割地赔款。

每个民族为自己的生存奋斗都是英勇的。北洋水师在甲午硝烟中覆灭宣告了邓世昌的英勇不能换回国破身亡的惨败，令陈伟文将军拍案：——1887年明治天皇谕令：“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的事情。然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聊以资助，”买兵舰、造码头。而当时中国的慈禧太后却挪用北洋水师军费建造皇家园林颐和园。

两个同样渴望“国富兵强”的民族展开了较量，日本海军一改锁国海防的消极姿态，主动寻求海上决战，歼灭了当时“亚洲

第一，世界第六”的中国北洋水师。胜利者割占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毫不客气地索取了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当时中国政府年收入仅八千多万两白银。

“东方大梦”终于醒了。

“那时丧权辱国是因为清政府腐败。现在，我铁了心地要干海军。”1956年，高中毕业的陈伟文在武汉大学生物系和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之间选择了后者。他今天对国人这样说：“我们这一代再不收回南沙，子孙后代会戳我们脊梁骨骂：你这个海军，从50年代当到80年代，究竟干了些什么？”

炮声在宣告

中国水兵的散兵线越逼越近。

越南军人脸上的微笑变形成猛兽的狰狞，他们横过挂在胸前的冲锋枪，拔出腰间铮亮的匕首，摆出决斗的架式。

“拔掉敌旗！”中国指挥官发出准备肉搏的命令。

“第二小组跟我来！”杨志亮带领两人趟水冲击。

“我也上！”新兵李克贵一声吼，哗哗赶上了杨志亮。

“冲——啊——！”中国军人胸中不知憋了多久的呐喊，突破40几条硬汉粗放的喉咙，向越军压去。

身高一米八五的黑大个杜祥厚，一个“猛虎扑食”，撞开昂首护旗的越南士兵，攥住越南金星旗杆，一声脆响折成两段。

一名越南士兵像头错豹腾身扑到大个“黑老杜”身上，比这位强悍的越南军人高出一头的河北汉子杜祥厚把这头猛兽按进水里，激起高高水花。

为了南沙——

北海舰队海军中士李志伟贴身穿着印有“北洋水师”字样的

背心抗击南中国海的惊涛骇浪，仿佛背负着中华民族每一代海军的耻辱和使命。

“你知道北洋水师的历史命运吗？”记者问他。

“知道。我向大队枪帆业务长争取到了高射机枪的战位。”——再没更多的话，只有南沙火爆的太阳，照射着誓死如归的脸庞。

为了南沙——

志愿兵王重阳的父亲从病床上抓起来，给儿子送归队参战的电报。

起伏的湖南益阳山道上，一位老人一步一喘，浑身汗透，天黑才挪到儿子的岳父家，用满是老茧的手捧出电报，送给操纵枪炮指挥仪的儿子。

告别病危的父亲、失学的弟妹，王重阳挥泪踏上征途。

他如期赶回部队，军舰即将启锚，父亲病故的电报来了。

为传递祖国的召唤，患癌症已到晚期的老人走完了生命中最后一段艰苦的路程。

全舰官兵在码头列队，汽笛长鸣，向北方致哀。“终于用上我们海军了。”年轻的海军军人，心领到家乡父老的嘱托：“孩子，该去了。南沙正值多事之秋！”

“哒！哒！哒哒哒！”南中国海枪声骤起。

越军国旗一倒，一名越南冲锋枪手，迅疾端起枪口，对准中国拔旗的士兵。

杨志亮跃上两步。他左手抱住这名越军，右手持枪顶住对方喊：“不许动，再动就打死你！”越军猛地甩开杨志亮，转过枪口向杨志亮打出一个长长的连发。

子弹扫断杨志亮左臂，连血肉飞溅到大海里。

只见小杨“啊——！啊——！”怒吼着，单手操枪，把射击的越

寇胸脯打成“马蜂窝”。

中国水兵的冲锋枪顿时喷射出狂风暴雨，像一把锯将直立礁上的敌军齐刷刷砍倒。

越军 HQ604 上的机枪吐焰狂叫起来，弹雨溅起水花复盖了赤瓜礁。越 HQ505 舰的 40mm 炮也同时向中国军舰开火。

礁盘上水柱如林，经久不落。

南充舰上陈伟文的心猛地一揪，挥拳下令：“开火，打沉它！”

“目标：敌 604，放！”二十秒钟之后，前副炮首发命中，掀掉 HQ604 甲板上的机枪。敌射手像青蛙跳水倒栽进海中。

HQ604 舷窗伸出一支火箭筒，被机枪手曹俊明两个长点射打掉。

从奈罗礁海域调来增援的中国湘潭舰赶到，奉命向越 HQ605 还击。另一中国军舰炮口猛喷巨焰，向越 HQ605 连发炮弹。

7 分钟后，1988 年 3 月 14 日 8 时 59 分 30 秒 HQ604 船浓烟翻滚，爆炸声声，沉没在南海怒涛里。中国海军南充舰腾起一片欢声。

中国人！快面对海洋

“3·14”海战的炮声沉寂了。中国海军取得击沉敌舰两艘、重创一艘，自己无一舰损伤的战绩。

但是中国海军官兵的血脉依旧像南中海的惊涛一样不平静。

3 月 16 日的华文《明报》呼喊出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中国人要提高控制海能力，“用铁拳保卫南海疆土。”

日本人高吉在二次大战中的《我的太平洋战争观》一书中说，“在飞机发达的今天，不管敌主力舰有多少，只要有足够的

航空兵，就能统统将其击沉。”

日本军在珍珠港的大捷和最后的覆灭证明了他的理论：“海军作战进入了航空兵时代。”

某驱逐舰支队李秀康政委以职业军人的眼光审视到：印度政府官员提倡国货、坐国产车，抠出钱来买航空母舰，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航空母舰？

越南损兵折将，却在全国掀起一股宣传“长沙群岛”（即中国南沙群岛）的热潮，国内动员为他们在侵占中国领土上的驻军捐款捐物，大建钢筋水泥永备性战略工事。

5月11日越南《人民报》颂扬越南国防部长黎德英亲自出马到中国南沙“视察”。

法新社同日报道：“越南消息灵通人士说，军方已经迫不及待，要设法夺回中国军队占领的岛礁。”军事专家们说，“越南在那里许多岛礁上的军队，在一旦要对中国阵地发动攻击时，能够迅速动员起来。而且，金兰湾的越南空军也可以对中国阵地进行轰炸。”

几乎同一时刻，中国一辆北上列车的卧铺车箱里，海军军官曹保健与同一格中其他5位较有身份的旅客谈起南沙，他们竟无一人知道南中国海发生了什么事。

军港外的一条小街，南沙归来的西昌舰水兵苏保敬、张润东正与推着摩托的小青年对话。

青年说：“没你们当兵的我们过得更好。”

水兵说：“没当兵的，谁去守卫西沙、南沙？”

小伙子说：“没有西沙、南沙我们也照样过。”

难怪，中国一家大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日本不久前不惜巨资，抢救即将沉没在太平洋中的一个远离日本国土的小岛（实际是几块礁石）。这家报纸编辑在该消息上加上了这样一块版

头：“海外奇闻”，以示国人欣赏日本人怎么“冒傻气儿”。

日本人傻吗？电脑计算精确，他们大大地明白“海洋就是生命”：本世纪末，全球陆地资源的80%将被耗尽，而人口将达到60亿—65亿。陆地越来越小。人类生存的星球上，最后的空间和资源即是海洋。

日本用重资填造起那座名叫“冲岛”的小岛，按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大和民族将获得以那几块礁石为中心，半径为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在那里，他们享有不可侵犯的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为目的主权权利。

中国本应在南沙享有这样的主权权利，可是82万平方里中的大部分海域和资源已被他国非法占领。我们是挖珊瑚沙堆在永暑礁上，耗费巨资建造海洋观测站。

承建这一伟大工程的海军第八工程处处长沈时聪，来到某市一家大公司联系工程船，该公司领导干部反问：“你们有美元吗？船我们有，但那是用来赚外汇的。”

沈时聪拿出上级关于建站的文件。对方一看就笑了：这算什么呀？

“南沙群岛已有几十个主要岛礁被别人侵占，”沈处长对该干部晓以民族大义，“这种令炎黄子孙痛心疾首的事，再也不能从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传下去了。永暑礁工程绝不是一个海洋观测站的问题，这关系到中华民族今后几个世纪的生存发展！”

“……没有美元，港币也香。”两套语言，无法对话。人们对大海为什么如此冷漠？

18000公里海岸为什么竟成为一堵深重的屏壁？

几千年帝王的文治武功、百姓的生老病死、以至于人的思维活动范围，为什么都被封闭在这屏壁之内？

“3·14海战”功臣李楚群心在滴血。他驾着冲锋舟去砍越舰

缆绳的英资是何等豪迈，谁曾想他心头上还压着家乡妻子久患的重病？

7月31日，广州流花汽车站，李楚群把军功章和出海作战的补贴放在一起，渴盼着尽早赶回家乡医治病重的爱妻，卸下自己久压心上的重负。

突然，扑上来一个歹徒，猛力夺走李楚群的军功章、军官身份证等，“哗”一下子散落在都市大街上。

“有人抢动！”李楚群高喊着冲向歹徒。围过来的人群却自动为歹徒让开一条通道，光天化日下，“过街老鼠”在人人不打中从容遁去。

南充舰上与李楚群生死与共的水兵们眼珠红了，掏出微薄的作战补贴，捐给教导员妻子治病……

海军副司令员陈明山闻讯不禁怅然：“军人保卫祖国，谁保卫军人！”

苍茫南中国海，中国海军日夜驻守在人工堆成的海洋观测站和孤伶伶的高脚屋上。

经过3·14战火洗礼的赤瓜礁海域，越南侵略者仍在虎视眈眈。

世界许多经济学家、未来学家多次声称：“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

中外战略家共同认为：“中国海洋海域可能是世界最富有的海域。”并将成为“多事之地”。

侵略者是贪得无厌的。越南人不仅想要整个南沙，甚至连2/3的北部湾都划成是他们的。

这种逻辑如果成为现实，从黄海大陆架到东海大陆架，从北部湾到南中国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中国应有的约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将被别人占去一半。

南中国海，1988——

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依旧交替劲吹。无边的浪涌带着永世不竭的冲动在沸腾，召唤中国人把脸转向海洋。

记者手记之一

在那水天相连的远方

岸边的信号灯

几百米长的水泥台在太阳光下白晃晃空荡荡的。海军综合补给船 575 号离开湛江军港 5 号码头时，岸上只有几名解缆的水兵。

“起锚部署！”各舱扩音器里传来副船长的声音。船上 300 多名官兵沉默地看着几十吨重的铁锚拱出海面，码头与船舷之间出现一道深深的缝，那缝逐渐变成一片海水。

因为 575 号是从北海舰队来的，这又是第二次下南沙，码头上没有送行的军乐队、首长们和友邻部队的战友，也没有抱着孩子或怀着孩子的家属。自然也见不到苏联歌曲《海港之夜》所唱的“亲人的蓝头巾在船尾后飘扬”。

23000 吨（未满载）的 575 号由两艘拖船拽到港湾深处主航

道之后开始使用自己的动力，缓缓向出海口驶去。那 300 多名海军军人仍然无言地朝岸上眺望，工作服在舷边和前后指挥台顶上排成一堵堵蓝色的墙。左舷是寂静的军港，右舷 200 米处是繁华的湛江市。浓郁的棕榈盖住了人世的喧哗，上百座楼房从绿荫中探出头来，却不向远去的 575 号张望。

那天下午四点，中国海军 133 编队 575 号舰的水兵告别自己心中的岸驹向南海时，阳光明丽。在舷边轻微的水声中，我突然明白，苏联作家邦达列夫为什么把自己一部长篇小说定名为《Берег（岸）》。岸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所。你在海里看上一个月蓝色之后，就会知道什么是水兵们、海员们心中的岸。

但是那天下午，巨大辽阔的岸却角沙漠一样宁静，毫不在意那 300 多个军人从它身边漂离，去和来自同一块大陆的另一段岸边的军人生死对峙。它根本没有察觉。

然而，575 也高傲地沉默着，朝着水天相连的远方加速，掠过军港里一个又一个码头和三三两两并列系靠在码头上的战斗舰只，径自航行。

曾几下南沙的 552 号、508 号护卫舰并排停泊着。575 从它们一侧驶过。

头天我还在这两个舰上采访。深夜在 508 的会议室同舰长、政委那帮沉郁的青年军官一起抽烟，把低矮昏暗舱室抽得个人影模糊。508 在华阳礁驱赶越军 HQ851 扫雷舰那次接触中，主副炮分别瞄着对方指挥台和吃水线向前逼近，愣挤走了对方。舰长赵启春作动员时铁着脸说：“国家要海军是做什么用的？现在人家占了咱们的地盘，说白了，我们杀人的时候到了。你不杀他，他就杀你……”当兵的没二话，听令而去。操炮的、守机的、登礁的、各行其事，斗志极旺。返航时因为长年维修费用不足，508 没到西沙底舱就漏了。技术员用了修船厂作梦也想不到的土法子

焊了一块铁补丁，100米人才算从2000多米深的大海捞回来。人影憧憧的烟雾里，508舰收我和海政文工团几个哥们作为508舰“名誉舰员”。

552和508的后甲板上的官兵发现了575，站起来向575挥手。喊什么，因距离太远听不见。

忽然，508赵启春舰长和康非副政委从舱里冲出来。康非自称理想主义者，着了魔似地非要从北京海军司令部调到南沙舰队战斗舰上，却偏偏赶上508已三下南沙回来，没摊上战斗，心里正冤得不行。他俩和战士们顺着船舷跟着575跑，又在舰首停下挥手。

我和其他几名508名誉舰员在575高高的指挥台顶肃立，作敬礼状，心里不着边际地重复着电影《啊，海军》中日本联合舰队航母上成群的军人挥手向从甲板上腾起的第三飞行突击队送行的镜头。

赵舰长回头对人说了几句什么，一个水兵三窜两窜爬到二层顶上信号灯边，信号灯对着远去的575一闪一闪。

我身边575的通信参谋盯着灯光念道：“祝——战——友——们————路——顺——风。”

各舱扩音器：“解除进出港部署，进入航行部署。”

夜航。海天混沌。桅架上的风总是鬼哭狼嚎地哀鸣不断。白色的浪花和鱼群的磷光在黑暗中急速向船尾退去，快得吓人。无边的厚重的夜暗里，人间烟火晃如隔世。岸的心理距离，已不能用陆上的尺度去想象。只有508舰上信号灯在我梦中闪烁。

……海军的信号灯在闪烁……

海平线

原先，在 575 航行途中的头几天，战斗舰 133、134、556 补给的时候，我弄不懂，为什么舰船相靠就值得人们都从舱里跑出来看。看什么？不就是通过跳板来回扛东西吗？

后来躺在永暑礁会议室的桌子上，一夜一夜地听着浸透海水的缆被晃动的拖船绷得吱吱叫的时候，才明白。这时，我自转 360° 所看到的始终是一条海平线的日子，已经过了 20 多天。白天是那条环线，夜里还是。今天是，明天还是。你在这儿守上一千年，还是这条线。远远地，575 的身影在东北锚地，133 驱逐舰在南西锚地。刚刚认识的朋友互相眺望，几十天说不上一句话。我们互相看到的不过是一条模糊的灰线。

● 南海海盆的地质构造很典型。礁盘内水深 1—10 米不等，礁盘外陡然深至 2000 多米，南海最深 5300 米。所以在季风不断的日子里，礁盘边缘总有一道白色的浪带。那浪带比海平线却有变化，初一、十五一个周期。浪高时卷起 4 米，在铅灰色的天空下亮得耀眼。浪头带着亘古自来的精力不停地砸向礁盘，又带着沉闷的轰鸣腾跳起来。风把成吨的海水吹作水雾向天上扬洒。水雾在浪带上飞起几丈高，被折射的阳光一照，就化成神秘的白光。白光凝固在灰色的天边，久悬不落。我趁落潮想走近那浪带，没有一次成功。负担太重。手里捧着不忍舍弃的各色海物，腋下挟着钢钎。脚下的海石花很脆，时常让人从齐膝深的海水里猛然跌陷到齐胸深的海水里。我粗估那浪带和住地的距离，来回 20 多里地。

随着潮汐变化，浪带会变得低矮，没有声色。当我看到浪带又一次带着无穷的力量升起来时，我知道，我在礁上已呆得太

久。鼻子上阳光灼成的焦壳已经剥落几层。

人变虚了。饿得难熬见罐头又想吐。罐头红烧鸡、牛肉块、午餐肉蛋卷之类见了避之不及。事再多，晚上仍然失眠。大脑皮层的兴奋点散不开也移不开。想着一筹莫展的报道，想着岸上的人……一切都想过了之后，有几夜想的只是我那双旧的阿迪达斯运动鞋。我对天发誓，想的就是那双鞋。人懵了之后，世界变成了一双鞋，三十几年的人生记忆变成了一双鞋。

我要见到那双鞋，则要跨越国内最远距离上的空间。要跨越，则需要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只有重大行动时舰队一级才能调动。而调动舰船的日子遥遥无期。也许在下次浪带升起的时候，也许在下次，下下下次。

过去我说过不怕坐牢，可以一个人看书想问题。贺延光看到此处肯定会冷笑（注：贺在“四人帮”时坐过牢）。这会儿我决定，轻易不去坐牢。我知道小锅是铁打的了。

北拖 717 靠 575 那天，小拖船在浪尖上跳舞。两舷齐平的瞬间，水兵们扛着东西飞跑到另一艘船上去。717 的一个水兵，离青岛半年了。575 给他带了一个家里寄来的邮包。他在卸满器材杂物的后甲板上匆匆打开了包，拿出一双运动鞋当场就试。

575 上成百的水兵隔着跳板，盯着那个只穿一条脏裤衩的幸福的水兵试鞋。这天，他们看到了除了海平线之外的事。

黑浪

渚碧礁上出现伤员，舰队命令 133 去拖带伤员。我们获准同行。

渚碧礁离永暑礁三百多海里，133 开了个 28 节，约 55 边。速度越高越晃。前 20 分钟我还煞有介事地掏出本来听舰长介绍

133 情况，突然感到不对劲，马上颇文雅颇从容地问：“有桶没有？”脸早已灰白了。水兵放下桶，我已不能再文雅，跪在地上脑袋埋进桶里昏天黑地地吐起来。舰长特地从冷库取出鲜猪肘子，烧得金红金红，插着餐刀送上来。这时我像冬眠后的狗熊，没了翻身的劲。命定要错过那金红色的美丽的肘子！

11 月是南海风浪最大的季节，575 出海就碰上 25、26 号台风。2 万多吨的船，两舷一左一右地埋进浪里，一米深的海水在甲板上横滚。头一天一个机电长就为固定油桶被砸坏了脊椎。11、12 月里，风力老下不了 5 级，阵风老是 7、8 级。在永暑礁撒尿，“子弹”从不直落海里，而是向一侧横飞。于是，如果几个人同时撒尿，每人之间需隔 4 米开上，否则容易被他人的“子弹”误湿。

到渚碧礁，天全黑了。舰长问我能不能上礁。我狗熊一样从沙发上撑起来，眼没睁开就吹：“行。我比你们水兵水性都好！”

从软梯下到跳荡的小艇。上艇像翘翘板一样离开了高墙似的舰舷。

海风一吹，清醒一些，但还显迟钝。好像另一个我在看着“叶记者”和十个人在黑呼呼的海上颠簸。

接近礁盘的浪带时，左舷一个近二米的涌头压来，舵手没发现，或已躲避不及。

我听见那个来了神儿的“叶记者”喊：“左舷大浪！”浪已猛扑小艇。艇向右一歪，50 多岁的军医飞出艇外。“叶记者”用胳膊勾住军医一条腿，海政文工团的罗伟勾住另一条腿，趁小艇回摆，拽回军医。军医的腿插进“叶记者”的救生衣里，叫他抬腿，他也听不见。

进了浪带，小艇老撞礁石，要不就卡在珊瑚礁里。高脚屋下来了三个陆战队员拖小艇。快到高脚屋下的铁沉箱时，小艇又抽

风似地跳起来狠撞了沉箱两下，差点把陆战队员撞死一个。

拖带伤员回来的路上，小艇没出礁盘，舵就撞坏了。只有动力，没有方向，随波逐流。艇上的人乱喊起来，吵着要回高脚屋过夜。人们军衔、职务有高有低，操舵的志愿兵顶多是个军士长，不知听谁的。我和“叶记者”终于成了一个人，但说话的劲都没了。我说：“不能回高脚屋，我们已经漂出浪带。只有上舰。”人们于是用桨控制方向。连海政的霍编导都“左舷逆划，右舷顺划”地忙活。桨是橡皮艇用的小桨，没作用。步话机失灵。我把手电给水兵，便距离太远，驱逐舰看不清信号。那天晚上舰上领导也发了毛。大黑天，小艇丢了几个小时没信儿。

我不知小艇上别人怎么想。我觉得横竖漂一夜，天亮再说。有人嚷嚷“风浪越来越大，船扣了喂鲨鱼”云云。我觉着没那么玄。要不就是我晕得发木对危险不那么以为然。总之浪确实更大了。浪把船头打得对准133的灯火时，小艇就开一阵。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逐渐接近了133。

133的人全都没睡，站在甲板上。探照灯扫来扫去。小艇在舷边跳得更欢，人上不了软梯。舰上放下两个吊钩，准备吊小艇的头尾。吊钩又飞来飞去打人，因为大舰也在晃。一会勾上了，提升到半道，小艇在空中跟大舰亲热起来。甩出去，撞回来，如是者三。把霍编导震得动作变形，心脏病犯了。

“混迹海军”不是那么容易。

地狱

后几天的消息越来越倾向于我们将搭乘北拖717返回湛江。上帝！133还3700吨呢，717只有1400吨，而且是圆底，而且要过9级风的狂浪区。

我们真的是乘 717 回来的，命令非常突然。一天午饭后通知：“717 紧急备航，回大陆。”

礁上、船上都升起三色旗，以示惜别。留的和走的合影、留名、打行装，闹闹哄哄。

启航后，我迅速地草鸡了或狗熊了，躺下不再敢动。没能作凝视状，并等到永暑礁变成小黑点才进舱，虽然我知道礁上的人在凝视着我们的船变成小黑点。

返航第一夜，船体单边倾斜 50° 以上。倾斜仪标针打到了头。黑浪像大师傅颠炒勺似地随心所欲地翻动我们的船。比 133 开 28 节时还邪乎。每次大摇和回摇之间有一种比发高烧、比酩酊大醉还难受的失重感。每一个来回都伴随一片热闹的叮叮当当。钢结构船体在张力限度下来回变形，舱里的内衬材料嘎嘎怪叫。海水灌进舷窗，裹着淡水桶罐头饭盒收录机手表来回乱滚。除了把自己绑在岗位上的值更人员。人们都静静地瘫在床上，比死人多一口气。

可怕的晃动中舱里一分一秒地渐渐亮了，又一分一秒地晃到第二个夜间。30 多个小时过去了。嘴里又粘又臭。肚里早吐空了。厕所就在四米之内，去不成。任何一个调整重心平衡的动作，如抬手看表，都会引起憋不住的恶心。别说穿鞋上厕所了。夜间极冷，没法穿衣服。

听说人家美军海校学员进校就做手术，切断前庭器官某根传导神经，以防晕船，实在明智，我真不知道这时发生战斗我将表现如何。抓起相机往外冲？尿憋了 30 多个小时也不上厕所，往外冲？用一种晕得最轻的“抗风浪姿式”卷在席子上，从床这头滑到床那头，压得半边皮肉生疼不敢翻身，往外冲？

为抗浪 717 作“Z”字航行，又多走了十几小时，还差点过了敌占岛。让我给他没见过面的女儿起名的张教导员，嘴唇发

紫，踉踉跄跄抱着纸箱给每人身边放了两包方便面。几天开不了火，啃这个。我不啃，我倒是仗着教导员给我这点勇气，走过躺满淡水桶的甬道。十分坚强地上了厕所。尿已变了气味，飘着鸡肉罐头和科隆香水的混合味。

大海把人折磨得告饶之后还在翻腾。我已经连心爱的阿迪达斯都想不起来了。冥冥中只剩下贴身挂着的虎纹瓷胸坠告诉我，自己还活着。

后来有个过了贡古海峡的记者几次在饭桌上讲风浪大的事。我想兴许他遇到的风浪更大吧。再后来我过了巽他海峡，两次通过西风带，总比贡古海峡邪乎多了。感觉都不如 1400 吨的 717 过南海。

好像过了一辈子之后，舰队同意 717 在西沙金银岛锚地避风。锚地确实风小。一抛锚，锅盆瓢碗不叫了，船上一片死寂。

不知从哪个舱里传来歌声！

“我思念——”嗓音很高，邪腔怪调地往上扯。“念——”的拖腔甩得很长很野。一个年轻豪迈的生命在唱谷建芬的《那就是我》，根本没把刚才的风浪和今后一段艰苦航程放在眼里。我从不待见谷建芬写的歌，但我马上重新认识了《那就是我》。歌声引起了善意的笑骂；717 苏醒了。

我扯着嗓子死皮赖脸地接下去：“啊，妈妈，假如有一叶白帆向你驶来，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又航行两天后，早上，有人在甬道响亮地说：“还有 6 海里。”人们马上明白了那人在说什么。我还是起不来。我看见“叶记者”磨磨蹭蹭狼狈地刷了牙，歪歪倒倒爬上了指挥台顶，又着腰，撇开两条“X”型的长腿，象唐·吉珂德胯下的瘦马，骄傲地站直了身子。他前方已是葱茏起伏的绿色海岸。

一小时后见到了榆林军港。指挥“3·14 战斗”的基地参谋

长陈伟文率人在码头上守候 717 从南沙归来。我蓦地想起电影《中途岛之战》中美国太平洋舰队得胜返回夏威夷。亨利·方达演舰队司令员。他和另一个海军将官站在航母高高的前桥上，俯看着码头上几名迎接他的老战友，老军官仰头向他敬礼。他仍然俯着身子，前臂支在栏杆上，指尖缓缓挥至前额，平静地还了礼。初看时，我惊呼：“何等潇洒！”这时我和“叶记者”合成了一个人，收敛起不可一世的姿态，几倍地谦卑起来：“亨利·方达首先是分寸把握得准确。到过沧海深处的人，八成都会变得恬淡。”

我又准备好出海了。虽然我注定此生不能混入军队，海魂衫和解放鞋洗得干干净净放在衣橱里，随手可以拿到。我会像海龟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执拗地爬向海洋。

记者手记之二

海权忧患

实际上，从 1988 年直至现在，我在海军/海洋报道中，仅仅想写一个主题海权忧患。

马汉《海权论》之海权，所指是制海权。他的核心理论是通过控制海洋来控制大陆。这是为强国所用的理论。本文之海权，所指是海洋权益。

80 年代中期，我从老山前线回来，父亲提了一句：“现在南沙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了。”忘了他是什么场合讲的这话。到 1987 年底，越军侵占中国南海柏礁。外交部发了个声明。次年初，中国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在南沙群岛水暑礁建立海洋气象观测站。3 月 14 日，中越在赤瓜礁爆发武装冲突。

我好像觉得这件事相当重要。当时我得作两方面准备。一是和海军套近乎。南沙群岛没有公共交通，只有在水暑礁建设海洋气象观测站的部队和执行战备值勤任务的舰艇编队，而且没有地方记者到过南沙。二是看书。得把以往对海军、海洋、周边国际

关系的了解系统化。

当时我在“思理部”，正好遇上关于海军溆浦后勤学院政治课改革的一个线索。马上采访，在版头条位置见报。出了报往海军首长、海政宣传部、宣传部的新闻处等处一通寄报。主要借以同他们认识，之后提出到南沙采访。人头混熟了，海政新闻处给南海舰队开出了第一张地方记者的介绍信。这时已经10月了。辗转到湛江基地，等编队出发又等了20多天。

等待出海这半年多，我把各国海军史，国际海洋公约、周边关系、周边各国海军力量、中国边界争议问题、海军装备等等方面的书刊资料，能找到的都仔细看了一遍，而后重点精读。这时我才懂得了什么是海洋权益，才知道中国的海权被人侵犯的现状。按国际海洋公约规定，中国应有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但其中半数被周边国家提出所谓“主权”要求，150万平方公里存在双重或三重“争议”。在黄海、东海等中国大陆架，在中国最先发现、最先居住、最先从事生产活动的南沙群岛、钓鱼岛等地，都有人掠夺资源，甚至非法占领。其中南沙群岛被侵占，竟是本世纪30年代之后才发生，主要的“既成事实”竟是“二战”以后发生的。甚至有的国家竟然在1957年声称“发现”了南沙群岛的某个小群岛。而最严重的侵占则发生在70年代。

后来到南沙采访又了解到，在永暑礁建站准备阶段，中国考察船看一处岛礁，越军跟在后面就占一处岛礁。越南人几根竹竿、几张席子搭一个高脚屋，插一面金星旗，中国就不再去碰它了。本来从海洋气象角度看，建站条件最好的是大现礁，中国船考察过大现礁，越军就占了。考察过程中双方在华阳礁出现争夺。两边都派了小分队上礁，五星红旗和金星旗对峙。僵持到半夜，涨潮，对方位置低，漂起来了，呆不住，撤了。这才保住了华阳礁。我感觉，实际上这次考察引发了又一次争夺。这时，南

沙露出海面的20多个岛屿，除太平岛在中国台湾守军管辖之下，已被侵占殆尽。赤瓜礁战斗本来是自卫反击作战，保住了赤瓜礁，却丢了舶兰礁。

我照当时国际上的油价算了算，南海每年被掠夺的油气产量，两年可还清中国外债（当然积极引进外资是另一回事）。

3.14海战之后，所有中国舰船东撤防空。连永暑礁工程都停了。留守的6个兵想，横竖是死，还不如干活，比等死强。就开着工程车继续干。理所当然地，报道应该涉及中国海军的制空权问题。在南沙执行任务，现在的机型续航能力都不够。于是了解近海防御目标和相应的海军装备，海军发展问题。现在，中学生都知道“航母作战群”这个词儿了。

南沙采访过程中，我拟了4篇报道，每篇规模和《重铸一代海魂》都差不多。《……海魂》是其中一篇。其他三篇分别写海洋权益、海军建设和中国海洋国土被侵占的历史。也许是因为事件依托不足吧，后来李伟中编辑成了一篇。之后是这个部、那个部送审。审来审去，删得几乎没了东西。当时一位老副总编辑最后又成段地砍了一遍，我百思不得其砍的理由，气得差点把拼好的铅字盘给掀了。

但是，毕竟保留了一点点有价值的文字。比如，人家要占你一半的海洋国土，南沙群岛被瓜分殆尽，中国君王的文治武功被传统的力量屏蔽在海岸线之内：比如南海200多口油气井没有一口是中国的等等。

从此，我写海军，就老带着甩不开的所谓忧患。大约是1991年，我经过采访，执笔写了《铁人艇长赵信广》，也是写南沙值勤的。那年我不能署“本报记者”，连名也不能署。我也不管，无所谓。接着自费到上海看看，被一群认得的海军军人拉到基地小聚。我问：“这几天报道台湾上钓鱼岛被日本拦截的事，

你们关心吗？”那帮海军气得站起来：“谁说我们不关心钓鱼岛？！”

· 关键是有方面对国家海洋权益的漠视与软弱。多少年至今，外国侵占不断，中国声明不断。有一种奇怪的思路，回避。怕南沙问题“复杂化”、“国际化”。一边说主权问题不容谈判，一边又说“共同开发”。别人可谁也不回避，一个劲地挤占，一个劲地“开发”，结果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国际化”。加上“新日美保安条约指针”等因素变化，周边海洋权益问题 90 年代末比 80 年代末更难解决。今天的现实是明天的既成事实，今天的现状是明天的历史。究竟谁该对中国今天领土主权负责？

1992 年，我“可以”工作了。借开会的机会采访了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参加了他们高年级学员舢舨横渡渤海的训练。行前，一位还算了解部队的编辑对我说，要写男子汉。我说，男女之别，最为性感。写了也会叫座。但那是××青年报记者写的玩艺，这种思路人人想得到。后来见报的《海狼不是天生的》写的是海军职业军人的忧郁，海军希望伴随经济发展和根据国家安全需要能得到相应的发展。写得不明确、不到位是我的原因。

如今，毕其一生精力研究南沙问题，在癌症晚期写了《南沙群岛·石油政治·国际法》的潘石英不知是否尚在人世。但我想，中国自古多忧天之士，岂只是几个人想到了这个问题？就像我认得的众多海军职业军人那样，民族的海权忧患肯定在觉醒。

时间：1988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9 日

作者：马役军 姜源

三十万临时工在深圳

马役军：逃离成形

三十万临时工在深圳

临时工：特殊的社会群体

当深圳的工业总产值以超过 8 年前 100 倍而令人惊叹之时，人们不知是否注意到，在沿着广州至深圳，深圳至惠阳两条“大动脉”展开的 2000 多平方公里的深圳土地上，正崛起一个被社会学家称之为特殊社会群体的临时工大军。

1988 年 6 月间，深圳市劳动服务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据估算，深圳市目前的临时工人数已近 30 万。

30 万，超过深圳市固定工人总数近 4 倍，比深圳经济特区常住人口多 5 万人。这个数字，与世界最大的加工区工人数字相

比，也可名列前茅。

数字之大，导致了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另一个特点：复杂。

深圳临时工的籍贯涉及全国各大省市——广东、辽宁、上海、湖南、新疆，五湖四海在此汇聚。

他们中有高中生，也有文盲；有二十七八岁的大男大女，也有十三四岁的童工。他们几乎都出自偏僻、贫穷、落后的农村。穷，逼他们走出了祖宗之地，来深圳这陌生的世界“淘金”。

他们中间的确涌现出一些“成功者”。24岁的农村姑娘赵露珍，苦苦奋斗了7年，终于被一家有千余名工人的中外合资企业聘为厂长。这是深圳30万临时工的骄傲。然而，象赵露珍这样的幸运儿在庞大的临时工队伍里寥若晨星。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仍没摆脱困惑——兴奋中的茫然，期冀中的失落，新鲜中的不习惯。环境在强迫他们改变自身的一切，他们也要求自己适应这一切。于是，临时工从封闭的“自我”走向对“自我”的改造。一位教育工作者这样评价临时工：“他们在用双手建设起深圳这座现代化城市的同时，自己却仍囿于传统观念和生活习惯造就的那个狭小天地。所以，正是这种极为矛盾的状态，给深圳社会留下了许多棘手的问题。”

“临时工问题”，它在呼唤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给予关注。

改革中的劳动管理体制尚不成熟，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现实在发生矛盾和抗衡。临时工现象仿佛成了许多问题的聚焦点，一切都需要重新思想，重新判断。

——外商投资，看中的是中国劳动力的廉价。然而，临时工对自身劳动力价值提出愈来愈高的要求。于是，资方的高指标、高质量、高利润与工人的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形成了矛盾。工人的利益、投资者的利益都在要求保护。在多元化利益的状态

下，究竟靠什么解决劳资双方纷争不休的矛盾？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削现象？如何认识工人“主人翁”地位？如何去适应不同的生产关系并存的现实环境？一系列的观念性问题，也在困扰着人们。

——深圳市临时工大军中有近 25 万女临时工，这是更为特殊的“女性群落”。日本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解决劳力密集型加工区女性工人的性导向问题，是比解决劳资纠纷还要困难好多倍的问题。

——临时工中的童工问题，深圳市各级部门曾下了很大气力去解决。然而，童工现象却屡禁不绝，在某些地方甚至花样翻新，愈演愈烈，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临时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因此，探索、解剖这个侧面，需要整个社会作出回答。

流动性，是深圳临时工群体的又一大特点。这种流动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形成的。深圳市总工会主席张汉明对记者说：“深圳的发展离不开这些临时工，然而，深圳又无法养活他们，留住他们。他们没有户口，没有住房，没有家庭……”

所以，他们必须流动。流动可以创造新生；然而，流动也会制造不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欧的经济繁荣导致了普遍的劳动力短缺，因此吸引了大批来自地中海沿岸和中东各国的农业工人。当时的美国敞开门户接纳移民，使社会学家们展开了“种族融合国”的激烈争论。今天，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万计的临时性劳动力。对这个特殊的、流动性的社会群体的未来，我们的社会学家该作出怎样的估计和预测呢？

深圳今日的“临时工现象”、“临时工问题”，也许很快就会

在劳动力市场逐渐开放的全国各沿海、内陆城市出现。

这无疑要求我们去思索与探讨。

多元化利益：纵横交错的矛盾

在深圳作实地考察，你会发现这里的临时工问题之所以很复杂，解决起来之所以棘手，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处在一个矛盾的多元化利益之中。

多少年来，我们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单纯强调总体利益，而忽视各个阶层与群众间的个别利益，造成了人们之间似乎不存在利益差异、利益冲突的假象。这种假象在中国改革的前沿阵地深圳，最先被击碎了。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元化，使某些工人和劳动者原有的主人翁意识有所淡化。特别是外商、外资的大量涌入，使不少炎黄子孙的骄傲受到了冲击。而这一切，几乎都渗透于“三资”企业内部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和抗衡之中。

资方与工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资方代理人、企业的直接管理者与工人、与资方的利益关系，企业管理者中的中方代表与各层次间的利益关系，工人内部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是一个多元化利益的海洋。不正视它，不疏导它，我们的开放事业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什么是“主人翁”地位？怎样理解“三资”企业中剥削与被剥削现象？一系列的观念性问题更是成为深圳市临时工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难题，因为被剥削的正是他们自己。

领导者也同样面临着难题：“在‘三资’企业中，我们既要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又要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这表面看来好象不偏不倚，非常公正，然而，资方要求的是高指标、

高质量、高利润，而日渐觉醒的临时工要求的是高工资、高待遇、高福利。这是两者利益关系中难以调和的矛盾。

搞社会主义就不能容忍“人剥削人”的现象，这是多年来中国人头脑中已形成的权威性定论。然而，今天在深圳，剥削现象不仅存在，而且还要受到保护和尊重，这也就难怪有人不理解，忿忿不平了。

不理解的东西却是现实的。对这种现实的认识在临时工中导致了两种情况：一些人认为，受雇于人家，反正是人家剥削我们，咱能忍则忍，一切听命于老板，只管干活就是了；另一种情况是，少数人遇事则闹，怠工、罢工、拆机器、拆设备。曰：他不让咱好，他也别想好。

近年来，深圳市“三资”企业中工人与资方的纠纷日渐增多，劳资矛盾成了深圳另一种不安定因素。

这完全是一种新的利益结构。工人需要重新去理解，领导者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位企业的领导讲得很深刻：解放前我们在工厂搞地下工作，就是领导工人闹罢工，与资本家斗，反剥削、反压迫、争自由、求解放，干起来痛痛快快。可现在，工人的利益、资方的利益都要顾及。有些工人利用罢工等形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理、有利、有节。但也真有无理取闹者，叫人啼笑皆非。”

合资企业开源鞋厂临时工潘玉明，因没按厂规每2小时在黑板上填写一次生产数字，日方技术员桥爪正美催促他填写。当时因没有翻译，潘玉明没干。桥爪正美误认为小潘不执行，伸手抓住小潘衣领，拖他往黑板方向走。潘玉明却把对方的帽子摘下来，戴在自己头上取乐。桥爪正美一怒之下，朝潘的头部打去，造成小潘头皮外伤。

事情发生后，开源公司责令桥爪正美向厂职工公开检查，向

小潘赔礼道歉；经济上除负责赔偿小潘养病期间的工资、奖金和医疗费用外，另给 500 元港币。

潘玉明当时未作异议。可过了不久，他又到区工会再次投诉，要求将此事按政治事件重新处理。他说：日本人为何在国庆节前夕打中国人？这是蔑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小潘的爷爷在日本侵华时被杀害，今天他又被日本人殴打，这新仇旧恨要一起算。他要求把桥爪正美抓起来，判刑或驱逐出境，并要求再赔偿 9000 港币。

一些工人支持小潘的行动，认为这是长中国人的志气。而资方认为，这是不合理的要求，不予承认。

区工会经过慎重研究、考虑，最后还是采纳了资方的处理意见。于是，小潘和一些工人不满起来，骂工会是资本家的“狗腿子”。

类似的事件，使深圳市政府机关的一些干部也在思索：“是我们工人的思想观念、自身素质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还是三资企业这种形式与管理方式方法和客观实际相脱节？”

一位合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对记者说：“尊重、保护资方的合法利益，承认他们对工人暂时的一些剥削，这是有益的。因为这对发展我国的经济有好处。”

记者曾就这个问题采访了深圳市总工会主席张汉明。他说：“我们应该教育工人，把眼前的利益与长远的利益统一起来，特别要从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教育工人为了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国家长远的利益，要作出暂时和一定程度的牺牲。”

他认为：承认和正视这一点，比单纯地从理论上教育工人在“三资”企业中应有“主人翁”地位也许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这种思想和观点，已开始被深圳市的工人所接受。市总工会

对十几家“三资”企业工人的问卷调查中，400余名工人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人认为：“应该承认剥削的存在。但从我国长远的利益来看，接受这种剥削是值得的。”

为了长远的利益牺牲一些眼前的利益，退一步而进两步，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然而，让所有的人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并不很容易，还需要时间。

那么，有没有一个“杠杆”来调节“三资”企业中各群体、各层次之间的矛盾关系呢？在深圳，很多人苦苦祈望与寻找的正是这个“杠杆”。

劳动争议：呼唤中国的劳动法

深圳市蛇口工业区，1986、1987两年共发生临时工停工、罢工事件21起。据深圳市总工会办公室的同志反映，1987年以来，临时工停工、罢工事件无论在次数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有所增加和扩大。

有关人员的调查和分析表明，在停工、罢工事件中，有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是属于资产违背经济合同，侵犯工人合法权益造成的；有百分之二十是资方故意侵犯工人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造成的；有百分之十是属于工人素质低，要求不合理的结果。

具体分析罢工和纠纷事件的原因，会使人产生疑问。一些本来很简单，可以避免的矛盾，为什么在这里屡屡被激化？“三资”企业中的劳资矛盾和纠纷，难道真成了一条难以挣脱的魔绳？

蛇口工业区内一家港商独资企业凯达玩具厂以“订单多，生产繁忙”为理由，大幅度提高生产定额，强迫工人每天加班生产4至6小时；有时工人一天竟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星期天也不

准休息。而厂方给的加班费很不合理。工人劳动强度过大，发病率上升。有一位女临时工劳累过度，竟一头栽倒在车间里。

有 30 名女工自动停止加班加点，以示抗议。厂方将一名带头的女工开除出厂，杀一儆百。

工会出面干预。港方经理说：“我们是按法律办事的。你们没有法律规定不允许我们加班生产，另外，也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和限制加班的时间。”

工会的同志拿出了深圳市政府下发的关于“三资”企业中工人加班加点的规定和政策提醒港商。他却说：“这些我都知道。可这些规定和政策是你们内部的，我们不好执行喽。”

中国没有劳动法。深圳特区也没有劳动法。

而与深圳毗邻的香港，则有一部详尽的劳工法——劳动工时法、最低工资标准法、劳工伤残赔偿法。事件发生了，处理的方式方法劳工法上写得一清二楚。劳资双方都受法律的约束和保护。

黄锦贤是深马玩具厂的一名临时工。去年底，他操纵的机器失灵，把左手的 4 个手指轧掉了。他住院 3 个月，厂方只付了医药费、住院费和发基本工资；这期间的伙食费和营养费来源于同厂工友捐献的 1100 元港币。

今年 2 月 13 日，黄锦贤伤愈后，立即回厂上班。原来厂里答应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可他并没有领到，却接到了厂方的通知：“你不要再上班了。”

20 岁的黄锦贤，哀求港方主管开恩，给口饭吃，这样回农村也难以承受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然而他遭到了拒绝。

记者找了港方经理俞克强，他对此作这样的解释：“黄锦贤出院后工作不负责任，厂方怕影响其他工人的情绪，所以‘炒’黄锦贤的‘鱿鱼’是理所当然的事。”

记者问：玩具厂招聘的 800 多名工人，是否按照有关规定签订了劳务合同？

俞克强很坦率：“没有一个人签订劳务合同。想来干，我们认为可以，你就干；我认为你不行，你就得走。我是搞企业的，只认工人干活，其它的事情不管。”

就在记者采访的同时，又有一名工人被轧伤手送往医院。该厂厂长邓东喜承认：这里小宗事故不断，重伤事故时有发生，去年一年就发生了 3 起重伤事故。

看来，深圳市政府的有关规定和政策，在下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和执行。有人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些规定不具备法律的约束力和相应的具体措施。

深圳市劳动局、总工会、妇联都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接待、处理临时工的投诉。《深圳法制报》等报刊每天都接到许多临时工投诉、告状的信件。深圳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张柏对记者说：“只要有一部详尽的劳动法，很多棘手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谁也别纠缠，大家都按法律办事。然而没有这个法，就会节外生枝，矛盾不断。”

记者到深圳市有关部门询问：深圳市临时工人数已达 30 万，注册的“三资”企业已有 14000 余家。为何不制定一部可行的地方劳动管理法，以健全临时工用工制度？

答曰：深圳市没有人大常委，所以制定不了地方法规。

深圳需要劳动法，否则“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会使深圳市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深圳今天所发生的矛盾也会在全国各地出现，所以，中国需要劳动法。

诚然，制定、完善一部在中国切实可行的劳动法并非易事，它需要时间去实践，去作理论的探索。但是，不能因此而延误改革开放、发展的时机。法律界有关人士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发

现一些国家和地区现行的一部分法律条文，稍作修改，很适合中国“三资”企业目前的状况。

“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引进现代管理方法，已经见了成效。那么，作为上层建设组成部分的法律，是否也可以作相应的引进呢？”法律界有识之士在呼吁。

对外开放，还需要作更大胆的吸收。

不容回避的问题：女临时工的性导向

据深圳市劳动部门的权威人士估计，深圳市目前约有 25 万女临时工。

记者在宝安县采访时了解到，一家拥有 205 名临时工的塑料手袋加工企业，女工与男工的比例是 50 比 1；男性职工只有 4 名。

当年，三五九旅的战士和一些建设者进驻新疆去开发那片荒漠时，曾因为缺乏女性公民而出现许多棘手的事件，身经百战的将军不得不重视这一“严峻的问题”。派人到上海、山东、安徽等地，以优惠条件招募女性公民进疆。

如今深圳，雨后春笋般崛起的“三来一补”企业里，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这里满目皆女性，堪称“女儿国”。

“没有女人不行，然而女人多了更麻烦。”这是中外合资的雅阁宾馆一位总经理的感慨。

论干活，女孩子听话、心细、手巧、耐力强，对于搞出口加工的企业来说，可谓求之不得。然而，由于女性公民的高度集中，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也随之而产生了。女临时工的性导向，这是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

南朝鲜、台湾、新加坡等地开办的出口和加工区，也曾遇到

过这类问题。年轻女性的高度密集，使嫉怨、插足、同性恋、卖淫现象非常严重。深圳加工区开办时间不长，问题虽不如以上地区严重，但如果对此不引起重视，那么很可能在数年内打成“死结”。

前两年，深圳有家报纸曾以《哀怨？悔悟？希望？》为题，发表了一封女工的来信。信中透露了女工劳动的艰辛，离家的孤寂，特别是对爱的渴求。这封信一时间在深圳市的一些部门引起震动。蛇口区工会、团委协同有关部门，很快在临时工密集的四海区办起了俱乐部、舞厅、球场、旱冰场。

五光十色的业余生活，暂时抵消了女工的精神空虚。然而，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对爱的渴求、对性的渴求，仍袭扰着她们干涸的心灵。

“谁也不想恋爱呢？”在宿舍，几位年龄稍大些的姑娘谈起这个问题，不像小姑娘那样羞涩。“劳累了一天，谁不想靠着一个男人的胸膛休息一下？即使不同他结婚，我也愿意。”

深圳市公安局一位对青年性心理颇有研究的专家说：“谁也阻止不了她们去想性的问题。她们的心中好像满堆着干柴，若遇情爱之火，一定会熊熊燃烧……”

然而，现实是不允许她们堂堂正正点燃心中爱情之火的。因为她们是临时工，因为她们没有深圳户口，因为这里只需要她们贡献青春，而不能久留，所以她们不能像常人那样谈恋爱，也没人与她们恋爱结婚。但是，对爱和性的渴求又是人的一种本能和天性，它并不会因户口一类的限制而泯灭。于是，就出现了同居、未婚先孕等现象。

据《深圳特区报》一位记者在蛇口工业区的调查表明，未婚先孕者的数量逐年上升。蛇口工业区约有女临时工 10000 人，1984 年未婚先孕者 200 多人，1985 年 300 多人，到 1987 年则上

升为 800 多人。

“我们的办法，只好是多发些避孕工具，但愿她们不要因为疯狂的‘恋爱’损伤身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干部这样说。

“我们在女工中提倡‘自尊、自爱、自重、自强’”，一位妇联的老大姐对我们说：“然而有些女孩子就是太不能克制自己，思想道德败坏，真是恨铁不成钢……”

蛇口区工会为了帮助女临时工解决思想问题，特意在聚集着 7000 余名女工的四海宿舍区开办了一个“职工来访接待室”。这些辛勤负责的工会干部白天晚间都等候在那里，与一个个来找她们的女工促膝交谈。然而，谈来谈去她们发现，很多现实的问题，是难以靠做思想工作解决的。

蛇口工业区一家企业的香港老板，时常在星期一，星期六将邀请附近工厂漂亮的小伙子来厂举办周末舞会。于是，这一个星期中，女工们似乎都心情畅快，干劲大增。

离深圳不远的东莞，有一个很有名气的荔枝专业大户，他种了 200 余亩荔枝树，雇用了 20 多人。与很多企业主不一样的是，他盖了房子，把雇工的家属都接来。没结婚的，让他们自己找对象，在那儿结婚。这样一来，增加了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另外也保持了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相对的稳定。有人反映，他的荔科技园不仅连年丰收，而且，他还办起了荔枝罐头加工厂，事业红红火火。

女临时工的性导向问题解决不好，就会成为一桩很大的社会问题。1987 年，深圳南头区妇联接到 45 宗婚姻纠纷案，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女临时工插足所引起的。

此外，还有同性恋、卖淫……

日本经济学家藤泽幸日在巡视了台湾高雄、南朝鲜马山、菲

律宾巴丹等几个亚太出口加工区后感慨地说：“解决密集劳力型加工区女性工人性导向问题，是比解决劳资矛盾还困难好多倍的问题。”

有人建议：干脆再从内地招些男工人来，摆平男女工人的比例。然而不行。一是工作性质不适合，二是即使促成他们恋爱结婚，可又解决不了户口、住房等一系列的问题。

一些搞经济的同志开始研究：女工轮换制是否真的适合于深圳加工区？

不管怎么说，它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

童工现象：如何摆脱过早负重的命运

1988年春节过后，中共广西玉林地委办公室致函中共中央办公厅称：春节以来，广东的深圳、东莞大批地向广西玉林地区各县市招收童工。先后招去1000多年中小学生。其中中学生556名，小学生468名，年龄最小的10岁，最大的16岁。造成北流县2345名中小學生中途辍学，不愿再回学校上课。家长和教师反映强烈，要求救救这些孩子。

广东省委领导接到此件后，立即指示调查。深圳市劳动部门、环保办、工会、妇联迅即组成联合调查组，与省有关部门一起对“童工现象”展开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深圳市一些“三来一补”企业中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雇用童工的现象，个别企业还相当严重。经检查的206家企业中，发现44家企业雇用童工。这些企业雇用童工，都未经劳动部门办理用工手续。

为了了解童工情况，记者来到深圳南头区四兴制品厂的女工宿舍。这是一栋30多平方米的大工棚，一溜木板搭的通铺，一张床位子要挤两、三个女工，屋里阴暗、潮湿，气味难闻。

当时屋里有3个女工，一个来自广东五华县的姓杨的女工对我们说：“四兴制品厂主要生产绢花，因此工人基本都是女工，最小的12岁。”

另一个来自广西的16岁的女工，她的手被压花机烫伤，正在养伤。她伸出左手，手背上是一个黑紫色蝴蝶状的花模烫痕。这个面容憔悴的小姑娘对我们说，她的手是4月20日烫伤的，而老板让她5月7日必须上班，否则开除。

另一个女工，看上去也就是十三四岁的样子，明显的发育不良。我们想同她聊几句，可她不理。后来，她跳下床跑了出去。她X型腿弯曲得非常明显，身体瘦小得叫人可怜。

她们的生活环境与工作环境之差叫人难以置信。她们每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据她们介绍，每天早晨7点上班，中午12点下班，一个小时吃饭；然后从午后1点再干到6点，休息一小时；晚7点再加班到10点，有时到11点。童工的工资比成年人的工资要少许多，平均为80至100元。每月要交伙食费、住宿费、水电费、培训费，七扣八扣，到她们手里则所剩无几。那个来自广西的手受伤的小姑娘，受伤后每月只开10元钱。她凄然地对我们说：“现在我连回家的25元车票钱也拿不出来。”

坐在大工棚里与她们聊着，我看到对面的墙壁裂开了一条三、四寸宽的缝隙。透过缝隙可以看到香港老板供在车间门口的那尊大财神，香案上，熏香缕缕，鲜果诱人。

一个老板说：“她们来这里做工，比在家里舒服嘛，又可以赚一笔钱。”平湖某厂的经理说：“我是可怜这些孩子才招她们进厂。否则，这些女孩子可能会到社会上干其它违法乱纪的事。”

国家《义务教育法》明令禁用童工，国家教委、司法部也多次三令五申。然而在深圳童工现象为什么却屡禁不止，在有的企业中甚至愈演愈烈？

看来，只靠一部《义务教育法》和几个部门的三令五申，是难以消除童工现象的。

假年龄、假名字、假出生地，临时工身分的虚假性简直令人咋舌。一个来自广西的小姑娘对我们说：“年龄还不是那么回事，想填多大就多大嘛！”

据了解，广西一些农村的干部为了创收，也不管出外做工的人年龄是否合法，一律按标准线——17 岁以上出具证明。每张证明收费 75 元。

宝安县坪山镇发展总公司的领导告诉我们：“三来一补”企业多了，劳动力就紧张了，所以，有人干起了“人贩子”的买卖。他们手里有公章、有介绍信，专到贫困山区招工。也不管年龄大小，能干活就行。上次，一个人贩子一下带来 100 多个姑娘。她们中好些人的名字、年龄都是假的，有的是冒名顶替。

劳动管理制度上的混乱，为童工现象的存在提供了温床。

令人悲哀的是，很多中小學生出来打工，完全是出于自愿。他们认为读书没有啥用，不如出来干活挣点钱实惠。另外，农村教育所收费用也高，一些家长有难处，就叫孩子辍学。

有人担忧：“如果不加以切实的限制，深圳农村‘三来一补’加工企业也许慢慢会变成童工的世界。”

他们的劳动力是极为廉价的，他们在用稚嫩的双手去换取那点微薄的工资。她们中有的人连姓名也写不好，所以，只好在工资卡上按下自己的手印。

深圳大学的一位教师说：中国的劳动力是廉价的，在今天，这是我们吸引外资的优势。然而我们，我们不能只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顾我们国家的未来。”

记者手记

逃离成形

—

这里是厂区西北角的一个豁口，发散着呛鼻异味的浊水从豁口处往外流。豁口很窄，我得侧身挤进去。踏着一堆锈蚀的废铁管，我才走出这片工业废水制造的沼泽……

这是深圳南头区一家港商独资企业，主要生产塑料花和绢花。这家工厂雇用了200多名来自各地的打工仔。而给深圳劳动部门写信投诉的就是这家工厂的一位女临时工。

在深圳采访临时工，其艰难的程度远远超越了我的想象。我来这家工厂采访已经整整3趟，可连工厂的大门也没进去。森严的大铁门永远紧闭着，里面拴着一条足有半人高，吐着长舌的狼狗。我望狗兴叹。万般无奈，想起《深圳法制报》的一个朋友，找到他，他又找到当地派出所民警。在民警的带领下，我们找到

这个豁口，偷摸进入了采访地。我们走进了那个阴暗潮湿的临时工宿舍，采访到那个被严重烫伤、一直没有得到医治整个手臂已经溃烂的不满16岁的女临时工。

这是1988年的夏天，深圳的气温出奇的高，几乎每天都在38度以上。我来这里的任务并不是采访临时工的，而是追踪北京大学毕业生闯特区的故事。引起我对深圳临时工关注的是那天深圳一家报纸刊登的一条很短的消息，3个女临时工几乎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自杀身亡……尽管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死亡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悲剧。而每个意外死亡的后面，几乎都会有一个极致的经历。联想其它，我终于下决心改变采访方向，争取把深圳几十万临时工的故事告诉给读者。

当时在全国性的报刊上，还没有关注临时工的系列新闻出现。我产生了搞出独家新闻的欲望。马上给编辑部打电话，并给总编辑写信陈述理由。我的想法得到了总编辑和编辑部的支持。

采写计划一旦形成，就已经成为相对的旧闻。所以记者新闻采访中的“喜新厌旧”绝对是正确的选择。古希腊哲人说，人的一只脚不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流，它说明了时空转换是稍纵即逝的。新闻的新是相对的，记者要随时扑向最新发现的新闻。

二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深圳，与十几年前的深圳有着天壤之别。深圳建设开始的时间不长，每天从全国各地涌向深圳的临时工，有如二战结束后，重建欧洲的人们从世界各地涌向扼黑海出入门户的伊斯坦布尔。人们蜂拥而来，于是许多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相辅相成的。

30万临时工，当时超过了深圳固定工人总数近4倍，比深圳常住人口多5万人，相当于非洲吉布提这种小国的总人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聚集一地的最庞大的临时工大军。在这大潮般汹涌而至的30万临时工面前，我感到震惊和惶惑。不仅仅因为它的人数之巨大，成份之复杂，而是这个现象背后所掩藏的深奥的社会课题——关于社会、关于人、关于历史、关于现实、关于性爱、关于人权、关于文化心理、关于哲学背景……可以这样说，现代社会学所囊括的所有引人瞩目的理论，都会在深圳30万临时工生存空间中找到注释和答案。基于这样的思考，我眼前的深圳30万临时工就不简单的是一群打工仔，而是认识共和国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的一个载体。在新与旧的夹缝中，我看到的是共和国艰难前行的背影。这新闻的主题不可为不重要，这新闻的载体不可为不大。这是思考的结果。

新闻不可以没有思考，新闻的思考应该贯穿于发现、采访、构思、写作的全过程。没有思考而产生思想的新闻是没有灵魂的新闻。思考有多深，新闻表现就会有多深。思想是个海，而思考是个勺子。思考是个过程，思想是思考的结果。有人认为新闻仅仅是一种表现，这里发生了什么，你关注就得了，你写下来就得了，用不着思考。这是一种层次。另有一种层次是在采访、表现和摆布新闻事实的时候，融入个人的思考，让溶于其中的思想使新闻深刻起来，这就是所谓告诉人们这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这又是一种层次。

三

新闻不是哲学，新闻的思考不是哲学的思考。新闻的思考兼有理性与感性、逻辑性与文学性。新闻的思考必须找到事实的切

入点，找到新闻时效的切入点。

30万临时工在深圳的系列报道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组新闻毕竟第一次向读者揭开了深圳30万临时工生存的秘密，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问题，从而让人们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复杂和艰难。

这组报道被香港及许多外国通讯社转载——劳资矛盾、雇用童工、女临时工的性导向……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报刊第一次关注和揭示这类问题。

这组报道在当年全国青年报刊好新闻评奖中，几经争议后，给予了最高奖项。

相异性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的一种规律，人们在新事物的认识过程中，不可能那么统一，那么一致。对事物认识相异的广泛性，决定了记者对新闻事实思考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后，外资进入中国，独资合资企业大量涌现，传统意义的工人阶级主人概念发生了变化，如何看待这种变化？这需要我们来回答。《劳动法》颁布实施了，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否会在新条件下得到保护？童工现象的出现，使我们的《劳动法》和《义务教育法》都在接受挑战。采访中，最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占深圳30万临时工大多数的女临时工的遭遇。

女性是一道难解之谜。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她们的存在都可以证明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社会进步的程度。女性，是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不厌其烦论证的角色。事实证明，他们的做法并非偏颇，因为只有证实了女性这世界的一半，才能证实世界的另一半，从而证实这个世界。

水，平衡着地球；女人，平衡着人类。这似乎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我们真正地了解女性吗？她们作为女人，不仅要承担做人的痛苦，同时要承担性别的痛苦。在深圳采访过程中，我终于认

识到，了解女人比了解男人更难，因为女人的世界远比男人的世界更复杂。

那天晚上，我到深圳四海工业区采访，那里有蛇口工业区最大的一片女临时工宿舍。这里是中国单身女性最集中的地方，聚居着 7000 多女临时工。深圳有许多来料加工企业，在这种企业里，女工与男工的比例有极大的悬殊。深圳的一些纺织、印染、塑料制成品等领域的企业，是清一色女性王国。企业主的盘算决定了男女悬殊的比例：女工柔弱、听话、好管理、胆小怕事、不那么抱团滋事，且女性劳动力的价格明显低于男性工人。正是这种原因，深圳女临时工的人数达到了 25 万之多。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两性严重比例失调，同性高度集中的“特殊空间”。这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又令人束手无策的空间。社会学家从生理学角度分析人类后认为，男女比例相对平衡，是稳定社会和人类的重要因素。两性比例严重失调，则会造成人心理和感情的失衡，导致情绪的“斜坡效应”，以致于造成社会的混乱。无论在哪一个空间，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这种规律都难以违背和抗拒。对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我采访过程中，各级组织的接待者明显地在回避。性问题，一种罪恶，它只能悄悄存在，见不得人。问题可以回避，然而现实是难以回避的。当年，新加坡、菲律宾、南朝鲜等许多国家在开创出口加工区的时候，都遇到过年轻女性高度集中，性比例失调而导致的女临时工性导向问题。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藤泽幸日这样断言：“解决密集劳动型加工区女性工人的性导向问题，是比解决劳资矛盾、纠纷还要困难好多倍的问题。”

许多问题你看到了，是否能反映到报面上，既由环境的宽松程度所决定，也由记者的胆识所决定。我一直认为，记者在采访中是不应该有禁区的。许多时候，不是环境和条件禁锢了我们，

而是我们自己禁锢了自己，自己限制了自己。深圳女临时工的性导向问题，我一开始就把它列入采访计划，尽管这个问题我们的报纸从来也没有报道过，也从来没有记者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反映中国女性，但既然是问题，首先你要把它采访了，写出来，这是记者的职责。

这篇稿子如我判断一样，很快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女临时工性比例严重失调而引发的爱的惆怅，性的饥渴，哀怨的内心，焦躁的情绪，卖淫、插足、同性恋，还有愈演愈烈的同居、未婚先孕，这些只能在私下统计，只能在内参上反映的问题，终于摆在了阳光之下。

问题是不能遮掩的，如果出于某种策略这可以理解，但有许多情况，遮掩反而会延误解决问题的时间，丧失解决问题的最好机会。譬如吸毒的问题，譬如卖淫的问题，譬如法轮功的问题。舆论监督是一种权力，记者有权力揭示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而没有权力掩饰这些问题。

如今看这问题，似乎小题大做。可在当时的确要冒点风险。社会真的在开放和进步，只能这样解释。

四

《三十万临时工在深圳》系列报道发表后，我欲罢不能，接着写了6万字的报告文学《痛苦的年代》发表在《中国作家》上。它成为披露中国临时工问题的开山之作，尔后转载率之高超出了我的估计。心灵上得到的安慰是难以言喻的。我付出了，然而我得到了，我理解了开发建设深圳的30万临时工，而社会也理解了我。

在这篇报告文学的前面，我写下了这样的题记：

这是一个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分离
从而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年代；
这是一代注定要为中国历史付出代价
和承担痛苦的人们。

诗人这样预言：这株植物要长大
但此时却是胚芽。
增长——
然而逃离成形是命定的……

时间：1988年6月3日

作者：孙亚明

中国铁路悲歌

孙亚明：问渠那得清如许

中国铁路悲歌

中国铁路在改革的大潮中颤动。

翻车。撞车。客车着火。

买票难。乘车难。运货难。

丁关根引咎辞职，运输部组建中辍。世人瞩目，舆论纷纭。

丁关根勇敢地揭开了铁路改革的序幕。邓小平说：“让铁路闯一闯。”

80年代初。

猛烈的改革浪潮撞击着太平洋西海岸的古华夏大陆。承担着中国70%运输量的经济大动脉——铁路，仍在旧体制下沉重地运转着。

运输收入全部上交国家，花钱再由国家调拨。这就是铁路的

体制。

35年来铁路运输量增长了12.1倍，而铁路里程只增长1.3倍；机车总功率只增长5.1倍；15000公里铁路失修，30%的机车车辆超期服役。这就是旧体制留给铁路的负担。

主要干线上运输能力只能满足70%，上海、广州方向只能满足50%。这就是铁路的现状。

改革大潮隆隆，开放激流滚滚。货运量在猛增，客运量在猛增。

中国铁路何以应付这种全方位开放的局面？

1985年，入主铁道部不久的丁关根，果敢地筹划起铁路大包干方案。它的内容是由铁道部对国家实行经济承包，铁路每年除上交5%营业税外，全部收入归自己，同时铁路在“七五”期间要使客运量增长45%，货运量增长71%，修建新线、复线、电气化铁路近万公里，铁路机车车辆方面的工业投资接近前35年国家在这方面投资的总和。

赵紫阳、李鹏、姚依林对大包干给予肯定。邓小平说：“让铁路闯一闯。”

1986年3月，铁道部全行业经济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方案出台。当时在国内并没引起注意，而外国通讯社却纷纷报道：“中国最庞大的企业，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铁路承包，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工业改革。”

确实，一个拥有320万职工，上千亿固定资产的企业，对国家实行全面承包，这不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上的一大壮举，在世界铁路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30多年了，中国铁路第一次遵循商品经济规律搞运输。过去人们只讲生产，不管经济效益，现在收支归自己，上上下下都得学会算账，讲投入产出。

体制的骤变，推动着人员素质和思想观念的更新。铁路局、工程局、机车车辆厂的局长们，再一次被迫步入高等学府。仅仅一年半，铁道部利用北方交通大学为基地，轮训了所有司局长，不合格者不任职。经济师、会计师，第一次破天荒地摆到了重要位置。改革呼唤出它急需的新型人才、新型指挥员。

中国铁路第一次以主人的角度，审视自己，规划自己，发展自己了。

政治线、战备线……历史上新线建设不讲铁路部门的经济效益，由国家说了算，结果是随领导者的主观意志和政治气候变幻。

韶山，个人迷信岁月里建设的铁路，开始时是软卧、软座、而后以棚车代客车，现在无人无货可拉。停运！

通（辽）霍（林河）线，投资6亿元，建成420公里，运能2000万吨，运量仅有1/10，不足200万吨。

1966年至1982年建成的19条干线和14条支线，共10000公里，运量不足，运能闲置，仅1992年就亏损8.3亿元。

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密集，人口集中，铁路只占1/3，运量却占全路总运量的70%还多。丁关根毅然发起“南战衡广、北战大秦，中取华东”的三大战役。要扭转被动局面，从限制型运输向适应型过渡。

仅仅两年半，大包干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机车平均走行公里（也可以说是铁路工作量）比1985年前7年，年均增长24%。这是中国铁路史上前所未有的效益。

然而，尽管大包干挖掘出巨大的潜力，同时，也诱发出潜在和新生的矛盾激化。人们开始反思、探究，寻求新的出路。

龙年之初，事故迭出，血与生命发出警钟的悲鸣：中国铁路，你已经到了力量的极限。

人流，不可遏止的人流，冲进车站，冲上列车。

车厢弹簧压死，垃圾箱挤扁，行李架上爬满人，厕所里挤满人。

382万民工出川！成都、绵阳、广元……每天上车10万之众。

改革，开放，搞活。商品经济魔术般地把亿万农民从土地上呼唤出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个体经济遍布城乡。人的流动、物的流动，成倍增长。客车由14节增至16节、18节、20节，仍然杯水车薪。

今年春节刚过，川、鄂、湘出省民工达千万。

京广、京沪、宝成……主要干线上，常年超员100%。1959年落成，作为首都引以为豪的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站，设计能力3.6万人。现在每天上下车人数30万。

货运超负荷。丰沙线上，100节车厢，载着5000吨货物的组合列车，4分钟尾追一趟。

衡阳至广州，列车密度到8分钟尾追一趟。广州铁路局在修筑衡广复线施工状态下，运量不仅没减少，反而由1981年的1200万吨上升到1987年的1900万吨。

人员超负荷做贡献。

北京站，干部、职工常年连轴转。

北京列车段，春运增开列车缺员1400人，列车员这趟车下来马上又套乘另一趟车，有人竟然连续57天没回家休息。

1987年，中国铁路运量密度达23524换算吨公里，居世界第2位，中国每台机车运量比美国高1/4，每辆货车运量比美国高2.7倍，每辆客车平均运输量也居世界前列。

这是50年代的陈旧的设备，与80年代世界发达国家第一流水平相媲美的效益。

当我们赞美那些超劳的铁路员工，赞扬铁路取得的巨大效益时，是否从科学的角度反思一下：人的超劳，设备的超负荷，是不是已经违背了科学规律，降低了运输生产的安全系数？龙年之初，4起客车重大事故，死伤上百人，损失逾亿元。血的代价，发出警钟的悲鸣：中国铁路，你已经到了力量的极限。

数字令人黯然神伤：超期使用钢轨 12860 公里，1000 对客车列车中有 2294 节车厢是 30 年代制造。而铁路基建投资却连年下降。

某日凌晨，成昆线上。

541 次旅客列车飞速地奔驰着。

11 号车厢门口飘来一股白色气体。

“着火了！”不知谁呼喊一起。

紧急制动，列车猛停，车厢大乱。旅客纷纷从车窗争恐后地逃出。结果一场虚惊：茶炉喷吐的蒸汽，被误认是着火冒烟。

客车晚点，接站亲友、铁路员工家属都在打听：没出事吧？

人们的心头笼罩着一层恐慌气氛。

恐慌不无原因。

5.25 万公里铁道线上，超期使用钢轨 12860 公里，其中伤损钢轨 12 万根，相当于满载货物和旅客的列车在 1500 公里的伤损钢轨上飞驰。

1000 对客车列车中，1935 年至 1938 年造的旧型车厢 2294 辆还在使用。春运缺车厢，只好以棚车代客车，1988 年春节每日以棚代客 1517 辆。

当发达国家已进入电气化高速火车时代，我们仍有 40% 的运能靠蒸汽机车。

中国人均铁路拥有量居世界第 102 位。按国土面积平均拥有铁路量居世界第 73 位。发展中国家印度，国土拥有铁路密度是

我国的4倍，人均拥有铁路数量是我们的2倍。

交通运输，属公共基础设施，又带有国力开发性质。纵观世界发展史，任何国家工业化，必须使交通运输超前发展，由国家
对铁路实行优惠政策，或密集投资，优先发展。我国属于大陆国家，南粮北运，北煤南拉，长大距离，非铁路莫属。

可是，国家规定的铁路设备折旧率只有3%，照此，33年设备才能更新一次，谈何现代化！

早在1975年，党中央就明确指出，铁路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可是在我们面前展示的铁路基建投资数额：“一五”计划时为11.4%，至“六五”计划，已下降到4.5%。

违背经济规律，就难免要加倍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请看一组简单的数字：

1984年，3000万吨煤炭压在山西。如果运出，可多创产值500亿元，为国家增收利税125亿元。

1987年，江、浙、沪电厂缺煤。拉闸限电，当地减少产值100亿元。

铁路、邮电、公路，这些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固然投资需求大，可它巨大的间接的社会整体综合效益，确实值得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深思。

这是一部高速运转着的大联动机，每天都有10000列货车、1000对客车在运动中，只要一个关键人瞬间疏忽，一个要害部件意外故障，都会酿成灾祸。

1986年，劳动制度改革，实行合同制的消息传出，一场突击顶替风席卷铁路。好的政策由于某种原因带来的副作用，有时也会大得惊人。

四五十岁的熟练工人、技术工人办了“病”退，十七八岁的娃娃顶岗。仅运输部门就顶替上来91000多人。来不及正规训

练，繁忙的大动脉急需人员顶岗作业。对效率、安全的影响，至今尚未消失。

一年后，人员逆向流动：

丰西电力机务段，进口 100 台先进的电力机车，招收 200 名司机，报名只有 29 人，最后只留下 2 人。

北京工务段 60 个工区，过去每个工区 10 多名工人，现在平均只有 1.5 人，只好招收农民合同工维修铁道和道岔。

“50 年代人们都愿意上铁路，铁路待遇高。”一个老工人说。

“铁路苦、累、险岗位多，当个个体户都比铁路来钱容易。”一个青年工人说。

“上面压下来的任务多，职工收益少，铁路新民谚是‘大包干，越包越干’。”一位干部说。

韶关机务段两名乘务员被打，几十名乘务员联合行动，冲上 272 次旅客列车。拉架的党委书记当场跪下向职工求情，也劝阻不了。

商品经济的冲击，新旧体制转换，利益结构的变幻，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每个人头脑中都有双重价值的斗争、折磨和困惑，每个人都面临新的抉择，也向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现实要求：改造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位日本经济学家说：如果企业没有确定产品价格的权力，就不可能反映价值规律的市场供求关系。价格决定市场竞争力，价格定了，企业的命运就定了。

“铁路运价太便宜了！”

一个个体户在广州站货场里不无感慨地说。开始他还以为是铁路算错了价：从 500 里外用汽车运来的水果，竟和从广州运到 5000 公里外新疆的价格相等。

中国铁路运价，相当于 1936 年和 1955 年的价格。

一吨货物运一公里不到2分钱，只有公路运价的1/11，航空运价的1/60。

集装箱运输，每万吨公里成本为266元，铁路收费264元，倒贴2元。机械保温车每万吨公里成本为439元，铁路运蔬菜时只收218元，不到运输成本的一半。只有“社会主义”的大锅饭才赔得起。

木材涨价，钢材涨价，运输成本不断不升。仅机车用柴油一项，1987年就多支出4.4亿元。

严峻的外部环境使铁路自身建设缺少资金，职工福利待遇下降。

“丁关根成功在大包干上，失败在物价上。”当丁关根辞职之际，铁路职工竟如此平静。物价上升了，职工福利下降了，怨气总得有人承担。

一位经济学家说：“中国铁路要走出低谷，必须改变死运价对活物价、低运价对高物价的状况，按价值规律搞运输。”

中国的江河在呼唤千帆竞发；

中国的公路在呼唤改变现状；

中国的蓝天的呼唤更多的银鹰；

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必须走大交通之路。

作为大交通骨干支架的铁路，大包干仅仅是它在改革中迈出的第一步。在改革大潮的震撼中，下一步该如何走？

英雄的中国铁路员工，你们的使命注定是创造！

记者手记

问渠那得清如许

理性之光

“本报第一买书狂！”本报同仁李大同翻阅我提的一摞书，眼睛瞪得车轮那样大，叫了一声。

一位外地朋友见我居室一面墙全是书，不由得问道：“读得过来吗？”我有些茫然，不知如何作答为好。

我们封闭了二三十年，整整一代人的时光，当世界的大门大开，各种新思潮、新观点涌进，令人眼花缭乱，确实有从文化沙漠中走出来的感觉。太干渴了，无论什么水，捧起来就喝，来不及品尝，又有新的渴望，恨不得将世界上所有的新知识都一口吞下去。每次开会，记者们都带走一大包书，花钱买知识。记者宿舍“夜游离”成为“读书斋”，樊泉生、郭家实和我，大家天天在灯下读书直到深夜。

看书的层次高了，许多介绍当前新思想、新方法的理论书、“时髦”书带来新的冲击、新的发现，使我们审视事物的眼光也不一样了。过去——现在，外国——中国，有参照物，不由自主地比较，多角度透视，也就能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把采写的主题放在整个中国的改革大潮之中，进行全方位扫描。《中国铁路悲歌》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采写的。整篇通讯，无论从宏观的驾驭，还是具体示例的选择，都染上了思辨的色彩。戈理说：“要用思想火花照亮你的素材。”

改革的时代，是理性的时代。你不信服理性，那就难免落伍。在新闻界，两三年前还很不错的记者，很快被新浪潮抛在后面。中国有史以来，思想观念更新的频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快。记者们从思想观念到写作方式都面临全面更新的挑战。仅仅读书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思维方式和新知识的转化。

脚写的新闻

坐卧不安，整整一个星期。

我已经掌握了一系列中国铁路状况的数据。可是拿到报纸上的不是领导者的报告，不是学术论文，是通讯。

通讯必须用形象说话。去找形象。

南下列车。

窗外烈日如火，车内闷热、拥挤。孩子的啼哭声、因碰撞而火冒三丈的争吵声。人人心里烦躁。空气中弥漫着烟味和拥挤的人体散发出来的汗臭味。突然，一个旅客大叫一声，口吐白沫，抽起疯来。突发性精神病在列车上时有发生。无论是铁路干线还是都市的公共汽车里，拥挤不堪的状况，已经到了摧残人性的地步。这是坐小轿车，坐软卧车，甚至坐硬卧车里的人难以体验到

的。

火车头内，炉火熊熊、热浪难挨。有节奏的隆隆车轮声，催人入眠。可是司机必须全神贯注，一时疏忽就会酿成车毁人亡的事故。外界谁又知道这些司机每次出车都是提前4个小时到单位休息，然后才允许他登上机车。可是当今的中国社会，没有特殊的家庭环境，哪个中年人不是有一大堆家务事等着他干呢？接送孩子，买煤买粮买菜，还要出乘前提前去4个小时，难啊，创造着的铁路工人。

客车里、机车上，亲身体验，详细调查，在我的思维里，枯燥的数字和具体的形象联系起来了

里面所列举的这些数字是铁路上所司空见惯的，可是运用了对比手法，就奇峰突起，给人以强烈的反差，产生了震撼力。对比，在新闻写作中有着极广阔的应用天地。通讯一气呵成，竟然用了78个数字。环环相扣的对比中，不但不枯燥，反而加强了形象的说服力。数学有数字的力量。因此想到，理性时代，仍需要感性认识。新闻还得用脚去写。脚底板下出新闻。

宽松的环境

《中国铁路悲歌》透视出那么多问题，能不能拿到报面上来？

总编辑徐祝庆说：“这样的稿件，是应该登的。”

5000字的通讯，十点多钟交稿，第三天见报，中间经部门主任、总编助理和两位总编辑，一路绿灯。

报纸出来的当天，遇到首都报纸的几位同行，他们带着羡慕的口吻说：“你们报有胆量，有气魄！”

是的，《中国青年报》为什么会涌现出一批特别能战斗的编辑、记者？为什么会产生一批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报道？很重要的

一个因素是报社内部有民主和谐的空气，宽松的环境。

记者的稿件出现争议，报社首先保护记者，有了非议，社一级领导把责任承担过去。正是这种宽松的气氛，使记者心情舒畅，放开膀子能干，挥开笔敢写，目光四射，思维呈放射状。事物的规律就是这样，成功和失误的概率均等，不允许越格，也不会有突破性的成功。

“问渠那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宽松和透明的环境，是《中国铁路悲歌》成功之源。